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俄〕戈·瓦·普列汉诺夫 著



D05.12
P962
: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俄〕戈·瓦·普列汉诺夫 著

孙静工 译

郭从周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03319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俄国社会思想史

第三卷

〔俄〕戈·瓦·普列汉诺夫 著

孙静工 译 郭从周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19-3/D·186

1990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281千

印数2 000册 印张11 3/4 插页4

(60克纸本) 定价：15.0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92 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 3 月

目 录

第三部分 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续)

第三部分　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思想运动(续)

第七章　18世纪的西方社会思想及其对俄国的影响

I

温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仅仅法国人，他们对我国学术的促进作用，要比整个欧洲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这最少对我国18世纪的先进社会思想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先进社会思想从法国影响中得到的教益，要比从其余整个欧洲影响中得到的多得多。实在说，当时，其余整个欧洲也都处于法国的有力影响之下[①]。因此，我们必须对那时先进法国人的意图、观点和爱好，作一些较为深入的了解。

我在提到法国启蒙思想家时，不只一次说过：他们是第三等级同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斗争的思想代表人物。但是，就社会成分说，第三等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属于这一等级的，既有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的那些社会成分，又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些社会成分。当时在第三等级的内部，业已存在和逐步发展着各种经济矛盾。这些矛盾决定了下一世纪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进程。很自然，这些矛盾，在当时尽管还不很发展，但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

① 意大利人贝卡里亚说，他“在一切方面都得助于法国书”；科西嘉人曾请卢梭为他们写一部宪法，波兰人也请他写宪法，等等。

全部观点——当然，首先是经济和政治观点，却不能不发生影响。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

18世纪的法国，对经济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推崇法国重农学派，不是偶然的。但是，重农学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为由自然界本身决定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文明社会的《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制度》。他们教导说，在这种社会里，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纯收入。这种纯收入就是剩余价值。到底哪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是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研究。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眼光的范围内分析资本"的功绩，属于重农学派①。

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生产资料不属于劳动者，劳动者所有的只是本身的劳动力，因而不得不在市场上把这种劳动力出售；生产资料属于企业家；企业家购买劳动力，迫使劳动者把它使用出来。企业家和工人组成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最主要阶级。除这两个阶级外，还有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有些地方，也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就是这样一个由地主、企业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社会，按照重农学派的学说，乃是一种自然的制度。这个学派的鼻祖魁奈证明，如果在法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则利莫大焉。诚然，在他认为农业劳动是唯一能够创造"纯收入"的劳动时，他所说明的，主要是——如果不说纯粹是——农业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过，这是细节，完全不足以减少重农学派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性②。

---

①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斯特列尔斯基译，普列汉诺夫校订并作序。第35页。

② 魁奈提出如下论点："农民穷，则王国穷；王国穷，则国王穷。"这个论点使人想起俄国波索什科夫关于"农民的财富是沙皇的财富"的见解。由于波索什科夫的见解写在魁奈之前，所以在俄国，人们都跟着波戈金说，波索什科夫预告了最伟大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发现。我在本书第2卷(第3章)对于这个意见作了仔细分析，现在只是补充说明，波索什科夫怎样也没有想支持魁奈所宣扬的那种经济制度。按照魁奈的观

如果我们从经济学家转而看看当时一般称为哲学家[①]的作家，我们就可看到，他们都是把资本主义关系看作自然的生产关系的。例如，伏尔泰在所著《L'homme aux quarante ècus》(有40个银币的人)里虽曾机智地嘲笑重农学派的单一税要求，却在自己所著《哲学词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中十分坚定地说：

"人类就其现状而言，其存在是不能没有大量一无所有的有用的人们的，因为富人显然不会抛弃自己的土地去耕种你的土地；而如果你需要一双鞋子，则缝制它的，决不会是多少有些社会地位的人们[②]。因此，平等是一种最自然的东西，同时又是一种最难实现的东西。"

换言之，没有什么比权利平等更自然，也没有什么比经济平等的要求更不现实。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共同观点。排除经济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达到这样 à l'ordre du jour (议事日程)的阶段，甚至那些在理论上欣赏共产主义制度的作家，也都认为这个制度在现时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③]。

点，农民的财富必须以先有富足的农场主为前提，农民是在他们那里从事雇佣劳动的。这一论点，在魁奈的论文《农场主》(《Les fermiers》)和《谷物》(《Les grains》)里，都明确提出和详细论证。在这两篇论文的第1篇里，他写道："农人愈富，则他所增加的土地生产力和国力就愈大。而由贫穷的农场主耕作土地，则只会使国家受损失"。(《Encyclopédie》，《百科全书》第14卷，第49页，瑞士版)。在这两篇论文的第2篇里，他声明："所谓富有的农场主，不是指亲自耕作自己的土地的农民，而是指领导企业，并以自己的聪明和财力支持企业的企业家。"(《百科全书》第16卷，第447页)。因此，魁奈的上述论点可以表述如下：王国穷则国王穷；农民穷则王国穷；而农民在成为独立的业主的地方，都穷。显然，波索什科夫没有，也不能提出类似的见解。

① 不过，人们也称重农学派为哲学家："les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② 伏尔泰说："un maitre de requètes"(一个行政法院的查案官)。

③ 马布利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捍卫"财产公有这一令人愉快的观念"，以反对重农学派。但是他也声明：私有制的弊病，现在业已过于根深蒂固，不可铲除。(参阅他所著《Doutes proposès aux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 sur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A la Haye, 1768, P.15 et 24《就政治社会的

从这方面说，实质上，各式各样先进作家之间的差别，在于一部分人认为经济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从而力图揭示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优点，——魁奈及其门徒就是这样主张的；另一部分人则将这种不平等作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加以容忍，一方面指明它的有害后果，同时力图设想出一些能够减轻这些后果的措施。属于这后一类的作家，有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①。

经济平等不可能的信念，从启蒙思想家流传到大革命的活动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巴贝夫及其同志)，甚至最极端的革命派也认为经济平等是一种既不可能实现，又有害于他们事业的空想而加以否定。

不仅这样。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关于经济平等不可能的信念，更为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继承。他们与共产主义者相反，也只是要减弱这种不平等，而不是取消它。

II

事物的自然秩序统治于一切地方，只要在这些地方它未为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情况所破坏。伏尔泰认为，甚至在“野蛮”社会，也存在着他坚信为文明国家所需要的经济关系。“我们的法律是谁

自然根本秩序向经济哲学家质疑»，海牙，1768 年第 15 及 24 页。)卢梭也是这样想的，尽管他认为文明社会生活的一切消极方面，都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平等的消失而产生的。

① 我们在霍尔巴赫的著作里，看到一种后来为圣西门所详细发挥的思想。他说：政府以及所有正直的人们，必须经常关怀尽可能更多居民的福利，而不要为了某一阶级将他们牺牲。(«Système Social» etc Lomdres, 1673, t. 3, p. 74)(«社会体系»，1693 年版，第 3 卷，第 74 页)。爱尔维修认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减少一些人的财富，而增加另一些人的财富(参阅他的«全集»，1848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430—431页)。更详细地关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请参阅我的著作«Beiträgc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 Holbach, Helvetius, Marx», Stuttgart 1895(«论唯物主义史——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马克思»，斯徒加特 1895 年版)，载全集第 18卷。这里再补充一点，即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在阐述其关于财产不平等的危害的观点时，从来不曾从资本主义关系中举例说明。这是当时先进法国作家的思想方式的特点。

制定的呢?"——在他的一篇著作里，野蛮人问道。"是社会利益制定的",——野蛮人回答。"我想借此说明：那些占有椰子和老玉米的人们，禁止外人染指他们的这些东西；而那些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们则必须工作，才能取得食用这些东西的若干部分的权利。我在我国和贵国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其他法律精神都是不存在的(暗指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

自然的"法的精神"不仅应该决定公民权利，而且应该决定政治权利。伏尔泰也许会大吃一惊，如果对他说，"他的"弗尔尼庄园中的农民，甚至他的仆人，都应象他这位开明的弗尔尼庄园的地主以及其他"上流社会"的人们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里，表示支持代议制。但是，他只承认有产者的选举权。他说："私有财产创造公民。任何在国内有财产的人，都会关切国家的幸福。"("C'est la propriété qui fait le citoyen; tout homme qui possède dans l'état, est intéressé au bien de l'état") 由于在当时的国家里存在着若干具有一定政治特权的等级，所以狄德罗觉得必须说明：这些特权不应扩大到代表权上去。"无论某种相对的关系使人们处于怎样的地位，人们是作为私有主而取得代表权的。"① 这就是说，政治权利应取决于人的阶级地位，而不应取决于他对这个或那个等级的隶属关系。当时，狄德罗在启蒙思想家中是一个极端分子②。

尽人皆知，后来法国立宪会议只承认适合一定财产要求的"积极公民"才有选举权。这表明，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代表都同意以财产为选举权来源的观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由于是以第三等级思想家的身份发言，所以

① «百科全书»，第 28 卷，第 366 页。

② 卢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同。但是他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同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有分歧的。

在这个等级的富有分子的利益与无产者的利益相矛盾时，他们是维护富有者的利益的。他们的思想解放斗争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之内”的斗争。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在一切时候，一切地方都是有意识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的利益，那也是极端错误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记》一书中精辟地指出:“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普列汉诺夫注）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①

此外，马克思还补充说：“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如此”②。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启蒙思想家的改良意图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社会环境的范围。但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矛盾，当时暴露得还不显著。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当然要显得比现时好得不可计量。可以进一步说，当启蒙思想家维护私有者的权利时，他们所考虑的不是剥削者，而是被剥削者。

试举一例，卢梭在他所著《爱弥儿》一书中说：私有观念甚至应在自由观念之前灌输给儿童。根据这点（此处原书有脱落——译者）……但请注意一读《爱弥儿》第2卷的有关地方，就可看到，这种攻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应该怎样给儿童灌输私有观念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52页。——校者

② 同上书，同页。

按照卢梭的意见，应该给儿童讲明，物品是用自己的劳动将其生产出来的人们的财产。请看，这全然不是资本主义的财产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拉萨尔所精辟地表述，财产是一种异化的东西（Eigenthum ist Fremdenthum），因为富人的收入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而是由他人的劳动，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私有财产的主要基础是私有者的劳动。因此，珍视劳动群众利益的人们坚定不移地、热情地维护私有财产。然而劳动群众之受剥削，并不仅是通过雇佣。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群众往往处于对统治阶层的法律附属地位，他们必须将其劳动产品的或大或小部分交纳给这个统治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私有者”观念可能有双重意义。“私有者”既可以是那些有权向生产者征收一定贡赋的人们；又可能是那些必须交付这种贡赋的人们，即生产者。当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社会秩序趋于崩溃时，统治阶层的思想代表人物将贡赋收受者了解为私有主，而被统治阶层的思想代表人物则认为私有主是那些交纳贡赋的人们。在这后一阶层的思想代表人物捍卫私有权时，他们所维护的是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剥削阶级的利益。18世纪法国第三等级思想代表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当时的法国，资本主义关系尚未成为统治的关系；同时，某些对生产者的旧的、封建的剥削形式，仍然继续存在①。

剥削观念本身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的。我在另一地方说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只知道两种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收入：地租和资本利息，而企业家的收入，在他们看来，则是劳动者报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必须记住，才能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最少是对他们的左翼的思想方式有所理解。

我指出了卢梭在许多方面与启蒙思想家有分歧。但在这个场

①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著作能在心理上充满那样高贵的热情。

合中，卢梭的观点，却是与启蒙思想家完全一致的①。我所以特别引述卢梭的话，唯一的原因在于我觉得他的范例是最明显不过的。

毋庸争论，当人们不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在这里应该说，当人们没有客观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主观的、心理的可能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而维护被剥削者的利益时，他们必然要陷于矛盾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那些属于温和派的启蒙思想家，都陷进了这种矛盾。例如，怀疑论者的伏尔泰尽管同天主教进行过残酷的斗争，却竟然说什么生前作恶，死后报应，这同他的灵魂哲学观点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他所以这样说，主要是为了教训劳动群众。他经常坚决否定唯物论，而他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未能摆脱唯灵论的物质观，而且是因为他对于唯物主义宣传给社会安宁带来的有害后果（les Conséquences dangereuses），深感恐惧②。他未能理解唯灵论观点的没有根据，也是因为这同一种（只是不自觉的）恐惧的原故。对他说来，从资产阶级社会观点看来是有益的东西，比在理论意义上属于真理的东西更为重要。也许可以称他为现代实用主义者的先驱。不过，对他有利的是，在他和现代实用主义者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在伏尔泰的时代，资产阶级制度不仅没有陈腐，而是相反，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生命力，越来越广泛地扩展了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方面。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只要它没有度过自己这一发展阶段，——如恩格斯在与杜林争论中所正确地指出，——即使在这个制度下注定要遭受不幸的人们，也会兴高采烈地欢迎它。如果某一作家以这个新秩序的思想代表人物的身份发言，有时虽是更多地以利益的考虑而较少以理论真理的要求为指导，但归根到底，

① 参阅爱尔维修的«论人»（«De l'Homme»）第 10 编，第 7 章。

② 详请参阅 Y. Ж. 白里西埃: «Voltaire philosophe», Paris 1908, P. 173—175.（«伏尔泰哲学»，巴黎 1908 年版，第 173—175 页）

这并不妨碍他为进步事业服务。因为他心目中的利益，说到底乃是社会利益。然而当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生活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业已过时，业已成为"旧秩序"的时代，已经不能援引这一有利情况，而这一情况的重大意义，则是任何一个科学地认识社会思想史的学者所必须承认的。

III

黑格尔称法国启蒙哲学的时代为光辉的日出 (ein herrlicher Sonnenaufgang)。这个时代所以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它把一切旧信仰、旧传说、旧制度都召唤到理性的法庭之前，予以审判。尽管理性在对于这一切作出裁判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范围。但是在当时，这个范围是这样广阔，用同一个黑格尔的话说，它使世界渗透了精神的热情。启蒙思想家是一切使用这样或那样方法去镇压旧秩序的人们的辩护士。为了深信这一点，必须对当时的，比方说，戏剧创作，予以追述。

哲学占领了舞台，将它转变为传播解放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我在前面已经不只一次指出，启蒙思想家曾同君主专制妥协。但是，他们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妥协。这个条件就是：君主专制必须为启蒙事业服务。伏尔泰的诽谤者们直到现在还时常攻击他曾给登位的国王献了无数颂词。但是第一，他们没有看到，伏尔泰所以奉承这些权贵，是因为他希望推动他们去同他所仇恨的偏见和制度作斗争。第二，他们忘记了他在所写悲剧里，曾给掌权者以怎样的教训。冯腾 (А.Фонтен) 将科尔尼勒 (Корнель) 所写的«奥狄浦斯»同伏尔泰所写的«奥狄浦斯»① 加以比较，绝妙地

① 奥狄浦斯，古希腊神话中特维城王子，其父深信自己将被儿子所杀的预言，把他弃在野地。他长大之后，偶然杀了一个人，以后作了特维城的王，娶了该城王后。后来才知道被他杀死的是父亲，所娶的是母亲。他就把自己的双眼弄瞎以赎大罪。他曾猜出怪物所出的三个题，因此他的名字成了很有智慧会解决难题的人的代名词。——译者

说明了法国知识界情绪的改变。我们在科尔尼勒的作品里看到最能说明 17 世纪法国特点的语句:

人民为君主而死,

死得光荣。

相反,在伏尔泰的剧作里,奥狄浦斯却说道:

君主为国家而亡,

算得尽责。

这是在君主对待臣民的关系的观点上的一个大变革。同时,在关于王权的法律基础的认识上,也发生了与此不相上下的变革。在«米洛卜»里,伏尔泰通过波里逢迪的口宣布:

君主的第一件事是作个幸福的士兵,

只要对国家有利,

就毋须恪守祖训。

关于国王,他的布洛迪说道:

背叛祖先,

他废止了我们的誓言;

依靠罗马法,

他就敢于作个不忠祖训的人。

罗马不再是奴隶,

他已独自成为叛徒。

对于天主教的僧侣,伏尔泰奉承的言论就更少了,当时谁都了解,他在下面所宣告的,主要是对这种僧侣的抨击:

我们的神父

不是虚无恐怖者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的轻信

反把他们装扮成有才能的人。

至于他的«穆罕默德»就更不用说了。他在这里表达了当时统

治于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宗教起源观点。然而伏尔泰不是一人，追随着他的有许许多多作家，这些人虽然没有他那样大的天才，却都同意他的观点。在马蒙泰尔的剧作(«La mort d'Hercules»«黑尔库力士之死»)里，第扬尼拉由于先知者宣布泽列拉要求以人作为供奉，向第姆逢特慨叹道：

你敢对我揭穿一个丑恶的神话吗？
嗯，一个相当凶狠的骗子
　正在他们的庙里，
把灵魂交给上帝
　就以上帝的口气说话。
你听到他的可怕的怒声吗？
现在剩下一条七头蛇
　需要制服，
七头蛇就是过错，
大胆地埋葬它吧！

这同伏尔泰的 «ecrasons linfâme!» (раздвитегадину! 不宽容！)简直是一模一样。

但是法国的古典悲剧，在其鼎盛时期，是贵族社会的概念和趣味的最鲜明表现。它已不完全符合与贵族进行斗争的第三等级的心理了。资产阶级的戏剧是这个等级的解放努力在文学上的成果，它的创作者之一便是著名的«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如果说，资产阶级戏剧没有显示出艺术的美，但它毫无疑问，对于传播解放思想，却大有贡献。它的创作，本来就是为了宣传这种思想的。当时的悲剧就凭如下这一点，已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需要：即按照旧的规章，只有位高望重的人物，才能成为悲剧的主角。梅西埃(S.Mercier) 在 1770 年 7 月 10 日给汤玛的信中说道："都以为悲剧应由国王来演，都把外表的伟大当作实际的伟大。诗人……

使人们的认识走入歧途，——我敢说，他欺骗了我们。我想，应该向他们指明：勇敢、豪迈和德行都属于社会上的愚昧阶级(aux classes obscures de la société)，每一个人，只要他完成了从他的社会地位中产生的义务，他就可以希望成为同代人和后代人心目中的英雄。人就是一切，刺激因素是无足轻重的。"①

天主教的僧侣坚称，人的本性遭到亚当和夏娃的罪恶行为的破坏。启蒙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他们当中有些人以为，人就其本性而言不恶，亦不善，他是随着自己发展的环境而变恶或变善的。另一些人则同意卢梭的意见，认为自然使人为善，人只是在社会里变坏的。无论如何，这两种人都坚决反对教会的观点。曾是最著名的资产阶级戏剧理论家之一的梅西埃说："诗人应该相信，人生来就善……如果我认为他生而恶，我就会折断我的笔，让墨水在我的墨水瓶中干掉。你是谁，敢断言人是生而恶？魔鬼，谁教育你的？人们真正是生来就亲如兄弟哟！一切铺天盖地的巨大迫害，一切巨大的罪恶，都是为幽灵而作的。人们在想象中都充满了幽灵，并因幽魂而激动。"

所谓"幽灵"，应了解为宗教迷信；而所谓为幽灵而作的罪恶，则应了解为象巴托罗缪之夜②那样的血腥历史事件和一般宗教迫害。因此，梅西埃的愤激言词，在这里是直接地、坚决地指向僧侣的。但是在18世纪的自由主义剧作家中，无论是他或别人，都毫不认为人类的本性只是在宗教"幽灵"的影响之下变坏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对于那些并不包含什么"幽灵"的社会制度，对最高等级的任何特权，都提出了抗议。剧作家们将这些特权看为歪曲人性

---

① Sébastien Mercier sa vie, son ocuvre, son temps, par Léon Béclard. Pario 1903, P.790—791 (《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其生平、著作与其时代》，巴黎1903年版，第790—791页)。

② 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4日的前夜，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校者

的根本原因。同时，特权的占有者被描写得比特权的受害者更坏（当然，这同实际情况是并不矛盾的）。格弗说："在1760到1790年间，存在着两种关于人性的相反偏见：如果出现了两个出身不同的子女，那就可以相信，贵族子女会秉承种种可笑的姿态，种种巨大的缺陷乃至下流的恶行，而青年的平民知识分子却显示着最善良和最高贵的情操。"①

子女是在家庭中受教育的。毫无疑问，当时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比贵族家庭更为健康的社会机体。因此，毫不奇怪，资产阶级的戏剧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家庭关系，予以不一样的评价。它在描写贵族家庭时，总是迫使夫妇相互间不守贞操，迫使子女在没有道德规范中成长，模仿恶言恶行；而与此相反，对于资产阶级或农民家庭，则描写得既和睦，又幸福，其家庭成员之间，笼罩着相互眷恋的感情②。

我们在绘画中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格勒兹用画笔高度赞扬小市民和农民的道德。这引起了狄德罗和他的写作同人的热烈称许③。

至于喜剧，谁不知道莫里哀的《贵族中的小市民》一剧？这位小市民的学习优雅的贵族礼貌的可笑努力，现在还使我们心旷神怡。梅西埃责备莫里哀不该通过若尔当去嘲笑"简单而纯洁的诚实性格"，和"侮辱国家最受尊敬的等级，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侮辱那个构成国家的等级——资产阶级"④。所以，如果17世纪的法国喜剧给世界奉献了若尔当，那末，在下一世纪，它便会贡献出万德

---

① 《18世纪的法国戏剧》（«Le Drama en France au XVIII secle»），巴黎1910年版，第364页。

② 同上，36页。

③ 关于格勒兹在这方面的艺术活动，请参阅 Louis Hanteconur Greuze, Paris, 1913（路易·汉德逊：《格勒兹》，巴黎1913年版）。

④ 格弗：书见前，91页。

尔克——父亲，这个角色不但不使观众发笑，而且由于行为高贵，使他们深受感动，此外，他还几乎是令人鼓舞地宣扬了商业的道德优点①。

狄德罗由于非常明显的心理原因，一方面为西登的剧本感到高兴，同时却抱怨法国喜剧对仆人的不公正。后来，鲍马舍在所写剧本«塞维尔的理发师»(1775)和«费加罗的婚礼»(1784)里，为仆人进行了报复。他给仆人安排了比显赫贵族好得不可计量的角色，而且通过费加罗的唇舌宣称，如果按照对仆人的要求来判断，那就会找不出有多少主人配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这虽是一句戏言，却是非常辛辣的。机智而欢快的费加罗还善于发表严肃的议论；而当他严肃地发表议论时，他的话往往带有威胁。

这种威胁，由梅西埃的«L'indigent»(«穷人»)一剧中的贫苦织布工约哲尔说出来时，显得更为响亮。约哲尔和他的妹妹住在一小间陋室里，他们拼命工作，想勉强度过艰难的岁月，此外他们还想把他们的父亲从监狱里赎出来。父亲入狱是因为他被当局指定出席纳税会议，——即著名的"taile" ("人头税")，——但他不愿查封穷苦的欠税人的财产。雇佣他们劳动的承包商付给他们的报酬很少，而生活费用却很昂贵，所以约哲尔愤然写道："我所以穷，只是因为富人太多了。" ("Je ne suis pauvre que parce qu'il y a trop de riches.")

路易十四不能容忍荷兰的绘画。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同他的继位者不喜欢资产阶级戏剧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值得奇怪的是，特权社会对于第三等级思想代表的文学艺术倾向，不曾给予更猛烈的反击；就是对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学说，也不曾给予有力的反击，而这种学说的逻辑结论，则是推翻旧秩序。贵族社会对于经常

① 万德尔克父子，——西登所作剧本 Le philosophie sans le savoir «没有学习的哲学家»(1765)中的角色。

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现象和社会意识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很不理解的。

象格勒兹的绘画一样，资产阶级的戏剧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769 年某一法国剧院的经理想演出«哈姆雷特»，他将这个打算通知了坐在剧院大厅里的观众。可是观众却高喊："Point d'Hamlet! Le pére de famille!"("不要哈姆雷特！要一家之主！")①。

IV

引起文学艺术新趋向的社会原因，造成了在总体上构成 18 世纪哲学的各种思想在法国的广泛传播。就其理论内容说，这个哲学是对等级君主制全盛时代风靡法国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直接和无情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在它的拥护者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的敌人的时候，它也是唯物主义的。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唯物主义的伏尔泰就曾象一个唯物主义者那样高谈阔论。每当他不满足于对一切学派的思想家发出俏皮轻薄的怀疑主义的批评和对«形而上学者»加以恶毒的嘲讽时，他总是不辞辛劳地严肃考虑一切哲学的根本问题：主观和客观，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即身体，所以我思维；此外，我一无所知。"如果这是怀疑论，那也显然是这样一种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对于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能够不要其他非物质实体的帮助而感觉和思维的学说，是不适用的。

如果他一方面接受唯物主义的前提，同时却否定唯物主义的结论，则他们这种不彻底性，如前所说，部分地是由于他尚未能摆脱长期以来蒙受的唯灵论概念的影响，部分地是由于我称之为他的实用主义的东西，也就是他不愿意支持在他看来有害于社会安

① 格弗，书见前，176 页，附录。狄德罗的剧本«Le pére de famille"("一家之主")在艺术成就上并不出色。

宁的哲学真理。

伏尔泰所害怕的东西，很可能曾使许多第三等级的思想家害怕。作为结构严紧的体系的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在他们的心里占有统治地位。只有一些最勇敢的人们才公开和彻底地坚持它。因此，这些大胆的人们能够从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中得出在当时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条件下所能合理作出的一切结论。

必须记住，实际上，这些结论不仅具有理论意义。马克思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指出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密切联系。他正确地指出，如果人是从外界得到一切感觉、知识等等，那就应该这样建立他周围的外部世界，使他能够从那里取得应该得到的印象；如果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一切道德的基础，那就应该使个别人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相符合；最后，如果人的自由不在于消极地逃避这样或那样行为，而在于积极地表现自己的个性，那就必须消灭反社会的犯罪根源，并在社会里为每一个别人的活动提供天地。

那种使个别人的利益符合全人类，最低限度，符合他的同胞的利益的社会组织，应该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社会主义者是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分歧的。可是，就在社会主义者营垒之内，也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未能一致：不同的社会主义学派作出了不同的答案。尽管这样，完全无可争议的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学派在作出自己的特殊答案时，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无不以18世纪法国唯物论的结论为依靠，尽管在依靠的同时，对于它的“无神”论和仿佛不道德的学说，有时又予以批驳。

法国唯物论者虽然没有从自己的理论中作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怎样也不可能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他们毕竟按照理性的要求，力图改造人们周围的“世界”——即社会关系。轰动一时，而且实际上也很优秀的著作《自然体系》（«Systéme de la Nature»）——人们称之为唯物主义的圣经，——明确地说明，这一

著作的作者都是些多么热情和勇敢的改革家。该书第2卷第24章对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最有启发。这章的题目是«自然法典简编»(«Abrègé du Code de la Nature»)①。

«自然体系»②的作者从错误的东西不会对人们有益、有害的东西不会成为真理这个论点出发，猛烈地反对一切«幽灵»，因为“幽灵”使人类陷于谬误，而谬误又产生一切社会的恶。作者粉碎旧“偶像”。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使人们认识真理，不再忍受拖着锁链的奴隶的悲惨贫困生活。作者驳斥旧道德，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将道德科学建立在坚强的人性基础上。他们有时几乎很接近于共产主义。例如，他们用自然的名义对人们说：“自己享受，也让别人享受我给与所有我的子女们共同使用 (que jai mis en commun) 的财富罢！”他们大声疾呼，反对掠夺同胞，反对饱食终日、百无聊赖的富人。按照他们的意见，只有符合自然法典的社会制度才是公正的。我们已经知道，为了使法国社会政治制度符合法国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那些自然法典，必须完全革除旧的秩序。把它们革除是对最大多数法国人有利的。因此，«自然法典»的作者完全有权把自己看为人民的辩护士。

关于爱尔维修，情况也是这样。他的著作为俄国思想界，例如，拉季谢夫的莱比锡同学们所热烈传诵。尽管爱尔维修也将资产阶级所有制看为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和必要条件，但是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一个地方想证明，有产阶级的利益，在他看来，比人民的利益更为贵重。相反，爱尔维修坚定地反复说明：“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他认为民主的宪法是最符合人民福利的。按照他的意见，贵族等级统治的社会，是

---

① 我们在下面就又看到，这一章对于俄国读者也有强烈印象。

② 尽人皆知，这部书是由整个霍尔巴赫一组人写的，天才的狄德罗也参加了这个小组。

怎样也不能在其成员之间促进正义感和公民责任感的发展的①。他是一切特权的敌人，认为任何一种特权都是以不正义为基础②。

V

启蒙思想家着手出版其著名«百科全书»，开始了一件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著述事业。狄德罗所草拟的«百科全书»出版通告，就已发出了可以说是民粹派的民主呼声。通告写道："«自由艺术»界专搞自由艺术，已经搞得够多了。现在是他们应该注意一下«机械»艺术的时候了；现在是应该结束对占国家大多数的手工业者、短工、以及一般靠双手劳动过活的人们由于陈腐的偏见而采取的轻视态度的时候了。如果说他们是不幸的，那么，整个国家也都同他们一道不幸"。狄德罗向短工和手工业者发出呼吁，指出他们"所以认为自己应受蔑视，只是因为别人蔑视他们"，然而他们对自己是应有更高的估价的③。法国的知识界还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言词向本国劳动人民发出呼吁④。

① «全集»，巴黎1918年版，第2卷，第236—237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308页。

③ «Diderot» par Joseph Reinach Paris 1894 P.43—44（约瑟夫·赖纳赫.«狄德罗»，巴黎1894年版第43—44页）。狄德罗在另一地方（«百科全书»第III卷«艺术»条）对轻视机械艺术的人们进行了抨击。他说，这种偏见是那些寄食于愚昧无知的渺小暴君之门的寄生虫和说教者在城市中散布的。狄德罗说到这一切时服从于一种情感，就是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法国史学家们后来完成了历史科学的整个变革。奥古斯丁·梯也尔在1818年写道："当野蛮人在欧洲到处横行的时候，我们当中有谁听说过那种为人类保存工业艺术和劳动习惯的人们呢？这种人经常受着征服者和统治者的压迫和掠夺，过着艰苦的生活，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只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他们为自己的儿女，为全世界拯救了文明。我们就是那些受尽征服者无情摧残践踏的农奴、纳贡者、资产者的后代。我们赞美了一切，研究了一切，只是对他们所完成的事业，没有赞美，没有研究"。狄德罗的祖先也是那些受尽征服者和征服者后裔压迫的纳贡者和资产者。

④ 这里所引述的狄德罗的言论，使我们想起革命时期所传唱的一篇歌词。歌词写道："Les grands ne nous paraisoent grauds que parce que nous sommes à genoux; levons nous！""大人物显得伟大，只因为我们是跪在地下，让我们站起来吧！"

为了避免重大误解，我在这里必须附带说明：不要将事情夸大，以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有意识地准备了18世纪末爆发的革命风暴。保守派顽固地拿这一点来攻击他们。可是，保守派错了。

当时，曾有某些新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等)，看出了人民已无法忍耐，也许会起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但是，他们既不拥护革命的行动方式，所以对于日益接近的革命爆发，他们感到害怕，而不是欢迎。他们从心坎深处宁愿和平的改革、而不要暴力的革命。革命观念宣传家们的这种和平倾向，无论在文学或在艺术上，都有鲜明表现。用典型来表现第三等级意向的资产阶级戏剧，完全没有战斗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绘画，例如在格勒兹的画里，也是没有的。尽管启蒙思想家把第三等级的地位摆得比特权等级高得不可计量，他们在一致赞扬这第三等级的德行时，从不放弃机会突出贵族的恶行，但是他们对于贵族，仍然没有丧失希望，以为后者终将认识到自己特权地位的不当，从而力图至少也大大减轻特权地位对人民群众的有害后果。不是偶然，他们断言："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理性到头来总是有理的)。事实上，他们对于国王也抱有这种希望。他们以为，国王应该懂得，对于他们，统治自由幸福的臣民，要比统治被奴役的不幸臣民，舒服得多。在法国，这种希望在路易十六即位和杜阁改革开始时，曾活跃一时。但是杜阁当权不久，随着他的下台而来的是公开的反动。不言而喻，这不能不使启蒙思想家感到沉痛。他们的观点里浸进了沉重的悲观情绪。这一情况在当时尤为不可避免，因为前此在路易十五统治的最后几年，某些最敏感，最急躁的启蒙思想家，由于对法国政府完全失望，已开始极端悲观地看待法国。爱尔维修在我已不只一次提过的他的著作《论人》(这本书在他死后才出版)的序言里说道，他的国家业已完全陷于专制制度的压制之下而无法摆脱，因此它所能希望的只是外国占领罢了。由

此可见，“失败主义”——读者会原谅我用了这个野蛮的名词，非常可惜的是，这个名词在我国已是很常用的了——并不象某些天真的“革新派”所想象的那样新奇。不难看出，爱尔维修的这种独特的“失败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是由两种心理原因造成的：即对法国政府的完全失望，以及对法国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击败君主独裁制度的毫无信心①。应该同意，无论对君主制的失望或对人民的无信心，在当时都是有充分的心理原因的。

关于第一点是毋须证明的；至于第二点，我想指明：人民群众当时尚未表明他们对解放思想的理解和对这种思想的同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启蒙思想家有时会对他们发出尖锐的批评。现在的反动派就是利用这类批评来证明启蒙思想家意图的所谓反人民性质。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早就有不少人以其政治见解的渊博和其热情维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而出类拔萃。我在本书第1卷里摘录了商界领袖罗伯特·米龙在1614年国会演说的片段。在这些演说里已经发出了革命的语调。但国会的会场却被政府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借口，说什么要用会场来举行舞剧演出啊，而被关闭了。议会的代表被遣散回家。法国的工人群众对此漠不关心。他们毫不理解，政府所代表的统治者给了他们多么蛮横的侮辱。1789年，他们对于国会会场被关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Tempora mutantur！（形势变了！）但是在爱尔维修写他的《论人》一书序言时，他不可能知道1789年的事件会怎样发展（顺便指出，他不曾活到1789年），正如其他启蒙思想家也都对此未能预见一样。他们只能根据过去进行判断。

的确，在18世纪中叶，法国人民已开始逐渐觉悟起来了，逐渐变得更敏感，而且最主要地，逐渐变得更没有耐性了。这种情况在

---

① 爱尔维修这样谈到法国人："Nulle crise salutaire ne leur neudra la liberté"（任何单纯的危机都不会给他们带来自由）。

巴黎暴露得最早。1750—1751 年间，在巴黎，由于警察的无耻横暴，发生了异常重大的骚乱。参加骚乱的人们甚至说，要到凡尔赛去烧毁“用人民血汗”建造的皇室城堡。这些骚乱象一道道闪光，向人们昭示着暴风雨的来临。在 18 世纪后半期，类似的现象愈来愈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巴黎的人民虽然反对行政当局，甚至严厉谴责国王本人，但在当时却全然不拒绝君主专制制度。在 1757 年的骚乱中，曾出现威胁处死国王的宣言。但是对路易十五除威胁外，还提出要奥尔良公爵即位①。在这以后很久，人民的思想也没有超出更换皇帝的范围。

这样，人民的情绪是不能促使启蒙思想家放弃其将改良的愿望寄托于“开明君主”善良意志的旧习惯的。保持了这个习惯，他们可以毫不背叛自己而交结他们觉得在当时多少有些善良愿望、多少能够实现他们的解放要求——哪怕只是其很小的一部分——的君主。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的解放要求不是由国王，而是由号称制宪会议的法国国民议会实现的。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革命才能实行本质上革命的要求。但是由于启蒙思想家在提出具有革命性质的要求时，企求和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联合“开明君主”去实现它们；另一方面，由于国王有时不得不反对特权等级的某些完全陈旧的封建奢望，所以有些国王便觉得同先进的法国哲学家们交游，是不无益处的。于是他们给启蒙思想家写些殷勤亲切的信，邀请他们作客，送给他们皮大衣，发给他们养老金，听取他们的颂词，甚至——尽管远非那么愿意，——忠告。

这一切在最初的革命风暴爆发之后，就改变了。甚至在革命

---

① 参阅马尔西勒·罗弗的一篇有意义的文章：«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人民运动»），载论文集 «La vie parisienne au XVIII siècle», Paris, 1914（«18 世纪巴黎人的生活»巴黎 1914 年版）。

前几年，在百科全书派影响之下发动起来革命的青年法国人，也都越来越多地表露出不同的情绪。他们兴高采烈地读着普鲁塔克的书，倾慕古代共和派。这种情绪的改变，在文学和艺术中都有表现。在先进等级中风靡一时的资产阶级戏剧和格勒兹绘画，现在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现在所珍视的，与其说是在这些戏剧和绘画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家室美德，不如说是政治战士的光明正大的忘我精神。为了表现这种光明正大的忘我精神，试图重新复活古典悲剧①。这时，在绘画方面，格勒兹的地位与大卫相比，也大有逊色了。

要有新的雀儿，才会唱新的歌。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

VI

18世纪法国哲学所注意的主要问题是：根据理性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注意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由于这一原故，它才被称为解放哲学。

如果看看17世纪，则情形完全两样。按照笛卡儿的意见，同中世纪的哲学相比，新哲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maitres et possesseurs de la nature)②。笛卡儿对于社会制度问题，是很不注意的。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情形，也完全是这样。培根·费鲁拉姆斯基所看到的新哲学的主要任务，同笛卡儿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他说："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所注意的也同样不是社会制度，而是增加人对自然的权力。

增加人对自然的权力，意味着增加人所支配的生产力。由此

① 参阅谢涅为所写悲剧«Charles IX ou l'école des rois»（«查理九世或保皇派»）而作的序，这个剧本是献给“法兰西国家”的，在1789年11月4日演出。序写于1788年8月22日，就是说，在革命之前就已写成。

②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6-e parti（«方法论»，第六部分）。

可见，在新哲学史中，曾有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新哲学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换言之，促进技术知识的积累。这是对于哲学任务的功利主义观点。因此，可以说，17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在关于哲学的任务的看法上，是同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一样的功利主义者。在这里，所有的差别在于功利主义的性质。

在培根和笛卡儿时代，先进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使增加生产力的需要变得特别突出。伟大的思想家们对于这一社会需要的反应是，给哲学以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曾对自然科学，并经过自然科学对技术，发生异常有利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先进欧洲社会的内部关系。由于这种发展，第三等级在这种社会的生活里开始发挥前所不能比拟的、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旧的社会关系同他们的这种新的、重要得多的作用不相适应，所以他们便想把这些关系消灭掉。第三等级思想家所制订的18世纪解放哲学，表现了这个意向。他们所期待于新哲学的，已不是增加生产力，而是改造社会，使其适合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

现在看看俄国。前已指出，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们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的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他们向西欧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在本国增加各种技术知识的储备。请回忆一下塔季谢夫关于科学与理论的利益的议论罢！

彼得改革给俄国生产力的发展以异常巨大的推动。如果说，改革后，俄国的生产力比改革前要发展得快得多，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快到能使废除旧的社会制度成为18世纪俄国面临的问题。著名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起草委员会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当时在俄国存在的那种《中等人》——俄国的工商界并未受到法国解放哲学的触动，并不想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这种人是保守的，其一部分甚至是反动的：他们请求恢复旧秩序的一些方面，因为这些方面的

崩溃(部分地是由于贵族特权的增加),对于他们的利益带来危害。至于贵族等级，他们的有学识的代表虽然很热情地阅读伏尔泰和其他流行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但是作为等级,他们却未能笃信解放哲学的灵魂:即致力消灭一切等级特权,从而把劳动群众置于新的更自由的生存条件之下。贵族不仅情愿保存农奴制，而且如我们所了解，很成功地争得了这种制度的扩大。当时的贵族近卫军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迅速击败希图解放农奴的政府的。不言而喻，农民对于农奴制的沉重桎梏，是刻骨仇恨的，他们屡次企图摧毁它。但是,他们的企图本身,表明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微弱,他们距离建立真正新秩序的意图有多么远。

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在18世纪下半期，接触西方影响的俄国人虽然大大减少了从直接和实际(技术)效用的观点看待启蒙运动的倾向,但是,在他们那里,还不可能对宣称必须进行根本社会改造的哲学理论,发生认真的兴趣。

VII

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虽然当时的俄国社会，不愿实行法国解放哲学的实际要求,因而也不曾对它发生认真的兴趣,但是当时在俄国,却有个别的人物极为认真地对待它,决心用一切办法促成它的实际结论的实行。在这种人物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被推到首位。这位女王的相当浩繁的文学著作，被认为是她真诚愿望将略通文理的俄国小市民提到18世纪先进概念和意图的高度的证明。在这里,他的著名的“敕令”赢得了最多的赞颂。

叶利谢耶夫伯爵在《敕令》刊布一百周年纪念时，在激进派的《祖国记事》报上写道:“《敕令》公布之日是我们真正开始欧洲生活,从内部靠拢欧洲文化之日。在这一天,俄国人第一次获得称为公民的权利。”按照一位现代学者的说法,在《敕令》里,“充满了孟

德斯鸠、贝卡里亚、狄德罗等伟大思想家和高贵心灵的精神，后来许多代人都受到他们的影响”[1]。

对于这种极尽颂扬的评价，已到批判地对待的时候了。无可争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在俄国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人物——暂时还只是个别人物——能够热爱当代的先进解放意图，并为其实行献出自己的力量。尽人皆知，他们因为具有这种能力而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然而叶卡捷琳娜本人却不在这种人物之列。尽管她欢喜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某些观点和写作方法，——特别是伏尔泰的方法，但她从来没有认真地热爱解放哲学。叶卡捷琳娜把自己称为(也可能她真是这样想的)伏尔泰的学生。但正如米柳科夫所出色地指出:“她的伏尔泰精神散发着更多的轻薄的摄政王时代、而不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气味”[2]。她在即位以前很久写的札记里，谈到她不受成见的约束。这是对的。她是没有成见的。毋庸置疑，伏尔泰对于陈腐概念的天才嘲笑，帮助她摆脱这种成见。但是，尽管摆脱了旧概念的影响，叶卡捷琳娜却一点也没有接受新概念的影响。象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一样，当新的法国哲学答应给她利益时，她便是这个哲学的拥护者；而只要哲学家们敢于向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实际要求，与她的利益背道而驰，她便傲慢地付之一笑。列举这种例子并不费事。

在狄德罗盘桓彼得堡期间，叶卡捷琳娜时常同他谈到她所召集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当然，她没有放弃机会为她的《敕令》的自由主义而吹嘘。这位伟大的百科全书编纂人的一段札记表明，他的徒骛虚名的对话者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未为她的人民所理解的人物，似乎人民对于召集法典起草委员会所给予人民的恩德，未能

---

① H.Д.切丘林:《俄国立法文献——叶卡捷琳娜女王二世的敕令》,1907年版。序言,第11、6页。

② 《俄国文化史纲》第2辑,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398页。

予以重视。狄德罗注意地听取了他的殷勤的对话者的谈话，却按照自己的意见对事情作了解释。也许，读者还记得，克里扎尼奇一度认为俄国人民性格的一切缺点，都是由于"严厉的控制"所产生的。狄德罗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断定，俄国社会生活的万恶之源在于奴隶制度，而铲除这个祸害的最可靠手段则是自由。请注意哟！——自由，不仅是民事的自由，而且是政治的自由！在他看来，开明君主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臣民之中发展自由爱好，养成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自己的事业的习惯。狄德罗在理论上是天才，但在实践上却是幼稚的，他很认真地要求叶卡捷琳娜注意在"公正和开明的君主独裁制"中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位爱好自由的哲学家表示坚信：在这种君主独裁制的长期影响下，人民会陷入"甜蜜的，却是致命的梦境"。(un sommeil doux mais c'est un sommeil de mort)①为了抵制自己的开明君主独裁制的麻痹作用，自由主义的女王必须把她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变成常设的委员会，并正式将她的一部分立法权力移交给它。为了促使她采取这一"异常慷慨的措施"(acte bien généreux)，狄德罗要她相信，"倒霉的不是那些增加了人民权力的国家，而是那些国王权力变得没有限制的国家"②。叶卡捷琳娜亲切注意地听取了他的意见，这使他高兴。她也读了他的短简。但是，不用说，关于所谓无限制的君主权力的"倒霉"，她是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某次，在对他的种种解放计划进行了争论之后，她对他说，他忘记了地位的差别，"您是在纸上谈兵，纸是什么都能忍受的；而我，一个不幸的女王，却是在同人皮打交道，人皮是要敏感得多啊！"③ 可是，狄德罗没有丧失说服她的希望。离开彼得堡，在回巴黎途中，他在海牙停留了相当长

① Maurice Tourneux, Diderot et Cathérine II（莫里斯·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巴黎，1899年版，第144页）。

② 同上书，第150页。

③ 她后来将她的这一看法转告了塞究尔(Ségur)。

的时间，在那里，很无礼貌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手里拿着笔，读完了叶卡捷琳娜的«敕令»，说得简单些，就是在«敕令»上写了他的反对意见。就中第一条说:“除了人民，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国王。”

在一条反驳意见中说:一部写得好的法典应该这样开始:

“我们，人民，和我们，人民的国王共同宣誓忠于法律。按照法律，我们都受同一法庭审判。如果我们国王破坏法律，因而成为人民的敌人，则人民完全可以不再信守效忠的誓言，而仇视我们，追究我们，废除我们，甚至在必要时判处我们的死刑。”

请看，这已经够激烈的了。但是，狄德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直接了当地、尖锐地说明了他对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他写道:“叶卡捷琳娜毫无疑问具有君主独裁制权力(est une despote)。她是想保持这一权力并将其传给她的继位者，还是想截断它呢？如果她想保持它，那就让她随心所欲地草拟她的«法典»罢，她是不需要国人通过的。而如果她想放弃它，那就要把她的否定意见写进文件。①”

狄德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将他的反驳意见寄给叶卡捷琳娜。可能因为他知道：骆驼穿过针眼是千难万难的。这些意见是在他死后才到达叶卡捷琳娜手里的。毋须补述，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丝毫没有同意这些意见。在给格里姆(М. Гримм)的信中，她评价这些意见是“真正的空谈，对事物无知，不慎重，无洞察力”。她补充说:“如果我的 «敕令» 适合狄德罗的胃口，那它就将一切都颠倒了”②。从那以后，在她同格里姆的通讯里，就很少看到这位鲁莽哲学家的名字了。

这一事例，显示了在18世纪先进法国哲学家和他们同代的

① 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第563—564页。

② 同上书，第519—520页。

“开明君主”之间的思想分歧。启蒙思想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决心支持君主的专制权力，因为希望他们尽快地利用这一权力去解放自己的臣民，也就是去消灭专制权力。而“开明”君主则相反，他们讨好启蒙哲学家，是因为想在他们的帮助下更加巩固这个权力，消灭一切使这一权力受到约束的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分歧之下，要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他们相互之间尽管恭维备至，然而恭维愈多，对于双方的活动却愈少发生重大影响。

VIII

叶卡捷琳娜为了给自己的《敕令》辩护，反对忘恩负义的百科全书派的粗暴批评，在给格里姆的同一书简中写道："我断言，我的《敕令》不仅是好的，而且甚至是卓越的，极合时宜的，因为贯穿其存在的 18 年，它不仅未产生任何的恶，而且一切由它引起的，有口皆碑的善，都来自它所确定的原则"①。

叶卡捷琳娜自己也承认，《敕令》中确定的原则，都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抄袭得来的。既然这些原则都是“好的，甚至是卓越的”，那么，这就不是对她、而是对法国解放哲学的颂扬了。叶卡捷琳娜的荣誉，只是实施了这些“好的、甚至是卓越的原则”罢了。她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在给若弗莲夫人的信中，她写道："请您告诉达朗贝，我很快就给他寄去笔记。他会从那里看到，天才作家的著作，只要愿意加以应用，就能产生多好的效果。我希望他会满意这一著作，虽然它是一位新手写的，但其在实践中的执行，却是由我负责的。”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个《敕令》。尽管叶卡捷琳娜对《敕令》所根据的原则的实行，作出了保证，但是她深切知道，就在那时，她的实践已与原则分歧。“天才作家的著作”要求自由，而叶卡捷琳娜却在即位之际，就发布了 1762 年 7 月 3 日诏书，庄严承担

① 图尔努：《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第 320 页。

保持地主对农民权力不受侵犯的义务。她甚至超出限度地履行了这个义务，因为她不仅保持了农奴制，而且大大地扩大了它的范围。

这一情况是达朗贝所不能知道的，正如他不能知道叶卡捷琳娜的自由主义《敕令》很快就被禁止——当然是在她的同意之下被禁止的——一样。1767年9月24日参政院的命令规定，向最高机关分发《敕令》57份；同时说明，《敕令》的内容仅供出席者参考，不仅对于外人，就是对于办公室人员，也都不准分发，不准抄录，不准阅读。与切丘林的意见相反，"统治着"劳动群众的，无论如何，不是启蒙思想家，而是他们的对立面：汉日希之流，斯科季平之流，普罗斯塔科娃之流。

在方-维津的剧作里，普罗斯塔科娃对于贵族不能随便鞭打他的仆役的思想，表示愤慨。她质问："给我们发布的所谓贵族自由的诏书有何用处？"关于这个问题，斯塔罗杜姆幽默地指出："这真是个解释诏书的能手！"在这里，援引有关贵族自由的诏书是不合适的。可是，这位开明的女王有先见之明，她还发布了大量的其他诏书，完全确认贵族有鞭打其仆役的"自由"。因此，普罗斯塔科娃并不象方-维津所暗示的那样的大错而特错①。

叶卡捷琳娜由于是在俄国生活条件之外受到教育的，所以对于统治着当时俄国的劳动剥削形式，自不能有何偏好。她是不反对减轻这种剥削形式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对这一点费劲。同时，她很快就考虑到，这不为贵族所乐意，而她的一贯守则，则是避免不必要的惹祸。彼得三世被推翻不久，法国公使布列特勒评论她道："很奇怪，这位一向号称勇敢的女王，在需要解决任何足以引

---

① "在《纨绔子弟》初次上演那年(1782)，整个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53%)，都登记为贵族所有"——克柳切夫斯基在所写《方-维津的"纨绔子弟"》一文(见《随笔和演词合编》，莫斯科1913年版，第304页)中，很恰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起国内矛盾的极小问题时，却是那样优柔寡断。”她在新的位置上巩固起来之后，虽然年复一年地增加了自信，但是，对于她的贵族近卫军怎样也不会让她超越的界限，她都从来不曾忘记。她在同狄德罗谈话中提到的那张以极大的敏感为特点的人皮，是贵族的皮，而不是农民的皮。

每当提出改善农奴命运这个“该死的问题”时，贵族的皮确乎表现了巨大的敏感。这在极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叶卡捷琳娜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显著矛盾。叶卡捷琳娜不是一个能让自身的实际利益去为理论而冒险的人①。

狄德罗以为她会为了对人民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而自愿放弃其无限的权力。他又是大错特错了。权力对于她象空气一样必要；为了权力，她可以无所不为。用布列特勒的话说，“伏尔泰的女弟子”只要看到哪怕是极小的危险，足以使她丧失她敢于夺取的东西，她的自由主义的本能，便会立即销声匿迹。

例如，在《敕令》里，叶卡捷琳娜追随贝卡利亚和其他启蒙思想家，谴责刑讯。毫无疑问，她发表对刑讯的理论谴责，远在制订《敕令》之前。但在处理古列夫和赫鲁晓夫等对她阴谋反叛案件时，她却违反先进的理论，甚至违反侦查委员会的决定，命令对被告人进行刑讯。“1762年10月6日，根据女王陛下的上谕，对彼德·赫鲁晓夫，违反审讯及对质所获真相，进行笞刑拷问”。西门·古里耶夫也受同样的刑拷②。孟德斯鸠，贝卡里亚和狄德罗，他们的伟大

① 叶卡捷琳娜即位后，慷慨地奖赏了她的支持者，给他们分发了农奴和金钱。呼吁她“迅即登上俄国王位，借以挽救祖国于危难”的40人，获奖52万6千卢布及18,000名农奴。在废黜彼得三世的上谕里，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这些人是以被忠实臣民选出的人民身份来谒见她的。这样，对“当选者”的奖赏，就是将他们的“选民”的一部分发给他们作奴隶。对于选民，新女王也未忘记。她给他们的奖赏是降低盐价，每普特10戈比；比利巴索夫说得好：“必须吃掉一普特盐，才能感觉到女王的10戈比的恩惠”（见《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2卷第92页）。

② B.A.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伦敦1895年版，第2卷，第174页。

思想和高贵心肠，断然不会同意笞刑。然而开明的女王哪管他们！

人们断言，叶卡捷琳娜在其统治的末期，特别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有很大的变化。的确，法国革命迫使她放弃以前乐于使用的自由主义词藻。但是说她对其过去的观点业已失望，却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她有过什么失望，那不过是她已不能得心应手地把自己装扮为自由主义——有时甚至是“共和派”观点的坚决拥护者，同时却一贯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已。M·M·谢尔巴托夫公爵论及她时写道：“使她最为苦恼的是，当她听到关于某些案件的法律决定违反她的意志的报告时，她脱口而出地回答：‘难道我不能不顾法律而执行我的意志吗？’”她所以变成这样，全然不是由于任何失望的影响。她从来就是这样，无限的权力追求，——用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话说，独断专横的倾向使她成为这样。

她在1762年10月19日上谕中宣布：“秘密侦讯办公厅从现在起永远废除。”她的臣民热烈欢迎了废除可怕的侦讯机关。然而庄严宣布的改革，却只限于名称的改换而已①。

伏尔泰的女弟子对方-维津所提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打诨者，弄臣，小丑都无官衔，而现在却都有，而且有很大的官衔等等的答复，是人所共知的。她的答复是：“我们的祖先并不都识字。”这不明确。但是答复的下文却较明确：“这个问题是从自由谈论中产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方-维津很懂得这些话的意思，因而决定“取消他准备提出的其他问题，以免给他人以发表鲁莽的自由谈论的借口。”也许可以说，叶卡捷琳娜在作出这个答复时，已是感到失望了。但是，根据她对自由谈论的批评，草拟一篇她自己称之为“关于缄默”的上谕，这篇上谕约莫于20年

① 叶卡捷琳娜统治下，秘密侦讯办公厅改称秘密审讯处、其主持人为笃信宗教的舍什科夫斯基，此人于审讯被告——甚至“知名人士”时，曾用棍棒打击下巴，以致牙齿碎裂，甚至脱落。

前发布了。

这篇于1763年6月4日在莫斯科街道的咚咚鼓声中宣读的上谕，通告全国说，在叶卡捷琳娜的臣民当中，有一些"道德和思想败坏的人"竟然议论与他们全然无关的事情。仁慈的女王劝告这种人缄默，专心致力于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们这种慈母般的告诫和关怀不能对这些堕落腐化分子的心灵发生作用，不能使其走上真正幸福（原文如此！）的道路，那么，这种无知之徒中的任何一人都会懂得，我们那时将依法严惩，罪犯们将无可幸免地感受到我们雷霆之怒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们破坏安宁，蔑视我国陛下的意志"①。

这一严厉的"缄默"要求，是由于希特罗夫案件引起了纷纷议论，而向俄国小市民发出的。希特罗夫认为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反对女王与奥尔洛夫伯爵结婚。

叶卡捷琳娜长篇累牍地谈到国民教育的必要，可是实际上，她为国民教育很少尽力。为了普及教育事业，她聘请了包括著名的塞尔维亚人扬科维奇-德-米里耶沃（即米里耶夫）在内的各式人物。但她没有邀请热情无私、主动自愿为这一事业工作的诺维科夫。对她说来，诺维科夫是一个过于独立自主的人物。

方-维津向《真事和谎言的作者》问道："什么是我们的民族特性呢？""作者"（即叶卡捷琳娜）答道：我们的民族特性"在于对一切事物的深刻而敏捷的理解，在于模范的服从，在于具有创世主给予人类的一切德行。"

伏尔泰女弟子的这个答复，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尼古拉一世所赞许的那种民族特性理解，而尼古拉一世却是对任何哲学都是没有兴趣的。

---

① 比利巴索夫，书见前，第267—268页。参阅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5卷，第1457页。上谕在帝国所有城市中公布。

不要以为叶卡捷琳娜是由于受某种偶发的情绪的影响而这样回答方-维津的。否。她经常要求她的臣民“模范地”服从。至于她对这种服从怎样理解，可从她所说的皇太子费微的故事中看出。费微按照父王的命令，勤勤恳恳地给干枯的树枝浇水。对于嘲笑他的这种毫无意义举动的人们他驳斥道：“只有下命令的人，才能发表议论，而我们的事情，则是服从，驯服无怨地执行命令，不发议论。”

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所愿望的模范臣民！

如果我们注意到理论对于叶卡捷琳娜只是达到个人目的手段，则她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就毫不足怪了。

图马诺夫说得好：“她的政府措施的主要动机是个人虚荣，而不是考虑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任何见解。”即使某些措施给国家带来某种好处，那也只是由于她“希望不仅使俄国，而且使整个欧洲对她表示热烈的称颂。总之，叶卡捷琳娜的所有轰传一时的堂皇创举，几乎从未贯彻始终。它们都失败得很快，就象它们开始得很仓促一样”①。

在叶卡捷琳娜的性格里，有许多使她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暴君相接近的特点：她同他们都一样有才华，一样没有“陈腐观念”，一样能够关切文化的成就，一样精力充沛，一样冷静自制，一样冷酷无情，一样追求权力，一样丝毫不择手段。谈论她的什么理想和失望，是同谈论某一路易·莫罗或某一凯撒·波尔吉亚的理想和失望，毫无两样。

① «18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的影响»，载«俄国语文分离论文集»«Влияни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II века» в «Сборнике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 языка и словесности»，帝国科学院出版，第75卷，第9页杰尔扎温的评语：“她更多地按照政治或她的意志，而不是根据神圣的真理来管理国家和一般司法”，«全集»，科学院版，第6卷，626—627页。我们为了对杰尔伕芬表示尊敬，有权补充，他的这个严格的评语是在他写了颂扬叶卡捷琳娜的颂诗以后作的。他自己说过，当他写这些颂诗时，他还不知道女王的性格。

IX

了解18世纪先进启蒙思想家的意图的俄国人，都看到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践之间的矛盾，并为此感到恼怒。可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很少的。最大多数的人看不到这种矛盾，即使看到了，也不认为必须把它消除。他们都满足了。

卡拉姆津后来写道："如果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俄国时代加以比较，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会说，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国公民的最幸福的时代，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时代"①。

当然，这里所谓俄国公民，自应理解为俄国贵族。如果说，那时劳动群众的情况是很艰苦的，那么，贵族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确实生活得好些。叶卡捷琳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虽然很大，但为地主所喜爱，因为这意味着农奴制的保持和扩大。至于"独断专横"，那也必须记住，无论她是多么爱好它，但是，作为一个善于知人和极有分寸的妇女，叶卡捷琳娜处事面面俱到，既使狼吃得饱，又使羊过得不坏。她完满无缺地保持了专制权力，但对待贵族的态度，却与以前的皇帝或女王不同。在安娜女王时，切尔卡斯基公爵抱怨说："现在活着危险，对所有人都随便无端猜疑。"在叶卡捷琳娜的统治下，随便猜疑没有了。谁对女王不违反她的意旨，谁遵守关于"缄默"的上谕不干预同他无关的事情，谁就可以平安无事。叶卡捷琳娜是善于矫揉造作的。同以前各个朝代相比，甚至与伊丽沙白朝代相比，她的统治也显得——仍然是对贵族而言——既温和又宽大②。颂诗作者热情地歌颂了这一变化：

① 见札记《论古代和近代俄国》。

② M.M. 波果斯洛夫斯基说："整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从上到下，都打上了农奴制的烙印，因为所有的社会阶级都被奴役了。安娜和伊丽莎白时代的皇宫，按照西方样式安排陈设，以外国式的豪华富丽而令人惊叹。在俄国社会中，它成为西欧情调的

欢乐的泪河，

　从心灵深处奔流；

啊，温良的天使，

　和平的天使，

您身披紫红色的霞光，

　手持权杖，

从无际的天边下降，

人民幸福无疆！

在那里——

接谈时，

可以低声细语；

午宴上，

不祝福万寿沙皇；

不害怕杀头遭殃。

在那里——

女王的名字错写了可以刮去，

女王的肖像

也可以不慎落在地上。

在那里——

不流行丑角式的婚姻，

不使用峻法和酷刑，

达官们不吹胡子瞪眼，

公爵们不老母鸡似地咯咯有声，

宠儿不哈哈大笑，

传导处所，而究其实，它不过是一处广阔的地主庄园。这两位女王都是18世纪的典型俄国地主——农奴主。"(见«18世纪上半期俄国贵族的生活和道德风尚»,«科学论坛»,莫斯科，1904年，第6卷，第37—38页)。在这里，叶卡捷琳娜可以完全不放弃她的无限制的权力，而轻易地扮演一个自由主义的角色。

煤烟不污损颜面。

………………

耻辱啊，

把伟大的人物讹传为

可怕，可憎……

卡拉姆津在前引札记里更简短地表达了同一个思想。他写道："叶卡捷琳娜使君主专制清除了暴政的杂质。"谢尔巴托夫公爵有好多保留地接受此说。他比大部分贵族等级要求严格得多。大部分贵族等级认为他们事实上已摆脱暴政。最高当局对他们的态度的改变，是官宦等级逐步解放的自然结果①。然而正是这一情况使对这一改变的精神需要，变得迫不及待。

正好，法国解放哲学对于俄国官宦等级的解放事业可以大有补益。这个哲学在已将消除——哪怕只是部分地消除——"暴虐统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一切地方，都是有利的精神武器。俄国贵族的思想代表人物尽管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有不与他们的特权协调的观点，然而对于那些可以用来"从君主制中清除暴君杂质"的观点，反而是欣然接受的。例如，他们很欣赏孟德斯鸠关于欧洲君主向臣民发出呼吁和亚洲暴君靠恐怖而统治之间的差别的议论。孟德斯鸠在确定这一差别时，发表了我们所熟知的波丹的观点②。可是，当波丹写成他的著作时，俄国的官宦等级还看不到欧洲的政治文献，所以当孟德斯鸠复述波丹的思想时，这个思想便深为这个等级的欧化分子所爱好。由于这个思想复述在《敕令》

① 对官宦等级人物的态度改变，从以下情况中已可看出：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把她推翻彼得三世说成是对饱受暴政灾难的俄国人的真正悲天悯人的丰功伟绩。她在1762年7月7日上谕中写道："大权在握的君主，独断专横，不以爱人类的善良品质来限制自己，这是一种巨大的罪恶，是造成许多灾难后果的直接原因。"因此，她必须表明：她虽取得君主权力，却善于克制自己。

② 象波丹一样，孟德斯鸠（见《法的精神》1，XV；章 VI）说，"莫斯科人"是一个受治于君主独裁制的民族。

中，所以俄国贵族对于《敕令》大加赞扬，而且不能不大加赞扬。

《敕令》指出土耳其各国对臣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很少注意，而且以"温和的国家"与之对立：指明在"温和的国家里，最下等的公民的财产与荣誉，也都受到尊重①。俄国的欧化贵族深信，叶卡捷琳娜所谓下等的公民，绝不是农奴；所以对于将"土耳其各国"与"温和的国家"相对立，他们只能拍手称快。这种对立等于约许在俄国实行这些"温和的国家"所特有的政治体制②。

《敕令》说，在温和的国家里，"不伤害任何人的生命，除非祖国反对它。然而祖国是不伤害任何人的，祖国首先给他们以一切自卫的手段"③。事情不能再好了。俄国官宦阶级不是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时期就已梦想这种温和的政治体制吗！在某些沙皇所颁发的证书里，所谈的就是国家管理体制而不是政体。证书里所说的最高当局的权力，仍旧是漫无限制的：只是采取措施避免滥用这些权力罢了。以往，由于官宦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即新兴贵族和大贵族之间的冲突，这种措施方案是不能实现的。但在现在，大贵族已不再是新兴贵族的威胁了，官宦阶级已可使用其各个阶层的联合力量去争取某些让步。他们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愿望取得让步，因而对于女王自由主义言论中的一切让步暗示，都热烈表示欢迎。

叶卡捷琳娜装腔作势地承认，她在《敕令》里"剽窃"了孟德斯鸠。但是，不要以为她在"剽窃"时不是小心谨慎的。她在一切方面都有分寸，而且从来不忘记自己。

柳特什说得对，孟德斯鸠是有限制的等级君主制的拥护者，而

---

① 《敕令》，第 113，114 章。

② "地主的仆役都无私产，他们所有的财物，都属于主人。在 18 世纪，还有什么比贵族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更无保障和更不稳固的呢？他们的财产是每分钟都可以被没收的。"（博戈斯洛夫斯基：书见前，41 页。）

③ 《敕令》，第 114 章。

“叶卡捷琳娜则信奉所谓合法的，但是官僚制的君主制理想”①。这里有着巨大差别。然而俄国贵族的政治要求并不苛刻。他们准备满足于“合法性”。

X

喜剧«啊，时间！»的作者在给«绘画»杂志出版人（诺维科夫）的信中，对于这一喜剧所引起的社会评论，作了有趣的“注释”。剧中人之一受到殴打。剧作者（叶卡捷琳娜）承认：“我听说，某些评论家对于剧中猥亵地安排菲尔利弗留什科夫先生由于说了些下流话（由于多次不如约偿付赌债——著者）而受到鞭笞，有所议论。他们说：‘怎么！贵族竟因不名誉的事情而受鞭笞？’② 叶卡捷琳娜为了辩解，援引刑法典说：‘批评家先生可从刑法典中看到，人们由于下流的言论和游手好闲，会受到怎样的处分。’但是，这样的援引不能使贵族满意，因为他们的新的意图已非旧法律的范围所能包括。叶卡捷琳娜懂得，在这样的情形下，必须让步，也可以让步。在颁发给贵族的特权证书里，她豁免了对他们的体罚。

对贵族施用笞刑，——尽管只是由于不名誉的事故，——毫无疑问，是与贵族荣誉的概念不相称的。但这一概念在俄国贵族庸人的头脑中缩小到什么程度，可从以下一个例子中看出：

卢金写的喜剧«慈爱的阔人»，其主角多布洛舍尔多夫——一个轻率的，但并不凶恶的人——在谈到他的仆人华西里时说道：“尽管他是一个好的庄稼汉，却仍存留着凝结于他们那类人身上的仇恨和恶意。”后来，他相信，在忠于他的华西里的心灵里，既无仇恨，也无恶意，又赞叹道：“至于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在你们同类

---

① «十八世纪俄国的总结»论文集（Сборник «Итоги XVIII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 1910 年版，第 16 页。

② «画家»，1772 年，第 1 部，第 7 张，着重点见原稿。

人中所罕见的品德。不要怜惜我罢！请揭露，控诉，斥责，制止我的傲慢和骄横罢！”激动的老爷甚至想给自己的农奴以自由，而当农奴表示拒绝时，老爷的惊异是无限的：“啊！这样善良的人真少见哟！你的德行使我惊奇。”

这样的恭维比辱骂还要难受。为什么激动的多布洛舍尔多夫甚至在想恭维他的奴仆时也使奴仆难受呢？涅泽列诺夫教授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用剧中主角发言的卢金，是一位“受了欧洲教育”的人。这是毫无道理的。这位笃信宗教的学者对于法国解放哲学(虽然，他对这个哲学是毫无所知的)的“坏的方面”作过长期不懈、但是很不成功的揭露；然而他并不了解，当多布洛舍尔多夫——或者，也可说当卢金——谈论**德行**时，他所提出的观念，显然也是从“受过欧洲教育的人”，即孟德斯鸠那里抄袭过来的。可是，两人的话虽一样，意义却并不一样。孟德斯鸠所谓德行，是指激励贵族服务国家的那种立功意图①。他全然不是把这种意图拿来与非特权等级的“缺乏荣誉感”，或其他类似的“僵化”品质相对立，而是拿来与他认为是东方君主独裁制国家居民所特有的对荣誉和功业漠不关心相对立②。因此，很显然，在多布洛舍尔多夫(卢金)的头脑里，那种毫无疑问是从“受过欧洲教育的人”那里抄袭来的荣誉观念，却有着与当时的欧洲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征。如果说，在俄国，贵族的荣誉观念是以农奴仆役的屈辱观念为补充，则其来源不是别的，而是由于人民的被奴役。卢金不满意俄国作家为剧院写出了一些“**不表现我们的德行**”的剧本，在这个场合里，给

---

① 孟德斯鸠说：“La nature de l’honneur est de demander des préférences et des distinctions”（人的天性是要求特惠与荣誉）（见«法的精神»）VII 第1.111章。

② 他说：“Les hommes y étant tous esclaves, on n’y pent se préférer à rien”（既然人在这一点上全是奴隶，对这一点我们也只可最不喜欢）。

自己的主角提示的"恰恰是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议论①。

如果法国思想解放的著作受到了资产阶级眼界范围的限制，——当时，在18世纪，资产阶级的眼界要比现在广阔得不可计量——那么，俄国的这种著作却为贵族的眼界所局限，同时，由于农奴制的存在，这个眼界在当时比现在还要狭隘。因此，就在俄国欧化贵族所能接受的这一极小部分西欧解放学说里，也可看出带有我国乡土风味的大量"残暴"杂物。

与贵族一君主制的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地主对农民的"残暴"和最高当局对地主的"残暴"，并行不悖。贵族的解放过程不能使统治阶层限制君主的权力。农奴主感到这一点，因为在提要求时，很是拘谨的。他们——就其绝大多数说，——都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给他们作出的微小让步，而并不要求重大让步。当叶卡捷琳娜命令俄国居民在向最高当局上书时签名不称奴隶而称臣民时，书报上发出了一片欢呼声。此前不久在所写《农奴颂》中为农奴制之推行于小俄罗斯而痛心疾首，眼泪滂沱的卡普尼斯特，现在为"俄国消灭了奴隶称呼"而欢喜欲狂。他的喜悦的心情竟然如此热烈，似乎可以设想，俄国真正变成自由的国家了。

啊！这一天——
　比胜利之日还要光明灿烂，
从天上——
　女王下降到人间！
不自由的沉重枷锁，
　已被砍断。
俄罗斯呀，
　你现在自由啦！

---

① 请回忆法国启蒙思想家怎样责备法国的旧喜剧对仆役的不公道。（参阅本书前1章）

欢呼罢，永远欢呼罢，

　欢呼叶卡捷琳娜福寿无疆！

她重新给了你生命，

上帝的慈悲，你应看见，

在未来的全部时间里，

幸福与自由将紧紧相联！

“奴隶的称呼”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俄国名门贵族的权利、自由和财产特权状况相对立的。因此，新兴贵族为这一称呼的取消而欢乐，是有根据的。科斯特罗夫，如所共知，是经济农民出身[①]，他比卡普尼斯特“歌唱”得更为响亮：

已昭告：

　再不是奴隶，

　而是祖国的子孙，

　　是英雄，

　　是缪斯[②]的爱好者

　　是值得称赞的公民。

用全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哟，

对于我亲切的不是称呼，

　而是您对我的慈爱的心！

已昭告：

　崇善去恶，

　作一个善良的人，

　从今后叫我作母亲……

请原谅罢，女神，

　我这里泪落满襟，

---

① 1764年前教会、修道院所属的农奴。——校者

②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科学的女神之一，给诗人灵感的诗神。——校者

您的神圣的言词

盛情心领！

啊！用欢乐的眼泪……向您问讯：

你的神殿在何处？

你的祭坛、神香何处寻？

它们深藏在俄国人的心灵！①

不用说，不一定要做了贵族才会对自己免除了屈辱的奴隶称呼而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只是保持着俄国当时的贵族概念，那就会易于忽视"在俄国消灭奴隶称呼"并不曾使俄国农民摆脱奴隶地位。对于平民知识分子科斯特罗夫似应期待对这一改革采取更多的怀疑态度，可是，统治阶层的礼赞欢呼，也感染了他。

XI

由于法国解放哲学促使俄国君主制清除"暴政的杂质"，所以对于它的影响——无论其范围多么狭小，应该承认是卓有成效的。对于这一点，就是象涅泽列诺夫教授那样的学者，他们尽管讨厌法国启蒙思想家，也都不能否认。但是，只要问题涉及这一哲学对于18世纪俄国人的道德影响，情况就会迥然不同。除对解放哲学不甚了了却公然仇视这种哲学的涅泽列诺夫教授外，许多其他学者也大都认为这一哲学以其"坏的方面"对俄国社会施加了坏的影响。这个问题是值得细心探讨的。

看来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争论：既然这一哲学有其"坏"方面，——请问哪个哲学没有坏的方面？——则很自然，在其所渗透的一切国家里，它都会由于这些"坏"方面而产生坏影响。不幸的只是，这种简单的见解，由于内容贫乏而极端简陋，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

① 《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王即位全民欢庆节日书简》。

毫无疑义，法国解放哲学也象任何其他哲学一样，是有其“坏的”方面的。但是，试问这些“坏的”方面都是些什么呢？只有下功夫对它作过研究的人，才能对此作出较为严肃的回答。然而在谈论解放哲学的人们当中，却有许多人并没有下过功夫。因此，他们对于这一哲学的所有各个方面，既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都一直茫然无知。在对问题采取这种态度的情形下，要胡诌些经不起任何轻微批评的东西，自属轻而易举的事了。

关于法国 18 世纪哲学，在我国是更多地用德文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我国学者迄今还常常引用著名的赫尔曼·赫特纳 (Herman Hettner) 的著作，以他为这一哲学的真正权威。但是，第一，他对法国 18 世纪哲学的了解是很肤浅的；第二，他缺少一个历史学者在同革命时代作家打交道时所必需的思想勇气。赫特纳能够用来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畏逻辑相对立的，往往只是一种市侩的愤怒。在法国唯物主义者企图解决新的理论课题的地方，他看到的却是不道德的宣传。对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否定态度，从他那里传授给许多俄国学者。我们有一切根据设想，当已故佩平批评《自然体系》的唯物主义是“粗鲁的”唯物主义时，他是师法赫特纳的；而佩平却毫无疑问是我国一位最严肃认真的文学史家。佩平尚且如此，则从涅泽列诺夫教授那里还能希望什么呢？既然决心不加批评地重复对解放哲学极端代表人物的学说的否定意见，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它里面发现任何数量“恶的方面”，而且把许多同它毫无因果联系的东西，强加给它。

在为叶弗列莫夫主编出版的方－维津文集写的序言里，皮亚特科夫斯基正当地指出，18 世纪的俄国作家，往往不善于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作些深入的思考。他还说：

“如果我们在那时的文艺活动家身上极少看到彻底性，但在日常生活中，法国的影响却产生了《旅长》一剧中的大量旅长子弟，

——伊瓦努什卡之流，他们胡诌一些关于婚姻和对父母态度的不可理解的词句，说这些词句是从熟悉法国思想家的流行观点的人士中听到的。伊瓦努什卡之流关于尊敬父母的谈论，用喜剧的形式表达了爱尔维修的思想。"

这里的话，句句皆错。何谓法国影响？法国贵族社会发挥的是一种影响，而法国百科全书派和一般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巴黎逗留过若干时日的伊瓦努什卡所接受的是什么影响呢？他说(见《旅长》，第1幕，第3场)："书呆子以为……脑袋必须从内部、而不能从外表进行修饰。全是废话！鬼才会看见什么东西藏在内部，而外表却是人所共见的。"解放哲学的拥护者难道会说出这种话？不会。他们的见解完全不同。如果荒唐的伊瓦努什卡能够抄袭法国人的论点来反对从内部修饰脑袋——对于这一点完全可以怀疑，因为这里的荒唐达到夸张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那么，难道这种论点只能从与哲学素无渊源的法国上流社会的那些虚伪无聊之辈中抄袭得来①！伊瓦努什卡的婚姻观点也是从法国上流社会抄袭得来的。他承认，固定的妻子使他"产生恐惧"，因而发誓，如果他的未来的妻子是固定的，他要同她离婚。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在法国贵族中广泛流传的那种偏见，尼维尔-第拉-肖塞 (Нивелль-дела-Шоссэ) 在1735年所写剧本《流行的偏见》中即已对这种偏见表示反对。启蒙思想家是一点也不赞成这种偏见的。如在前章所述，他们是乐于用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稳定性来同贵族家庭的动荡相对立的。由此可见，这里完全谈不上什么伊瓦努什卡的偏见是从"熟悉法国思想家的流行观点"的人士中听到的②。

---

① 刊登在诺维科夫主编的《晚霞》中的一首诗《北方的拜兰节》里，通过年轻的花花公子说道："贵族生来就与哲学无缘"。伊瓦努什卡无条件地与他有同感。

② 刊登在诺维科夫同一刊物里的另一首诗里，劝告趋慕时髦的人，按照贵族的

关于儿女对父母的关系问题，伊瓦努什卡在与他的父亲争论时是这样说的："既然狗崽仔不定规要孝顺生它的那只老狗，难道我就应该对您有任何孝顺？"①

在亚里斯托凡的喜剧«云»里，斐吉皮得在同他的父亲斯特里卜西亚得争论时，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其相似之逼真，不禁使人发生这样的疑问：即方-维津在这里是否效法亚里斯托凡呢？——特别因为他，如所周知，一般说来，是大量抄袭外国作家的。但是，无论如何，当皮亚特科夫斯基说"伊瓦努什卡关于孝顺父母的议论是以喜剧的形式表述爱尔维修的思想"时，他是大错特错了。这些议论之不能反映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如斐吉皮得的主张并不表述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一样。

XII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承认法国唯物论的"粗鲁"，关于18世纪解放哲学的"坏的方面"问题，就意外单纯地解决了。这个哲学的所有接近"自然体系"粗鲁理论的东西，都是坏的。由于这种著作在当时的俄国获得了许多读者，所以，为什么法国哲学能够对俄国人发生坏的影响，也就完全明白了：这就是因为它在俄国人之间传播了粗鲁的唯物论原则。我们知道，伏尔泰没有放弃同唯物主义者的论争。然而就是在他的哲学学说里，也易于发现极为明显的唯物主义影响的痕迹②。因此，他的学说也必然会动摇俄国读

风习，在结婚后立即与妻子离异。诺维科夫的同事们比皮亚特科夫斯基更懂得这类问题。

① 第3幕，第1场。

② 解放哲学的毫不妥协和极为彻底的敌人约瑟夫·第-麦斯特尔建议对所有虽非唯物主义者，但却"过于"推崇物质并损害"真理原则"的名誉的哲学家都给以唯物论者("Matérialiens")的称呼。(«Examen de la Philosophie de Bacon». Bruxelles 1844, t.1, p.263«培根哲学的考验»，布鲁塞尔1844年版，第1卷，第263页)。伏尔泰很推崇物质，因此无疑地属于唯物论者("matérialiens")。

者大众的道德观念。涅泽列诺夫在贯彻这个结论方面比其他俄国学者更为勇敢。他几乎将18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有他不喜爱的东西，都归罪于解放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在他的眼光里，整个法国哲学都是极为丑恶的。按照他的意见，在法国哲学里，"邪恶的原理遮盖了真理的光辉"①。

涅泽列诺夫教授断言，法国解放哲学促使俄国文学传播肉欲、轻浮和对生活邪恶的姑息。毋庸解释，一种哲学，当它本身就是第三等级同旧秩序的生活邪恶斗争的思想表现时，是不可能对生活中的邪恶采取姑息态度的。同样，任何人都会同意，著名的《百科全书》完全不能说是轻浮的文学遗产。把讥讽当作轻佻，等于把学究气混同于深思。这正如马克思正确地说，正是嘲笑**可笑事物**的人，才会**认真地**对待可笑事物。

关于肉欲的指责，情况却不是这样。实际上，乍看来仿佛涅泽列诺夫和其他同意他的观点的学者——他们是多不胜数的——并非完全不对。在伏尔泰的长篇小说和狄德罗的某些短篇故事里，无疑地有些如果不是肉欲，也是接近肉欲的成分。这种成分是从哪里渗透进伟大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这些著作中呢？

狄德罗在逗留彼得堡期间为叶卡捷琳娜写的一篇札记里，开玩笑地说，如果他一旦成为君主，他会颁布哪些法律。他在这篇札记里还说，他决不反对在"德尼皇帝"②的臣民之中传播奢侈豪华，因为这是臣民经济昌盛的成果。他预见到卫道之士会要反对，所

---

① 见《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46页。无情地攻击理性时代的涅泽列诺夫教授，也指责它……**不尊重理性啦**！我不是开玩笑。他于阐述载在诺维科夫出版的某一定期刊物上的一篇教育论文的内容时，赞扬论文作者不同意当代的一些观点，因为按照这些观点、智慧是一种无关宏旨的存在，其发展应放在最不重要的地位上（《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圣彼得堡1875版，第329页）。下面我还要对这种令人惊奇的概念混淆，进行分析。

② 狄德罗的全称为德尼·狄德罗，这里所说"德尼皇帝"，即作者自称。——译者

以提问：这种奢侈豪华对人民的道德风尚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个绝妙的回答。他说："犯罪会停止（plus de crimes），可是会发生许多被神学称为淫佚和极尽丑恶的过失。"在这些过失中，他把肉欲的享受，放在首要的地位①。

这算什么？是宣传淫乱吗？不尽然。"德尼皇帝"希望在他的国家里，停止犯罪。很显然，如果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则道德风尚的收获，会是非常多的。这样，这位想象中的哲学家皇帝愿与神学所说的致命罪恶和过失实行妥协，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基督教道德的抗议。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在基督教道德里，有许多与古代道德水火不容的禁欲主义成分。作为对这种成分的反动，在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的世俗道德里，出现了肉欲成分。然而不是任何肉欲都应受到指责。基督教道德中的禁欲成分是对肉体的自然的不可抑压的权利的否定。对于这种否定的否定，正好是这些权利的恢复，它是健全的道德的必要条件之一。任何人，只要他认为反对基督教道德的禁欲成分便是致命的罪过，都一定会觉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说是充满了不道德的。这里的问题决定于观点。谁要是对法国解放哲学由于它否定禁欲主义而加以指责，他便不应忘记，完全相似的否定，渗透了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西欧一切先进文化倾向。例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全部艺术史，都是用健康的肉欲所表现的审美观念，与在病态的基督教禁欲主义基础上成长的观念进行斗争的历史。

方－维津在从国外寄给帕宁伯爵的一封信中指出："就我所知，现代哲学家（即启蒙思想家——著者）的整个体系，就是要使人们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都有德行。"方-维津在这里给启蒙思想家的哲学理论规定了一种过于狭隘的内容：不能将这个理论的内容全部归结为宣布道德不决定于宗教的独立性。但事实上，这个理

① 图儿努：书见前第 238—239 页。

论是坚决宣布了这一独立性的。这是它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完全可以理解，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一个同政教两界贵族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等级，其思想代表人物如果不力图结束人民对僧侣的道德从属关系，是不算彻底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在这种从属关系里教育成长的人们，都会觉得启蒙思想家的世俗道德是宣传不道德。学者在当时的文学著作中发现对解放哲学家提出道德败坏的攻击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心理现象。

XIII

在研究18世纪的俄国文化时，尤其需要这样的小心谨慎。在彼得改革前的罗斯，道德是听命于宗教的。彼得改革不可能立即结束道德条规对宗教教条、乃至对仪式的这种从属关系。我们知道，“学术侍从”对于这类问题的态度就已远远不够彻底；至于分裂派对于西方影响的反应，就更不用提了。

即使在塔季谢夫的思想里，世俗的因素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就是塔季谢夫，也毕竟未同宗教决裂。至于康捷米尔，尽管他常常乐于谈论道德，他不象莫斯科的学究们那样引述圣者传，而是引述世俗的、甚至多神论的思想家；然而宗教对于他的头脑却保持了巨大的权力。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同僧侣等级斗争中开始达到的结论，他是望而生畏的①。完全可能，在康捷米尔看来，狄德罗也是一位对于道德非常危险的无神论者。然而塔季谢夫和康捷米尔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啊！在比他们落后的人们中间，莫斯科的道德服从宗教的习惯，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保全。而且，不仅在18世纪上半期如此。诚然，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贵族的欧化阶层，确曾以巨大的猎奇心理倾听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宗教宣传。对于这种宣传的爱好，甚至多多少少成为一时风尚。但是在

① 见前书，卷2，第84页。

这种时髦爱好后面往往发生怎样的反应，是可从洛普欣的例子中看出的。

他曾短期间爱好唯物主义，甚至为了进行宣传，还翻译过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第2篇最后一章①。但是他刚刚译完，便感到沉痛的后悔，一夜没睡，将他的无神论的手稿焚毁了②。

方－维津在青年时期醉心自由思想，但他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根据他的"真诚坦白"，他回忆同自由思想者的交往，不能不感到害怕。

如所周知，他后来瘫痪了。人们传说，有一次他坐在莫斯科大学教堂里对学生说："以我为鉴罢，我是因自由思想而受惩罚的。"这种传言可能失实，但是这里丝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把疾病当作惩罚**的观点，是方－维津青年时期所反对的观点之一。

那些不再把宗教看作道德的必要基础的人们，洛普欣和方－维津自然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对这种人的评价，那就犯了很大的错误。方－维津在其《真诚坦白》里谈到他结识一位"公爵，青年作家"，这位作家带领他同一批在"渎神及亵渎活动中"混日子的无神论者相会。在渎神及亵渎行为中混时间，意味着浪费时间，也就是做一个没有真正职业的人。我们如果相信方－维津，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这位自由思想传导者的特点，纵然不是道德败坏，无论如何也是空虚无聊。另一方面，这同一方－维津在**忏悔以前**写的一封致亲友书里，

---

① 这一章题为《Abrégé du Code de la Nature》(《自然法典概要》)，洛普欣译为《自然规章》。

② 塔特利娜(П. Н. Татлина)有类似的经历。伏尔泰的著作给了她最强烈的印象。她说："但是旧的概念没有在新事物面前退却，读完伏尔泰的著作之后，我感到这样害怕，想把它投到火里烧毁。可是这些书都不是我的"。塔特利娜与洛普欣不同，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惧，更理智地对待了危险的作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意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却把这位公爵描绘为具有严肃理论兴趣的人物①。此外，根据其他证明，他原来还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叶利谢伊»的作者马伊科夫喜爱这一青年伏尔泰信徒的“开明思想和高贵品格”②。方维津在恢复其童年的信仰以后，认为不仅俄国的“伏尔泰信徒”，而且所有先进的法国人，都是不道德的。他在1778年9月18/29日从亚亨发给帕宁伯爵的信中写道：“达朗贝之流和狄德罗之流，就其本质说，同我每天在林荫道上所看到的江湖骗子，完全一样，他们都为金钱而欺骗人民。在江湖骗子和哲学家之间的唯一差别，仅在于后者除了爱财如命，还兼而无比地追求虚荣。”你们会同意，这些证人的供词是不足为信的。可是这样的证人还有不少呢！无论在当时的文艺作品或在关于他的回忆录里，都充满了对伏尔泰信徒的否定态度。西波夫斯基说得对，这种情况使我们深信，整个地说，俄国社会几乎都是敌视他们的③。这就是说，整个地说，俄国社会甚至对于有关他们的完全不符事实的传说，也都欣然信从。

假定我们的证人的证词，值得更多的信任。赫尔岑本人便认识很多俄国伏尔泰的信徒。他说，他所遇到的一些老年人，“即使不是共济会会员，也是伏尔泰的信徒或唯物主义者。”然而这位当然值得重视的证人也认为在彼得堡，与在法国相反，18世纪哲学是多少有些有害的影响的。按照他的意见，这一差别的形成，是由于在法国，新学说在使人们摆脱旧的成见的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更高的道德意向，“使他们成为革命者”；而在俄国，新学说徒然破

① 这里所指的是科兹洛夫斯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后来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服役，在切斯明斯克战役中阵亡。

② 参阅纹格罗夫论文集«俄国的诗»第268页，Л. Н. 马伊科夫为В. И. 马伊科夫文集所写的序言。

③ 参阅论文集：«18—19世纪俄国思想史纲»（«俄国的伏尔泰学派»）——«往事余音»(«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VIII—XIX в.в.»)——«Голос минувшего»，1914年版，第1卷，第125页。

坏了束缚着半野蛮人性的最后纽带，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旧信仰和旧道德观念。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竞相响应生活享受的号召，但是在他们灵魂里听不到呼吁人们夺取伟大再生的庄严警钟①。

对于这些证词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在前面谈到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时就已指出，拄着宗教的拐杖才能行走的道德，在被夺去这些拐杖时是要倒塌的②。某些欧化的俄国人利用新学说作为麻痹自己的良心的手段，也就是替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作自我辩解，有时还要在人前作为替自己辩解的手段。这样的假定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很可能，在俄国重演了法国在百科全书派时代以前很久就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法国自由派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有关道德诫条的概念同他们对于宗教和教堂的概念联系起来，出于对僧侣等级的憎恶而破坏这些诫条。一位法国学者说："他们由于反宗教而道德败坏"③。温斯基说：在他的俄国同代人之间流行着不遵守斋戒，不履行教堂规定的仪式，"对僧侣和教规发出自由评论"。官宦阶级和僧侣的冲突，在莫斯科罗斯时代就已经存在。如果在当时，这种冲突能够促使官宦们吸收宗教异端的理论，那末，在彼得后的俄国，这种冲突就能够促使某些为数很少的贵族对一般宗教采取否定的态度。既然对一般宗教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在俄国就必然要出现由于反宗教而产生的道德败坏。

但是这种道德败坏通常仍是异常表面的：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罪恶的真正爱好者，不如说是"罪恶的夸大者"。我们知道，"罪恶的夸大者"往往比罪恶的告发者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更

---

① 伊斯坎德尔：《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A. Iskander: «Du développement des idées révolutionnaires en Russie»)，巴黎1851年版，第46—48页。

② 见前第1卷，267页。

③ 路易·杜克罗：《百科全书派》(Louis Ducros, Les encyclopédistes)，巴黎1900年版，第22—23页。

高情操①。18世纪俄国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败坏"——如谢尔巴托夫所鲜明描述②——并不是由于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它在文化不高的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宫廷里，就已经使人强烈感到。就是那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尽管人们都将道德败坏归罪于他们，然而就是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共知的意见，有助于了解道德败坏的根源。爱尔维修很不错地阐明了奴隶制一方面与专制独裁制度，另一方面与某些道德沦丧的因果联系③。

还须考虑到，那些在俄国揭发"伏尔泰的信徒"道德败坏的人们，往往本身就在道德上极为可疑的。只要提出捷普洛夫就够了：重新回到笃信宗教的道路上的方－维津，同他有过一次关于信仰的富有教益的谈话。尽人皆知，罗蒙诺索夫从这个坏透了的"书吏和滑头"那里，曾经得到多少东西。

在俄国贵族的狭小眼界范围内，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说，有时是会采取荒谬的形式的。这是很自然的。法国解放哲学的俄国追随者，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他们有时简直令人发笑。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些真正悲剧性的人物。如果他们的灵魂听不到号召人类争取再生的警钟，那他们也由于这种充耳不闻而首先付出了代价；而他们所以会充耳不闻，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理解一直是很片面的，然而尽管他们的理解很片面，但他们毕竟比他们周围的人们要高出得多。他们厌恶这个环境，正

① 在亚历山大时代，普希金便一度作过"罪恶的夸大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比他的严厉的告发者和惩罚者高贵得不可比拟的人物。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抱怨莫斯科国家的居民，"在地面上种的是黑麦，而生活却靠谎言"，尽管也许他并非不"夸大"，甚至在道德观念上还多少有些摇摆不定，但在道德上他却比他的同代人要高尚得多。

② 难道只有谢尔巴托夫一人谈到这点？方-维津在1773年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里，也说道："关于这里的道德沦丧，是毋须描述了。我对上帝别无请求，只请求让我光荣地离开这个地狱。"见《方-维津文集》，第403页。

③ 《论精神》(«De l'Esprit»)第III篇，第XVIII—XXI章，《论人》第X编，第IX章。

如青年的奥尔金-纳晓金和赫沃洛斯季宁的《杜克斯》厌恶改革前的莫斯科一样。他们同样遭受着沉重的精神痛苦。但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没有受到这种痛苦。1793 年，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富有地主奥波琴宁决定自杀，在遗嘱中写道："死不过是从存在转变为完全的死灭。……我是没有任何截断自己的存在的理由的。就我的境况说，未来对于我是一个逍遥自在和美好如意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是会转瞬即逝的。"这篇遗嘱似乎可以使人假定，我们通过奥波琴宁看到一种人，这种人由于丧失对死后存在的信仰而失去了生的意志。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哲学未能锻炼欧化俄国人的毅力，相反，由于他们缺少掌握某些科学真理的素养而削弱了这种毅力。但是请读读奥波琴宁处理他的书籍的遗言罢，你们便可看到，事情并非如此。

他写道："书，我的心爱的书呀！我不知道留给何人。我相信这里谁也不需要它们。……它们是我的唯一宝藏。在我的一生，只有它们哺育了我。最后，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命便会陷于无限的悲痛，我就会早已轻蔑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由于精神孤独而造成的自杀，这种精神孤独难道不就是精神痛苦的最可怕形式吗！自杀者正是这样说的："最后，对俄国生活的真正憎恶，这就是迫使我主动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动力。"

古罗马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就是这样割断他们的血管，以免看到奴隶制度和道德沦丧的。很可能，奥波琴宁周围的谎言与罪恶的黑暗王国，很有可能把他看为道德败坏的典型。

人们说，在我国 18 世纪自由思想家的面孔上，有着某种潦倒沉沦和精神分裂的烙印。这是否由于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遭遇过导致奥波琴宁死亡的悲剧呢？

我国的自由思想家没有听清楚唤醒他的同代文明人类的钟

声："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对于政治往往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但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当然，只要不是简单的盲目模仿——由于推动了思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的自由思想铺平了道路。西波夫斯基写道："如果18世纪主要是无神论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初期和亚历山大一世王朝初年和20年代，在我国思想史中便是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时代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空想家已经没有以往的祖传信仰：政治自由主义和宗教自由主义并行不悖。"①

这里需要略加限制：并非所有亚历山大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家。已故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令人信服地指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通过18世纪哲学，亦即通过唯物主义，确乎达到了政治的自由思想。按照他的正确见解，19世纪20年代的典型的先进思想代表人物，是"受过启蒙时代法国著作教育的政治家和唯物论者"②。

不仅这样。我们很快看到，就在18世纪，那些由于先进政治观点(不是由于误会)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也都是受过法国解放哲学的教育的。

更有进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第三等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在俄国官宦阶级的解放过程中，就已经是一种异常有用的武器了。如果此外还再补充指明，叶卡捷琳娜时代文学所吸收的人道主义的崇高的、尊贵的一切，也都应归功于这一意识形态，那就不难理解，当时法国影响的**积极**方面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比**消极**影响更为重要了③。

① 论文见前，《往事余音》，1914年，第1卷，第126—127页。

② 见他的优秀论文《20年代的唯物论者》，首次载在杂志《往事余音》(1907年6月)，其后收进他的论文集第2卷。

③ 赫尔岑同受过18世纪法国哲学教育的老年人的会见，可能发生在他一生中的什么时候呢？很显然，主要发生在他的青年时期。但他在青年时期的一些年月里，

B.B. 西波夫斯基在我所引用的论文里提出了不少资料，有助于对这种富有成效的影响作出正确的估计。但是他也“从法国史学家莫里逊”那里抄袭了关于伏尔泰学派的极端偏颇的——在消极的意义上——评价。顺便指出，他所引述的史学家实际上不是莫里逊(Morisson)，而是诺里逊 (Jean-Felix Nourisson)①。这个史学家是现时的一个保守派，而保守派对伟大的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中的革命作用，是不能轻予宽恕的②。我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真倒霉哟！

XIV

法国启蒙哲学教导：就其本性而言，人非善，亦非恶，他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变善或变恶的。从这里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这个环境成为尽可能更合理，也就是尽可能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旧的秩序被确认为不合理，必须予以革除。诚然，卢梭和他的思想同道者们并不完全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条件地认为人性本善。但这在实际上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为了预防，或最少，减弱被歪曲了的人性，必须断然革除社会制度的缺点。

这一结论在法国是符合第三等级的情绪的，他们迅速着手在实际上实施。我们知道，俄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等级，还不能使先进法国人关于人性的学说符合他们的情绪。因此，这一学说虽被

爱好过神秘主义。老一代的“伏尔泰的信徒”的观点，自然应使他激怒。他的一位被称为化学家的表弟，显然是一个合乎 18 世纪标准的唯物主义者。赫尔岑(在《往事寻思》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的唯物主义使我愤慨。”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从赫尔岑本人的谈论中可以看到，这位“化学家”对待他的农奴的态度，要比其他农奴主好些。后来，赫尔岑完全摆脱了神秘主义。但是旧的印象在他关于法国哲学对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的影响的评价上，仍然留下了痕迹。

① 见他的著作《伏尔泰和伏尔泰学派》(«Voltaire et le Voltairianisme»)，巴黎，P. Lethilleux(勒提勒克斯)(avant-propos，前言标明为 1896 年)

② 诺里逊关于卢梭也写过同样仇视的著作《卢梭和卢梭学派》(«J.-J. Rousseau et le rousseauisme»)，巴黎，1903 年版。

移植到俄国土壤，却不能不经受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人成为好或坏取决于他们所受的影响，那就很显然，人性是由教育决定的。18 世纪的法国人，赋予教育以巨大的意义。爱尔维修写道："教育万能"（"L'éducation peut tout"）。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和那些负有使命执行她的观点的社会活动家，都非常乐于复述这个思想。别茨基写道："显然，一切恶与善的根源在于教育。"我们看到，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下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了使年青一代受到良好教育，需要一些什么呢？

根据别茨基的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选择直接的根本的手段以外，别无他途。就是说，首先以教育的方法产生所谓新的良种，或新的父母，他们能够将获得的直接和根本教育移植到自己的子女心中；他们的子女又将这一切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就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代代相传。基于这一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开办了各式各样的——虽然，为数不多的——教育机构。

关于我在上面刚刚引述的别茨基的教育观点，卡拉什指出："一目了然，在这段忿激的议论里，新的理论既有其强的方面，也有其弱的方面。对于公共幸福的真诚预望，提高祖国道德水平的爱国意图，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方法的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似乎建立新的良种会是那样容易"①。

对于这种观点是不能同意的。别茨基的忿激之谈，远远不是什么既有强的方面，又有弱的方面的新理论。在它里面，恰恰没有强的方面。

法国启蒙思想家丝毫不认为建立人的新良种，是象别茨基所描绘的那样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证明可以援引同一爱尔维修的

① 卡拉什：《学校和教育简史》，莫斯科 1902 年版，第 134 页。

见解。

他写道：有两种教育：第一，儿童教育（Celle de l'enfance）；第二，青少年教育（Celle de l'adolescence）。第一种教育是由学校给的；第二种教育是由青少年周围的社会生活给的，或按照我们的哲学家的说法，是由政府的形式和人民的习俗给的；而后者又决定于政治制度。如果第二种教育与第一种相抵触，那它就会完全破坏它的影响。

"假定我从童年起就给我的儿子灌输对祖国的爱，教导他将自己的幸福同善良的、即同对大多数人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的儿子在走进人间之后看到爱国者生活在受轻视、贫困和压迫之中；如果他知道，善良的公民受到权贵和富有人们的敌视，在城市里只有很坏的声誉，此外有德行的公民被剥夺了进入宫廷的途径（这一恩典、荣誉和无疑地构成真正幸福的财富的来源），那就可以稳操胜算地打赌：他会把我看成一个无知的浮夸者和草率的狂人；他会蔑视我，这种蔑视也推广到我的为人；他会沉湎于政府形式和同胞的道德风尚所促使流传的一切罪恶。"①

按照爱尔维修的意见，在君主专制的土耳其，是谈不上任何好教育的。的确，有些专制统治者十二分热烈地赞扬哲人的中庸之道和古代英雄的高尚品德。但是这种赞扬是谁也欺骗不了的；因为尽人皆知，这些统治者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又是一回事。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也不能对学校和家庭教育，抱有任何希望②。

如果我们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那种言行不一的统治者中的一个，那我们就会明白，爱尔维修对于别茨基所谓在当时的俄国可能建立人的新良种的欢快自信，是断然不会同意的。根据爱尔维修的理论，任何认真的道德教育改革，必须以同样认真的法律

---

① 《爱尔维修全集》，巴黎 1818 年版，第 2 卷，第 595—596 页。

② 同上书，第 596—597 页。

和政体改革为前提①。既然对于当时俄国国家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抱有任何希望，所以爱尔维修不仅不会为别茨基的乐观主义所感染，相反，他会对俄国情况表示完全悲观的观点。试回想，他甚至对于法国的情况也是用悲观的观点去看待的。当然，不是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象他那样彻底。思想的不彻底，使人有时甚至在理论上预示着暗淡结论的地方，也怀着光明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以政治社会改革为教育改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无可争议的。

XV

我们已经看到，在别茨基关于建立人的新良种的种种议论里，毫未提到国家改革的必要。在当时俄国的最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议论里，也都毫未提到这一必要。他们谈到教育时，总是仅仅注意到家庭和学校教育。爱尔维修可能说，他们说的只是儿童教育，而未提青少年教育。然而即使他们不提青少年教育，儿童也不会因此就不逐渐变为青年，而青年的性格也不会不在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形成。俄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否认从法国哲学家的人性理论中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按照这个结论，人的性格只能在社会环境良好的地方，才会成为良好的。他们还同意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环境的组织本身能够说服个人相信他们的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时，这个社会环境才是好的。按照法国哲学家的理论，这样的社会环境就是在文明世界的最先进国家里，也还不曾存在。问题就是要经过社会和政治改革建立这种环境。企求实行这一改革，这就是法国解放哲学的革命实质。

就其最大多数而言，俄国启蒙思想家是不同意这种企求的。他们还未认识到，俄国现实需要根本改造。试问他们怎么能够希望

① 《爱尔维修全集》，巴黎 1818 年版，第 2 卷，第 598 页。

俄国居民周围的社会环境会使他相信他的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的一致呢？对于这个问题，方-维津在所写《纨绔子弟》一剧第5幕第1场里，作了答复。

普拉夫金在这里发表意见说，人的成为不幸是由于自己的罪过，是自己堕落的结果，但他愿意知道使人们变为善良的办法。斯塔罗杜姆细想普拉夫金的话，对于这一点表示了下列坚决信念。

“它们(即办法——著者)掌握在君主的手里。只要人们看到：没有善良的品德，谁也不能成长为人；任何卑贱的服务，任何金钱，都不能买得因功绩而受到的奖赏；人们是被选择去任职的，职位不是人们攘夺得来的，——那时，任何人都会感到品德优良的利益，任何人都会变得善良。”

大家都看到，问题的解决在斯塔罗杜姆的脑子里要比在法国哲学家的脑子里简单得不可计量。如果法国哲学家们向开明君主发出呼吁，那他们所期待和要求于君主的，便是认真的改革(例如，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所提建议，便是如此)。这种改革，必须将公民的个人利益与国家的总利益联系起来。但斯塔罗杜姆的要求却缓和得多。他的愿望只是要君主不将他的那些没有“高尚品德”的仆人列入“人”的范围。君主只要坚决遵守这一完美的规章，那时任何人都会成为善良的：因为任何人都会感到作一个善良的人，是有利的。斯塔罗杜姆深信，君主是能够很顺利地遵守上述规章的。他说：“请相信我，我的朋友，在君主想到，在他知道什么是他的真正光荣的地方，人类的权利就不会不归还人类；在那里，所有的人都会很快感到，每一个人必须按照合法的途径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

在斯塔罗杜姆的头脑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完全丧失了革命的内容，而获得了保守的性质。这些观点，在斯塔罗杜姆的对话者普拉夫金——剧作者对他也非常欢喜——的头脑里，也获得

了同样的性质。普拉夫金说："真是的，任何身份的人都必须有适当的教育。"同我们在爱尔维修著作里所看到的相反，教育在这里不仅不以根本社会改革为前提，而倒是完全适应于现存的事物秩序。

当方-维津想要出版（1788年）«诚实人的朋友或斯塔罗杜姆»杂志时，他在«给斯塔罗杜姆的信»里这样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名称："我必须承认，为了我的喜剧«纨绔子弟»的成功，我应感谢您这个脚色。我根据您同普拉夫金，米龙和苏菲的谈话，编写了整整几场戏。观众直到现在还愉快地观赏着它们。"观众对这几场戏，甚至比对方-维津表现出无疑的巨大讽刺天才的那几场戏，还更乐于观赏。这表明大部分欧化的俄国人是同意斯塔罗杜姆和普拉夫金的观点的。既然如此，则俄国当时的一般文学著作，特别是讽刺作品，除开少数例外，无不以宣扬"高尚品德"为特点，便不足为怪了。1769—1779年间的讽刺杂志，对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个别现象，曾群起而攻之，——有时还攻击得相当勇敢。它们显然不怀疑，这些现象同当时事物秩序的最深刻基础，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试为举例说明：

一些最好的讽刺杂志曾对残酷无情的地主发动攻击。在诺维科夫的«雄蜂»里，塑造了一个叫别兹拉苏德的人物。他坚决相信农民不是人，而只是农民。当他看到他的农民"按照东方的方式"向他跪拜时，他想："我是主人，他们是我的奴隶。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使他们忍受任何穷困，日夜工作，完整地交纳租赋以执行我的意志。他们记住我和他们的身份，应该对我望而生畏。"此外，关于农民，他还说过："诚惶诚恐地把你的粮食送来。"①

涅多乌姆伯爵夫人的情况也不比别兹拉苏德好一些。"只要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小市民或农民，他会立即打寒战，发哆嗦。他不用

① «雄蜂»(«Трутень»，1769年，第24页。着重点见原文。

流行的语汇，给他们以下流的名称，但究应怎样称呼他们，却是他50年白白虚度的生命中所未能想出来的。"①

在同一年的《雄蜂》杂志第26页和第30页上，刊登了一名村长给地主的《复文》和地主给农民的命令，对于当时的农民情况，作了极好的描述。按照讽刺作家的安排，村长将在村会上实行体罚和对一名在给地主的呈文里称地主为父而不称为老爷的农民罚款5卢布等等，向地主报告。村长在报告里补充道："他说他是由于糊涂才这样称呼的，以后他再不敢称呼您老爷为父亲了。"②

在同一个诺维科夫的《绘画》里，刊登了《И＊＊＊Т＊＊＊两地游记》的出色片断。作者在总结他的旅行印象时写道："在农民的形象里，我到处看到了贫困和奴役。荒芜的土地，粮食的歉收，都向我表示，这些地方的地主对土地没有热情。那些用薄板支架起来、上面盖着禾杆的小小茅舍，院子围着篱笆，不多的存粮，极少数的牛马，往往都证明贫穷户是多么贫困，然而整个国家的财富和伟大却是由这一切构成的。"③ 这些片断是同拉季谢夫的著名《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游记》极相仿佛的。我们知道，这些片断当时在读者中造成强烈的印象。人们对诺维科夫说，"我们的许多贵族对贵刊第五印张(即刊登了这些片断的印张——著者)表示不满。"与此相反，另外一些读者却"因为同一印张而表扬了诺维科夫"④。但是《游记》的续篇，没有发表。这显然是由于当局采取措施，取缔了它的刊行。

诺维科夫辩解说，《游记》的作者所攻击的，不是整个"贵族团体"，而只是那些滥用权力的贵族。对此，当时就很少人相信，现在也很少人相信。

---

① 《雄蜂》，第23页。

② 同上，第24页。

③ 《绘画》，1772年度，着重点见原文。

④ 同上，第13页。

有些学者断言，诺维科夫反对的是整个农奴制，而不仅是地主的滥用权力[①]。诺维科夫可能在灵魂深处确乎谴责农奴制本身。但是在刊物上他却只是谴责了坏地主。人们说，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我国众所熟知的“种种不能由编辑部门作主的情节”。这也是可能的，但这却未获证明。不仅如此，我们有理由设想，诺维科夫不仅在变成神秘主义者之后，就是在出版«雄蜂»、«绘画»和«钱包»时期，也没有在原则上谴责农奴制。我们不要因为在这些杂志上时常看到关于“农民也是人”的议论而陷于错误。谢涅卡不是也曾写过：奴隶也象他的主人一样是人吗？[②]然而对于作为社会制度的奴隶制，他却从未表示反对。此外，那些认为诺维科夫对农奴制进行原则谴责的学者，都忽视了一件刊载在«钱包»第6页(1774年度)上的异常重要的文件。我所指的是独幕喜剧«民间歌舞»。

在这个喜剧里，似乎是为了教训坏地主而描绘了一个好主人托尔斯托苏姆，把他描绘为“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老爷”。这个好主人的臣民之一说：“看到他的农民，心里真高兴”；又说，“如果好主人的农民贫困了，那他就得责备自己，或者他是一个懒汉，要不然就是一个酒鬼。”显然，这远远不是对农奴制的原则谴责。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好主人托尔斯托苏姆的同一忠实奴仆还发表了下述非常有教益，同时也很能说明问题的见解：“忠诚的奴仆不仅要讨好主人，而且有时还要恭恭敬敬地向主人报告他的不对的地方。善良的主人从来不为此发怒，有时虽然生气，但不会持久；后来就自己承认不对了。这种情形，我在向老主人作报告时经历过很多次；为此，他豁免了我的一切，并给我赏赐。”

请注意，喜剧«民间歌舞»是预定演给来自人民的观众看的，按

① 参阅涅泽列诺夫：«诺维科夫——1769至1774年间的杂志出版家»，1875年，第153页等。

② 见他给洛皮里伊的一封著名的信。信里指出：必须人道地对待奴隶。

照《钱包》杂志出版者的意见，它应该给这种观众带来益处。然而上述见解的"益处"，难道不就是保护农奴制本身吗！

托尔斯托苏姆的另一农奴，他的儿子的仆人华西里说，农民都很爱老地主，"由于他的原故，也都爱青年的地主，尽管他对农民还未作过任何好事"。但这同一华西里在同他的年轻主人一道纵酒狂欢时，很害怕事情会为老地主所知道。"无论他对我们多么仁慈，只是我的背脊将为此受到惩罚；在这种饮宴之后，我的剧烈的醉后头痛，就是一年也忘记不了。"从这里可以看到，理想的地主托尔斯托苏姆关心他的农奴的良好道德品质，是不惜实行非常严厉的体罚的。

诚然，前面研讨的喜剧不是诺维科夫写的。谢缅尼科夫认为，喜剧很可能是公爵夫人达什科娃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旨意写的①。但是，诺维科夫不仅出版了它，并且在它的篇首写了一些完全同情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送给他发表的这篇喜剧的根本思想，他会采取这种行动吗？毫无疑义，这个根本思想，就是要说明地主应该，而且也能够关心自己的农奴；而农奴则应该，而且也能够真诚地爱自己的地主。这同农民解放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诺维科夫在出版《雄蜂》、《绘画》及《钱包》时期，是最先进的俄国人物之一，这是绝对毋庸争论的。但是，这一在当时异常先进的人物的观点，是多么温和，可以从他对出版自由问题的态度中看出。同他的所有欧化的同代人一样，诺维科夫赞扬叶卡捷琳娜给了自己的臣民以思想和言论自由。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十分内行地(Ex professo)注意尽可能扩大这种自由的范围。但他却从未想到可以完全取消书报检查。按照他的意见，国家的安定和公民的安全，都要求"禁止出版反驳神圣法律，反对君主专制和祖国的书籍。这种著作都是有毒的和有诱惑性的，它们能够危害青年

① 《1769—1774年间的俄国讽刺杂志》，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58页。

的灵魂，纵容恶行”。写这种书的人不配称为作家，或照诺维科夫的说法，不配称为创作者，而应被指为“有害的败类”。为了预防这种“败类”对社会的有害影响，政府必须检查新出版的书。而且诺维科夫认为，在新书检查中，精神检查应起首要作用[1]。如果我们考虑到，诺维科夫在俄国讽刺杂志出版人中，可能是一个最有主见，也想必是一个最光明正大的人，那我们就可相信，当时我国讽刺作家的要求，事实上是非常低的。尽管如此，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还是遇到了种种不可克服的阻碍。

如所周知，按照时间顺序，第一个讽刺杂志是《万有》（1764年）。它是按照叶卡捷琳娜的意旨并在她本人的领导之下，由科济茨基出版的。在这本杂志的某期，刊登了一篇对报刊的热情颂词："啊！报刊！自然，是上帝自己启发了那个发明你的人！由于你，保存了人类伟业的记述；由于你，人类的思想从东方飞向西方，从日中飞到午夜；你消灭危害人类的偏见，真理由你而发现；由于你，沙皇和大臣们从事例中学会保卫祖国，统帅们学会军事艺术，法官们学会探求真情实况。你极大地促进着人类的福祉！”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也象在所有其他事情上一样，叶卡捷琳娜的实践是同她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叶卡捷琳娜所以要由她自己领导《万有》杂志，所以要鼓励其他定期刊物的出版，显然是抱着一种希望，以为俄国的定期刊物会只限于热情歌颂新女王。然而无论俄国新闻界人士的社会意图多么温和，他们毕竟对于自己的任务有了严肃得多的理解。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进行批判，然而叶卡捷琳娜却认为他们必须歌颂。从这里，自然要产生分歧，严重地影响了讽刺刊物的命运。

在1769年度的《雄蜂》第2页上，刊登了一位将军给他的逃避兵役的侄儿的一封信。这位关心子侄的伯父大惑不解地问道："你

[1] 《绘画》，1772年，第20页。

为什么讨厌服役呢？如果你以为根据现时的命令，服役没有好处，我的朋友，那你可错了。的确，就现在说，是今不如昔；但是即使这样，经过 10 年，还是可以赚得一个好好的庄园的。可往年是多富有啊，你自己去核计罢，现时的各种敕令夺走了我们的多少粮食呀！”

叶卡捷琳娜认为这封信得罪了她。于是，她御用的《万有》杂志，立即开展了一个反对《雄蜂》的运动。

“伏尔泰的女弟子”的杂志证明：法院和法官并不象前引一信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坏，尽管有时官吏会在事实上受贿；但是在这种事情上有罪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行贿者自己。《万有》杂志写道：“还有一点要问，如果他们周围少一些引诱者，那么，对他们的控诉是否会少一些呢？”这一意外的、真正别出心裁的意见，受到其他杂志的坚决反击。

在《杂组》杂志里刊登了一封信，尖刻地挖苦“祖母”[①]对刀笔吏的维护。祖母说过，最好是少打官司，多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杂组》反驳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谁也不会因为小事去打官司。如果大家都是有良心的，如果大家都遵守法律，那就既不需要法院，也不需要法官。但实际上非有法院不可，所以必须设法使刀笔吏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一封写给《杂组》编者的信写道：“请求你们拒绝祖母的意见，因为她现在说的是简单的神话，从而表现其智力的昏庸。”[②]《地狱通信》要求祖母想想受到人们尊敬的古代讽刺作家，提醒她：讽刺作品的存在就是为了嘲笑罪恶。这个意见是针对《万有》主张对人类的弱点必须抱着仁爱和宽恕的态度而发的。祖母不断宣扬说：“善良的作家很少谈论罪恶，以免由于某种事例而侮辱了人类，但应运用其他教范，通过各种品德完美的人，也

① 当时这样称呼杂志《万有》，因为它的出版要比所有其他杂志为早。

② 《杂组》杂志，第 11 页。

就是通过既高尚、又正直的人，来描写对信仰和法律的坚决维护，歌颂热爱国王，热爱社会的祖国儿女，描写爱好和平的公民，真诚的朋友，圣礼的护卫者"，等等等等①。

这里几乎是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中提出了我们所熟知的一种保守派理论，以为最好是提出正面的人物，而不是提出反面的人物。这一理论后来多次被人们重复，"伏尔泰女弟子"的喉舌也断言，作家们所以习于描绘事物的消极方面，是由于在他们的心里缺少善心。《万有》杂志在答复《雄蜂》杂志第5页发表文章，对它进行反驳的一位"真理爱好者"时，写道："他的良心不懂得宽容在什么地方是必需的；他的智力可能不理解这种道德教导。应该假定，他是想用笞杖去制止一切的。无论如何，在将他交给公众审判时，我们会劝他治病，使他不再拿起纸来胡乱涂鸦。"② 事实上，这位"真理爱好者"是最不需要治疗的，因为他对事物的观点毫无残酷之处。当他说，残酷的不是那些反对违法乱禁的人，而是那些同违法乱禁实行妥协的人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写道："许多缺少良心的人从来不明确指出罪恶，并不是更为仁爱。他们说，普通的人都良心脆弱，必须用仁爱来包涵罪恶；因此，他们将罪恶缝在仁爱的长衣内。然而这种人的仁爱，应该更合适地称之为爱罪恶。照我的意见，改正罪恶的人比那些宽恕，（或用俄国话说）纵容罪恶的人，是有着更多的仁爱之心的。"③

女王的御用刊物有意纵容罪恶，这是洞若观火的。然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刊物接受了"唯物主义或否定论"的影响（如机灵的涅泽列诺夫所想象的那样④），而是完全另有原因。

① 《万有》杂志，1769年，《闹钟》杂志新版，莫斯科1893年，第48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雄蜂》，第5页。

④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78—80页。

叶卡捷琳娜在登极后三星期，发布了一个关于«贿赂»的上谕，用极为鲜明的色调描绘了俄国社会生活中这一根深蒂固的积弊，语调之尖锐激烈，也许为她那个时代的一切讽刺刊物所罕见[①]。但是，这个上谕正因为是在新女王登极以后不久发布的，所以它是对以往朝代的指责；而在这位女王即位后五年开始出版的讽刺刊物，对于受贿者发出的攻击，则只能理解为对她本人的指责了。叶卡捷琳娜便是这样理解的。她无限度地追求虚荣，希望她的臣民真正信服颂歌作者的保证，说自她即位以后我国业已形成普遍幸福。后来，在«俄罗斯语言爱好者的对话»(1783 年)里，她把那些认为在俄国尚未肃清贿赂现象的人们嘲笑为陈腐的怪人。她以«真事和谎言»作者的名义，提出作者祖父的一位老友为类似的怪人之一。这位老人欢喜读书。但是，第一，其弱点是无批判地接受写书人所说的一切；第二，关于事物的思想和概念在 40 年前是怎样，现在也还是那样，虽然事物在实质上变化甚剧……他直到现在还抱怨督军和他的属员的不公平，然而这种不公平已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了。这样，叶卡捷琳娜想使«对话»一书的读者相信，只有落后的人们才会抱怨行政机关和法庭的不公正。她关于这位她所不满意的老人写道："当时这种人号和机灵和博学，但在现在，由于事物改变了，思想开展了，他的概念也就落后了，而他却囿于这种概念，没有前进，他谈论现在正如在 40 年前谈论当时一样。"

事实上，在«对话»出版时，就已经没有督军，也没有督军的办

① "我们早就听到，现在更从事实本身看到，在我们的国家里，贿赂现象增长到了什么程度，几乎在最小的政府职位上，神圣的作用（法庭）都传染了这种祸害。谁要谋得职位，谁就得付钱；谁要辩诬，谁就得用钱；谁要对人进行诬陷，则所有狡猾的诉讼都靠礼物来支持。许多审讯人员本应在自己的神圣职位上进行公正裁判，却相反将它转变为市场，辜负了我们授予他的无私和不徇情的法官称号，似乎给他的收入是为了补益家庭，而不是为了对上帝，对我们和对祖国有所服务。由于贿赂而对正确的告密进行诬陷，破坏国家收入，有时还使贫者暴富，而富者变贫。"（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记»，第 2 卷，第 19 页。）

事机构①。然而贪官污吏的数目，却并未因此而有所减少。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叶卡捷琳娜却对此听都不听。她的自满自负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她用《真事和谎言》作者的祖父的名义，坚决强调："请记住我的话：所有现时的罪恶都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如奔流着的涨水。但水一旦达到以前的界限和堤岸，便会重新比以前更自然地流去。"

方-维津过分颂扬叶卡捷琳娜的文学天才，当他劝她——其实是劝《真事和谎言》的那个作者——用讽刺作家的鞭子鞭打昧良心的法官时，她代那个作者说："在'真事和谎言'里不包含使人厌恶的下贱东西，在那里严格排除了不具备欢乐的精神和不合乎我的祖先爱好的一切，强烈的悲剧使人产生索然无味之感，尤其是产生痛苦和眼泪。抨击讼棍和贪污，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连文法都不甚了解，哪能写出什么教训呢！"

叶卡捷琳娜喜欢具有"欢乐精神"的著作，而不喜欢讽刺作品的"下贱"和"索然无味"。但是既然完全不要讽刺作品又不可能，所以叶卡捷琳娜对讽刺作品提出了第一，我们都知道的要求，即仿佛对有罪恶的人应抱着人道主义的态度，第二，——这是对第一要求的完全自然的补充，——她希望讽刺作品不要牵涉个人。与此相反，诺维科夫在他的最初的讽刺刊物上，便证明必须"指名道姓地批判"。这又是一个异常重要的分歧。

1769—1774年间，这位最优秀的讽刺杂志的出版者对于"不顾情面的批判"是怎样理解的呢？

我想，这最好用事例来说明。

在1769年度《雄蜂》杂志第25页上，讲了一个叫普罗拉兹的人的故事，他是一个卸任"官吏和挥霍游荡的人"。他欠了一个商

① 以前督军为一府之长。但自有了省的建制以后，省直接划分为县，府的建制取消。

人的钱。请看他怎样想法赖债的。

“碰巧他们两人一同作客。商人有些喝醉了，普罗拉兹有意激怒他，说不给他还钱。如果他要控告他，那他就什么也得不到。商人把普罗拉兹痛骂了一顿，而普罗拉兹什么也没有回骂，只说请大家注意听着，次日便向法院递了呈文。最后，他没有还债就将他的借据取了回来，上面说明钱已收到，而且这笔钱是为了在来年冬天给妻子购买皮大衣的。普罗拉兹清偿了债务，而商人却由于把懒汉骂作骗子，丢失了钱财。”

诺维科夫深信，嘲笑罪恶，比往往只能引起索然无味之感的训诫，更能减少罪恶的作用。但是如果讽刺作家仅限于一般地嘲笑某种罪恶，那么，在染有这种罪恶的人们中，便会没有一人将这种嘲笑算在自己的账上：任何人都会以为这是指的别人。因此必须给以暗示，使某一犯了罪过的人由于这种暗示而理解到作者所说的就是他，而不是任何与他相近的人。“真理爱好者”在描述前面所说的官吏普罗拉兹的行为时写道：“我断言对人而发的批评更能改正罪恶。”但是就这样，也要作得十分谨慎。必须使对某一人，对某一犯了罪恶的人所发的暗示，不为大家所了解。“不然的话，如果把这人写得这样明显，以致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是他，那时，这犯有罪恶的人便不会改正，而会除了旧恶之外，增加新恶，亦即增加仇恨。”

从这种实在说是很幼稚的意见里，可以看出诺维科夫和他的思想同道们所谓“指名道姓的批判”只是单纯地揭发个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官吏普罗拉兹的例子和在«雄蜂»、«绘画»等杂志上看到的许多其他例子证明，“指名道姓的批判”主要是要暴露“掌握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们。“真理爱好者”要求对被揭发者保持慎重态度，也许不只是表示他们担心为大家所了解的暗示会产生过于强烈的心理作用，而且表示他们害怕被揭发的达官大吏会进行报复。

讽刺作品在其发展的初期到处都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是，无论其最初的步子或其进一步的发展，都依据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取得了不同的形式。众所周知，阿里斯托凡的喜剧，也是“不顾情面的批判”。但他生活在民主制的雅典共和国，享有极大的言论自由，不怕对犯有恶行的人提出指名道姓的批评。相反，在叶卡捷琳娜的俄罗斯，对于当权的达官大吏的哪怕是极为小心的暴露，也会给揭发者带来巨大的麻烦。象女王一样，达官显贵们都认为一般描写罪恶，比“指名道姓的批评”好，而且比具有“逗笑精神”的著作则差得多。当然，讽刺杂志自应招来发自他们的巨大不快。

由于讽刺作家（如果不辜负这个称号）是很难用“逗笑的精神”来写作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俄国讽刺-暴露作家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艰难。1769—1774年间讽刺杂志在许多场合里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一个又一个地停闭了。不言而喻，它们的消失，不能使它们所代表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因此，由于对讽刺作品的需求没有消失，遂不时出现了新的讽刺刊物。但是它们所遇到的困难，并未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相反，由于伏尔泰的女弟子愈来愈加明白法国新理论的实际意义，这种困难是愈来愈多了。当革命的风暴在法国勃然兴起时，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时，俄国一些作家受到凶残的迫害。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命运，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女王的不满，波及当时还很年轻的克雷洛夫，这一事实却不是那样为人所知的。

XVI

克雷洛夫后来说道：“我的一篇在印刷所里业已排好了字的小说，被女王叶卡捷琳娜要去了。手稿没有归还，就此丢失了。”① 克雷洛夫甚至似乎被抓去“关了禁闭”，并且被禁闭的，还不只是一

① 见卡拉什编辑出版的《克雷洛夫全集》第1卷附录：传略，XLII页。

人，而是一批人。事情发生在1792年，其时，他同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普拉维利希科夫、克鲁申等人出版了讽刺杂志«观众»①。这整个事情的经过，迄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可靠的是，克雷洛夫并未马上被制服。次年，他同克鲁申着手出版新杂志«圣彼得堡的信使»。尽管«信使»上的讽刺作品远远不象«观众»上的讽刺作品那样色采鲜明和勇敢无畏，但这新的杂志也使它的出版者遭受迫害。克鲁申在杂志的第三部分写了一篇关于克尼亚日宁的悲剧——«瓦丁»的研究。如所周知，这篇文章极为女王所不满。«信使»的出版受到申斥。结果，克雷洛夫逃避到一处乡村，而克鲁申则远游国外②。从那以后，克雷洛夫长期停止了写作。而当他重新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对讽刺作品，已无兴趣。他只是偶尔写些寓言，尽力避免激怒有产者当局，始终记住了：最好是紧闭牙关。

B.B. 卡拉什说："俄国的生活挫折了克雷洛夫这一俄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把他的讽刺禀赋限制在狭隘的轨道上，而不让其正确发展，甚至在许多方面歪曲了它。……真正的克雷洛夫，就其对俄国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说，最多地，尽管也并不是完全地，显现在他的讽刺文章里。这就是这些文章的巨大历史和文学意义。"③

我们业已看到，俄国现实生活的不良条件非常独特地改变了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抄袭来的人性论。这种改变也影响了俄国讽刺作家的观点。我们已经知道，方-维津通过斯塔罗杜姆发表了改正俄国道德风尚的意见。在克雷洛夫同拉赫马尼诺夫在1789年合办的讽刺刊物«神灵的通讯»里(按照卡拉什的正确评价，这个刊物给我们恢复了诺维科夫式的讽刺作品的最好传统和传说)，发

---

① 卡拉姆金在1793年1月3日给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信中问道："我听说，«观众»的出版人似曾被捕'关禁闭'，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呢？"

② «克雷洛夫的杂志出版活动和他的讽刺作品»，前引«克雷洛夫全集»，第2卷，第301页。

③ 同上书，同页。

表了一篇《魔术师马利库尔姆尔克给安姆彼多克洛》的信，信内写了如下颇有特色的见解：

马利库尔姆尔克说："在古代哲人所提出的全部证明中，没有一项证明比一位学者提出的所谓大部分人都是凶恶和堕落更为明确和逼真。"当然，这一悲观的意见只适用于"现代的人"，所以许多法国启蒙思想家也可能会同意这个意见。不过，他们会补充说，凶恶和堕落，主要盛行于特权等级之中，为了改正道德，必须废除特权。俄国的作者① 却有不同的见解。在他的心目中，"堕落的最深刻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的欲望"②。

这个见解的本身是值得批评的。然而最值得注意的却是从这里得出的关于讽刺作家的任务的结论。

马利库尔姆尔克继续说："现代，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陷于非常重大的灾难，或陷于完全破产，他们不了解，或不重视我在这封信开头所提出的定则。"（即关于人的凶恶和堕落的意见。——著者）讽刺作家必须警告他的读者，——特别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使他们不致陷入给他们撒下的罗网。

"轻佻是缺乏经验的青年人的通病；因此，必须时常告诫他们，毫无戒心地进入社会，希望在社会里找到公平和正直，等于不带地图和指南针而飘洋过海，盼望经常遇到顺风，盼望在停泊的任何海岸，都可找到平静的码头。"

在这些意见里，已可看出后来使克雷洛夫对任何社会问题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的那种悲观主义的萌芽③。

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悲观主义并不是我们未来的伟大寓言作

---

① 可能就是克雷洛夫本人。

② 《克雷洛夫全集》，第 3 卷，第 196—197 页。

③ 按照格涅季奇（Гнедич）的意见，克雷洛夫在晚年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相信眼前的事情，"既然同意现存的秩序是与罪恶相关联的，但又用一种思想聊以自慰，以为要建立其他的秩序，是不可能的。"（见《克雷洛夫全集》，传略，第 108 页）。

家的个人特点。我在谈到俄国伏尔泰门徒时，即已指出，在18世纪后半期，在俄国优秀人物中间，随地都可看到一些悲剧性的人物，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几乎是或完全是绝望的。毫无疑问，当时这样的人要比同一世纪的前半期多得多。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在这样一个产生了大量极为令人喜悦的希望的朝代里，哪里来的悲观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从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指出的叶卡捷琳娜的理论和她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中去找。

理论产生了令人喜悦的希望，而实践却使这些希望归于破灭。当然，不是在所有人那里，因为大多数人是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的活动的，而只是在要求严格又极为敏感的人们那里。这些人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却走在前列。他们为俄国社会思想探求新的道路，因此，他们感到的失望，是当时俄国社会心理中一个极堪重视的事实。

克里扎尼奇将他的进步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广泛改革。他把君主制看为"摩西权杖"，能够从不毛的峭岩里，找到欢畅的源泉。"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更相信"摩西权杖"的神奇力量。"学术侍从"不只是由于恐惧，而且是赤胆忠心地为君主制服务的。彼得一世以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们的行为，似乎应使先进的俄国人大大减少其对君主制的进步意义了。但是先进的俄国人，却习惯于将彼得继承人的恶行，看为偶然的例外，而不是看为一般的通则。他们期待着，以为就在今天或明天，这些例外会成为痛苦的回忆，而一般通则会终于显示富有成果的力量。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他们以为，现在"摩西权杖"会比彼得一世时还要工作得好些。然而，当他们看到这个权杖有两端，其用以打击过于热衷的启蒙思想家的一端，要比用以对付过于愚钝的守旧派的一端坚决有力得多的时候，在他们的心灵里产生了种种为彼得时代先进人物所未曾有过的疑惑：18世纪后半期的"学术侍从"——我所指的是

当时的知识界的最先进部分——开始逐渐丧失其对君主制的信仰。

我不是说已经丧失，而只是说开始丧失，而且只是逐渐丧失。这种丧失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包括19世纪的一部分，有时加强，有时减弱。完全可以理解，各种不同的思想家都屡次经历了这一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的影响下得出了种种极为不同的结论。我们很快便可看到，这一过程怎样影响于他们当中某些最显赫人物的世界观和情绪。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过程在这一世纪里，不只是已经开始，而且在文学著作中已经有所表现。

XVII

方-维津(1744—1792年)

1

克雷洛夫禀赋了巨大的讽刺才能。但是，这种才能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在18世纪下半期，方-维津是我国最大的讽刺天才。

B. Г. 别林斯基用不多的话卓越地阐明了方-维津的著作生涯的真正意义。他指出，«旅长»和«纨袴子弟»不能称为喜剧(就这个字的艺术意义说)，它们更多地是俄国讽刺作品力求成为喜剧的努力的成果。但是，别林斯基的这个评语，并不妨碍他确认这些喜剧虽然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却毕竟是优秀的文学创作，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宝贵史篇”。此外，还应补充，当时的我国社会生活可从方-维津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得到颇为鲜明的说明。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我国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的工作——就其本身来说是异常有益和光荣的——是在贵族眼界的范围内完成的。他们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抛弃了贵族的观点，而比较坚决地转到当时西欧先进启蒙思想家所保持的第三等级的观点上来。拉季谢

夫便是这不多的人们当中的最优秀人物。

然而如果只有不多的人能够达成从一种观点到另一种进步得多的观点的转变，那么，在其生命过程的一定时期不断**动摇**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人们，却是为数颇多了。对于某些人，——尽管不是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动摇是一个极为艰难，有时简直是极为悲剧性的过程。在动摇、并且由于动摇而饱受折磨的人们当中，最突出的要算诺维科夫了。方-维津也属于这一类型。

他自己以恐惧的心情回忆他接受自由思想者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影响时期。我已说过，对于在方-维津的《真诚坦白》中看到的关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及其小组的评价，应该批判地对待①。但是，到底是关于这个小组的哪些回忆，引起了我们的讽刺作家的恐惧心情呢？确定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按照他的说法，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小组，热衷于渎神言论和亵渎活动。我们的讽刺作家写道："对于渎神言论，我从来没有参加。当我听到无神论者的咒骂时，我直哆嗦；至于渎神行为，我却起过不是最小的作用。……那时，我写了一篇致**舒米洛夫**的信，其中某些诗作表明我在当时的错误认识。"②

这封"信"里有许多饶有趣味的东西。但是信里所表明的"错误认识"，并不象方-维津在恢复其旧时信仰以后所感到的那样重大。所谓"错误的认识"全部包含在"信"的最末一行：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

这里很少可怕之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怀疑论的最低发展阶段而已。显然，方-维津的怀疑论是由于直接间接接触伏尔泰

---

① 对于我在前面引述的有利于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证词，还可补记远非自由思想者诺维科夫的评价。在所著《俄国作家传记辞典试编》里，诺维科夫说："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由于对语言科学的极大爱好，他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他的著作所获得的智慧，增进启蒙作用。"

② 《方-维津文集》，版本同前，第542页。

的著作而引起的。如所周知，这位费尔涅教长的怀疑论世界观并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点的最极端表现。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有好些勇敢得多和彻底得多的思想家。当然，从方-维津的家庭所坚决维护和他自己在脱离科兹洛夫斯基小组后所恢复的那些旧概念的观点看来，对于创造世界的真正目的的任何怀疑，都是可怕的罪过。在伏尔泰的怀疑论和对美好旧时光的天真信仰之间，有一个很广阔的距离。所以，毫不奇怪，方-维津在倒退到他的笃信宗教的祖先所遗传的思想方式，走完这一距离之后，便感到他是一个逃出了致命危险的人了①。

值得指出，方-维津虽然同伏尔泰一样，拒绝解答世界是为什么而创造的问题，但在这封«信»里，对于涉及人类相互关系的一切方面，却比伏尔泰还要怀疑得多。他在«信»②里称呼的人物之一——他的农奴凡尼卡的说词，毫无疑问，表达了自己的主人的思想：

> 四顾环宇，
> 我到处看到的只是蠢事。
> 我还察觉——
> 世界长期靠谎言生活，
> 再没有这样的神仙，
> 能使世界充满真理；
> 教士尽力欺骗人民，
> 宫廷的仆役——贵族的主人，他们
> 相互欺骗，而达官显贵，他们
> 又往往欺骗君主；
> 任何人都想塞饱自己的腰包，

① 他说，他的父母都是笃信上帝的。他刚一识字，他们就强迫他读教会的书。

② 信的全称是«给我的仆役舒米洛夫、凡尼卡、彼得鲁什卡的信»。

说的是福利，

干的却是欺骗。

伏尔泰尽管是一个怀疑论者，但他相信，将来理性会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占优势，虽说他的未来的理性胜利，不能与他的崇拜者和传记作者，例如，康多尔塞(Кондорсэ)的那种洋溢的光明希望相结合。这就是说，在伏尔泰那里，怀疑论与颇大一部分乐观主义和睦相处。但在《给仆役的信》里，完全没有乐观主义。人们都是贪婪、狡猾，惯于欺骗。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不合理的。方-维津尖刻地嘲笑了这一切。但是，这一切永远不变吗？难道不能希望将来文明的人类会变得更合理些？会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显然，在《信》的作者那里，就连这个问题也未产生。这同我们在伏尔泰那里看到的情形，是有重大差别的。当然，这种差别是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

在法国业已成长了一种可为启蒙思想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的力量，而在俄国，这种力量暂时却还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培养欢乐希望的心理可能，——虽然我们知道，当他们看到可悲的现实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变得消极(如爱尔维修)，——而他们的俄国追随者要感染这种乐观情绪，却是困难得多了。

但是，毫无疑问，任何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愿望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人，是很难带着《给仆役的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人类关系的极端悲观的观点生活下去的。正如黑格尔在所著《精神现象学》中说过：怀疑论能够导致忧郁的情绪(das unglückliche Bewusstsein)。这种情形，我们从那些往往自愿结束生命的俄国“伏尔泰门徒”的事例中，也可看到。然而不言自喻，自杀并不是摆脱忧郁情绪的唯一手段。而且这个手段，一般地就其性质而言，只能为个别人所选择。其他的人则用各式各样的古怪行为来解闷；最后，第三类的人则及时到童年信仰的平静滩头，从而顺利地摆脱了忧郁

的情绪。可能，这类人要比所有其他的人多得多。

2

方-维津在其宗教自由思想的不很长久的年代里，在上述这封《信》里，询问他的一名仆役，为什么他们注定要在“沉睡”中度过一生。那时使他感到奇怪的，——如果不说愤慨的，——是在世界上竟然有人在奴役中度过一生，而且方-维津觉得，他们甚至毫不怀疑他们应该“永世成为奴仆”。他对此感到奇怪，——这一事实表明了他所受到的“伏尔泰主义”的影响。的确，在这一方面，也如象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伏尔泰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并不很大的。在《信》里，他粗暴地嘲笑了他的农奴仆人。他虽然想说明，他的仆人之一对于创世的目的问题，曾经有所考虑，但是写道：

“他的怀疑触动了根本，

他愁眉苦脸，浑身打着寒噤！”

我们看到，自由思想没有使他了解法国启蒙思想家具有的对仆役的人道主义态度。但是自由思想毕竟使他对于农奴制的优越性发生某种动摇。在他结束其宗教自由思想之后，他的这种动摇也似乎结束了。他开始坚信不疑地重复着农奴主关于俄国农民的奴隶地位的益处等等流行议论。他在1778年3月20/31日从巴黎写给帕宁伯爵的信里说：“我参观过兰格多克，普罗万斯，多芬内，里昂，波尔贡，沙姆畔等省。前两省在这里，在全国被认为是粮产最丰裕和最富有的地方。如将我国最好地区的农民同那里的农民相比，我发现我国农民的情况，公平地说，是比较最幸福的了”。同一封信的下文表明，他在这里所指的只是农民的经济地位，而忘记了法律地位。

当时法国农民的经济情况是很坏的。方-维津也许没有过分夸大地说：“在这个果实累累的边区，在每一个邮站，我的马车经常

被穷人包围着，他们时常向我们乞讨的不是钱，而是问我们是否带有一块面包。”在懂得本身利害关系的明智的俄国地主那里，农民当时在经济上是生活得好一些。但是，明智的地主当时是否很多呢？在讽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论文——可以设想，方-维津是不会不知道这些论文的，——使我们有根据断定，他们是不多的。这些论文证明，在俄国先进人物看来，甚至俄国农奴的经济情况也是阴森暗淡的。不仅这样。无论当时法国农民怎样穷困，但他们的绝大多数早已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这就是他们的地位同俄国的“神圣所有制”相比的极大优越性。然而，在方-维津的眼光里，这一优越性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不过，这只是根据他的通讯而言。其他的一些资料则对此产生疑义。

谢梅夫斯基认为我在前面提到的《法国贵族自由和第三等级利益简释》一文，是方-维津写的。尽管该文作者实质上也是完全站在贵族的观点上，但他是18世纪俄国欧化人物中的一员。这种人物为在俄国建立“诚实和开明的市民阶层”而钻营奔走。按照他的见解，市民阶层是“社会的灵魂”。他懂得（尽管是部分地），第三等级在一个以生产者被奴役为基础的国家里，是很难发展的。他的研究的结论是：“在俄国应使1）贵族完全自由，2）第三等级完全解放，3）从事农业的人民虽不完全自由，但最低限度，在他们（农民——著者）将来成为能使农村或主人的作坊趋于完善的农民或艺人时，应有自由的希望”①。

对谢梅夫斯基所说上述见解出自方-维津手笔的假设有利的事实是：最低限度，他有时关切这一见解中所涉及的社会问题。

在他所翻译的作品中，有一部的标题是：《经商的贵族与军人贵族的对立，或关于贵族经营商业是否对国家幸福有利的两种见

① 《沃龙佐夫公爵的档案》，第XXVI卷，第324页。

解》。收进这部译本的两位法国人的著作，都写于1756年，其时经济问题引起了法国读者的深切注意。第一篇著作的作者，坚决主张贵族从事商业。这一职业一点也不降低最高等级的地位，却能改善它的物质状况，并给法国生产力的发展以新的推动。这位法国作者逐一分析了妨碍贵族经营商业的种种偏见，而且为了给商业辩护，有时讲些粗野的语言。值得指出，这位法国的商业辩护士，象俄国见解的作者一样（谢梅夫斯基认为这种见解出自方-维津的手笔），也将商人称为一切社会集团的灵魂。同时，关于法国贵族过去对人民的态度，他是这样描写的：

“首先，法国贵族不努力从事他们农村土地的耕耘；他们有的是听从命令的奴隶。人民摆脱了这种桎梏，而取得了某种自由。现在贵族想收获粮食，那就得雇用工人并用金钱迫使他们工作。”①

接着又说，为了种好自己的田地，贵族需要金钱，而向他们提供金钱的是商业。总之，法国作者把自己表现为浸透了第三等级新意图的作家，他们深切了解以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要比生产者受法律奴役为基础的封建关系高超不知多少。他甚至对英国革命表示——虽然不是直接了当地，而是躲躲闪闪地——同情，以为这个革命以“受咒骂的”“不公平的统治者”克伦威尔为代表，注意商业，就象注意“生命之树”那样②。这一切都是如此明显，读者是不能不一目了然的。如果方-维津在读到这种见解之后仍然认为必须将其译成俄文，那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见解的趋向，并没有使他感到害怕。

不仅如此。还可设想，法国作家关于贵族经商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见解，对于方-维津主要喜剧中的那一好发议论的主角——斯塔罗杜姆的性格，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

① 《方-维津文集》，第600页及579—580页。

② 同上书，第581页，着重点见原书。

事实上，斯塔罗杜姆的发家致富，不是通过军职，而是通过在西伯利亚的某种工业经营（可能是开采金矿），“他在那里赚了金钱而不用良心去换取金钱，不从事卑鄙的勾当，不掠夺祖国；他在那里向土地要钱，而土地比人公正，不讲情面，只是诚实地、慷慨地给劳动以报酬”①。

当然，斯塔罗杜姆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同先进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少共同之处的。我已指明，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学说，在他那里取得了怎样独特的形式。最后，他直接了当地表明，他害怕现时的哲人在根除偏见的同时，会从根本上，用他的话说，收回德行。如果甚至保守的斯塔罗杜姆，其性格的颇为重要的特点之一，确乎是来源于我在上面引用过的那部讨论贵族经商的著作的爱好自由的作者，则这一著作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头脑里留下重大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既然如此，那就完全不可理解，方-维津怎能说服他的尊贵的通讯人，要他相信俄国的制度优于法国制度和一般西欧制度了。但他却恰恰是要他相信这一点，这是从他在1778年9月18/29日给他的信的下述一段里可以看出的：

“诉讼的事情在法国也同在我国一样不幸，唯一的差别是，在我国诉讼的花费不象法国那样漫无限制。……在法国，断案以前必须作好许多烦琐的手续，……而在我国，最少这是一个优点，动作要灵敏得多。只要有某一与宠臣有瓜连的半个贵族出来过问，案件立即出现转环而接近于了结。”这真是一个可疑的优点！可是，即使对于这一优点不加怀疑，方-维津也应记得，偏袒是“独断专横”的产物，任何一个宠臣总是有“作坏事的巨大权力和可能的。”

在写给帕宁的另一封信里，方-维津“真诚地坦白”（这是他的原话）说：“如果在我的理性健全的年轻同胞当中，有人因为在俄

① 《纨绔子弟》，第3幕，第2场。

国看到舞弊和混乱而发生愤慨，并在心里开始与俄国离异，那么，为了使他热爱祖国，除了更快地将他送到法国之外，别无更可靠的方法。在了解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之后，对现实不满的俄国人即使相信，那些谈论法国的"完善"的人，是在撒谎；无论在俄国的生活有时是多么坏，但是，如果心安理得地，如果用理性统治想象，而不用想象统治理性，则在那里，"可以象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幸福"①。看来，作出这样的结论的人，从精神状态说，是不可能图谋政治改革的。

彼得时代的俄国官吏去到外国，——到威尼斯或巴黎，——都迅速看出在西欧各国，要比在俄国有更多的自由。方-维津也看出了这一点，因为毕竟他比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期的俄国人更有观察外国生活的素养。但是，在他总结他对这一生活的观察时，却出现了意义深长的保守主义的保留。

他写道："在研究法兰西民族的状况时，我学会了区别法律上的自由和实际上的自由。我国人民没有第一种自由，而后一种自由则享受很多。与此相反，法国人虽享有法律上的自由，却生活在真正的奴隶制度之下。"按照他的正确的意见，法国人的实际被奴役是由于"国王虽受法律的限制，却掌握着践踏法律的一切力量。"从逻辑上说，按照宪法草案序言的精神，由于国王对法律的践踏，应该作出结论，确认必须制订"根本法"，以结束国王的专横。但是方-维津避开了这个结论。他满足于对法国秩序的笼统谴责，并提出一种叫人感到欢喜的思想，以为俄国人民大量"享受着"即使不是法律上的自由，也是实际上的自由。他在其他信里断言，俄国秩序全然不象它的不公正的诽谤者所说的那样坏，可是一般地说，"铃鼓总是远方的好听"。

① 就是在这封信里，方-维津断言，"在较好地区"的俄国农民，要比法国农民容易生活。

别林斯基赞扬了方-维津的国外通信，因为，照他的说法，信里精辟地指出了法国旧秩序的缺点。他认为这些信比卡拉姆津的《俄国旅行家通信》高。然而方-维津虽是比卡拉姆津更确切地指出了当时法国秩序的某些弱点，可是，对于这样或那样致力于根本改革这一秩序的一切，他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在这里比卡拉姆津显得还要目光短浅。的确，他的艺术嗅觉不时提醒他，在法国发生着某种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暂时还不存在、或暂时还很微弱的新运动。但是他对这一新运动的模糊认识，只是增加了他对法国的反感。由于对这一运动的否定态度，他甚至相信在法国，"人们的生活和享受并非真正的幸福，而且对幸福，并无最低的认识"①。前此数月，他在一封写给亲属的长信里，坚决表示："在俄国，各州府的贵族要比这里好得无法形容；此外，这里的空谈有着较好的外表"。对于这种说法，俄国的斯科季平之流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是会欣然同意的。

根据方-维津的书简判断，他对很少受到解放运动波及的德国，比对法国要喜爱得多。他给妹妹的信中写道："说真的，德国人比法国人单纯，但无可比拟地更值得敬重。我千百倍地宁愿同德国人住在一道，而不愿同法国人住在一道。"但在地球上，绝对的东西是没有的。如果住在德国比住在法国要好得多，那么，住在俄国又要比住在德国适意得多。方-维津在给他的亲属的信中写道："一般地，我可以公正地说，从彼得堡到纽伦堡，我们祖国的包袱是越来越重了。这里的一切，一般比我们差：人、马、土地，必需食物的储藏，总之，我们的一切，都要好些，我们的人也比德国人多。无论别人怎样说，这种信念总是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里。"②

在这一切里，没有自由思想的痕迹。是啊，自由思想有什么意

---

① 从巴黎寄给妹妹的信，1778年4月（原信未写明日期）。

② 1778年8月29日，9月9日的信。

义呢？“法律上的自由”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在人们的心坎里，没有第一条法律，没有人们之间的第一种联系——即善良的信仰，任何政治方面的改革又有什么用处呢？”①

方-维津在结束了宗教自由思想，回到他的童年信仰以后，仿佛还保持了，最少是有时还保持了感染政治自由思想的能力。但在他第一次国外旅行期间（我所摘录的那些书信就是那时写的），他连政治自由思想也放弃了。这是有其不可争辩的逻辑的。合乎逻辑的是，方－维津既然拒绝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便同时放弃了他们的所有社会政治改革计划的出发点：以前他同他们一道，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观点出发的，即人们的行为决定于社会制度；现在他却以为制度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善良的信仰了。如果彻底地发挥他的这一新观点，他便应得出这样的论点，即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可是，他的彻底性没有保持多久。

他在1777年翻译了《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一书。这本书是法国研究院院士汤玛斯写的，而且用这样的想法粉饰，例如：

“自由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服从统一的法律的权利，除了这种统一的法律之外，别无什么可以害怕的东西。害怕说出自由这个名词的奴隶多么可怜呀！谈论法律有罪的国家多么可怜呀！”

又如：

“永远仁慈的自然，按照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创造了人。暴政的出现，造成人的弱点和不幸。这时，少数人占有了一切，等等”。

按照一位学者的意见，如果方－维津通过他的译文发展并补充了他自己所谓更好的政治制度的思想，则通过同一译文，他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所谓政治改革无用的思想。

不用说，在《马尔库·阿弗列里约赞词》里，过于细腻的学院式的雄辩是多于对自由和平等的坚强的爱。但是作为《赞词》的基础

① 1778年1月15/26日给帕宁的信。

的思想，毕竟与我们的讽刺作家在其国外来信中所表述的那种箴言，是极其矛盾的。

同一学者又认为，“1785 年 8 月，方-维津患脑溢血，这结束了他自童年以来所坚持的自由思想的意图。”的确，方-维津为波将金逝世（即 1791 年）而作的《论虚度的人生》一文表明，疾病造成了他心灵的完全悲观情绪。他在文中坚决谴责了他以前“对理性的狂烈向往”。但是，我们看到，关于“对理性的向往”，他在 70 年代第一次出国旅行时，便已经几乎是象患脑溢血后一样坚决批驳过。此外，在他为他的——未经警察批准的——杂志《诚实人之友或斯塔罗杜姆》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在 1788 年 2 月刊登的莫斯科来信，这封信表明，方-维津在病中有时还受到政治自由思想的冲击。

这封来信谈到在俄国妨碍辩才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方-维津用斯塔罗杜姆的名义写的。他说：我们缺少演说家并不是由于我们秉赋的弱点，而是由于缺少“使辩才能够表现的机会。”在其他政治条件之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我们的大主教加夫里尔，萨穆伊尔，普拉东就是我们的迪洛特逊和布尔达鲁；耶拉根就其职位编写的各种意见和主张也充分证明：如果我们有了讨论法律和租税的讲坛，如果我们有了判断掌握国家政柄的部长门的行为的场所，俄国的辩才会发挥多么大的力量。”①

在这里不提出普拉东，加夫里尔，萨穆伊尔以及……耶拉根的辩才实际上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不能不看到，疾病缠身的方-维津在这里仍旧是完全根据政治自由思想的精神立言的。按照这种精神立言，须以一定的“对理性的向往”为前提。

这就是最主要的东西。方-维津的观点是彻头彻尾地互不协

① 《文集》，第 248—249 页。

调和自相矛盾的。他能够几乎同时发表直接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对于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性，不仅因为方-维津在俄国18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为18世纪下期的许多有学识的俄国人，都在这方面同他相似。

但是，必须记住，在我们的讽刺作家的世界观里，保守主义几乎经常占着优势。叶卡捷琳娜看错了，她抱怨说："我活得别扭！就连方-维津也想教训我怎样统治国家。"

方-维津不能够给她造成任何真正的政治麻烦。说到底，他在实践上保持了斯塔罗杜姆所表示的那种欢快的信念，即君主掌握着使人们幸福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只对确切达到"善良操行"要求的官吏，才按照职务，给予好处。就这点说，他也与他的许多开明同胞所见略同。

1784年3月，病危的 Н. И. 帕宁伯爵（方-维津自1769年起即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向他口授了自己的政治遗嘱。这篇遗嘱包含以下的内容：

"授予国王最高权力，是为了谋求其臣民的一致幸福……没有必要的国家法律，则无论国家的状况或国王的地位，都不巩固。……没有公正温和的神圣品质，而实行侮辱、强暴和苛政的任何政权，都不是神授的政权，而是人授的政权。这种政权纵容人的不幸，向实力让步，贬低人类的尊严。处于这种毁灭状态的民族，会找到各种手段，用加于他们的同样权力，摧毁镣铐，是否出乱子是心甘情愿的。……国王与臣民之间的义务，都是……自愿的。"简言之，Н. И. 帕宁伯爵的遗嘱，是以"法律上的自由"的优越性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而这一思想，方-维津在其从国外寄给 Н. И. 帕宁伯爵的兄弟——П. И. 帕宁伯爵的书简里，已予批驳了。必须记住，П. И. 帕宁是完全同意他的哥哥的观点的。我们往后还将对这些观点进行探讨。这里只要说明，从 П. И. 帕宁伯爵为庆祝

保罗·彼得洛维奇亲王即皇帝位而写给亲王的信中可以看出，方-维津是完全赞同帕宁兄弟的政治倾向的。这怎么能同前面摘录的他的国外通讯相调和呢？

不仅如此。在方-维津按照 H. И. 帕宁伯爵口授写成的政治遗嘱的一个地方，谈到"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私产的国家"，即存在着农奴制的国家；在评价这种国家的时候，发出了近乎鄙视的遗憾。而在 П. И. 帕宁伯爵所写的遗嘱"补充"里，更要求关于农民对地主的"义务"，作出法律规定①。这同方-维津所谓俄国农奴的令人羡慕的命运的意见，怎能协调呢？我们是否有权假定，方-维津的晚年，在社会政治方面又传染了某种自由思想呢？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这样假定。

3

康捷米尔抨击了"诽谤者的言论"。方-维津也抨击了以普罗斯塔科夫之流和斯科季宁之流为代表的诽谤者。康捷米尔写了讽刺作品《品质恶劣的贵族的骄傲和妒忌》，方-维津也不放弃机会去触动"品质恶劣的贵族"。苏马罗科夫暴露了"芝麻绿豆小贪官"，方-维津对于这种小贪官也不宽容②。康捷米尔（在第一篇讽刺文里）挖苦了梅多尔，因为他力言用于印书的纸张太多，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卷发。在康捷米尔的第二篇讽刺文里，菲拉列特申斥叶夫根尼只关心外表，所以长年在外国旅行，除了完备的时髦知识之外，什么也不曾得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还

---

① 参阅 E.C. 舒米戈尔斯基：《保罗一世皇帝》，圣彼得堡 1907 年版，第 53 页，附录第 4、7、12、17 页。

② 参阅杂志《斯塔罗杜姆》资料中的七等文官弗兹亚特金给皇帝陛下的天才信简。《旅长》一剧中的女文官说（第 1 幕，第 7 场），她的丈夫是在"关于贿赂"的上谕发表后辞职的，因为他相信，他在委员会里再没有什么可干的了。顺便指出，对于上谕的这种援引，除了嘲笑贪婪的官吏之外，还巧妙地恭维了叶卡捷琳娜。

将各式各样的讲究穿着的男女，绑在耻辱的柱上①。总之，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的范围，在整个18世纪，没有改变。

所以这样，有两种原因：第一，叶卡捷琳娜的无比虚荣心，不允许设想在她的光荣的王朝里，能有任何比较沉重的社会溃疡，所以她极度压制了讽刺作家的揭发活动。我们知道，当时的讽刺刊物都是寿命不长的。第二，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仍然用该世纪上半期讽刺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主要基础：他们都嘲笑旧事物的辩护士，而在对这些最主要基础的态度上，却仍旧是从旧事物中继承下来的现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的暴露诗的眼界，极大地受到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的限制。

然而生活是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彼得改革的后果显露出来了，因而讽刺作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即使没有扩大，但对其中某些问题的态度，却部分地改变了。

梅多尔和叶夫根尼使康捷米尔感到愤慨的是，他们对启蒙事业的利益漠不关心，而把时间——彼得卵翼下的真诚小学生总是非常珍惜时间的——耗费在时髦的琐事上。康捷米尔从未想到责备他们轻视俄国和俄国的习惯。在他那时候，有多得无可比拟的理由为相反的极端担心：这就是对西方和对西欧生活方式的轻视。因此，对他说来，维护俄国启蒙事业的利益，意味着同守旧的俄国人的民族特殊论进行斗争。在18世纪下半期，情况已变。那时谈不上恢复彼得前的旧事物了。俄国的统治阶层业已与彼得改革完全妥协。不过，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同它妥协，是很自然的。

俄国统治阶层利用彼得改革来巩固和扩大其对劳动群众的统

① 有时，仿佛他们在嘲笑贪官时有意模仿康捷米尔。（作为例子，可以指出1772年度的《绘画》杂志第一部分，第3和第4页。）但在康捷米尔那里，没有猪仔、猪猡等等一类的粗犷语汇，而这种语汇，甚至在诺维科夫那里都可大量看到。

治和摆脱义务兵役。摆脱义务兵役可给他们以空余时间。他们把这种时间部分地用来安排他们的经济事业。然而系统的坚持劳动，从来不合乎这一阶层的习惯。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分散到农村，与其说是从事农村经济，不如说是从事狩猎和纵酒狂欢。至于他们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住在首都继续服务公职，但全然不象对各式娱乐那样热中于业务。在首都的贵族中，孳生出大批讲究服饰的男女，为讽刺作品提供了大量的“人证”①。这些贵族等级的上流社会分子，迷恋外国时装和习惯，不仅达到了象康捷米尔笔下的梅多尔一样可笑的极度，而且轻视自己的祖国。讽刺作家就是这样证明的。

方－维津在《旅长》一剧中迫使伊万努什卡（伊万的小名）向他所追求的顾问夫人说：

“我的一切不幸只在于你是一个俄国妇人。”她用同样的精神回答说：“当然，我的天使，这是我的可怕的毁灭！”

既已决心模仿外国人，俄国的贵族等级很快懂得，最好的模仿样板是法国贵族，因为他们最雅致（“人情味”），而且欧洲大陆所有文明国家的贵族都在模仿他们。在18世纪下半期，按照外国方式教育青年，意味着给他们以法国教育。那些由于轻视俄国而受到我国讽刺作家抨击的花花公子，力求尽可能更多地模仿法国人。

在《旅长》一剧中，伊万努什卡对他的父亲说：

“我亲爱的父亲，听说您要给我讨个俄国女人？”

他的父亲问他：“是啊，难道你想讨个法国人？”

---

① 叶卡捷琳娜时代讽刺刊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对“纨绔子弟”的抨击。在一封写给《绘画》杂志出版人的信里（《绘画》，1772年，第二部分，第12页），有一个叫胡里亚科夫的人说：对于诺维科夫的这一刊物，不分男女“交相”“不断”赞扬，他们说：“多么聪明的绘画！他对于现时装模作样的彼得堡时髦男女的腐败习俗作了这样色彩鲜明的针砭！除了他，迄今更无别人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他真是一个正直和聪明的人啊！”云云。当时的讽刺作品大量讽刺“纨绔子弟”。

他答道："我的躯壳生在俄国，这是对的，但我的灵魂属于法兰西王国。"

为了向喜剧的观众们解释，伊万努什卡对法国人的这种可笑的偏爱是从哪里产生的，方－维津觉得必须由伊万努什卡本人来说明。这一年轻的糊涂虫在去法国之前，曾在法国马车夫的宿舍里学习，马车夫给他灌输了对法国的爱和对俄国的冷淡。他说："如果我就学于一个爱国的俄国人，也许我就不是这样了。"

在这里，如果回忆一下别林斯基的卓越评论，会是有益的。他说，方-维津的戏剧创作，与其说是本义上的喜剧，不如说是使俄国讽刺作品变成喜剧的努力的成果。在这些作品里，除了喜剧的成分外，还有许许多多漫画的成分。漫画的生命在于它对其所描绘的实际生活特征，作有意识的夸张。因此，必须有保留地(Cum grano Salis)接受我们在方-维津的喜剧里和其他讽刺作家的作品里所看到的当时俄国生活的画面。实际上，我们的时髦男女也许并不曾象《旅长》一剧中的伊万努什卡那样表现出对俄国的无限轻视，也不曾象他那样迷恋顾问的夫人。但是类似的轻视，毕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特点，这也毕竟是无可疑义的。追求时髦的俄国人，由于极端迷恋法国人，甚至不加批评地对待那些不成体统的法国男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作家不断地嘲笑了俄国人对法国人的轻信态度。诺维科夫在他的讽刺刊物里把这种轻信当作巨大的社会恶行来抨击。按照他的意见，在所有外国人中，只有法国人才是尽力利用了轻信的俄国人民的。在他所出版的《钱包》里，有一个法国人指出俄国人的极端淳朴，说"他们过于相信诚实，而不能区分真诚和狡猾；同时非常值得指出，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不欺骗他们，而是公平诚实地对待他们，但他们却不喜爱他们，也不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如果这些人想欺骗他们，那是怎样也欺骗不了的。

与此相反，俄国人的心灵深处都是向法国人敞开的"[1]。在克雷洛夫的作品里，一个迁居俄国的法国时髦女人告诉她的从法国逃亡出来的刑事犯兄弟说，美国人对于最初到达美国的英国人，远不及俄国人对于法国人的尊重："英国人用武器征服了美国人，而我们却用机灵巧计征服了俄国人"[2]。

在我国讽刺作品反对法国对俄国影响的坚决攻击中，可以很明晰地听到一个被侮辱的民族情感的呼声。被侮辱的民族情感一定要引起，而且实际上已经引起俄国作家把俄国和俄国人民的性格理想化的企图。这一企图，可以部分地解释我在前面指出的方-维津在其国外通讯中一般贬低西欧的秩序、特别是贬低法国的秩序，而对俄国秩序则过分地加以赞扬。这一企图使诺维科夫得出一种自我宽慰的意见，以为"俄国人都崇尚德行。"[3]他们以前尤其富于德行："我们祖先的德行更百倍于我们。我们的土地不曾培育既不喜欢德行、又不热爱祖国的极端邪恶的恶魔。"[4]

这种对俄国民族性格和俄国旧事物的理想化，是后来构成斯拉夫主义的因素之一。米柳科夫认为，对采纳新文化的反感，以及为了故意中伤新文化而颂扬古代的单纯道德风尚，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在彼得朝代及其继位者时代，就已看过了。这是正常的。然而问题在于彼得时代反对采纳新文化的人们所颂扬的是**彼得前的罗斯**，反对的是彼得改革，而在18世纪下半期，他们所颂扬的却是彼得时代。

诺维科夫在所著《俄国作家历史辞典试编》里，认为费奥凡·

---

① 《钱包》(«Кошелек»)，第3页，《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续篇。

② 《地精*佐尔给魔法师马利库勒莫尔克的信》，见《克雷洛夫文集》，第3卷，第139—140页，《灵魂通信》。

* 地精(гном)，西欧神话中身量很小的守护地下宝物者。——校者

③ 见《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钱包》杂志，第2页。

④ 同上。

普罗科波维奇的特殊功绩在于他是“彼得大帝的光荣事业的捍卫者和颂扬者。”在方-维津的著作里，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更为显著。他的斯塔罗杜姆说：

“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方式教育我，我不感到要对自己进行再教育。他是为彼得大帝工作的。那时都把人称为你，而不是称为你们；那时还未曾使人们沾染一种习惯，使任何人都认为自己代表许多人。而在现在，就是许多人也抵不上一个人。”……“那个时代的宫廷官吏都是军人，虽然军人并不都是宫廷官吏。父亲给我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最好教育。那时教育的方式很少，而且还不善于将外国的思想硬塞进空洞的头脑”①。

正是由于那时在俄国“教育的方式很少”，所以彼得才尽力想将外国的思想——即西欧的思想塞进俄国人的头脑。这就是他的改革的意义。由于忽略了这一点，方-维津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确，彼得所极端重视的那种“外国思想”，同叶卡捷琳娜时代贵族出身的“空洞头脑”所极端推崇的那种外国思想，是迥然不同的。它在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的头脑里，是断然不存在的。但是，如上所述，“纨绔子弟”之出现于俄罗斯，乃是彼得改革的逻辑结果。几乎是完全用贵族的力量完成的改革，扩大了这一等级的权利；而由于为这个等级保证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便在这个等级的某些部分造成了对上流社会的娱乐和外国时装的极端爱好。如果由于某种奇迹，俄国重新回到叶卡捷琳娜朝代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所颂扬的彼得一世时代，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也会重新迫使俄国遭受彼得改革的全部后果；而贵族的法国狂，便是这种后果之一。可是对于这种逻辑，尊敬的斯塔罗杜姆之流是一窍不通的。同样，他们也不懂，只有前进的，怎样也不倒退的运动，才能使俄国摆脱这种法国狂。

① 《纨绔子弟》，第3幕，第1场。

在1741年的政变将最高权力移交叶卡捷琳娜时，她郑重宣布将按照她的父亲的精神进行统治。这一诺言掩盖了她自身缺乏任何确定的政治纲领。同样，我们的讽刺作家所以要把彼得时代的旧事物理想化，只是因为他们对于怎样反对他们所指出的社会缺点，以及彼得改革的内在逻辑会使俄国走向何处，全然没有明确认识。

俄国"纨绔子弟"所想仿效的法国方式，是属于法国上流社会的。当时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分是特权等级的成员（贵族和高级僧侣）。法国第三等级的运动，其目的在于反对贵族和僧侣等级；运动的思想代表人物就是所谓"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不仅不迷恋法国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嗜好和习惯，恰恰相反，他们猛烈地谴责这一切。对贵族习惯、嗜好和生活方式的反动，在法国文学和法国艺术的一切新流派里，都跃然纸上。这种反动产生了格勒兹的绘画和狄德罗的伤感主义戏剧。18世纪末，这种反动的最新成就，是旧秩序的被废除，贵族一切特权的被消灭。但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里，只有法国能够产生这种成就。德国刚刚开始的第三等级的运动，没有超出列辛(Lessing)所完成的文学改革的范围，这一改革既是对当时贵族所特有的迷恋法国文学概念的抗议，又是对他们膜拜法国道德的指责。但是，必须记住，列辛之完成文学改革，也是模仿英、法两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特别是模仿狄德罗的。他对狄德罗是非常推崇的。因此，他对法国狂的抗议并不是对法国解放思想的抗议。列辛没有走得象18世纪先进法国人那样远，但他毕竟同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然而，我国法国影响的敌人，却也是法国先进哲学的敌人。

诺维科夫在其所出版的讽刺刊物里，往往这样表示，似乎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国自由思想家同"卷发学院"的教授们毫无二致。几年之后，在为所出版的《俄国古迹讲述》一书写的序言里，他猛烈抨

击那些他所谓感染了“法国自然体系的书籍的毒害，传染了香粉、香膏、纸牌、游手好闲，表面装饰和无益打扮等恶习的人们。”①所谓“自然体系的书籍”自然应了解为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所以，结果是霍尔巴赫和狄德罗应对上流社会轻薄少年的游手好闲，对他们的香粉、香膏和纸牌负责！不能比这种概念混淆走得更远了！然而这种混淆，不仅为诺维科夫一人所独有，在方-维津的例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方-维津在把彼得时代理想化的同时，也对法国的新思想鼓吹者（对所谓“学术界的撒谎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方-维津之过分赞扬俄国社会生活而贬低法国社会生活，部分地是出于对俄国上流社会的法国狂的反动。现在，我补充指出，将俄国欧化贵族的这样那样缺点的责任，诿诸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只能是俄国社会关系不发达的结果，这种不发达妨碍俄国讽刺作家去了解西欧社会生活和思想生活的现象。

米柳科夫说得完全公允：由于西欧文化仅仅为贵族等级所享有，所以对于他们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就同对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攻击交织在一起。可以补充说：从西方无神论作家那里抄袭得来的进步思想，其内容就是对贵族等级的特权地位的攻击，而把彼得时代旧事物加以理想化的笃信宗教的人们所攻击的，正是这些无神论作家。正因为把旧事物理想化的人们所厌恶的，是勇敢的革新家，所以尽管他们从这些革新家那里抄袭了进步思想，但他们并没有好好吸收它；同时，他们对贵族等级特权地位的攻击，由于同对这个等级的文明外表的攻击交织在一起，所以，不能不是极端无力和极端表面化的。此外，这种进步思想有时完全被冲淡了，而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宣扬——即利用都会中的道德败坏来宣扬外省贵族

① 见涅泽列诺夫：«Н. И. 诺维科夫»，第 220—221 页。

的"纯朴"道德——所代替。

然而，尽管对彼得时代旧事物的理想化在理论上毫无内容，尽管讽刺作家对贵族等级的外表文明的攻击在内容上贫乏无力，但是应该承认，这两者在当时都是值得注意的旗帜：它们表示，俄国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应对西方采取什么态度问题，业已产生。在本书往后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或者，——如果在这里可以使用我国在下一世纪 70 和 80 年代流行的表达方式——为了寻求我们的进步方式，18 世纪已经作过值得重视的努力。我们将在这一章里看到，方－维津在这个问题上就发表过后来在 19 世纪风靡一时的思想。

第八章 社会思想在不同社会成分相互斗争影响下的运动

法典委员会

I

彼得改革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往往互不协调的新意图，在臭名远扬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编制委员会"里亦有表现。但是，这一委员会表明，我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对于那些不符合彼得时代以前的旧事物和不符合迄今仍没有动摇的国家制度基础的法典的实施，是多么不利。

一部分人民把派遣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看为一种对国家的可憎的徭役。对这部分人说来，问题是尽快地摆脱这种徭役。在穆罗姆贵族给他们的代表的委托书中说："我们出席会议，根据我们全体穆罗姆贵族的共同意见，决不承认任何负担和需索。"① 在特维尔县，有一个地主借口彼得三世的敕令曾豁免贵族的任何强制服役，而拒绝参加代表的选举。工商阶层尚未免除强制服役。因此，在1766年12月14日上谕到达后，某些城市的市议会认为有权采取坚决措施，取缔逃避立法工作的任何企图。在浦季夫里，市议会命令市长库尔久莫夫："你要到浦季夫里的所有商人家中去，不要遗漏一户，向每人宣布，要他们准时出席。""万一他们由于不服从而没有报到"，市长应即上报。在卡尔戈波尔，市长奉命每周巡

① П.库德里亚舍夫：《人民对叶卡捷琳娜委员会选举的态度》。《欧洲通报》，1909年，12月，第516—541页。

查，明晰地宣读上谕文件及附件，务期家喻户晓。在卡辛，阿尔汉格尔斯克，梁赞省彼列亚斯拉夫勒市，市议会命令，在12月14日上谕颁布后，任何商人都不得在选举前擅自离城。在其他城市，离城的商人必须书面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归来。在卡西莫夫，责成市长对第一级和第三级商人中的40名，处以罚金，“不得疏漏”，因为他们经过多次通知仍不出席选举。对于无力偿付罚金的逃避者，决定处以“笞刑，使其不敢再犯”。这一切都是按照彼得改革前的莫斯科制度精神办理的。对于那些与当地生活素无联系，并且不愿被选而被选为代表的选举人，也按照这一精神对待。在当时莫斯科省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商人叶波尔金被选为代表，他虽然在文件上属于当地社会，但却住在维堡市。他在收到代表证书和选民委托书后，向相应的主管当局说，他在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既无房屋，又无商店，此外，他本人已经病了三星期，并提出医生诊断书作为证明。开始了一个整个的诉讼过程，官司打到参政院，参政院的裁决认为，叶波尔金在当选时，在该镇尚有房屋，而且身体健康，后来才生了不大的病，所以他无权拒绝充任代表的义务。维堡省省长遂将这一强迫被选的人送到莫斯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从现时的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库尔斯克的代表伊凡·斯科尔尼亚科夫的命运。他住在涅仁，托词有病。就是情绪乐观的参政院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代表，这病——“头脑糊涂”，是大病。可是严厉的库尔斯克市议会不考虑他的托词。根据省长的命令，为了惩罚他的“一周逃避”，斯科尔尼亚科夫由小俄罗斯委员会押送到库尔斯克。监禁过斯科尔尼亚科夫的涅仁市议会，认为他们是“依法”办事。

在叶尼塞斯克，当地居民有意推举一个受到普遍憎恶的人沙莫伊洛夫为代表。当选人抗议说，他是被恶意地选出来的。然而这没有用。他不得不服从自己的痛苦的遭遇。沙莫伊洛夫甚至参

加了修改代表委托书。法国谚语说得好；胃口在要吃东西的时候才会来。选民们在签署委托书时还担心，选出沙莫伊洛夫不仅会给当选人，而且会给选民自己带来麻烦。然而，困难总算是消除了，沙莫伊洛夫到了莫斯科，据说，还成为委员会的一名干员[①]。

如果旧莫斯科的传说，最少在俄罗斯国家某部分。居民中尚且记忆犹新[②]，那么，它在这个国家的行政官吏中，就更为根深蒂固了。叶卡捷琳娜说，她要使代表的选举成为"自由的"，要防止对选举施加行政压力。但是，我们深知，女皇的实践同她的理论分歧得多么厉害。实际上，行政当局只要觉得有益，便毫不迟疑地压制选举。他们极为关切的是使选举"充分安静无声地"进行，任何"喧哗"都被他们看为犯罪。如果在大俄罗斯很少发生具有政治意义的"喧哗"，那么，在西部边区，事情就迥然不同了。这些边区有其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权利，它们根本不愿放弃这些权利。那里的居民担心委员会会取消这些权利，因而宁愿完全不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在波罗的海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小俄罗斯的一些地方，便是如些。而当边区人民确信逃避派遣代表已不可能时，他们便在拟订他们的委托书时，首先请求保持迄今仍存在的特权和恢复已被中央政权取消的特权[③]。不言而喻，行政当局只能把这种意向和愿望看为"任性"，看为对决心为臣民造福的女皇的"忘恩负义"。小俄罗斯的总督鲁缅采夫从小俄罗斯写给叶卡捷琳娜的报

---

① 这段历史最初是由沙什科夫叙述的，参阅弗洛罗夫斯基伯爵的著作：«1767—1774年立法委员会的组成»，«新俄罗斯大学回忆录»第10卷，敖德萨，1915年，第407页。我所举出的其他情况，在这里亦有记载。

② 不过，必须指出，甚至在某些西欧民主国家里，当选人也无权不履行人民责成他们的政治义务。例如，14世纪的弗罗伦萨便是如此（见佩林：«弗罗伦萨的文明» F. T. Perrens, La civilisation florentine）巴黎，1893年版，第49页）。

③ 利夫梁德的贵族请求确认他们的特权，费波尔格的贵族申请保持瑞典贵族在征服该省时所享有的特权。（原文如此！）见«俄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第68卷，第66，67，91页。

告说:

"新法典草案没有引起对皇帝陛下的德意的感激,没有改变他们的倾向和意见。许多人酷爱为所欲为，甚至认为任何皇上的上谕都是破坏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他们所有人的意见都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委员会呢？我们的法律已是够好的了，而如果去作代表,那就只有请求确认我们的权利和特权。'他们'经常灌输到普通人民(这种人是真正善良的)头脑中的建议的用语，是自由和权利',把这视为必须一致寻求的根本。"①

象鲁缅采夫一样,叶卡捷琳娜决定,这种"任性"必须结束。她回答鲁缅采夫说:"我希望你会采取措施,逐步使那些不认识自己社会利益的人们,终于认识这种利益。"

由于她早在塔勒兰(Талейран)之前便已实行一个信条:我们应该利用言词来掩饰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里也立即建议避免"强制或严峻的训诫"。这一保留没有瞒过鲁缅采夫。在其后所写的一份报告里,他对他的爱好自由的元首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再去劝导这些撒谎者",他"直接采取了命令的语调"。如所预料,她答复他说,他所使用的命令语调，是"非常得体的"②。问题并不限于"语调"。在涅任团队，选民由于不满意他们的代表谢列茨基拒绝接受一份要求恢复贵族自由以及黑特曼(Гейтман)③政权的委托书,选出另一名新代表来代替谢列茨基④。于是，行政当局将"破坏秩序的主谋者"移送法庭:军人移送军事法庭,非军人移送民事法庭查办。

---

①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6卷,第315页。

② 同上书,第317页。

③ 乌克兰1654—1764年间的政权;查坡洛什哥萨克公选的首领;波兰16—17世纪的统帅均称Гейтман。——校者

④ 他对选民说:"我不能带着你们的委托书到莫斯科去,因为我不好意思把它拿给人看",——尽管前此他自己也同意委托书的内容。

他们的罪名是他们"公然破坏代表谢列茨基的权限"，而谢列茨基"自当选之日起即已处于女皇陛下的保护之下"。民事法庭给被告判处终身流放，军事法庭处刑更重：在36名被告中，33人判处死刑，其余3人判处流放；参政院将流放改判为16年监禁，褫夺一切官衔。死刑判决没有执行。不知道当时给他们改判为了什么罪；但在1770年，当仁慈的叶卡捷琳娜认为可以宽恕他们的时候，赦免的消息他们是在监狱里得到的①。

贵族对中央政府的反对情绪，比小俄罗斯人民的其他阶层表现得尤为剧烈。我们在前面看到，甚至鲁缅采夫也觉得，小俄罗斯的"普通人民"是"真正善良的"②。然而善良的小俄罗斯人民，也有不少不满的理由。哈尔科夫省③米日里奇镇的居民过去是镇的哥萨克军人，后来变为纳税居民，他们自然愿意恢复旧秩序。在一次选举大会上，有一个名叫格林金科的人感叹地说："谁规定了这个税额，他将永世不得超生。"他被捕了，并被移送法院。有些选民企图释放他；他们也被捕，并按法典第1条和第8条，以密谋危害国王健康，阴谋反对国王的刑律审判。苏麦省当局决定公开对所有被告（共23人）实行鞭挞。事实上，仿佛只有格林金科受了鞭

① 更详细的情况，参阅我在前面引用过的库德里亚舍夫的论文《居民对"叶卡捷琳娜委员会"选举的态度》，第532，533等页。

② 库德里亚舍夫说：在小俄罗斯，在委员会开会时，"滋生了不满的情绪和分离运动的暗潮"（《欧洲通报》，1909，第2卷，第106页）。不满情绪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说它有着"分离主义的性质"，却是很可怀疑的，特别是，小俄罗斯贵族所不满的是政府拒绝使他们在权利上与大俄罗斯的贵族平等。造成这一不满的原因，叶卡捷琳娜二世在80年代已予消除。用叶菲缅科的话说，这时，"小俄罗斯贵族的多年苦恼结束了，通向一直不能到达的殿堂的大门，已给他们打开了"。（A. 叶菲缅科论文集《南俄罗斯》，第1卷，第191页，《小俄罗斯贵族及其命运》一文）。小俄罗斯贵族不满之缺少政治内容，可从下列事例中看出，而这种事例远非仅有的一次：在波尔塔瓦领导法典委员会选举的科丘别伊"费了很大力气才好不容易说服官吏同城市居民开会"。见（《欧洲通报》，第2卷，第113页，库德里亚舍夫前引论文。）

③ 哈尔科夫本不属于小俄罗斯、而属于新斯洛波德省，但其居民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是小俄罗斯人。

刑，还有选民费特洛克受了笞杖。然而，这就是非常"严峻的劝导"啊！假定费特洛克饱尝笞杖滋味，是因为他企图强力释放格林金科，但格林金科的受罪，只不过是因为他过于激烈地表达了他对新事物秩序的观点而已。这就是说，"自由的"选民，在给应该谋求"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的幸福"①的代表提出委托书时，是没有自由公开说出他们所想说的一切和心里感到痛苦的一切的。

按照关于选举的上谕附件的规定，代表永远免除死刑，拷打，体罚和财产被没收；凡是侮辱代表的人，应受双倍的"侮辱"。然而在这里，实践又与理论分歧。哈尔科夫省代表普洛科普·库克向居民需索钱财，许诺在与选举同时举行的土地清丈中，给这些居民帮忙。库克被控敲诈，被剥夺了代表称号，并被处以鞭挞。这样看来，仁慈的女皇所给予代表的特权，其实不过是说，在没有预先剥夺他们的崇高的代表称号时，不能对他们的"肉体"进行处罚罢了②。

行政当局非常不喜欢代表们同他们的选民有书信往还。有些代表向外省写信。按照行政当局的意见，这些信可能表现出不服从。叶卡捷琳娜认为应该给他们提出严重警告，"使他们往后更慎重地使用纸笔"。代表杰尼索夫，莫列涅兹和莫罗兹。③由于同他们的选民有过仿佛令人愤慨的通信，都被开除了。不过，这类细节，就是现时的俄国读者，也不会觉得奇怪的。

---

① 在代表纪念章上的题词。

② 库克辩护说，他只是接受了自愿的、法律所允许的赠品。无论如何，有理由设想当地的地主夸大了他的过错，因为他们相信，他妨碍他们和睦地划分当地农民的土地。这类地主之一——百人长科瓦列夫斯基——建议撤销库克的代表职位，因为他是"一个阴森的令人厌恶的庄稼汉，他会在委员会里放出任何毒素"。（库德里亚舍夫：见前文，《欧洲通报》，第2卷，第120页。）

③ 弗洛罗夫斯基，书见前，第573页。

II

库德里亚舍夫说:“居民对选举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善意的和颇为自觉的。”他指出,在一些地方,选民坚决支持当选人,有时对他们实行经常的监督。

实际上,尽管无论在行政当局对选民和当选者的态度上,或在选民和当选者对自己的责任的观点上,都还保持了很多彼得前的旧事物,但我们还是看到,这次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选举,要比前此历代君主召集的类似委员会的选举,具有更多自觉性和严肃认真精神①。

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对此也不容夸大。事实是,在选民总数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积极参加了选举。这一事实,库德里亚科夫伯爵也曾指出。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许多多贵族选民,由于在军中服役,不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库德里亚舍夫伯爵举出了关于当时莫斯科省若干县的一些有趣的统计数字:

业　主

	总人数	住在县内人数	出席选举人数	送来意见人数
戈罗霍韦茨克县	63	7	6	4
瓦洛科拉姆斯克县	60	15	6	10
兹维尼戈罗德县	80	2	—	51②

在工商阶层的人们中,大概有些人——也许甚至为数颇多的

① 1766年12月14日发布的关于召集新法典编制委员会的上谕,按其先后次序,是第5次。在彼得一世时,即已开始设置立法委员会。最初,政府以为只要使用政府官吏,即可竣事。政府很快看到希望落空,便着手从贵族中,随后(在彼得二世时)又从商人中,再后(在安娜女皇和叶卡捷琳娜时)更从僧侣中,召集“善良有识之士”。就我所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尽管十分爱好同她的国外通讯人谈论召集委员会的事情,却谁也没有被告知,她这次所实行的主意,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

② 《欧洲通报》,第12卷,第541页,文见前。贵族选民有权不亲自参加选举,而书面投票。

人——由于经营自己的商务，或由于执行国家的强制义务，暂时离境，而没有参加选举。

库德里亚舍夫还指出一个当然很不方便的情况，即委员会的选举，指定在道路泥泞的春季进行。但是，第一，我们知道，市议会曾"恭敬地"——也是成功地——请求省长改变对居民不便的选举期限①。这一办法可以最少在一些地方部分地避免由于春天道路泥泞而造成的无可争辩的困难。第二，选民暂时离境，无论是自愿的(由于私事)或是强迫的(由于国家义务)，都很难完全解释为什么在彼得堡亲自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只达到居民总数的15%，而在莫斯科为数更少，只占选民的10%②。

为了避免误会，请注意不愿亲自参加选举，并不表示选民对选举的结果漠不关心。我们知道，选举法允许贵族书面投票或提出他们的"意见"。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莫斯科省，许多贵族选民行使了这一权利。同样的权利——这是不符合法定的选举程式的，——亦曾授予两个首都的选民。为数颇多的首都房产主，可能不愿意，或者因故不能出席选举大会。但是，贵族，比方说，兹韦尼戈罗德县的贵族，当他们在较远的地方服役时，觉得必须向故乡寄回他们的选举"意见"，这就表明他们对立法委员会的命运，颇为关心。而如果彼得堡或莫斯科的房地产主不亲自参加选举大会，却只是送出一封"信任信"，那就显然表示他们的选举热情，是异常有限的。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选举复选人时，出席了许多达官显贵，对于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应在同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情

① 弗洛罗夫斯基：书见前，第379，380页。

② 弗洛罗夫斯基，书见前，第356页；另请参阅库德里亚舍夫：《欧洲通报》，第12卷，第543页，前引论文。当然，选民暂时离开他们的经常住处，同样既不能解释我在上面所引述的穆罗姆贵族关于他们没有任何麻烦和需要的声明，也不能解释季米特洛夫斯克市居民关于他们不申请任何"改善"的声明，根据他们城市的情况，没有任何共同的需要可以提出等等(见库德里亚舍夫：《欧洲通报》，第12卷，第541页，同文)。

况甚至使领导这两个都会选举的警察总监奇切林有些着急，他“劝告选民不要在委托书里”“从有能力的、和知道城市需要的各种身份的居民中，选出复选人”①。

由于这一切，如果说不是“一般地”所有居民，而只是其中某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比在以前对选举表现了更认真、更自觉的态度，那我们就更接近真理了。

这一部分居民精力最充沛，也最活跃。他们的当选人，应该说是在委员会里享有代表权的所有居民的需要的表达者，是这些居民的意图的体现者。

尽人皆知，农村居民在委员会里的代表是很少的。在选举条例里只提到独院小地主，务农的士兵，多年公职官宦，耕种国家土地和缴纳皮毛实物税的农民。12 月 19 日上谕颁布后，除这些成份外，增加了某些其他成份。同年 12 月 19 日，参政院通过决议，给经济农民以代表权。其后不久，叶卡捷琳娜命令也吸收那些编入工厂的农民参加选举②。关于是否给予宫廷农民以代表权问题发生了，但因一开始就否定了地主农民的代表权一样，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否定的③。

任何特定阶级、等级或阶层的最活跃部分，通常都是它的最文明的部分。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惜当时俄国居民的最文明部分，也是不大文明的。博奇卡列夫编制的表格，表明选民中文盲的人数④。

---

① 库德里亚舍夫：同上书，第 543 页。

② 弗洛罗夫斯基(《立法委员会的构成》)引录了这个决议的原文。这样看来，库德里亚舍夫认为工厂农民没有代表权是错误了。下文我们将看到工厂农民的某些委托书。

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主领地里的芬兰农民与俄国农民不同，他们在委员会里有代表(弗洛罗夫斯基：同上书，第 425,426 页)。

④ 参阅博奇卡列夫根据 1915 年,1,2,3,4,5 月份《俄国旧闻》刊登的立法委员会资料而写的著作：《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初期俄国社会的文化需要》，本表载 2 月份。

省别	贵族			城市居民		
	选民总数	文盲	文盲对选民总数的百分比	选民总数	文盲	文盲对选民总数的百分比
奥伦堡	185	111	60	—	—	—
阿尔汉格戈罗德	331	93	28.03	—	—	—
莫斯科	1756	314	17.88	4646	1543	33.17
诺夫戈罗德	977	141	14.33	69	3	4.35
涅什戈罗德	130	15	11.54	680	331	48.97
诺沃罗西斯克	309	33	10.65	—	—	—
斯摩棱斯克	206	19	9.22	30	—	0
别尔戈罗德	510	43	8.44	1401	441	31.41
沃龙涅什	553	45	8.14	1471	813	55.27
小俄罗斯	884	53	5.99	521	383	73.51
彼得堡	41	2	1.88	100	—	0
斯洛坡乌克兰	254	11	4.33	—	—	—
喀山	205	2	0.97	82	13	15.85
基辅	111	—	0	183	93	50.82
阿斯特拉罕	—	—	—	682	372	54.54
爱司特兰	165	—	0	—	—	—
里弗兰德	171	—	0	—	—	—
西伯利亚	65	—	0	—	—	—
伊尔库斯克	39	—	0	63	—	0
维堡	3	—	0	—	—	—

当俄国讽刺作家嘲笑俄国的极度法国狂时，在莫斯科省这个大俄罗斯的中心，在属于“贵胄等级”的选民中，却有大约18%的文盲！至于在奥伦堡省，这种文盲选民竟达到半数以上，就更不用说了。文盲贵族可能不比塔拉斯·斯科季宁或米托罗凡·普罗斯塔科夫更易于接受一般西方影响，特别是接受解放哲学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集居在外省，这就使我们能够正确估计我国讽刺作品所时常描绘的那种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对立，以及他们在作这

种描绘时毫不掩盖其对后一种生活的同情①。

无论在大俄罗斯或小俄罗斯，工商阶层的文盲更为普遍。如果小俄罗斯省的贵族选民中，文盲只占6%，那么，城市选民中文盲便占73.51%。基辅省的文盲选民占选民总数的50.83%。在沃龙涅什省占55.27%；在莫斯科省占33.17%等等。彼得堡省仿佛是一个出色的，甚至奇特的例外，其文盲选民在贵族选民中仅占4.88%，而在城市选民中更下降为零。但是，那里列入城市选民数字中的人数比较不多。所以，更慎重的是，对于他们之中有没有文盲，不作任何结论。

无论个别情况如何，不容怀疑的是，俄国工商阶层，整个地说，在当时是比贵族等级更缺少文化的；当这些非常缺少文化的人们的代表不得不考虑彼得改革所引起的各项矛盾时，他们便显得不能广泛地照顾本等级的需要，不能提出结构严谨的、没有矛盾的整套要求了。

III

“要求”一词，也许是不适当的。谢列耶维奇说道：“尽管城市居民的申请是合法的，但是他们总离不开一种思想，以为这些申请会为女皇所不赞成；因此，在委托书的结尾，他们总是请求惠予最大的宽恕，如果委托书的内容有什么过当的地方”。作为例证，他从梁赞省佩雷亚斯拉夫尔公民的委托书里摘录了一段话，我们在那里读到：“如果在我们这些请求里有什么是不适当的东西，我们最诚恳地请求皇帝陛下宽恕，对我们这些最忠诚的奴隶宽容，不把这看成犯罪。”②这就是莫斯科罗斯的具呈人的语言！具呈人不是要求，而只是提出请求。18世纪的俄国城市居民对中央政权的态

① 必须记住，这里所说的全然不是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对立。

②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93卷、序，第9页。

度，同彼得改革前的城市居民，并无二致。然而在代表们送给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言论里，有时却发出了前所未闻的语调。彼得改革毕竟还是有其影响的！

必须指出，城市代表对彼得改革是深为同情的。苏兹达尔市的委托书包含了对彼得活动的整篇颂辞。委托书的编者热烈歌颂这位改革家对商业的"慈父般关怀"。他们说，彼得一世"以自己的崇高地位，不惜向精于商务的人民敏锐地考察有益的办法，艺术和工作，以便将这一切教育自己的臣民"，等等。他们对于彼得一世在实行有利于商业的改革时所追求的目的的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他"这样作的意图，是要使俄国商人积财如山，不仅(原文如此！)堪与欧洲商人并驾齐驱，而且超越他们，因为如在欧洲国家中所见，国家有多么需要商业，他是确切知道的"①。

往昔笃信宗教的人们对西方的那种笨拙的仇恨心理，在这里一点也没有了。然而这种心理，甚至波索什科夫也有过。在苏兹达尔市的委托书里，后面的几行还谈到"幸福的欧洲商人"，在他们面前，贫穷中在苟且偷安的俄国商人，感到羞愧。

在委员会的第 62 次会议上，巴尔纳乌尔市代表卡雷舍夫的发言，对彼得一世作了更为热烈的颂扬。他指出，彼得改革前的俄罗斯"不为世人所知"，由于贫穷妨碍它养活军队，因而不能自卫抗敌。但现在由于彼得改革，俄国已有强大的部队，"只要看看这个部队的样子，就足以使胆敢来犯的敌人惶恐和战慄"。

按照卡雷舍夫的意见，彼得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港埠，增加了同各种前所未闻的各国人民的贸易"。请看，他们主要是从商业的观点来估价彼得的改革活动的。军事的理由只不过是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罢了。应该看到，代表卡雷舍夫一般地认为商业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他断言，腓尼基和梯尔，卡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 107 卷，第 18 页。

尔伐根和罗马，英国和荷兰，“其光荣都归功于商业”[①]。

不仅这样。卡雷舍夫在确认商业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重大作用时，还引证了叶卡捷琳娜《敕令》中的语句：“在受到排斥的地方，商业凋零；而在安宁不受破坏的地方，商业建立起来了。”[②]有理由设想，他对彼得改革的巨大利益和对商业的重大意义的信念，都是同自由的必要性的认识相联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认识不只是他一人表示过。喀琅施塔得代表雷布尼科夫在与谢尔巴托夫公爵争辩时，将俄国商人的情况与西欧商人情况作了比较，指出：“俄国商人阶层没有应有的自由。”[③]

根据这一切判断，使城市代表懂得自由的意义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思想家，也不是他们所引述的西方影响，而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痛苦经验。涅什戈罗德的公民抱怨警察“给商业造成巨大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他们的委托书的第一条里便请求“将现有涅什戈罗德警察局撤销，并将警察职务划归涅什戈罗德省的议会管辖”[④]。北首都的公民提出申请，请求“任何人都不应在自己的住宅里遭受任何暴力侵扰；如果必须将谁送到法院或抓往何处，应先给他发出传票，如果他在传票到达后未及前往，也不能在住宅里或室内强力(原文如此！)逮捕，而应在住宅外或室外逮捕。刑事犯除外”[⑤]。

莫斯科公民在给他们的代表戈利岑公爵的委托书里，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他们希望警察保卫公民不遭受任何强力行动，并不得从自己方面对法院使用暴力。“如果需要将谁送到法院，任何时候都不得将他从自有的住宅(如果他有这样的住宅的话)，或租用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275—276页。
② 同上，第275页。
③ 同上，第8卷，第176页。
④ 同上，第134卷，第3，4页。
⑤ 同上，第107卷，第218页。

的住宅里将其逮捕。刑事案罪犯除外"①。叶皮凡选民，请求"不得将城市居民——平民知识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因任何案件捕进市议会或市政自治机关，并不得在这些地方将他们监禁。"

他们不象在其他委托书里一样把刑事案件作为例外，而只是把票据案件作为例外，"但必须将拘留时间和审判地点通知"②。

但苏兹达尔公民的话，比所有其他人都要激烈："当所有的财产都从手中夺走了的时候，号称商人是没有任何好处(原文如此！)和幸福的。……值得称赞的商业流通，其繁荣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自由的意志和对营业的不阻扰"③。

除这些权利要求外，还请求改进诉讼程序。彼得堡的居民希望"下令按照其他欧洲城市的样子（请读者注意这点！——著者），建立市政自治机关或市法院；为了最快地约束和根绝密告谗言，因循贻误，争讼纷纭，钻营奔走，请在现时法院下建立口头法庭，以便公民和居民毫无差别地在这里审理一切相互间的争议和委屈"④。莫斯科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而且——这一点也应该记住，——也引证西欧说："为了在公民之间更好地遵守秩序和处理发生在小市民之间的事故，最诚恳地请求在这里，按照欧洲城市的样子，建立市法院。(原文如此！)为了使一切人和每一人都能迅速约束和根绝密告谗言和因循贻误，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口头法庭，以便所有的人，无论其职位和官级如何，都能在发生争议和委屈时，利用不偏不倚的法庭。"⑤

在委员会开会时，城市的代表也请求设置口头法庭⑥。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93卷，第128页。

② 同上，第107卷，第12页。

③ 同上，第107卷，第15页。

④ 同上，第107卷，第217页。

⑤ 同上，第93卷，第126页。

⑥ 同上，第93卷，第134页。参阅前面引用过的博奇卡列夫论文，见《俄国旧闻》3月号，1895年，第574页。

再说一遍，彼得改革对于商工阶层没有白白过去。这个阶层的不识字或不大识字的群众开始意识到学习的必要。莫斯科的商人在他们的委托书里最诚恳地请求设置学校，“使不仅靠父母抚养的富商子弟，而且使靠本地商人养活的幼年孤儿，都能在这里学习各种语文，会计，以及为商业所必需的科学和知识”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市民在这里也引述了西欧情况。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居民在他们的委托书里说，由于无知，“商业上没有熟练的批发商，而开明的欧洲却到处都是这种商人，所以经常获得高利。因此，可以将我国商业比喻为这样的制造厂，其原料虽好，而工具失修，不能臻于完善”②。

贵族代表也在委员会里指出教育的利益。但他们是从国家职务需要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例如卡卢加的贵族，希望他们的子女由于受了教育，“在往后履行他们担任的职务时，不负所学”。按照别廖夫人的意见，学校所以需要，是为了“使贵族争得光荣，比其他人更能优秀地执行女皇陛下的军事职务”③。至于商人的代表，他们几乎只是强调商工业的需要。里亚斯克市居民力争责成市议会“尽一切努力来教育子女，使他们除熟悉法律和书写之外，还学习数学，会计，航海，几何以及其他有关商业的科学。他们的子女如果不懂得高等科学，那就叫他们按其志愿，学习手工工艺，不让任何人不懂科学而游手好闲，墨守成规”④。

有些城市的委托书编者，想到必须实行强迫教育。维亚兹玛市的居民幻想“没有一个商人或行会人员的子女不识字，没有一个人靠乞讨过活。”沃洛格达选民希望“对穷困商人的幼年孤儿，因才施教，虽非按其志愿，而是出于真正照顾。”阿尔汉格尔市委托书编

① 博奇卡列夫论文，见《俄国旧闻》2月号，第336页。

② 同上论文，3月号，第565页。

③ 同上，3月号，第565页。

④ 同上，第574页。

者，请求"规定对男女两性子女一律学习识字和教义，违者重罚。"里亚斯克商人，建议对不送子女入学的父母"处以罚款，并将罚款用来维持学校；此外，这些子女由于父母的纵容，未经主任教师同意或在放假前擅离学校，根据1714年的训令，不得结婚。"

不过，远非所有城市选民都表达了他们对学习的利益的认识。下面的数字表明在1767年的选举里，有哪些省份表明了这个认识，以及提出学校问题的委托书在整个城市委托书中所占的百分比①。

省　别	提出学校问题的委托书数	它们对全部委托书的百分比
斯摩棱斯克	1	20
阿尔汉格尔斯克	3	15
沃龙涅什	2	12.5
诺夫戈洛德	2	10
喀山	1	6.05
莫斯科	2	3.43

此外，城市选民的教育意图受到了等级界限的限制。

在1768年5月2日的会议上，农民士兵的代表伊凡·热列布措夫提出"意见"，认为必须在农村设立学校，以教育那里的儿童"识字，轮流学习教会的书和法律书"。在同年5月5日会议上，奔萨市的代表斯杰潘·柳巴夫采夫表示反对。他认为农民，按其情况，除识字外，不需要学习其他科学，而识字就是没有学校也可学到手。学校将使青年人离开农业②。

俄国手工业的大力发展，实际上使相当多一部分农民参加商工阶层，因而同任何地方相比，商人受到的教育更少，因而把人民群众留在愚昧之中。显然，来自同一省分——不过不是来自城市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32卷，第398，412页。

② 同上。

居民，而是来自农民士兵——的一位代表Er. 谢利瓦诺夫在发言反对柳巴夫采夫时，就想要他注意这一点。他提到方言教育重要性的叶卡捷琳娜《敕令》，同时指出，商人中有两个阶层：其一，由于学习而变得有了文化；另一则来自农民，没有学习的可能。从这里得出的最正确的结论很明显：如要对整个商人等级进行教育，那也就教育了农民。士兵代表的另一个意思，也是无可辩驳的：他认为教育不危害农业，而相反，给农业带来利益。

批评柳巴夫采夫观点的，除奔萨市的代表谢利瓦诺夫外，还有谢尔佩伊斯克的贵族代表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他认为教育对农民亦有益处，因为只有教育才使人有别于牲畜，同时，他还向我们阐明我们"对神，对国君，对社会"的责任。伯爵希望，在农民受到教育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地主表现出野蛮粗暴①。公平的读者会同意，农民士兵——也就是农民——的代表，对于教育的观点要比商人和贵族代表的观点既广阔得不可计量，而等级利己主义的成份也最少。

IV

我们知道，城市代表坚决指出了自由对于发展"商业"的重大意义。人们如果只是知道商人对于自由的这些颂歌，就会责备已故索洛维约夫的不公正，因为他说：在法律委员会里传遍了贵族、商人和僧侣们的和睦的、极为悲哀的"奴隶"呼声！根据商人对自由的歌颂，似乎应该假定，商人代表，相反地，曾和睦地叫喊："自由万岁！"但是，已故的历史家是对的。

就说我们所知道的喀琅施塔得代表雷布尼科夫的意见，认为俄国商人没有必要的自由罢。这个意思是以反驳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形式提出的。谢尔巴托夫公爵竭力反对城市代表申请准许商人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32卷，第457页。

购买奴隶。他说："我们看到，在整个欧洲，没有人有奴隶，但谁也不说这样过不去，谁也不抱怨没有劲儿了。怎么能说，商人没有奴隶，就过不去了呢？"① 雷布尼科夫想得对：如果承认俄国商工阶层的地位与西欧的地位相同，则这一论断是无可反驳的。所以，他赶忙指出，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与西欧不同，俄国商人被剥夺了自由，他们也没有"充分的特权，在官方征召时服役，这事涉及成千成万的人"。他对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这个答复大为城市代表所欣赏，他们当中许多人"同意他的意见"②。

同样，我在上面引录过的苏兹达尔委托书也歌颂彼得，因为彼得准许商人"适度地按照机器和炉窑的数目，购买农民"，送进工厂和作坊③。

许多其他城市，如莫沙尔斯克，阿尔扎马斯，托姆斯克，涅希，西尔白伊等等，都曾申请给商人以购买"奴隶"的权利④。

简括些说：西方的秩序是好的，自由也是好东西，但俄国不是西方。俄国商人等级自己没有自由，却又不能没有奴隶劳动。他们最恳切地请求将他们从对国家的义务兵役中解放出来，从束缚商工业活动的警察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又与此同时请求准许他们购买"奴隶"。彼得一世比任何其他国王都更懂得工业和商业的需要。他进行了伟大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取消工厂和作坊工人的奴隶劳动，相反，它破天荒第一次使这种劳动得到广泛采用。

城市选民和当选人的见解就是如此。索洛维约夫是对的！这就使我们对于当时俄国商人的**西方化**的范围，有了明确概念：从西方秩序中应该抄袭那些增加商人的身价和自由的东西，同时完全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108—109页。

② 同上，第176—177页。

③ 同上，第107卷，第17页。

④ 几乎所有参加投票的商人代表都提到必须允许他们购买奴隶——农民和家仆都要。（波列诺夫：《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序言，第24页）。

忽视那些这样或那样，从这方面或那方面保障工人人身自由的东西①。

这种商人的西方化，与贵族的西方化极为相似。俄国贵族等级也是不反对颂扬西方的，因为西方贵族保有一些为俄国所没有的特权。它同时又害怕与西方接触，因为西方各国的居民享有人身自由。然而这里有着重大差别。

如果城市的委托书充满了对彼得一世的歌颂，那么，随后在18世纪下半期，贵族思想家却对他开始采取一种颇为慎重的态度，因为他的官制级别表使门第的重要性退居于官衔之下，而且他全然无意豁免贵族的义务兵役。在立法委员会召开之际，业已从彼得一世历届继位者取得一系列特权的俄国贵族，竭力奉承叶卡捷琳娜二世，希望她不要拒绝执行他们那些不影响她本身权力的愿望。伏尔泰的女弟子非常乐意地迎合了他们的这些愿望。但是贵族的要求愈是增多，他们便愈是同其他阶层的利益和权利相矛盾。其他阶层不能不反对他们。可是，工业阶层的代表一方面吞吞吐吐地、毫无系统地表示反对贵族的要求，但在最主要的方面，却没有表现为革新者，而是表现为守旧者，更确切些说，表现为力图恢复旧事物的反动派。

谢尔盖耶维奇完全正确地指出：自远古到18世纪，所有自由的人都能蓄奴。法律禁止寺院和显贵购买世袭领地，但不禁止任何人购买人。在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曾允许商人和城市工商业者保有奴仆。只是在18世纪中叶，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根据参政院1746年命令，只允许在第一次普查时业已保有奴仆的工商业者，保有奴仆。

城市工商业者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购买的奴仆，从他们那里

① 不要忘记，关于自由对商业的意义，城市代表是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主管当局的允许下传播的——这一意义，在叶卡捷琳娜的敕令里亦曾谈到。

划拨出去，按照他们的意愿，拨给城市工商业及行会或者地主。剥夺商人购买奴隶的权利的制度，是经过这种实质上非法的命令确立起来的①。

商人力图恢复这一权利。在18世纪60年代初，——可以说，就在法典委员会召开前夕——科斯特罗马、科洛姆纳、梁赞省佩雷亚斯拉夫尔市、土拉、特维尔、诺夫戈罗德、新托尔日克、托罗彼茨、卡尔戈波尔、沃洛格达、辛比尔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以及维亚兹马的商人，都曾向商业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许可他们领有奴隶②。出席立法委员会的城市代表在一同高喊"要奴隶！"的时候，只不过是重复着以前商人提出的恢复旧日权利的主张罢了。

但是领有奴隶的权利，是不能同领有有住民的庄园的权利等量齐观的。在莫斯科罗斯，只有军职人员才享有这后一权利。在属于商工阶层的人们中，只有参加首都商会的人们以及被选为地方长官的那些市镇工商业者，才享有这一权利③。彼得一世给商人们的这一权利以全新的面貌。1721年1月18日上谕允许所有商人为工厂和作坊购买有住民的乡村，"其条件是这些乡村永远不能脱离这些作坊"。不仅如此，彼得政府还按照莫斯科的旧习惯，将俄国和俄国人看为沙皇的私有财产，往往将国家的工厂连同在厂里工作的工人，一同交给私人经营。彼得的继位者有时也这样办。在安娜王朝，由于当时最大工厂主的要求，发布上谕，规定所有当时在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永远属于他们的领主④。如果这一上谕完全符合彼得一世的经济政策的性质，那么他的历届继位者的其他上谕所追求的，却是直接相反的目的了。例如，同

① 参阅谢尔盖耶维奇为《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93卷所写《序》，第8页。

② 参阅拉波-丹尼列夫斯基的很有教益的著作：《俄国商工业公司》，圣彼得堡，1889年版，第64页。

③ 见克柳切夫斯基：《俄国阶层史》，莫斯科1913年版，第198页。

④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俄国商工业公司》，第63页。

一安娜女皇的政府在«关于所有工厂的总上谕»里，要求企业家使用雇佣工人的劳动。彼得一世的继任者在发给新工厂开办证书时，也都提出这一要求。最后，在1762年3月29日发布的上谕里，规定工厂应限于"根据身分证、按照商定的工资，使用自由的雇佣工人"①。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说：这一上谕的结果，看来在1763—1765年编制清册时即已显示出来，清册表明在我国已有些工厂只是使用雇佣劳动。这位学者完全否定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所说我国18世纪的大规模生产是奴隶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意见。根据18世纪60年代资料的分析，他断言当时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私营工厂工人总数的33%②。当然，这一情况是应该注意的。

但是，第一，在"自由雇佣的工厂及作坊工人"(他们的数目占33%)之中，毫无疑问，有许多是依附领主和宫廷的工人，就是说，仍然有许多是奴隶③。

第二，即使我们假设一种不可能的情况，即假定在工厂和作坊中从事生产的依附地主和宫廷的奴隶的百分比等于零，那我们也不能避开一个问题：即对于那种使用67%"不自由人"(按照彼得时代的说法)的生产，应该怎样称呼呢？称它为奴隶式生产比称它为资本主义生产要合适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④

第三，说我国18世纪的大规模生产是奴隶式生产，并不就是说这种生产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当时在俄国并不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现象。这一点是

---

①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俄国商工业公司»，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67—68页。

③ 在拉波-丹尼列夫斯基所引用的表里，"自由雇佣工人"一栏用了两个词为标题，即"自由工人和雇佣工人"——这是否因为并非所有雇佣工人都是自由工人呢？

④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自己也说，只有很少数贫穷和规模不大的工厂才完全使用雇佣劳动。(同书，67页)

显而易见的。然而我国大规模工业的基础仍旧是奴隶式的，这一点除统计数字外，还为另一事实所证明：这就是，如法典委员会城市代表发言所表示，人们认为对于企业家，雇佣劳动不及奴隶劳动有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非如此，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作的”企业家们所熟知的。

V

我国当时的商人在谋求恢复购买奴隶的权利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有趣的是，他们在将彼得时代理想化方面，同我们的讽刺作家，——方-维津以及别的一些人，——志同道合，尽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他们的代表所以颂扬彼得时代，不仅因为彼得一世准许商人“参照机器和炉窑的数目”购买奴隶，而彼得的继位者却逐渐剥夺了他们的这一权利。彼得试图按照西欧的方式改造我国的城市管理机构。1718 年 6 月，他决定“在所有城市里建立市议会，并提供良好的章程，按照里加和雷瓦尔的规则进行。”的确，严厉的改革家虽坚定、无情地使个别阶层的利益服从国家，却从未忘记用他自己的、本国的内容充实西方的形式。按照他的设想，新的城市机关必须“促进伟大国王的利益和幸福”，也就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他很少关心城市自治：他一般地不了解自治。而在其后的各个朝代，就连彼得一世为实行城市自治而实行的那些为数极为罕见的措施，也都部分地被取消，部分地被破坏了。毫不奇怪，我们在从城市派到法典委员会的代表们的委托书里，除看到对这位君主的理想化外，还看到对他的继位者的迹近讽刺的态度。苏兹达尔市的委托书抱怨说：“我们感到最为不幸和痛哭不已（原文如此）的是，他们（商人——著者）未能按照绝顶明智的国王的意向，达到他所期望的境地”。有时，城市委托书的编者直接了当地用彼得的语言，更确切地说，用总市长办事章程的语言

说话。他们的西方化来源于彼得的经济政策，而且很少超越彼得为他的西方化所规定的范围。

有时，对于叶卡捷琳娜时代商人的西方化，这种范围甚至显得过于广阔。

但是，当时我国商人也有不满意彼得改革的方面：这就是警察对城市的态度。在总市长办事章程里（城市委托书的编者和城市代表都往往用章程的语言说话）宣布警察"为市民及一切善良秩序的灵魂，为人们舒适和安全的基本支柱。"俄国居民有理由对这种关于警察的颂扬观点，采取某种怀疑态度。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知道，这一"人们舒适和安全的基本支柱"时常给公民造成巨大的不舒适，特别是威胁着公民的安全。因此，商人以其最有觉悟的代表为喉舌，"以欧洲城市为根据"，在委员会里请求使警察完全服从城市管理机关。为了形成这一愿望，必须，哪怕是短期地，停止向后看，而将自己的眼光朝向前方。然而由于商人在提出这一申请时，毫未放弃其恢复过去购买奴隶的权利的意图，所以，他们在悄悄地向前看了一眼之后，又开始凝神地朝后看。于是，他们的进步的愿望，立即被他们的反动追求所麻痹而归于消失。由于这一原因，可以说，他们已不善于对他们本身的申诉作出总结，因而从很广泛的前提里作出了极为狭隘的结论。例如，巴尔纳乌尔市的代表卡雷舍夫在委员会的第62次会议上关于"商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作了长篇演讲之后，提出申请：1）请求对恰克图海关征收的关税，加以改变；2）请求减轻西伯利亚商人所负担的义务；3）请求坚决重申和遵守规定，使其他城市的商人不得贩卖和零售商品，以免西伯利亚商人破产；4）请求重申取缔收受和进行贿赂①。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请求。实在说，为了这些，并无必要提出腓尼基、梯尔、卡法甘和罗马，也毋须谈论商业给英国和荷兰带来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280—282页。

的光荣。

莫萨耳的委托书警告说:"俄国商人与其他欧洲城市的市民阶层相比,是受到极度鄙视的",原因在于对他们"规定了人头税"①。也许,这一解释是近乎真实的。人头税是国家奴役非特权等级的多种结果之一,因而也是标志之一。但也只是多种结果和标志之一而已。为了将俄国商人提高到西方"市民"的法律水平,只解除他们缴纳人头税的义务,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水平,必须完全解放他们,并使他们取得"其他欧洲城市"第三等级已经取得的权利。

然而莫萨耳的商人,显然没有想到这点,所以,情愿满足于解除他们的人头税。

岂止莫萨耳商人如此! 尔热夫市的市民申诉说:"由于商人缴纳人头税,由于对他们的侮辱只处以极小处罚,他们不仅受到高等贵族,而且受到最下级官吏的鄙视"②。

"侮辱"这个概念是彼得堡俄罗斯从莫斯科罗斯因袭过来的。克柳切夫斯基说:"最初这个用语是指法律对某种官阶赋以何种意义,表示国家对不同社会官员给国家带来的比较贡献的评价的。用以表示这种官员荣誉评价的最明显的形式,是对侮辱、即对以行为,特别是'以不成体统的言论'侮辱别人的处罚。对侮辱的处罚,按被侮辱一方和进行侮辱一方的官级不同而采取甚为悬殊的方式"③。尔热夫市的市民由于对商人的侮辱只受到"极小惩罚"而感到痛苦,他们完全支持了旧的莫斯科概念。而由于支持这一概念,他们便不可能提出比较激进的要求。所以,尔热夫人表示,必须对侮辱商人荣誉,加重处罚。

---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107卷,第33—34页。
② 同上书,第107卷,第413页。
③ 《俄国等级史》,第196页。

但是，不言而喻，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只是转到彼得堡时期产生的概念的立场上，还是不足以产生比较激进的要求的。例如，谢尔佩伊斯克的代表请求给第一级的工厂主和商人赏赐佩剑的权利，这将使他们能够“比其他商人”获得更高荣誉①。这一谢尔佩伊斯克的欧化分子，其愿望的谦虚，真是无以复加了！

为了替自己辩解，当时的商人可能说，他们所以提出这种完全适合莫斯科罗斯的愿望，是有完全充足的理由的：旧莫斯科的实际，尽管经过彼得改革，仍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动摇的。彼得堡的公民申诉说：“本市的公民由于每年的选举公役，已是精疲力竭，他们多年抛弃了自己的商业，特别是生产”。这一完全有根有据的申诉，在其他城市的委托书里和城市代表的意见书里，也比比皆是。就在彼得改革之后，行政当局和贵族等级对在国家奴役下的商人亦曾加以残酷压制和贬抑。对于这一情况，波索什科夫就已表示不满，商人在整个18世纪，更是怨声不绝②。1745年莫斯科参政院办公室收到申诉，指控莫斯科警察局长纳希切金对小商人组织袭击，使用警察队伍毁坏了大量窝棚和小商店③。萨拉托夫委托书的编者说，他们的警察局长随意支配公民的劳动和时间。甚至城市里的市议会对于市民的态度，也是非常粗暴。莫斯科的总督萨尔特科夫伯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就已报告，奥尔洛夫市议会主席对商人实行了“巨大压迫，掠夺，导致死亡”。他抢劫了一个名叫库兹尼佐夫的工厂，残酷地殴打工人。为了敉平骚乱，军事当局认为必须遍布密集的哨兵，但是哨兵刚刚撤走，“骚乱者（即市议会主席的拥护者——著者）便象以前一样在市内到处骚扰，成群结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95页。

② 莫萨尔商人的委托书里写道，由于商人缴纳人头税，因而所有的人，“特别是贵族”，都称呼他们为庄稼汉。他们说，“我国有这些缴纳人头税的庄稼汉。如果对他们加以重压，也不会受到大的处罚。”

③ 季佳京（Дитятин）：《俄国城市制度和管理》，第354页。

队，手持实弹的枪械和棍棒，打死和打伤反对他们的人”。当人们处于这种条件之下时，他们象溺水者抓住稻草一般，抓住所有可以抓到的东西：诸如“处罚侮辱”，争取佩剑的权利等等。

VI

为了对城市代表在法典委员会提出的各种愿望作出公正的评价，必须确切了解这些愿望所自产生的历史环境。奇怪的是，甚至我们的一些深切了解当时我国商工阶层所享受的权利很小而所负担的义务很重的学者，也未能经常作到这一点①。例如，已故季佳京便责备城市代表希求“为商人保证从事商业与手工业的特殊等级权利”②。

可能以为，商人谋求垄断。可是，这是没有的事情。垄断家企图将新人排斥于他们的范围之外。与此相反，18世纪的俄国商人却申请将所有在罗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们都列入他们的阶层。苏兹达尔的委托书满意地提到彼得一世“曾命令将从事商业的农民永远列入商界”。下戈罗德的代表在委托书中请求将所有从事商业和流入下戈罗德各市镇的农民，列入下戈罗德的商界③。托姆斯克市的商人甚至请求给农民以参加商工界的便利。他们希望农民能够登记为商人，“不要通知原主管机关将他们除名，而只是通知他们登记的机关”④。这段话文理不通顺，但意思很明白。

① 季佳京：《俄国城京制度和管理》，第371—372页。

② 同上书，第498页。

③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134卷，第5页——商人的商业与农民的商业密切关联。在法典委员会召集前数年，商业委员会委员之一说：“商人由于缺少资本，如无农民商业的帮助，总是不能维持的。他们经常在内地城市贸易中与富有农民保持商业联系。据说，现时最明显的是，下戈罗德市议会不仅不妨碍农民经商，而且由于该会是由贫穷商人组成的，还自动寻找和邀请农民经商，并按照商业情况，向每人征收足够的税款，他们就是靠这种税款来维持开支和交付贡赋的。（拉波·丹尼列夫斯基：书见前，第103页。）

④ 同上书，第320页。

下戈罗德代表为了说明上述将农民登记为商人的请求，提出一种理由，认为这些农民当中的一些人都有一、两万卢布甚至更多的资本，却享受很大的优待，因为“他们除了向国家交纳正式赋税和向地主缴付代役租税以外，没有任何负担，不知道匮乏，不付住宿费用，也不知道警察干扰。”当时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说的。对于他们，问题实在不在于商业权利，而在于履行商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于所有愿意同他们一道分担这种义务的人，他们都愿意给予所有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权利。

在法典委员会时期，市镇仍旧象在17世纪时一样，是一个负担赋税和劳役的公社。象任何这种公社一样，它必须交纳一定的货币税和负担一定的实物税，它关心的不是减少公社社员的数目，而是尽可能更多的增加这个数目。城市委托书的编者和城市的代表所以请求禁止不属于商工界、因而不负担市镇租税和劳役的人们经营商业，就是为了求得这个数目的增加①。

谢尔盖耶维奇在谈到商界的等级意向时指出，例如，柳比姆市的委托书虽然反对农民经营商业，但毫不反对将他们登记为商人，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给他们以与老商人相等的权利。这位学者还指出，罗斯托夫的市民散布将农民登记为商人获得巨大利益的说法，“因为商人的商业发展了，则国库收入增多”②。

我国商人在坚决提出将从事商工业的农民转入商工阶层的愿望时，也如象在几乎所有其他事情上一样，是保持着旧莫斯科传统的立场的。1649年法典禁止不交纳国税，不服国家兵役的各色人等经营商工业③。

---

① 与此相同，15世纪的弗罗伦萨小资产阶级也力争对居住该市并从事工艺的外国人与该市市民相等地征收捐税，因为不这样，该市市民便抵挡不住他们的竞争。佩林：《弗罗伦萨的文明》，第88页。（Perrens, La civilisation florentine, p. 88.）

②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93卷序，第3—4页。

③ “莫斯科各市镇的主教，总主教，领主，僧侣，大贵族，侍臣，杜马（议会）议员，近

18世纪的彼得堡政府，并不急于撤销这一禁令。根据1755年商业章程，所有从事商业的人——哪怕是在市镇以外的区域，都须登记并交付赋税、负担劳役①。为了激励城市及市镇居民抗拒这一莫斯科旧传统，必须预先从他们颈上解脱国家赋役的沉重枷锁。他们在叶卡捷琳娜委员会里热烈请求解除他们的这一沉重枷锁。但是，只要这一枷锁还压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只得不由自主地设法不使任何一个商人规避把它戴上。

VII

我在本书第1卷已指出，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碍他们转入城市，妨碍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造成了手工业在乡村的广泛发展。这种工业的发展过程有其自己的逻辑，它同市镇公社工业发展的逻辑，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时常发生许多矛盾，这种矛盾在法典委员会里亦有表现。农村公社的代表表示，由于禁止农民经营商工业，国家不仅给农民，而且也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赫雷诺夫县的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抱怨商人妨碍他们出卖产品和从事手工业。独院小地主也反对商人强求只对负担商人赋役的人们，才给予经营商业的权利。叶列茨克省的独院小地主代表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广阔的俄罗斯国家里，商人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为数较少；此外，俄国商人由于具备有教养人的特性(这一独院小地主多么善于粉饰门面——著者)，同外国进行着商业交易；

亲和各级人士，以及居住市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任何从事商工业和开设店铺的人们，——所有这些市镇及在其中居住的人们，除奴隶外，都须永远不变地为国王服劳役，交赋税，服兵役。至于奴隶，均将于查询时告知，将他们交给那些支配他们的人们带到他们的宅邸。其父母为市镇商人的奴隶或来自皇室领有州县的奴隶，得在市镇居住。往后，除在皇家领有的市镇外，无论在任何莫斯科的市镇，都不得居留"。(《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沙皇1649年法典汇编》，莫斯科大学出版，莫斯科1907年版，第134页，以及136，137，138页。)

① 参阅基哲维特尔：《18世纪俄国市镇公社》，莫斯科，1903年版，第17页。

并为此从本国同胞中雇用了大量店员。考虑到这一切，我们认为俄国商人不可能参加任何小商小贩经营，尽管它不只一次进行过这种尝试”。①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农民坚决自愿地支持了贵族。

农民和贵族的团结一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根据在有关商业权利问题争论中所显示的这种团结一致，可以看出，这一权利问题该有多么复杂，它所牵涉的利益又是多么错综复杂。

唯独商工阶层享有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对于农村手工业者是一个带来巨大打击的威胁。此外，这还使向市场输送农产品的所有农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手工业者与手工业者各有不同。赫雷诺夫县的农民抱怨商人妨碍他们出售产品和经营手工业，他们在委托书中承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抛弃农业而只是从事“皮革业”。② 读者会同意，只是从事手工业而抛弃农业的乡村居民，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城市居民。如果我们的事实上的城市居民，比法律上的城市居民（市镇居民）负担较轻的赋役，则后者自然要呼吁他们遵守制度，要求“平等”。我们所考察的商工阶层的要求，最多的就是这种“平等”愿望。

阿斯特拉罕市的代表坚决表示，如果将“经商的农民”（原文如此！）改为商人，后者不会感到委屈，相反，会获得好处。他象托姆斯克代表一样请求说：“可否命令对于一切独院小地主，经济农民以及地主，农民，凡资本充足，从事商业又不属于农业者，一律依法登记为商人”。③在对他的这一提议进行辩论时，他极为确切地解释说，他的意思就是指这些既已脱离农业，又以经商为生的农民。对于有些人（请注意：不是商界代表）未必诚实地认为“新来的商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115卷，第229—230页。

③ 同上书，第32卷，第458—459页。

人"会排挤老商人等等，他反驳说，俄国幅员广阔，所有的商人——无论新旧——"只要有钱"，只要依法经商，都会有充足的天地。有趣的是，这个以"从莫斯科罗斯因袭得来的法律规定为凭借"的人，两次引录了叶卡捷琳娜的《上谕》[①]：因为在《上谕》里写道，"所有既非贵族、又不种地，而从事于艺术、科学、航海、以及业商工的人们，都属于中间一类。"显而易见，经商的农民正好属于这一类。

阿尔汉格尔戈罗德的耕种国家土地农民的代表丘布洛夫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禁止农民"参加商业经济"。他的理由说明了问题的又一方面。他说："如果禁止农民经营小量丝织品或其他为农民所必需的商品的贸易，那就不仅给农民，而且也给商人带来危害"[②]。

这话是包含着重大真理的。1764年有个城市的商人向商业委员会抱怨上谕禁止农民之间发生债务关系。他们坦率地说，商人有时是通过农民进行商业活动的[③]。可能，丘普罗夫代表在谈到丝织品的贸易时，也是指的这一现象。但是由于农民参加丝织品的贸易，——顺便指出，丝织品的原料并不是俄国农民经济的产品——所以他们便成为商人，因而当然应该负担所有加于商人的义务。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农民宁愿在事实上参加商人阶级而不履行加于他们的义务[④]。很可能事情真是如此。如果商工阶层群起反对这一倾向，那也不能为此责备他们。

至于贵族，他们毫不谴责经营商业的农民的这种贪婪倾向，这是毫不足怪的。从事商工业的依附地主的农民，愈是能够规避加于商工阶层的义务，便愈是能够向他们的主人支付更高的租赋。此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97页。

② 同上书，第8卷，第97页。

③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俄国商工业公司》，第103页。

④ 同上书，第104页，——前已指出，下戈罗德商人同市郊农民保有密切联系。

外，所有从事商工业的农民(这就是说，也包括依附地主的农民在内)，如果自由地、甚至强制地转入商工业阶层，那将是对神圣的农奴制的破坏。

最后，商人不仅是同农民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他们希望所有一切从事商工业活动的人们，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都必须选择：或者放弃这种活动，或者一同负担商人的义务①。贵族怎样也不喜欢这种选择，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不少工厂和作坊。

地主先生们不仅猛烈反对商人把商工业活动转变为他们这阶层(我每次指出的广义的阶层)的独特权利的企图。他们自己还企图剥夺商人经营某些工厂和作坊工业部门的权利。雅罗斯拉夫尔的贵族在他们的委托书中表示，“使用亚麻、大麻纤维及其他经济作物进行制造的工厂，均应为贵族所有”。但是，由于在这类工厂里商人投入了大量资本（这是雅罗斯拉夫尔贵族委托书原文的用语——著者)，所以又主张，已有的商营工厂，仍归原厂主所有，“但须向贵族缴纳若干数目不大，对他们不为沉重的款项”；至于新建工厂的权利，则只是给予贵族②。

贵族对于农民经营工业权利的维护，同大公无私多么风马牛不相及，从以下所述可以概见：

在同一雅罗斯拉夫尔委托书里，提出了禁止商人向农民就地（逐户）购买粮食的请求。按照委托书的说法，“他们这样购买粮食，实使农民陷于破产，因为商人时常向农民预付价款，最后迫使他们按半价出售粮食。”任何人都承认，这种现象是可能的，甚至是可靠的。

但是，如果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向商人出售粮食，那么，他

① 例如，彼得堡的委托书就抱怨对于居住首都的外国商人，豁免了俄国商工阶层所负担的义务。

②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301页。

们在什么地方出售呢？在城市吗？可是，在那等待着他们的是更令人愤恨的、更无可避免的违法舞弊行为。或者，也许他们应该在乡村里寻找别的不属于商人阶层的收购者？委托书的编者以为，——的确，这样的收购者应是贵族。他们丝毫不掩盖他们提出禁止商人就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的请求的目的。他们写道，这是“为了使贵族能够进行粮食贸易”①。这是非常朴素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这一朴素的供词并不完全。为了使它完整，应该写明：这是为了使仅仅一个贵族能够从购买农民粮食中榨取利益。

VIII

城市代表对于彼得一世允许商人“参照机器和炉窑的数目”购买农民，备极赞颂；而被派到作坊的农民却用最暗淡的色调，描绘了他们的处境。

被强制为作坊工作的农村距离这些作坊常达500俄里；这对于农民极为不便，所以他们宁愿派出雇佣工人来代替他们自己，尽管他们付给雇工的工钱，要比他们从作坊主人所得的多得多。“我们农民为作坊工作所得工钱极为微薄，夏天每日5戈比，冬天每日4戈比；而我们付给雇工的，却是每日6到7戈比。”农民砍伐木柴，每沙绳(等于1.134米——译者)工钱25戈比，而他们付给自由雇工的工钱却为30戈比以上。农民采煤，每20沙绳一堆所得工钱为3卢布40戈比，而雇工进行同样的工作，他们要付给12到13卢布②。这样看来，派给作坊的农民，也就是，不自由的农民，他们付给自由工人的工钱，占后者为了自己的劳动在作坊所领工钱的很大部分。拉波·丹尼列夫斯基也会同意，这种离奇的现象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关系里居统治地位的是农奴制。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301—320页。

② 同上书，第115卷，苏里卡姆县派给作坊的耕种国有土地农民的委托书。

不言而喻，派给作坊的农民，在这种离奇的经济里，是看不出任何美好的东西的。他们梦想恢复他们以前的那种耕种国有土地农民的地位，或如他们所说，注销他们同作坊的关系。

如果，耕种国有土地农民的一部分，抱怨政府将他们派给作坊以后，迫使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促进俄国雇佣劳动的发展，那么，他们当中的另一部分，则由于政府的各种土地命令而感到委屈。

1754 年的土地清丈训令，剥夺了农民（“自由”农）自由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往后不得将这种土地出卖或抵押。甚至土地继承权，也被废除。农民死后，他的土地不得在子女之间分配，而应交给所在的村，作为国有土地。谢尔盖耶维奇称这种政府训令为最古老的纯社会主义立法的尝试[①]。我在本著的历史绪论里[②]业已指出，这些训令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彻底贯彻了莫斯科时期政府对待劳动群众的原则而已。按照这一原则，生产者和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也包括在内，——都为国王的私产。我举出了一些例子，证明俄国农民对于这些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原则，并不总是驯服的。现在，我还要指出，我国北部某些耕种国有土地农民怎样在他们的委托书里反驳 1754 年土地清丈训令里的这些命令的。

乌斯丘格县雅格雷日乡的农民，关于他们因被剥夺了出卖土地的权利而感到的困难作如下描述：

他们说，许多人由于这一困难而陷于“贫困”。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没有子女，而本人又因生病或年老不能管理家务和耕种土地，土地又不能出卖，——由于这一切，他们所在的村子，陷于极度贫困和土地荒芜，派在村里的农奴又为本乡其他地方所支配，因此发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 123 卷，14 页。
② 参阅本著第 1 卷。

生社会穷困和不堪的负担”①。

委托书的一些作者凭经验知道，在政府的眼里，根据国家利益，也就是根据国库的利益而提出的理由，最为重要。所以对于问题的这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加以注意。

他们说："与此相反，在耕种国有土地农民之间转卖不动产，如果予以批准，那会带来社会利益。（原文如此！）因为，象以前那样，将文契写明的不动产从一人转给另一人，则其后代便会为了国家利益，满怀希望地，努力使耕地和干草场处于最好状态，这是一种不小的社会利益。”②

谢尔盖耶维奇认为在召集法典委员会时代，尚无土地重分的事。他说，土地重分只是在后来才发生的，并且不是自发地，而是由于1871年的政府指令。这个指令规定“将土地及一切可用农地，在农民之间按人口分配为课税单位面积，从此以后，这便成为人头税和一切劳役的基础。”③

但问题在于这一指令只是政府在很长时期内所实行的土地政策的最后一步。这一政策对于农民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如果农民有了这种土地而由于某种原故不能耕种，因而想要将其出卖，如果这样的农民对于取缔自由转让农民不动产的禁令感到不满，那么，另一部分农民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取得足够的土地份额，他们在法典委员会召集时代，便形成一种观点，以为政府应该无偿没收被出卖的农民土地，并在无地农民中进行分配。这部分农民深切领会政府土地政策的意义，认为既然所有农民都要向政府交纳赋税，那他们就有权从政府获得充分的土地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在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和宫廷农民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摩擦，这种摩擦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123卷，第12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23卷，序，第15页。

显著地表现在圣诞墓地农民和宫廷所属希莫涅夫乡农民的委托书里。

委托书写道，在这个乡里，"已开垦的"土地不足，而由于"上帝保佑"，人口增多，所以勤劳的业主要在森林里开拓新地，并在原有耕地上施上厩肥；而"其他地区的寄生虫"则不关心自己的经济，因而"陷于贫困，无力偿付租税"。

于是，这些所谓"陷于贫困"的农民，如圣诞墓地农民委托书所说，便请求将已由勤劳业主开垦和施肥的土地，按人口实行分配。委托书最坚决地谴责了这一请求：

"如果准许这些浪费者和懒汉按人口分得那些经过巨大劳动和亏损开垦出来的施过粪肥的土地，则每一男丁所得将略多于10俄亩，既不足以维持生活，而且往后也再不会有人愿意这样辛勤努力地增加粮食生产和扩充耕地。这种损失实无意义，因为勤奋者努力耕耘，而懒汉则坐享其成，以后还会将土地荒废。"①

卡尔戈波尔的农民也发表同样的意见。

他们在委托书里报告委员会，"在农民中间有许多人无力占有自己的土地，因而也无力偿付人头税"。他们的贫穷可能造成赋税的停收，也可能增加富有业主的负担。因此，卡尔戈波尔的农民，"表示渴望按照成规准许在他们之间出卖和互换农村土地。"②

"按照成规"！这就是在委员会里享有代表权的那部分农民的意图。他们毫不想到在远景上他们可能陷于一个耕畜的境地：有相当温饱的饲料，成为国家的财产，成为国家的能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

商人力争为自己的作坊和工厂取得购买奴隶的权利，对于政府将一个又一个等级特权给予贵族的政策，深为不满。我们知道，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123卷，第123—124页。

② 引自8月20日会议日记，同上书，第4卷，第72页。

他们也希望恢复旧事物,使事情“按照成规”发展下去。

甚至讽刺作家也习于将“成规”理想化,——将彼得一世时代理想化。

这就是18世纪的情形。我们在17和16世纪也看到同样情况:试一回忆库尔布斯基和一般大贵族反对派罢;回忆分裂运动罢。

当一个国家的心怀不满的人民不把眼光朝前看,而朝后看,不看未来,而看过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现在,足以成为前进的反对派运动基础的客观实际还没有形成。

事实上,18世纪俄罗斯的经济落后,在所有送到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委托书里,都显得惊心触目。如果将这些委托书同1789年法国选民的“Cashiers”加以比较,这种落后就尤为突出了。

IX

当时在俄国唯一不向后看,而向前看的阶层,是贵族。然而贵族向前看到的,除了给他们以特权,对商人阶层加以某些抑制和进一步加强农民的奴隶依附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布里克涅尔在评价谢尔巴托夫公爵这位法典委员会委员的发言时,写道:尽管这位雅罗斯拉夫尔贵族的代表,在委员会里没有起到象米拉波在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上所发挥的那种作用,“但是他在那里表现为自由主义原则的拥护者,人道主义的辩护人,高尚的思想家、慈善家”①。

我们完全不知道谢尔巴托夫的慈善家活动。我们也没有权利怀疑他的高尚品质和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我们有根据说他是一个能够高尚地理解他对祖国

① 见他的论文:《1767年大委员会委员——谢尔巴托夫》,(《历史通报》,1881年10月,第245页。)

的义务的人①。然而布里克涅尔将他比拟为米拉波，却是极度幼稚的。著名的法国雄辩家，代表了第三等级结束法国贵族特权的趋向；而谢尔巴托夫却最强烈地支持了巩固和大俄国贵族特权的意图。

他在为这种特权辩解时，有时确实表达了一些人道主义观点。例如，现代的读者，在读到他的关于商人的工厂中工人情况的演说时，也不能不为之心情激动。他认为这种情况"无论在生活方面或道德方面，都是极为恶劣的"。但是，不无奇怪的是，他严厉揭发了商人阶层企业家的冷酷无情，却仅仅顺便一提商营企业工人的极为恶劣的生活，而长篇大论地专谈这些工人的酗酒和道德堕落。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切危害大众，造成乡村的秩序混乱。然而在他开始描绘贵族工厂的奴隶工人的情况时，一切暗淡的色彩立即从他的笔下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片光明。

他说："贵族开办的工厂使农民不懈地热爱劳动。他们从主人那里获得充分的工资，他们从主人的利润里得到自己的福利。人们可能要反驳我，以为许多主人是不给自己农民足够的报酬的。但我不认为有这样心肠冷酷的人，对于在他们统治下为他们创造利润的人们，剥夺其应得的报酬。"②

当对于被剥削者的同情采取这种片面性质的时候，无论表达这一同情的个人有多么真诚，这种同情仍是值得怀疑的。阶层的偏见和私心，能使最高贵的情感受到歪曲。如果谢尔巴托夫公爵证明，必须将所有依附于工厂的人们重新登记，禁止工厂主继续购买工人而满足于已有的人数及其后代；如果，照他的意见，必须开导工厂主，尽力把工厂所属工人"逐渐解放为自由人"，那么，他对

① 他在同波尔京内伊争论时问道："为什么我从幼年时代便不断地写着，认为每一公民都应尽其力所能及为祖国谋利益呢？"（《俄罗斯史学家谢尔巴托夫公爵致友人书》。莫斯科，1789年版，第140页。

②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58页。

于任何人想向贵族工厂推行这些办法，便应首先加以猛烈抨击了。他反对商人购买奴隶的斗争不过是为了想使这一权利成为贵族阶层独享的特权而已。

在热烈维护这一特权时，他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平等的人占有平等的人为奴，这合适吗？"他的答复是：不合适。他甚至以充满愤慨的心情，回顾了古代。那时，人"象牲畜般被买卖"。但在这里，他默默暗示，在"本质"上同农民平等的只是商人，而不是贵族。因此，只有商人才不适宜于将农民变为奴隶。毋须补充，米拉波是很难承认这种完全建立在可笑的贵族成见与口味基础上，向"人类"发出呼吁的使人信服的论据的。

我在前面说过，商人高度赞扬彼得一世的活动，而贵族则对此颇为慎重。这一情况是这样显著，以致谢尔巴托夫也认为必须予以阐释。

他在9月12日会议上声明，他虽然也愿意撤销某些彼得的法律，但这完全不是因为他对伟大改革家的"德政"缺乏充分的敬重。"时间的情况以及各种场合迫使他为了我国的福祉制订了一些法律，而这些法律现在在我们的最仁慈女皇的幸福大国里，由于道德风尚的变化，不仅无益，而且可能有害"①。

在彼得适应变动的时间条件而颁布的法律中，准许工厂主为工厂和作坊购买奴隶的法律，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知道，谢尔巴托夫是反对这一法律的。但是按照这位雄辩的公爵和他的同道者的意见，在这类法律中，准许任何人经过服役取得军官官衔，成为贵族的法律，最为重要。他说，根据当时的条件，通过服役取得军官衔的人们的这一优越性，确为迫使贵族参加军役所必需；但在现在，当我们看到，俄国贵族爱祖国，爱光荣，对国王竭智尽忠，业已充分爱好服役，爱好科学时，这种权利，使这一等级比任何其他由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149—150页。

于某种情况不能取得军官衔的等级处于优越地位，似应予以废除①。

象任何时候一样，谢尔巴托夫在谋求废除这一法律时，没有忽略用道德方面的理由作为根据。在这里，他的出发点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抄袭的贵族光荣论。他说："最自然的理性教导我们，……光荣和荣誉在贵族等级中影响最大"。因此，贵族世系愈老，光荣和荣誉对它的成员的影响愈大，也愈强。……他们当中的每一人自从出生之后，便听到他们祖先的高贵事业，看到他们的形象，追忆并赞扬他们的名望。这预决了他们自己争取光荣功业的志愿。相反，由于服役年久而取得官衔的人们的子弟，在自己的周围看不到任何足以发展他们的荣誉感的东西，"他们祖先的名字，早已湮没无闻"。

因此，老贵族世系由于他们的道德品质的关系，岂不是高于新贵族吗？是的！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请委员会注意那些不利于道德发展的条件，而人们则是在这种条件之下追求官衔的。出身下贱的人们唯官衔是求。他们知道，"这取决于指挥官的权力。于是，不惜百般阿谀逢迎，使用卑鄙手段，以求取得他的青睐。这当然要加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上级的道德品质。"他们在获得军官官衔，并连带获得贵族称号之后，便再没有高尚的动机，而只是想到发财致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贵族也是不择手段的。"只要能更快地达到所愿望的结果，便不顾一切；所有贪污贿赂、掠夺以及任何类似的恶行，由此产生。"

巴尔纳乌尔市的代表卡雷科夫说：英国和荷兰的光荣应归功于商业。谢尔巴托夫却有其贵族的文化史观。他向委员会保证："哪里有贵族，那里就有贵族的臣民；哪里有贵族的臣民，那里就有农业、制造业，因而也就有财富；而哪里有财富，那里就会产生科学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150页。

和艺术"。

姑且假定，事情确是这样。但是，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的时候，并未听到有什么贵族。请问贵族是从哪里来的呢？

按照谢尔巴托夫的理论，贵族的产生是由于"在人民中出现了一些特别英勇的人"。由于这些英勇的人们的后裔也是特别英勇的，所以人民和国王便决定给他们以世袭贵族的称号，以示崇敬。

这一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极为符合老贵族世系的自尊心，却有一个弱点，即新贵族也可以它为凭借。何谓英勇？英勇就是对国家的贡献。难道现在除贵族外，更无他人能有这种贡献？西伯利亚的军职人员——通过叶尼塞斯克的代表萨莫伊洛夫之口——请求使他们的权利与俄罗斯贵族的权利平等。他们所说的正是这种贡献。是的，谢尔巴托夫是不承认他们的贡献的。皮毛牲畜实物税的征收，以及其他与此相似的服役，都"不够重要"。至于祖先的伟大业绩，即征服西伯利亚，公爵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英勇。尽人皆知，俄罗斯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士兵都应该是英勇的。而胜利的获得则是由军事长官的才智。谢尔巴托夫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征服西伯利亚的勇敢战士，不是由于他们自己，而是在指挥官的指挥下，才取得这一胜利的，而这些指挥官在当时便已受到国王的赏赐；还有那些追随指挥官的人们，也都各有报酬，如获得土地，安静的住所，以及薪给等"①。

雅罗斯拉夫尔代表的论点，在这里也不是无可非难的。为老贵族世系建立基础的人们，由于他们的英勇，也曾受到薪给、安静的住所、土地等等报酬。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的后裔什么优待呢？如果城市的代表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如果他们不是反动派，而是革新派，那他们便会立即给谢尔巴托夫的议论以反驳。但他们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160页。

却宁愿满足于恢复他们等级在往古时期的利益①。至于代表，由于他们的选民是新贵族或刚刚申请贵族称号的人们，所以他们的要求，就其性质说，不能够从原则上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只能摆出谢尔巴托夫也都承认的情况，认为就是最高贵的家族，也有过并不高贵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德聂伯长枪团代表科泽尔斯基同若干其他代表一道，竭力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俄罗斯贵族的祖先是通过对其忠诚和德行、功绩的赏赐，而不是通过世系的高贵，取得了自己的爵位，那么，他们的后裔便不应蔑视和鄙薄军官的职称。②"这一反驳，尽管很谦逊，却触到了谢尔巴托夫公爵的痛处；于是，他对科泽尔斯基进行了极强烈的反击。他高声说道：

"德聂伯长枪团代表的意见认为，所有俄罗斯古代贵族家庭都来源于低级世系；又认为现在这些古代贵族，由于傲慢，不愿让应该取得这种称号的人们取得这种称号。我很奇怪，这位代表先生用卑下的出身来责备古代俄罗斯家族。然而不仅仅一个俄国，而且整个世界都是相反的情况的见证。为了驳倒他的言论，我只要指出一些历史的事件就够了。俄罗斯贵族的一部分以吕里克大公为始祖，后来，按世系沿袭，又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始祖，其他外迁的贵胄则起源于受冕的首领。许多家族，其世系虽非来自领主人物，但都出身于贵胄人物，这种人物投奔到俄罗斯大公那里服军役，历时数百年，以对祖国的重大贡献而声名显赫。以我们这些代表为代表而集会起来的俄罗斯，怎能对这些历时数世纪不断作出贡献的人物提出责难呢！"③

通过自己代表而集合起来的俄罗斯，有权向这位俄国史作者指出：他对俄国贵胄等级历史的引述，就令可能适用于大贵族世

① 的确，在10月2日的会议上，鲁兹市代表 И. 斯米尔诺夫建议完全取消世袭贵族制，而只保留本身贵族制。但只有一个普吉弗尔的代表同意他的意见。

②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187页。

③ 同上书，第192—193页。

系，而对于委员会里讨论的一般贵族则是完全不适用的。

此外，为了回答高贵公爵对旧贵族世系出身“卑下”之说的愤愤不满，通过这些代表而集合起来的俄罗斯，可以给他提供一位代表——加佳茨克、米尔戈罗德和波尔塔瓦等团队的代表——莫托尼斯的言论：“我毫不感到卑下；农民，市民，贵族，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因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善良的教养和高尚的品德而光荣和高贵。只有那些品质恶劣，违法乱禁的人，才是卑下的……”。

卑下一词在当时已不再是低级一词的同义语，而具有侮辱的意义。我们看到，它最少使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发生反感。如果谢尔巴托夫在特别需要避免使用它时没有避免，那只是表明他的大贵族的傲慢而已。

他提出了如下纲领：

（1）除非根据唯一的女皇权力，任何平民知识界都不能取得官衔和贵族权利。

（2）贵族，只要有了这个名称，便比任何其他职称有服务祖国的优先权利，而且他们应按照他们的服务和服务的优先权利，取得与他们这个历来热爱祖国的等级相当的恩典。

（3）贵族未被剥夺贵族称号前，不得由刽子手进行惩罚。

（4）我在前面一再提及，由于贵族出身高贵，举止高尚，对他们的下流漫骂应为法律所禁止。

（5）领有乡村的权利，责成贵族使用它来为祖国服务，这是他在祖国将他派在任何地方使用时维持生活的首要方式。此外，我认为应对这一个等级给予使用和出卖其家庭产品及其他产品的权利。关于这些产品，毋须在这里一一指出①。

第一条说明门阀想排斥官吏。不言而喻，官吏不会同意这一条。但其余四条都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既然官吏能够获得贵族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152—153页。

的特权，他们自当乐于保持和扩大这种特权。因此，在法典委员会里，门阀和官吏之间的斗争只是围绕着第一条进行。

谢尔巴托夫的贵族意图，受到很多贵族代表的同情支持。他的学识和气魄扩大了他的影响范围。谢尔巴托夫为答复科泽尔斯基而发表的演说，造成了特别强烈的印象。按照会议日记的说法，他的演说，"始终精神异常激动，讲完之后，余音绕缭"[①]。

然而雄辩的演说家未能用"精神激动"来改变早已形成的不利于门阀的力量对比。

在委员会里，大多数都站在官吏方面。叶卡捷琳娜自己不愿在门阀面前贬低官吏，后来用特权证书满足了贵族的许多愿望。这样，谢尔巴托夫和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实际的成功[②]。

X

我国史学家屡次提出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失败原因问题。不能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委员会的召集没有导致任何显著的成果。根据普拉托诺夫教授的意见，"委员会不仅不曾完成它的全部事业，不仅不曾制订出任何一部分法典，甚至在历时一年半的两百次会议中，连代表们的委托书都未念完"。天真的史学家认为它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准备工作，由于表面上的事务组织的不踏实和不确切，由于领导者的无能。然而他也承认，委员会虽未造成法制的一般改革，而对于叶卡捷琳娜往后的立法活动，还是发挥了重大影响[③]。叶卡捷琳娜说：委员会使她对于整个帝国有了认识和了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 4 卷，第 193 页。

② 商人们力争，任何从事商工业活动的人都必须列为商人等级。旧贵族希望，贵族等级的大门只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才为官宦打开。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人的意图，虽如一些学者所指出，也浸透了等级的精神，但在这种意图里，没有贵族意图所特具的那种排他性。

③ 《俄国史讲义》，第 6 版，第 595—597 页。

解。这是实话。叶卡捷琳娜在研究代表们的意见时，看出了哪些要求可以不予满足，哪些意见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满足。她完全轻视委员会里为数无多的农民代表的要求；但她在1785年发给贵族和城市的特权状，却是对贵族和城市代表请求的直接正面答复。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委员会的召集，导致了(虽然不是迅速地)颇为重大的实际结果。

出于不可抑制的无限虚荣，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她的这个委员会，曾向全世界(urbi et orbi)大事宣扬。在她的这种大事宣扬的影响下，有些人以为法典委员会可起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起过的象立宪会议那样的空前作用，它将在开明女皇的赞许下把法国解放哲学的原则体现到俄国生活中去。在专制政权的青睐下活动的立宪会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空想。而如果想到当时俄国的社会关系，这种空想就变得更为可笑了。姑且假定我国的城市代表曾在委员会里伤心地抱怨警察，但在莫斯科国家的缙绅会议上，"受宠爱的"俄国人，也同样伤心地抱怨过不可忍受的莫斯科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因循。然而这种抱怨同根本社会改革的距离，却不啻天壤。又假定我国"中等人"在追述彼得改革时，羡慕西方的"幸福的"商人，提请政府注意商业多么需要自由。但是他们却不仅不设法铲除我国国民经济的奴隶制基础，却竭尽所能去巩固这个基础，想按照往昔的范围去恢复它。强大的法国革命思想运动，还没有触动他们。他们在委员会里的代表只是艰难地想到一些以一般原则为基础的意见。他们在理论方面既无提高习惯，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的思想仍旧局限于狭隘的实际。齐赫文市的代表C.索洛多夫尼科夫在对谢尔巴托夫公爵的一次发言进行答辩时指出，公爵"很少采用过去的法令为根据，他的这些意见是用他特别得自神授的智慧的推理来加强的"。在齐赫文市代表的嘴里，这就算是责备！这种责备，明显地说明了商人思想的保

守特性。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来自城市的代表，竟然“表示同意”索洛多夫尼科夫的意见！①

贵族代表对于理论思维的习惯，在委员会里显得略胜一筹。但是我们看到，贵族的实际意图，是同先进法国哲学的结论直接对立的。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当时阶段上，这些结论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不言自明，这对于这极少数人，只能是更坏……。

①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文集》，第8卷，第152—155页。

第九章　18世纪下半期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

I

如果某一位古代作家——比方说，西塞罗——在文艺复兴时代复活了，在他的头脑里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个问题：欧洲的新兴民族吸收古代文化的努力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当法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思想家看到自彼得一世以来人们力图将西欧启蒙运动的成果移植到俄国的时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不言而喻，西方的思想家是按照他们对于文化发展动力的观点的一般特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认为，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思想形式——即他们所说的“Opinion”（见解）——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比所有其他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伏尔泰的著名论文«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民族风俗与精神论）里表现得最为完整和明显①。

由于认为“见解”是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以为伟大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是最有影响的进步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物——«Essai sur les moeurs»将密诺斯(Минос)②、扎列夫克、摩西、穆罕默德等，都列为这种人物，——在伏尔泰的眼光里，不仅是最有影响的“见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

① 该论文最后定稿于1769年刊行。

②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王，为宙斯与欧罗巴之子，死后成为阴间审判官之一。——校者

这种"见解"的创造者。伟大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宗教学说奠基人、道德导师、立法者，总之，扮演着人民群众领导者的角色，他们指挥历史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

如果伏尔泰不曾保持一种信念，认为伟大人物的工作，只有在他们利用其聪明才智和权力来推广启蒙运动的情形下，才能取得丰硕成果，那他就不是启蒙思想家了①。他对彼得一世，因其所完成的改革，而备极赞扬。当然，这些赞颂之词并不都是为了想对当时俄国教育权力的代表者说的恭维话。

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1）俄国能否——如果能，那又在什么程度上——吸收西欧的文明？2）这种吸收是否需要？这两个为19世纪我国知识界所极为注重的问题，在18世纪就已提出。

如所共知，卢梭对于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持有特殊见解。他在所著«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论）②一书中提出一种奇特的思想，以为在彼得一世时，俄国民族尚未成熟到可以吸收文明成果的程度，因此，不应教它文明，而应教它养成军事行动的习惯。由于彼得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所以卢梭的结论是：俄国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人（les Russes ne seront jamais vraiment policés）。

费尔涅伊的教长坚决和尖锐地反驳了卢梭的这一思想。按照他的说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俄国人民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充分证明彼得大帝是立足在巩固、坚实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伏尔泰认为继穆罕默德之后，彼得是一个以其改革活动的最大成就而著

① 伏尔泰说："J'appelle, grands hommes tous ceux qui ont excellé dans l'utile ou l'agréable. Les Saccageurs de provinces ne sont que héros."（我把一切因有益或因令人喜爱而出众的人称作大人物。外省的掠夺者不过是一些英雄罢了。）

②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册，第8章。

称于世的立法者①。

«Essai sur les moeurs»(«风俗论»)的作者虽然认为彼得的活动是卓有成果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这看为罕见的历史偶然性。在莫斯科出现彼得大帝这样的沙皇，其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他毕竟出现了。按照伏尔泰的意见，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成就只是命运的偶然赏赐。在自然界生产出那个发明耕犁的人和那个创造纺织工艺的人之前，必须经过数量惊人的不同环境和时代。同样，现在在非洲有许多辽阔的国家，需要沙皇彼得。也许，他将在百万年后在那里出现，因为，伏尔泰补充说，一切都出现在遥远的未来②。

我们探讨他的这些想法。

如果象他在反驳卢梭时所说，彼得一世是立足在特别巩固和坚实的基础上的，则很明显，他所完成的改革是由莫斯科国家以往的发展过程所完全准备好了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同样明显的是，沙皇改革家出现在莫斯科的可能性，完全不象伏尔泰所说是不大的。与此相反，如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那种按照同一伏尔泰的说法、彼得大帝所赖以完成其改革的异常巩固和坚实的基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彼得大帝传» 的作者没有看出他自己的这一矛盾。

伏尔泰关于彼得大帝赖以建造其改革大厦的特别巩固基础的论断，显然是出于他对这一改革的同情。这对于一个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充任这一改革的史学家角色的启蒙思想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准备伟大人物出现并决定其创举成败的历史条件，是很少有

① «Histoire de Russie» («俄国史»)，见«Oeuvres comp'ètes de Voltaire» «伏尔泰全集»，第5卷，第67页。参阅1757和1758年伏尔泰给舒瓦洛夫的信。

② «Anecdotes sur Pierre le Grand» «彼得大帝传»)，«全集»，第5卷，第139页。

分析的习惯的。

根据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社会前进运动是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有意识的人们的活动，如谢林所正确地指出，又是自由的，因而是不能加以科学分析的。只有对于必然的过程，才能进行这种分析。在没有必然性的地方，就没有规律性，因而就只能求助于偶然性。我们看到，伏尔泰就是照此行事的，他把沙皇改革家的出现解释为极端罕见的偶然性①。他在谈到彼得时所陷入的矛盾，虽然完全不能用他的唯心史观来解决，却是完全可以用它来解释的。

这种唯心史观包含着许多悲观成分。如果进步人士的希望只能预期在历史偶然性中实现，又如果幸福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极端罕见的事情——试回忆伏尔泰所说的"百万年"——那么，进步的事业便是一种很少希望的事业了。任何熟悉18世纪启蒙著作的人都知道，就是在最乐观的启蒙思想家的见解里，也时常听到悲观主义的论调。也许不可理解，既然进步人士只能寄希望于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幸运的偶然性，那他们又从哪里来的乐观情绪呢？这种情绪首先是因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特有的那种对理性的不可抗拒力量的抽象信仰。就是这位唠叨什么在历史上一切都出现在遥远未来的伏尔泰，就曾令人快慰地说："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归根到底，理性终将是正确的"）。此外，启蒙思想家虽认为伟大的人物可惜在历史上出现得过于稀少，但他们另一方面，又赋予这种人物以完成有益的社会改革的几乎无限能力。他们时常说，立法者是万能的。既然立法者是万能的，尽管伟大的进步立法者在历史上很少出现，但理性的观念毕竟还是有实现的希望的。当启蒙著作在整个欧洲获得极为巨大成功的

① 根据他在《风俗论》中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按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莫斯科国家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可以用来解释彼得出现的条件。

时候，当启蒙思想家觉得理性终将真正地是正确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就更可以期待理性观念的胜利了。

掌握立法权力的进步人士，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有利于进步的一切：这只不过是立法者万能这一一般理论原则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无论启蒙思想家怎样坚信他们这一般理论原则的正确，他们却懂得，如果在欧洲，比方说在法国，出现一个愿将解放哲学的要求付诸实行的皇帝，他就会遭到特权等级的强烈抵抗。这一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的。由此可见，在问题涉及先进国家时，对于这一立法者万能的一般理论原则，必须加以重要的修正。但是如果提出的是落后国家问题，则启蒙思想家觉得这一修正没有任何必要。他们很满足于这一点。

试举一例。狄德罗在其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著作《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lice》(政治史随笔)中说，在法国永远不会有新法典，因为法国现有的法制是同私人的利益密切联系着的。"谁要想推翻这一巨大的怪物，他便会动摇所有的财产关系（toutes les propriétés）……。坏制度、特别是旧制度是实行好制度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① 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幸运的是，您皇帝陛下是无所不能的：更幸运的是，陛下除了作好事外，别无所求"②。狄德罗以为在俄国没有那样的旧制度、特别是坏制度，足以妨碍叶卡捷琳娜实现她在《敕令》中所叙述，或如她自己的说法，实现她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更精确地说——从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温和人士那里"剽窃"来的真理。学识渊博的狄德罗对于俄国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以实现最优良立法意图，慨叹道："什么也未作过的人民是多么幸福啊！"（"Qu'un peuple est heureux lors-

---

① （M. Tourneux:《Diderot et Catherine II》图尔内斯：《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95，96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

qu'il n'y a rien de fait chez lui!")①

我们知道，事实上，我国曾有许许多多制度，妨碍叶卡捷琳娜实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要求，……就令她认真地想实现这些要求。但是，狄德罗和许多与他同代的外国进步人士关于俄国的落后使俄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理性的实际要求的主张，曾经获得一些人们的赞同，这些生活和活动在俄国的人们，显然应该看到，以往的发展过程确曾在我国"作过"许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并不符合进步人士的意愿。叶卡捷琳娜写信给伏尔泰说："我应该给我的人民说句公道话：这是能使优良种子迅速生长的土壤；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一些公认为真理的原则"。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乐道的所谓在落后的国家里，理性易于取得伟大实际胜利的命题的变调而已。当然，在谈到叶卡捷琳娜时，我们完全有权不相信她的诚意。此外，她本人又是一个在俄国的外国妇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她，更正确些，同意被她"剽窃"过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却有许许多多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

方-维津在1778年1月25日和2月5日从莫彼利埃发给布尔加科夫的信中写道："如果这里的人们比我们更早地开始生活，那么，我们最少在开始生活时，能够给自己选择自己所愿望的形式，避免在这里业已根深蒂固的种种不便和罪恶。Nous commençons et ils finissent（我们的开始和他们的终点）。我想，正在出生的人，总比正在死亡的人幸福。"②

方-维津在这里是作为唯心主义者进行思考的。他深信落后的人民至少在选择其以后的发展"形式"时，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以自己的"见解"为依归。他的这个思考包含着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19世纪的俄国，时常发生深刻的冲突。所

① 《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95页。

② 方-维津的著作、书简等等，圣彼得堡1866年版，第272—273页。

谓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这个思想在舍维列夫的夸夸其谈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他说，俄国同西欧交往是同腐烂的尸体打交道。至于所谓俄国人民似乎具有选择任何“形式”的幸福的可能，则对这一点，我国西方派最少也同斯拉夫派一样，都曾时常指出。如果阿克萨科夫赞扬过俄国的幸福的落后，那么，我们的主观主义者（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民粹派（A. И. 赫尔岑，70年代的土地自由派，尤佐夫，B. B. 以及其他的人们），则力求证明俄国可能——而且鉴于西欧的可悲经验，应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立即跃进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由此可见，《旅长》和《纨绔子弟》等剧的作者，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所以值得注意，又在于他是我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提出了18世纪俄国知识界从同代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吸收的一种理论错误的一般“进步公式”形式。

II

这一错误的根子在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在历史过程的解释上是唯心主义者，而他们宇宙观的理论基础，却更为接近唯物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不无成就地致力于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学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从一定的范围看来，完全应该认为是经典的著作。完全可以理解，18世纪启蒙观点同唯物主义的密切接近，就是对于他们的一般浸透了唯心主义精神的历史观点，也应发生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断言，人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不过是感觉的变态（sensations transformées）。由于他们——正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毫不怀疑感觉是人们周围的物质环境作用于有生命的机体的结果，所以他们很自然要把道德情感、美的爱好、科学概念，简言之，人们的“见解”，都看为这种作用的结果。他们事实上就是这样看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不厌其烦地反复

说，人的观点和情感都决定于：第一，地理环境；第二，社会环境。然而坚持这一点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定理，因为按照这个定理，“宇宙是受治于见解的。”或多或少地明显染上唯物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家，其一般宇宙观，是同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背道而驰的。

由于无力解除这一根本矛盾，甚至很少看到这一根本矛盾，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于许多次要的矛盾。在这里，对这些次要的矛盾进行探讨，当然不是地方①。但是对于渗透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观和影响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某些唯物主义成分，在这里却不能置之不理。

首先，我要指出，法国理论家们——例如，波丹，以及在他之后的孟德斯鸠——从某些古典作家那里抄袭的一种观点，用气候的影响来解释某一民族的性格及其所特有的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在一种气候之下，只能出现辽阔的君主独裁制国家；在另一种气候之下，只能出现类似古希腊那样的共和国，等等。

这个观点无疑地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直接对立的：如果在气候的影响下，雅典人珍视政治自由，而东方民族则认为君主独裁制比较好，那就很明显，“见解”不仅不统治宇宙，它本身也取决于纯自然的原因②。但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只不过是想在历史过程的解释中增加必然性概念，因而也是增加规律性概念的最初的、完全不成功的尝试而已。

在本书结论中业已说过，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由于它这样或那样决定生理的过程，而人们的社会政治观点又仿佛为这种生理

① 关于这些矛盾，我在所著《一元论历史观问题》(《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书里已指出(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

② 通过当时极端幼稚地理解的某些生理过程来决定。

过程所决定；而是由于它给予一定社会所支配的生产力发展以或多或少的自由。生产力的状况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一经产生，便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发展。因此，社会的人不是直接地依赖于“气候”，——象我所分析的那派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间接地依赖于它：“气候”通过在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而影响于人，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则因一定地理环境的特点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气候”决定论者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虽是提出这一理论来代替历史唯心主义，却又马上回到历史唯心主义上去了。

姑且假定，古希腊人的政治自由爱好确乎是气候对于产生在他们机体内的生理过程的影响的结果。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则古希腊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便是“见解”，即由于“气候”影响而产生的政治观点和意图的直接结果了。这样，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心主义取代了唯物主义。在极为倾向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启蒙思想家的眼光里，历史唯心主义的回潮，并无损于“气候”的历史作用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有着启蒙思想家也能看到的缺陷：它并未解释恰恰需要解释的东西：历史发展过程。

伏尔泰在批评孟德斯鸠时说过，在地理环境未经任何重大改变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政治制度却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当他从这里作出结论，认为这种改变不能用“气候”的影响来解释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在作出这一结论和拒绝“气候”决定论后，提出的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唯心主义理论，把“见解”作为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但在所著《风俗论》里，我们却看到他很有意义地指出某些技术发明的巨大历史意义。例如，按照他的说法，火药改变了世界上的一切 (a tout changé dans le monde)。然而火药的作用不是“见解”的作用。这是属于另一现象范畴的原因的作用，我们称这一范畴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类似的观点在其他法

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更为常见。爱尔维修作过极有意义的努力，想用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来解释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又由社会的人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段的改变来解释。总之，这一卓越的努力并未成功。根据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别样。但同用“气候”的作用来解释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相比，它无论如何是具有无可比拟的更多科学内容的。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期所达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异常值得注意的萌芽。它的卓越还在于它对第三等级在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正确理解。这一理解就其本身而论，是毫无足怪之处的，因为启蒙思想家就是这个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我们知道在«百科全书»的出版通告里，曾用怎样的一些前所未闻的措辞谈论劳动群众。但在这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上述理解的存在，曾帮助法国启蒙思想家认识开始欧化的俄国对西方先进国家的态度问题。作为一例，我想指出雷纳尔。他的风行一时的著作«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E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的殖民和商业的哲学政治史»），曾为先进俄国知识界所热烈传诵。

根据雷纳尔的意见，文化发展过程受商业发展过程的制约。他断言“向其他民族传播文明的民族，是商业民族”。可是从事商业的就是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不发达的国家里，没有技术，没有道德，也没有教育。在俄国没有第三等级。这是俄国不同于西欧先进国家的最主要区别。只要在这个国家还未出现第三等级，彼得的改革便只能收到很小的效果。雷纳尔说：“俄国宫廷虽然到处召请名人，但其启迪本国人民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异国的植物将枯萎，就象外国花卉枯萎在我国的暖房里一样。在彼得堡建造学院和学校没有用处，派遣俄国青年向罗马和巴黎的最好行家学习也没有用处。这些青年在旅行回国后，适应他们在寻求

生活手段时所处的不良条件，将不得不把他们的才能闲置起来(abandonner)"①。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从头开始。在这种场合下，只有在俄国发展生产力，才是这个头。而为了开这个头，必须逐渐消灭农奴制。雷纳尔继续写道："学会种田，学会制革，学会制造毛织品，在你们那里就会出现富有的家庭。在这些家庭里将出生一些子弟，他们不耐烦从事他们父辈的繁重职业，他们将进行思考，进行争论，创作诗歌(雷纳尔说："音节的排列")，模仿自然，那时，你们将有诗人、哲学家、雄辩家、雕刻家和绘画家。他们的作品将成为手中有余财的人们的必需品。这些人将购买它们"②。这样，俄国第三等级的产生将自然而然地带来艺术、科学和一般教育在俄国的发展。

前已说过，雷纳尔认为逐渐消灭农奴制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现在再说一点。他认为问题是要一般地消灭那种，用他的话说，压制着我国全体人民的压迫。雷纳尔描绘了俄国普遍受奴役的暗淡情景，大声疾呼，不预先改变我国的政府形式(la forme du gouvernement)，就不可能使俄国人民获得幸福③。

在他的这种推论过程里，只有一件事情没有说明白：即在这样一个大家都被奴役、又没有第三等级的国家里，——而没有第三等级就不可能设想有教育，因而也不可能设想会出现致力于争取政治自由的人物，——谁能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呢？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条件下，是不能获得认真的答案的。而且不仅是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我们在往后各卷里就可看到，19世纪的俄国自由思想家多么长期不懈地、惨淡痛苦地致力于这个问

① 《一元论历史观问题》，第176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同上书，第168页。

题的解决。可是，启蒙思想家毫不费力地用向"开明君主"发出呼吁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以为，在俄国和在任何其他君主独裁制的国家里，会出现这样的君主，开明到愿意利用他的君主独裁制权力来消灭君主独裁制制度。他们有时觉得叶卡捷琳娜二世愿意扮演这样君主的角色。尽人皆知，善良的狄德罗怎样劝导她扮演这样的角色。显然，雷纳尔也对她寄予巨大希望[1]。此外，当他说不预先改变我国政府形式，就不可能使俄国人获得幸福时，他所指的与其说是政治制度，不如说是我国的管理方式。他极力主张缓和这种方式，但总的说，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独裁制是满意的。他的这种向君主独裁制转而向掌握君主独裁制权力的女皇发出的呼吁，使他离开在宣传第三等级对启蒙事业发展的作用时所保持的立场，而转到18世纪作家所习见的纯粹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去了。

III

在马克思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里，有一处值得一提，这对于评价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雷纳尔的观点，不无补益。

马克思写道："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2]。作为例证，马克思指出了欧文的学说，这个学说就其理论基础说，确乎是完全唯物主义的。但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物主

① 有一种报道说，在《雷纳尔文集》第3版里，有许多页是狄德罗写的。

② 请参阅我所翻译的恩格斯的著名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第8卷）。（引文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中文版，第4页。）

义，正好是同唯心史观和平共处的18世纪唯物主义。同极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欧文希望与他同代的文明国家的政府了解其真正利益，愿意从事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并教育其臣民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和活动。他忽视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而他所呼吁的统治者自己，就是在断然不能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朋友的社会条件下受教育的。

更早以前，他的导师们，即法国唯物主义者和一般启蒙思想家，就犯过这一错误。我们现在看到，雷纳尔在论及西欧启蒙运动在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的可能命运时，也犯了这个错误。这个错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直接传到先进的俄国知识界。方－维津说过，俄国可以选择任何“形式”，也是重复这一错误。在我国，只有那些在论及我国的未来时避免了历史唯心主义的任何影响的唯物主义者，才避免了这一错误。马克思的若干(不是全体)“俄国学生”，就是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但远在他们之前，别林斯基在他的一封著名的信简里，也表现为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信中断言，俄国只有在资产阶级得到发展时，才能在进步的道路上迈出真正的一步。别林斯基从来没有想到要求尼古拉一世的政府自觉地服务于一种经济政策，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把俄国从政治停滞的死胡同里拖出来。然而雷纳尔却要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作到这一点。这就是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但如抛开这一差别，则应承认，无论是在雷纳尔的观点或别林斯基的观点里，以及在马克思的“俄国学生”的相应观点里，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雷纳尔也好，别林斯基也好，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也好，他们都认为，俄国进步的未来命运同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着最密切的因果联系。而这就是说：

主观主义者和合法民粹派分子方－维津以为俄国可以不模仿西方而选择往后发展的“任何形式”，他的见解是同在很大程度上

为启蒙学者宇宙观所特有的唯心主义成分相一致的。在这种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下，狄德罗——在前面引录的书简里——为俄国的落后感到高兴，而雷纳尔则将俄国进步的全部未来，寄托于女王的开明专制。与此相反，别林斯基和马克思的"俄国学者"断言，俄国的进步事业，只有当俄国资本主义获得发展时，才会取得巩固的基础。他们的见解是以启蒙思想家所特有的唯物主义成分相一致的。在这种唯物主义成分的影响下，"百科全书派"说人的感情和观点决定于他的周围的环境，而同一个雷纳尔则写道：在一个没有第三等级的国家里企图传播西欧的启蒙运动，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第三等级是近代西欧社会的最主要特点。

雷纳尔的多卷头的著作给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年代的先进俄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仔细地读过他的著作。拉季谢夫用下述语句所表达的情绪，当然也是受了雷纳尔的影响。他说："环顾四周，我的灵魂因人类的苦难而感到创痛。我审视自己的内心，认为人的灾难是来自人，而且往往只是由于人不正视他周围的事物"。从这些话里已可看出，雷纳尔给予拉季谢夫的最强烈印象，不是他关于俄国启蒙运动前途的可能命运的唯物主义见解，而是他关于被压迫人类的灾难的一般性的，实在说，未免强词夺理的意见①。总之，以第三等级的发展为观念和知识进步运动的必要先决条件的思想，并未能在18世纪的俄国先进著作中移植成功，风行起来。

不言而喻，这个思想并非为俄国读者所不了解。我们知道，叶卡捷琳娜自己便曾约许若弗莲夫人在俄国着手培养第三等级。她在《敕令》(第317条)里"剽窃"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话，宣称"在受到压抑的地方，商业便会离去；而在不受干扰的地方，它会建立起

① 雷纳尔自称这些主张是 hors d'oeuvre'om (插曲)。

来"①。可是，我们塞米拉米达②的立法活动却主要是以保护贵族等级的利益，而无论怎样也不是以保障自由在俄国的未来胜利为指导。

我国对自由抱有幻想的人们，当时在社会历史思想方面，都是唯心主义者，但在我国当时知识界的右翼——更确切说，在他们的中派里，我们却看到一位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便是波尔京(1735—1792)。他从法国作家那里因袭了关于"气候"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决定影响的唯物主义学说。

IV

科亚洛维奇说，把波尔京称为斯拉夫派的先驱，不是没有某种根据的③。这样的称呼，确乎有些根据。在这位作者所写《列克勒尔克评注》一书里，我们看到一些在斯拉夫派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现在我把它们指出。

波尔京写道："按照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来判断俄国，等于用矮个子的尺寸为高大汉子缝制衣衫。欧洲各国在许多特点上彼此相同；了解半个欧洲，便可按照这一半来判断另一半，一般说，错误不会多。但是对于俄国，不能用这种方式判断，因为它同它们毫不相象，特别是在谈到它的四境的地理位置时。"④

读者可以自己看到，这是斯拉夫派的最主要原理之一。这一原理，在19世纪的俄国，曾反复为人们所称道，甚至西方派人士——如别林斯基，——也吸收了它。值得注意的是，波尔京从这个一般理论原则里作出了某些实际结论，这些结论也为斯拉夫派所

① 前章表明，这后一思想，商人等级的代表在立法委员会里，有时也不反对跟着她反复提到。

② 传说中的亚述女王，许多次远征及建造"空中花园"，都归功于她。——校者

③ 《俄国自觉史》，第3版，第129页。

④ 波尔京少将著：《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圣彼得堡1788年版，第2卷，第152—153页。

时常提出。

波尔京既然认定俄国丝毫不象西方各国，所以，对于彼得改革，自不会同情地看待。当然，他没有谴责它，因为他极为谨慎。此外，他很努力阅读«贝伊尔词典»，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但在他关于这一改革的议论里，仍然可以听到不赞同的语调。举例如下：

列克勒尔克在他的著作中说：莫斯科政府禁止外国学者来俄国，也禁止俄国学者去外国学习。对此，波尔京反驳说，对于外国学者来俄国，从来不曾禁止；至于俄国人出国，则加以禁止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要从国外旅行获得益处，必须“具有成熟的理智和对祖国法律及道德的坚定信念。对于思想不可靠，行为不检点的青年，不准出国，这是出于明智的预防，使他们不受有害的新事物的传染。”

波尔京断言，以后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旧莫斯科国家的顾虑的正确。

“自从我们向外国派出自己的青年一代，并委托外国对他们进行教育以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完全改变了；由于臆想的所谓教育，在我们的心灵里灌输了种种为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新成见、新嗜好、新弱点、新念头；我们对祖国的爱熄灭了，对祖国信仰、习惯等等的依恋消失了；就这样，我们把旧有的东西忘掉了，而新的东西并未接受过来，我们既不象自己，又未取得所企求的变化。”①

波尔京认为俄国道德风尚所以在西方教育影响之下遭到破坏，是由于对改革事业操之过急，“想把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在若干年内完成，把我国启蒙运动的大厦建筑在沙滩上，而不建在事先建立起来的可靠的基础上”②。

---

① 波尔京少将著：«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252－253页。

② 同上。

波尔京对于什么是我国启蒙事业的可靠基础，没有作出说明。他只是说："必须从良好的教育开始，而以旅行结束"；又说，叶卡捷琳娜二世"正在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以纠正危害"[1]。这种对于庇护过他并为他所极力赞颂的叶卡捷琳娜的阿谀之词，表明这位身受百科全书派教育的特殊斯塔罗杜姆式人物的观点，是多么缺乏斯拉夫派的气息[2]。

所谓彼得式的改革，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完成的意见，使我们明确了解那种使他与我国19世纪斯拉夫派极相近似的保守主义气质。还有一点使他与斯拉夫派近似的是，他不赞成彼得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波尔京写道，将彼得堡指定为俄国首都，是贵族等级和整个俄国人民所不乐意的。照他的意见，这有其根本原因："彼得堡距离国家的中心遥远，气候严寒，土壤贫瘠，地势低洼且多沼泽，粮食及食物昂贵而且必须从数千俄里之外运送，距离一般官宦家乡过远等等"[3]。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些理由有许多是正确的。我国19世纪的西方派，时常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问题上写文章，也深知迁都彼得堡的不便。但在西方派的眼光里，这些不便可由下述情况补偿而有余：这就是新首都，——这个开向欧洲之窗，——其精神气氛要比保守的莫斯科的精神气氛更有利于俄国的进一步欧化。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产生将政府迁回大俄罗斯首都问题。相反，斯拉夫派高喊：是回家的时候了（请回忆阿克萨科夫的话）；就这点说，波尔京也是他们的先驱。

他认为在考虑到他所列举的所有这些情况的时候，"纵使不去预测未来，也会在头脑里产生一种想法，以为或迟或早终将放弃彼

① 波尔京少将著《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252—25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卷，第549页。

得堡而将首都迁回原处，或迁到比两者都更有利的另一地方。这个吞没全部国家财富的深渊，是任何时候都填不满的，这将在某一时候迫使人们设法停止白白浪费资财和劳动。如果将这一切使用在莫斯科，它将会是多么好啊！"①

将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的思想，斯拉夫派预期在现时实现。波尔京则预定它将实现在更为比较遥远的未来。但这不是主要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他欣然同意往后将首都不迁到莫斯科，而迁到另一"比两者更为有利"的地方。波尔京虽然有时也维护我们的旧莫斯科生活，但是他对于这种生活没有 19 世纪所有一连串斯拉夫派所特具的那种特殊的原则性的癖好，由于这种癖好，莫斯科成为他们心目中与西方对抗的某种俄国"原则"的象征。正因为波尔京对于这种"原则"没有原则性的癖好，所以称他为我国斯拉夫派的先驱，不能不有重大保留。

克柳切夫斯基感到这种保留的必要，所以称波尔京为"斯拉夫派的某种旁系先驱"。他还提到，为什么只能说波尔京同斯拉夫派的接近是侧面的。按照他的很恰当的说法，《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的作者在考虑俄国的历史命运时，是手持着他心爱的贝伊尔词典发言的②。此外，还应该补充一点：波尔京在发表他的意见时，还念念不忘伏尔泰的《风俗论》。可以理解，对于他的爱好贝伊尔·伏尔泰和一般法国启蒙思想家著作，斯拉夫派是怎样也不会赞成的③。他们的思想习惯，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不喜欢 18 世纪全部有识之士，特别是波尔京所特有的那种理性。尤其是波尔京总想将他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斯拉夫派则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最后，——

① 波尔京少将著：《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 1 卷，第 549 页。

② 《随笔和演词》，莫斯科 1913 年版，第 175 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③ 甚至《百科全书》的译本他都勤奋地读过。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他完全不把斯拉夫人与其他欧洲民族对立起来，而斯拉夫派却是极为重视这一对立的。他甚至说，当然，斯拉夫人也是我们的祖先之一，但他们已完全与俄罗斯人——他这样称呼吕里克大公的同部落人——融合了，因此在我们的血管里几乎没有了点滴纯粹的斯拉夫血液。这样，按照他的意见，如果俄国同西方毫无相似之处，这也全然不是由于我们的部落特点。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主要的事情在于气候，而不在于种族。

波尔京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里说，"某些爱走极端的人赋予气候以适当的能量，以为人和国家的一切变革都是由于气候；另一些人则相反，剥夺了气候的一切，以为它毫无力量和作用"①。他认为孟德斯鸠是前一种人，而属于第二种人的，他不完全有根据地举出了"爱尔维修"。至于他自己，他自称是保持中间道路，就是说，"虽亦认为气候在人类的建立和形成中堪称首要的原因，但并不否认对此起着促进作用的其他原因"。但是根据他的进一步的解释，他似乎更接近的是气候决定论的极端派，而不是"爱尔维修"。他断言，气候对"我们的身体和道德风尚发生主要影响；其他原因，如教育、政治体制、榜样等等，则是次要的，附属的：它们只是促进或更恰当些，阻碍气候的作用"②。

为了说服读者相信气候的重大作用，我们的作者举出了一些有时不很可信的例证。植物从一种气候移植于另一种气候，便发生种变。长毛羊从吉尔吉斯草原移到俄罗斯后，也取得另一种"特性"。阿拉伯人（应是黑人——著者）移居欧洲后，成为白人，而欧洲人移居非洲，"几代后变为黑色（！），并且整个面形也变得同当地居民一样"。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气候的改变使植物和动物的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5页。

② 同上书，第6、11页。

机体发生极为重大改变。由于肉体和灵魂是“密切结合着的”，所以一切建立、形成和改变肉体的东西，都对灵魂发生同样的作用①。

“同样的作用”一语在这里显然不是说迁居非洲的欧洲人如果皮肤变黑，其灵魂亦将从白色变为黑色。但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显然，波尔京自己也感到，他的话极不明确。他力图用一些新的例证来阐明和加强他的意思；不过这一次，这些例证部分地是从古代作家那里抄袭得来的。他跟着维特鲁维说：在南方各国，“人们由于血量小，所以胆小，但是由于空气清洁，却思想活泼而敏捷；至于北方各国，住民思想迟钝，但作战却有能力，既坚强、勇敢，又无畏”②。

尽管这种结论和见解的弱点，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我们估且假定，事情就是这样。在这里，理论的主要课题在于阐明：由“清洁的空气”造成的南方民族的更为活泼和敏捷的思维，怎样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过程？而北方民族的“思想迟钝”和勇敢同北方国家社会制度及历史的因果联系，又表现在哪里？但是这一任务是气候决定论者永远不能解决的。原因很明白：因为对于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现象联系，是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的。波尔京可能正因此才表示支持中间道路，因为他相信这个课题是无法解决的。然而他的“中间道路”也是走不通的。

第一、“孟德斯鸠”本人从来没有用气候来解释人和国家的一切变化。他完全不是象波尔京所说的那样极端；事实上，他更多地诉诸“次要的或附带的”原因，而不是更多地诉诸气候。

第二、波尔京总是认为气候对于身体和道德发挥主要影响。所以，他在考虑各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时，必然要首先提到气候。例如，由于他认为俄国同西方国家毫无相似之处，所以对于俄国的独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特发展，他便只能用俄国人身体和道德在俄国气候影响下的特殊变化来解释。可是，我再次提出，这是不可能的。波尔京甚至不曾企图在他的理论思想劳动中对这方面有所考虑。他满足于“次要的和附带的原因”，而且就是在这里，他也表现出极大的折衷主义和极大的思想含糊。

如果气候对于身体和道德有着主要影响，则很显然，象“教育”和“政体”这样重要的民族生活方面就都应由气候的影响来决定了：由于气候影响而向某一方向发生形态改变的身体和道德，以其特点来制约某一政体和某些教育方式，而在这些身体和道德由于气候影响向另一方向改变时，它们便必然要造成另一种国家制度和另一种教育了。谁不承认政体和教育同气候的因果联系，他便不应承认气候的影响是主要的，亦即主导的影响。而如果他仍旧承认这一点，那他就会同自己发生矛盾。波尔京便陷入了这种矛盾。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常见，他的这一根本矛盾表现于大量所谓“次要的或附带的”原因。

这一点从我们作者就其对俄国关系上论述“自由”的议论中看得最为清楚。

V

无论列克勒尔克多么轻率，但他还是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俄国生活的某些最可悲的现象。他对劳动群众的被奴役和政府的横暴，进行了坚决的谴责，这些谴责的确并非经常表述得很聪明，并且总是说得很尖锐。在他的史论的一个地方，无疑地说出了一种为当时先进的法国自然神论者所共有的思想，即认为自由是人类从神取得的最宝贵的禀赋。波尔京不想反驳这个思想；如他所说，尽管他是能够作出一些有限的批评的。但他认为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适宜于同样的自由，或者与此不同，应有某种例外，某些条件、规定和规章呢？"

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于己无害地接受的那种自由对我们并不"适宜"。"我国农民不能忍受普鲁士的自由；德国的自由不会使他们的情况改善；法国自由将使他们饿死；英国的自由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①。

我国当时没有自由，而有农奴制。波尔京不愿人们把他看作奴隶制的"辩护者"，所以承认必须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但又立即声明，这只是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无论如何只有在我国农奴"成熟"到能享有自由以后，才有可能②。这样一来，在那最美好的时候到来之前，农奴制便是最"适宜于"俄国农民的"自由"形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离奇的现象也应由气候的影响来解释，难道不明显吗？但是，我们如果要从我们的作者那里寻求这样的答案，那是徒然的。相反，我们在他那里看到这样一些定论，按照这些定论，则适宜于俄国人民的不是奴隶地位，而恰恰是自由。他自己说，——而这确乎是同他的气候决定论相一致的，——"所有古代北方民族都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幸福，而奴隶制度则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最卑鄙和最羞辱的状况"③。他认为我国人民属于北方民族。因此，古代罗斯居民也应受到气候的良好影响。波尔京自己说，在最早的几个大公时期，我国"只有俘虏才是奴隶；而其他国家官吏，则是自由的"④。这一从自由到被奴役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根据波尔京的理论，由于次要原因的影响，气候的作用有时"显得无能为力"。他就是利用这种次要原因的影响来解释"为什么我国现时的道德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234—235页。

② 同上书，第236页。

③ 同上书，第242页。

④ 同上书，第241—242页。

同我们祖宗的道德毫无相似之处"①。这就是说，必须用次要的原因来解释俄国农民在吕里克、奥列格和伊戈尔时期的极端珍视自由，而在18世纪反倒不能"忍受"自由的利益这一历史离奇现象的。

波尔京说：导致气候作用不能发挥的次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同前此不知的异民族的来往，外国食物和辛辣块根对血液的影响，生活方式，习俗，服装的改变(即仿佛是变化的——著者)，教育，工艺等等都是"②。

哪些工艺，同其他民族的哪些交往，哪些教育和服装改变，哪些"辛辣的块根"夺去了俄国农民对自由的爱好而造成他们的奴隶地位呢？对于这些无可避免的问题，波尔京没有答复。他只限于单纯地叙述事实：某时我国农民是自由的；某时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最后，某时他们完全同奴隶一样。他所指出的事实是正确的。当时，他几乎是俄国农奴制度史的最渊博学者③。但是在这里，他对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毫未探讨。这部分地是因为，不管他怎样声明，他毫无疑问是农奴制的"辩护者"。他担心探讨农奴制产生的原因，会得出种种为贵族所极不乐闻的见解。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说明他的理论的无能：波尔京不能对俄罗斯农民受奴役的产生过程，找出与他的气候决定论相符合的解释。

在人民被奴役的基础上，在俄国成长了外国人几乎一致称之为君主独裁制的国家制度。波尔京不喜欢这个名称。他力图证明这个名称不适合于我国政治制度。我们很快便可看到，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暂时我们只是指出，波尔京由于未弄明白那些消灭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9页。

② 同上书，同页。——我只指出，Comme de raison(似乎的理由)，我对波尔京的说法未加改变。

③ 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里，他提出的某些见解可能使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他的农奴发展史理论。波尔京对于俄国经济生活也是很熟悉的。

我国农民群众自由的种种原因，所以不能理解那些在我国导致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出现的种种历史根源。

我们已经知道，他认为在俄罗斯，最低限度在最早的几个瓦兰大公时期，所有"国家官吏"都是自由的。这个意见他发表过不只一次。例如，他在同勒克勒尔克争论某次枢密院成员阴谋时说道："在吕里克之前和在吕里克时期以及在吕里克以后，在鞑靼人入侵之前，俄国人民是自由的。大公和封侯的权力，是有节制的，或者是同大贵族及人民的权力溶合在一起的"[①]。当然，这里他也未能避免自相矛盾。我们从他的著作的另一地方了解到："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君主制政体或君主专制开始的，这种制度是在所有其他政体中最自然、也最方便的一种。"他去那里完全按照这第二种观点，叙述了俄国历史。他写道："诺夫戈罗德人花费了几个世纪才达到人民政体，而且是经过了强烈和残酷的动荡才达到的"[②]。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看出这一矛盾，而且以为将君主专制作为国家发展的最自然起点的思想，是他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一书中就已提出过和论证过的[③]。然而不管他在那里怎样说，毕竟很显然的是，所谓俄国人民早期自由的思想，是既更为符合历史真实，也更为符合波尔京的气候决定论的：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北方民族是爱好自由的。现在要问：为什么俄国人民放弃了自由而建立了无限制的君生专制呢？

由于按照波尔京的说法，俄国人民在鞑靼入侵前是自由的，所以应该假定，这一入侵便是那种克制了北方气候对俄国人民的自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72页，又参阅第422页。

② 《波尔京少将对舍尔巴托夫公爵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的评注》圣彼得堡1793年版，第1卷，第3页。

③ 他指的是《注释》第2卷，第477页。但那里论述的完全不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那里完全是从抽象的观点考察专制政体的优越性。稍前（在第472页），才是我所引录的关于俄国人民在最初几位大公时期享有自由的地方。参阅《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

然影响的次要原因了。试问俄国在鞑靼人统治下有过哪些变化呢？

波尔京说："所有编年史和鞑靼人的公文都证明"，蒙古征服者只是经过自己的官吏收集贡赋，而让俄国居民按照自己的法律和习惯进行管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鞑靼人压迫的直接影响是不能用来解释俄国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的。剩下的只有求助于鞑靼人的间接影响了，也就是只有注意了解罗斯的新的社会政治需要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结合，这种需要和结合在鞑靼人压迫下产生，必然导致俄国大公们权力的逐步加强。可是，在这方面，我们在波尔京那里完全没有找到有成效的指示。相反，按照他的见解，鞑靼人的压迫在我国削弱了"上级的权力"[1]。

不能想象，在自由的俄国人民中间削弱上级权力的历史现象，怎能导致君主的无限制权力的产生和巩固。波尔京的俄罗斯国家历史哲学，在实质上并未超过塔季谢夫，后者的历史研究对他有重大影响[2]。他未能在提出我国政治制度问题时联系我国气候，或哪怕只是联系最重大的"次要"社会原因，所以当他不得不从列克勒尔克的攻击下保卫这一制度时，便抛弃了历史现象的规律性观点，而退入抽象思考范围，讨论究竟哪种政治制度优于其他政治制度。根据所谓"个别人的才智比许多人的才智更便于开始和完成重要的和伟大的事业"；"没有一长制便不可能有必要的准则"；"专制制度的弊病是暂时的，易于治疗的，而共和国的弊病则是严重的，不可治疗的"，等等理由，他断言"君主制政体介于君主独裁制和共和国的中间，是自由的最可靠避难所"[3]。

---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316页。

② 不过，这也是不公允的：塔季谢夫关于《君主独裁制》的优越性的见解从来不是象波尔京的相应论点那样抽象。

③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77，478页。

VI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结论，完全显然的是，波尔京是用纯理性主义的方法得出这一结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同意米柳科夫所谓摈弃这一方法是波尔京在俄国历史哲学方面的主要功绩的原故。

米柳科夫称波尔京为最早的和完整的俄国历史有机论的代表人物①。但«列克勒尔克注释»的作者是不配享有这一美名的。无论对于一般历史，特别是对于俄国历史，他都不曾，也不可能抱有这种观点。他的功绩仅在于他不满意历史唯心主义，因而企图——只是企图——制订一种对历史的“有机观点”，并为此求助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一个变种。可惜他所选择的是一个在本质上毫无前途的变种。由于这一失败的选择，波尔京的历史观点就连在18世纪业已达到的那种相对的——实质上远不完整的——严密性，都未达到；那时对于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解释历史的已有萌芽，还是态度比较慎重的。就这点说，波尔京的拙劣平庸的尝试，该是同爱尔维修的卓越尝试多么不同！②

另一不少受到尊敬的俄国学者发表过下述意想不到的见解：“如果断定与波尔京同代的俄国思想家比黑格尔更早就懂得存在的合理性，我担心那会是冤枉了他们；但关于活着的人们，由于自己的不合理会使他们本身及其后裔的存在受到损害，这却倒是波尔京不只一次明确、坚决地表示过的。”③

---

① «俄国历史思想主要流派»，第Ⅰ卷，第36页。

② 关于这一尝试，请参阅我的著作«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 Holbach, Helvetius, Marx»(论唯物主义历史家——霍尔巴赫、爱尔法修、马克思)。(全集，第8卷。)

③ «波尔京»——«克柳切夫斯基的随笔和演词集»，莫斯科1913年版，第184页。

关于活人会因自己的不合理行为而损害其自身以及其后代的生活，这是一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谁也不怀疑的真理。因此，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科学的或政论的贡献。

其次，已故教授不敢断言与波尔京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在黑格尔之先便有了关于存在、或更确切点说，关于真实的合理性的理解，这是正确的。关于真实的合理性的理论须以一元论历史观为前提，而这一历史观却为18世纪俄国人所完全缺乏。我们刚才恰好在波尔京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

如果黑格尔的一元论同波尔京的历史观点相距不能更远，但它毕竟还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波尔京的历史观点。

西斯蒙第在他所著«意大利共和国史»一书中写道：政府是民族性格的最真实原因。按照他的意见，这一理论原则是他研究历史所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之一。这一原则在18世纪的历史和政论文献中，几乎获得普遍的承认。

另一方面，这一世纪的作家很少怀疑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制度——从而它的政府的特性——都为其居民的道德、亦即居民的性格所制约。这一矛盾的结论，初看来是绝对荒谬，但在进一步考察下，却是正确的，尽管只在一定的、很有限的意义上正确。毫无疑义，在任何特定民族的性格和它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由于这一相互作用是在实际上存在的，所以它完全应该为科学承认。对此作出卓越阐明的，正是黑格尔。但是一元论者黑格尔对此还有所补充：他认为科学不能满足于理解相互作用。为了使这一相互作用不将我们带进无出路的矛盾，科学分析应该更深入一层：它应该对它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的那些社会生活方面的产生，作出说明。这种说明只有在一元论历史观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折衷论只是满足于对相互作用的理解，但这不曾妨碍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赋予或多或少的

意义①。

波尔京创立一元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尝试，没有成功。我们已经知道，他自称为“中间道路”派。但他的折衷主义比他所愿意、所意识到的，走得更远。他所理解——虽然是折衷主义地理解——的气候决定论，没有给他以解决“政府形式(和法律)取决于道德，道德又取决于法律(政府的形式)”这一二律背反的理论可能。因此，他以为必须将这一二律背反转变为科学分析的工具。

由于满足于对相互作用的折衷主义理解，他与18世纪许多其他作家相反，赋予道德的意义要比赋予法律的意义大得多。他写道:“使法律适合道德，要比使道德适合法律更方便些”。后者不用暴力是作不成的。梭伦在给雅典人制定法律时说:“我所颁布的法律虽不是在可能制定的法律最好的，但在适合雅典人的法律中，却是最好的;这就是说，他能够制定更好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会不适合雅典人的道德，因而对他们会是不方便的，不适当的。”②按照米柳科夫的意见，波尔京所以将塔季谢夫所收集的全部俄国法制史的资料汇集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进一步说，波尔京对于俄国历史的整个“有机”观点，也在于此。不难看出，这一观点“有机地”包含着这一学者在满足于相互作用观点时所不能避免的一切矛盾。

波尔京在反驳列克勒尔克时写道，“部落的性格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他们相互之间已有的政治决定”③。我们如果将这一原理同我们的作者以前所说的法律（即决定）取决于道德（即部落的性格）的原理并列考察，则结果在他那里，——也如在

① 这个问题在我的历史一元论里(见《全集》，第7卷)，有更详细的探讨。

②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316页，参阅317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423页，参阅第158，159页。在第1卷里(第430—431页)，波尔京完全赞同地引述了赖纳尔的意见，认为被剥夺了自由自决权利的人民，会变得同他们的君主一样。他也承认，“在不同的君主统治下，俄国人的性格也不相同。”

18 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那里一样，——道德取决于法律，法律又取决于道德。这里的折衷主义是如此明显，因此谈不上什么对历史过程的“有机”观点。

波尔京对于列克勒尔克著作的评语是很严厉的:“你无论写什么，都是无用的废话，废话不能使思想得到锻炼”①。这一严厉的评语是接近真实的。总之，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史，写得是很失败的。波尔京对于俄国历史和俄国生活的学识，都是这位法国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在他的“注释”里，是有许多异常宝贵的细节的。但是他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哲学见解，却是完全要不得的。它同样“不能使思想得到锻炼”。我已经说过，波尔京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是由于他的出发点的完全错误。

如果波尔京坚持说，使法律适合道德要比使道德适合法律更为容易，那是由于他的思想方式的保守性质。他不喜欢彼得改革，是由于这一改革的极端进取性。他责备这种进取性，因而提醒叶卡捷琳娜不要急于实行认真的改革，特别是不要急于改变农民的生活。从法律必须适合道德，而不是相反这一原理出发，可以轻而易举地借口农民的思想落后，即借口农奴制所产生的“道德”，而无限期地推迟农民的解放。农奴制的“辩护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愿意理解，他们以这种道德为反对农民解放的借口，是在无出路的逻辑圈子之内兜圈子。

VII

波尔京是奴隶制度的“辩护者”，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象方-维津一样，他坚决说，尽管有农奴制，俄国农民的情况还是不如西方那样难以忍受。俄国农民没有西方农民所交纳的那些赋税的概念，而安然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他同意的是“诚然，地主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 1 卷，第 432 页。

所属农民的情况，不都相同，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由于他们主人的冷酷无情和麻木不仁，负担着沉重的、难以忍受的租税和劳务，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生活得丰裕和平静，并不认为他们的景况是不能忍受的"[1]。稍后，他说："我国农民的很大一部分，抱着过分的愿望，而由于满足这种愿望的能力的增加，过分讲研服装……"[2]。

波尔京所使用的将俄国人民的情况与西欧各国人民群众情况相比较的手法，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克柳切夫斯基在我们的作者的探讨里看出了历史比较法的萌芽[3]。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波尔京想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比法国劳动人民更好地满足了自己的物质需要。为此，他引录了梅西埃在其名著«巴黎的情景» («Tableau de Paris») 中关于巴黎劳动人民的贫困和巴黎石匠用餐的简陋小酒店的描写。抱有极端反对派情绪的梅西埃，当然在这里是不惜尽力夸张的。结果在他的笔下形成了一幅极端悲惨的图景。波尔京便将他用完全另一种笔调写出的俄国工人生活概貌，摆在这幅悲惨图景的旁边，进行比较。

波尔京问道："我国劳动人民的食物是否象他们那样呢？我国种地，砍材，从事类似粗笨劳动的最穷苦人民，每日获得 35 到 40 戈比的工钱，每日两次吃很好的牛肉菜汤，加油的稀粥，在星期天还要吃馅儿饼，油煎饼以及类似的食物，与其说是吃得饱，不如说是吃得美。至于木匠、石匠以及其他类似的手工业者，他们生活得比这些人还要好得多，那就更不用说了。巴黎的中等人比我国所有住在自由地区的一般手工业者和农民，都要吃得坏些[4]。

这样比较的结果，得出了一种可喜的结论："在我国，一切都相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 223—224 页。

② «随笔和演词»，第 186 页。

③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 1 卷，第 234—235 页。

④ 同上。

反"①。的确，是相反②。

下面几行最能说明波尔京对于当时俄国农奴制的态度。

"不能说，有些人不应对那些不幸遭受残酷地主迫害的奴隶表示不满；但总的说，特别是就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说，却没有这种达官贵人的诡辩、高傲和残酷。经过经验检证的真实表明，俄国农民并不认为他们的境况是不幸的，是可称为奴隶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富裕、满足和安宁的农民，更是如此。他们对于更好的境况是连想都不想的。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是不会去希求的：人类的幸福，是由想象决定的"③。

俄国人民对于他们在北方气候影响下应该珍视的自由，"连想都不想"。"次要的原因"在我国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竟然这么巨大！可是，如果俄国农民竟然对于自由产生了某种想法，那又怎样呢？那是很坏的！波尔京痛心地说：

"自从那种所谓教育的微弱光照，从教养很坏的老爷那里反射出来，稍微触及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们，奴隶们对他们的老爷的忠诚和热情，便显著地减少了。"使他十分得到宽慰的一种境况是，"这种教育尚未达到农村住民，也未将其有害影响推广到所有他们那里"④。看来，良好的教育在于同奴隶状态妥协！

我在前面一章里已提请读者注意，在当时俄国讽刺作家对法国狂的抨击里，时常听到保守的语调。波尔京猛烈谴责对外国风

---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235页。

② 那些多少不用成见的眼光看待农奴制的俄国人，却对于俄国农民的境况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波列诺夫写道："我没有看到象我国农民这样极端贫苦的人。他们毫无法律保障，他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连生命也遭受一切可能的迫害，他们受凌辱，忍受无休止的横暴行为、折磨、强暴；因此必然要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我们现在实际上就看到他们属于这种境况。"（《俄国农民的奴隶境况札记》，参阅《俄国档案》，1865年版，第298页。）

③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383页，参阅第451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241页。

习的爱好，在他那里，这样的语调更为明显。应该记住，列克勒尔克所以激怒了他，不仅是由于前者关于俄国的轻率见解。他对列克勒尔克的厌恶还因为列克勒尔克爱好法制的新计划。他在批驳列克勒尔克时说：

“在反对舞弊行为及摒弃罪恶时，必须注意不要减少德行的力量；矫枉过正，是许多朝代衰败的原因。改正风俗和道德，必须非常慎重。”①

在这里，他的语气甚至比斯塔罗杜姆与索菲娅谈话中②的语气，还要坚决得多。但在这里，他的议论的精神，同斯塔罗杜姆并无二致。以下的意见，我们甚至从斯塔罗杜姆那里也未听到：

“许多人都注意到，自从我们革除祖先的习惯而按照外国习惯生活以来，我们是变得更弱了，更易于生病了，这样的人是很少活到老年的。根据我的陋见，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废弃了走去洗澡的习惯和采用法国式厨房。”③

对于这位贝伊尔和伏尔泰著作热情读者的这种唠叨，康捷米尔时代的斯塔罗杜姆之流一定会热烈赞同。这些斯塔罗杜姆之流可能也同意这位饱学深思的少将的经济观点。

波尔京反对在我国建造商船。他希望俄国永远不要同航运事业有关的“盈利”，而“将用在船舶上的人们转用于适合我国国情、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工艺和行业”④。哪些工艺和行业呢？他答道：“所有奢侈品都从外国供应，本国人从事生活所必需的行业：农民和军人都应是本国人”。也许是为了给这种经济政策以诱惑力罢，他特别指出，在斯巴达，“所有自由人都是军人，所有的奴隶都是农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355页。

② 《纨绔子弟》，第4幕，第2场。

③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369--370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27页。

民”①。

这种对于完全建立在农奴被奴役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极为同情的回忆，会使现时的读者感到惊讶。但是应该看到，就是在托尔斯泰伯爵所写的反拿破仑战争的天才长篇史诗里，出场的人物不也主要是博尔孔斯基公爵或罗斯托夫伯爵一类的俄国“自由人和怡然自得的卡拉塔耶夫一类的«农奴»吗？”

非常有趣的是，波尔京由于极端保守，极不欢喜辩论。他说：“争论无助于改正恶习，消除误解，毫不能使对真理的认识有所成就，却更多地是将真理掩盖。争论易于转化为荒谬的巧辩，爱好争论的人是自作自受。……争论的结果怎样呢？它增加了意见分歧，而保卫谎言的技巧就象保卫真理那样得心应手。”②

由于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比较有教养的俄国社会里，有不少象波尔京那样的斯塔罗杜姆，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远在«万有»杂志(1769年)时期，就有类似他那样的反对争论的人物——用笔名“阿里斯塔赫·阿里斯塔霍维奇·普里米里切列夫”——劝导作家“在相互之间保持不破裂的友谊和永恒的和协”。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当开明的女皇封闭杂志，禁止书籍出版，同对她过度忠心耿耿的责难者这一俄国实际“和解”时，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对她实行谴责的人物，就寥寥无几了。

VIII

农奴制“辩护者”波尔京，在俄国国家制度问题上，也表现为“辩护者”。在这里，他的辩护努力也象在那里一样，很少成效。

他在绝对君主制优越性问题上的抽象议论，对于西方作家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几乎经常在说，俄国的国家制度不象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336，337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354—365页。

西欧各国的君主制，而象东方的大君主独裁制。

波尔京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从心坎里欢喜《风俗论》第4卷里的一些章节，因为伏尔泰在那里力图证明，土耳其政府远远不象欧洲人所想象的那样专横。波尔京在引录了伏尔泰的有关论点之后，胜利地总结说："这样，如果土耳其和其他一些伏尔泰没有明确点名，而要由我们去领会的国家（这里所暗示的是法国——著者），其政体不是专横的，那么，怎能说俄国的政体是专横的呢？"①事实上，如果国家制度的一切形式都相互类似，那就很明显，俄国的国家制度同西欧各国的制度并无差别。整个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科学上使用这样的分析方法，离开所分析的现象的所有特征而进行抽象议论。伏尔泰著作中讨论土耳其政府特点的那一章（总计为XCIII章），应该说是写得最糟的一章。《风俗论》一书的机智而开明的作者，在这一章里谈得很肤浅。他的结论，就其科学价值说，远远不及波丹的相应结论②。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波尔京也会看出伏尔泰论点的不能令人满意。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不是科学的目的，而是纯粹辩护性的目的；因此，他不但没有改正伏尔泰，却把伏尔泰的已经过于简单化的思想，更进一步简单化了。

依靠伏尔泰，波尔京同时毫不迟疑地从俄国实际生活中提出他的论点。他写道："俄国贵族不比欧洲国家的贵族享受更少的自由、利益和优越；商人和农民的负担也比在欧洲国家小得不可比拟，怎能说俄国的政体是专横的呢？"③

我们的史学家属于俄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不但对于叶卡捷琳娜赐予他们这个等级的自由十分满意，而且——这一过失是隐瞒不了的——对于女皇奴役农民的政策，也是十分满意的。这就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66页。

② 同时，伏尔泰提出的有利于土耳其制度的论点，包含着对法国实际生活的痛苦的暗示，这一点是波尔京所不曾忽视的。

③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66页。

是为什么当这位无论如何不失为聪明博学的人物考虑俄国对西方的态度时，他的思考只能达到我们在方-维津的书简里业已看到的那套保守性的箴言，以为在西方，无论过去或现在，人们一点也不比俄国生活得好些。这一在实际意义上不能给人以慰藉的结论，在理论的意义上也是完全没有内容的。

列克勒尔克写道，我国的法典给丈夫以压迫妻子的残暴权力。波尔京说这个意见是无耻的、卑鄙的，因为在我国，夫妻关系不是由法典，而是由宗教法规决定的。可是，法国作家的错误并未减轻俄国妇女对丈夫的服从。从波尔京那里，关于这种服从，我们听到些什么呢？我们听到他说："古时，法国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并不小：根据波马诺阿罗夫的证明，习惯给丈夫以在空闲时殴打自己妻子的完全自由，但必须提防把妻子打死或致死"①。

列克勒尔克在谈到贵族杜马这一最高审判机关时，引述了伏尔泰的一个评语，说不是知识，而是官阶和出身使俄国人成为这一审判机关的成员。对于这点，波尔京也予以反驳。他质问："哪里有这种只靠知识而取得席位的审判机关？"他断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官阶，出身，财富和权势都重于知识、天才和能力"。对于这一论断，——其公式是"在任何地方，过去如此，将来亦然"，——他用了一个聊以解嘲的猜测来补充，说"也许，在贵族的法庭里，偶尔亦有只因知识而入选的人，但毫无疑问，更多的人是由于财富、门第而取得了属于有知识者的席位"。为了使读者不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情况比西欧坏些，波尔京急忙补充说，"据说英国也有类似情况：即在议会选举时，有时对财产比对知识和能力更为重视"②。

再举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波尔京在将法国同俄国比较时写

① 着重点是波尔京加的。

②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469—470页。

道:

“路易十四并不总是限于企求他有权要求的东西，他的要求和愿望往往比这多得多。……他的愿望并不经常都以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为依据，而是更多地建立在他的虚荣和古怪性格上。虽然如此，法国人并不称他为暴君。法国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权利多少次遭到破坏和消灭，基本法律遭到践踏和贬抑，议会的全体议员被剥夺了席位和被放逐，然而法国人并不把他们的政体称为君主独裁的暴政。”

我们所熟知的辩护性的结论，是很明显的：尽管我国的政体可能有缺点，但不能把它称为暴政。波尔京劝列克勒尔克和他的“姑息者”去了解一下我国的法律，规章和国家不同等级的优越地位。他断言那时“他们自己就会证明，俄国的政体完全不是象他们——部分地由于偏颇、部分地由于不了解——所想象的那样”①。为了加强说服力，波尔京再次引证麦尔西埃的反对派情绪，不用说，麦尔西埃对于法国的国家管理制度（任意拘捕等等），是强烈反对的。他激动地——对于这种激动的真实性是难以相信的——慨叹道：“这就是对于法国现状和法国政制的真实公正的描写。我们可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②

如果象已故克柳切夫斯基所说，这样地将俄国同西方进行比较，也是历史比较法的萌芽，那么，一些毫无头脑的人们在争吵中所惯用的争论方式，——对手之一由于被骂为笨蛋或贼而立即敏捷地反击说，“骂人的才是笨蛋或贼”，——便应认为是心理比较法的萌芽了。具备波尔京那样素养的人，应能说些更为严肃的东西。

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那时在我国已成为我国前进的可能方向和可能希望问题。这是在俄国知识界面前从未出现过的最重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523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25页。

要、最头痛的问题。但在波尔京的笔下，这个问题转变为我国的民族自尊心问题，这种自尊心受到在文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我们的外国人的优越姿态的侮辱，他们过去用——现在仍然继续用这种姿态来评论俄国。当然，民族自尊心并不是不正当的。一个对外国人的蔑视态度安然妥协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也是完全不想要存在的。诺维科夫和其他讽刺作家反对法国狂的言论，部分地就是由于受到外国人侮辱的俄国民族的完全合法尊严感的启发。丧失了这种尊严的民族是不足取的；但是，这种情感在寻找出路时，经常同其他情感交织在一起，并且按其性质的不同，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取得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心理意义。如果在我国讽刺作品里，对模仿外国的抨击，有时表现出保守的——如果不说是反动的——格调，那么，在波尔京那里，这种攻击却是有意识地、明目张胆地保守。

过于偏爱波尔京的克柳切夫斯基①，在波尔京那里除了找到历史比较法的萌芽，还找到了某种世界主义思想的特殊发展，似乎这种思想是上世纪俄国爱国主义辩证法的“颇为意外、颇为灵活的结果”②。这个结果说明，“个别民族，——俄国民族和其他民族——生活中出现的污点”，是由于人类本性的一般不完善，而功业和英勇则是俄国民族性的特质③。可是，不难看出，这一“辩证”结果，首先同波尔京的一般历史观点不符合。

列克勒尔克认为，我国政府各部门都证明我国的野蛮和愚昧，等等。对此，波尔京反驳说：

“不应将人类所共有的弊病和苦难加于一个民族。请翻阅所

① 毋庸怀疑，克柳切夫斯基从波尔京那里抄袭了某些个别历史思想——例如，所谓俄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不同，在于它较少戏剧性情节，等等。可是，这里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地方。

② 《随笔和演词》，第186，187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有王朝，所有共和国的原始年代的历史罢，那时就可看到，他们在一切习惯、行为和活动上，都是相仿佛的。可以列举数以千计的例子来证明，在一切地方，人类无论过去和现在，除了构成他们性格特点的某些轻微特征之外，都是彼此类同的。”①

接着，他举出了一些足以证实这一一般原理的历史事例。但后来又说，古代罗斯人的行为，完全不是象古代法国人这样野蛮和灭绝人性②。应该想到，俄国行为的这种相对平和，便是我国民族特性的“微弱特征”了。试问这种特征是在什么影响之下形成的呢？是在气候影响还是在什么其他“次要原因”影响之下形成的吗？波尔京对于这种问题的科学合法性，甚至没有料到。

不仅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主要是由气候决定的。但气候各有不同。因此，各民族的特性怎样也不能千篇一律。这一点早为古代作家所熟知，现代欧洲的某些作家，便是从他们那里抄袭了所谓气候影响决定论的。他们急切地指出，希腊人在他们的气候的影响下，爱好自由；而东方民族则对自由漠不关心。波尔京自己在引录维特鲁威的著作时，也力图向我们解释，各种不同的气候影响怎样造成各种不同民族在“精神力量”上的最重要差别。这样，人类又怎能在一切方面“彼此类同”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矛盾，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者只顾追求其辩护性目的，而忘记了他自己提出的原理：气候特点对于各个民族的特性和历史命运具有决定作用。

IX

不过，还应说明一点：就令不保持确定的历史观点，也可以追求辩护性目的。如果不背起沉重的理论包袱，甚至可以更方便

①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地参加文艺征讨。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法国神甫夏普[①]的争论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克柳切夫斯基说，虽然对于她的聪明，谁也不曾否认——除了她的丈夫，因为他在这方面是无判断能力的——但她的聪明无论从深度或从亮度说，都无惊人之处[②]。才学高深的史学家完全可以说得更尖刻些：叶卡捷琳娜的思想虽很活跃，但却异常肤浅。每当她不小心接触到理论问题时，她总是无可奈何地陷进概念的混乱，其实运用这些概念，并不怎样困难。试一回忆她的那个臭名远扬的«敕令»(«根本法»)第6章罢：

我们从她这个«敕令»知道，主宰着人类的有许多“东西”：信仰、气候、由政府创制的规章、法律、往事的先例、道德、习惯等等都是。但如我们想了解：在这些“东西”之间有无因果联系，例如气候对道德、习惯有无决定性影响(波尔京是坚信这点的)等等，那我们就会听到一些真正奇谈怪论。

叶卡捷琳娜说：“自然和气候几乎是统治着所有野蛮民族；习惯统治着中国人；法律折磨着日本；道德风尚一度安排古希腊自由人的生活；当局创制的规章和古代道德风尚曾经统治罗马”。在这一团稀泥里，看不到对历史发展过程提出任何严谨观点的企图。本来，叶卡捷琳娜并不感到需要这种观点。她极端任性地对待所有这些“东西”，将它们混作毫无秩序的一团。有时，她似乎对气候决定论发出嘲笑。例如，对于神甫夏普所说俄国人的神经汁粗糙以及这一生理现象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果等等拙劣议论，她曾用完全恰当的幽默语调作出结论说，“看来，俄国人的缺乏天才，乃是土壤

① «对于神甫夏普先生所著〈1761年奉王命前往西伯利亚旅行记〉这部印刷精致的坏书的消毒剂或批判»。该书记述俄国人的风俗习惯和这个大国的现状。(王家科学院，巴黎1763年版)。叶卡捷琳娜的这一著作的前两部分于1770年出版，已故巴尔捷涅夫在«十八世纪»第4卷中加以重印(莫斯科，1890年)。

② «随笔和演词»，第324页。

和气候的结果啊"①。但在《敕令》的第一章里，在关于俄国是否"欧洲大国"这个重要问题上，她却又求助于气候论了。叶卡捷琳娜断言，俄国是"欧洲大国"，并用下述方式证明她的意见："彼得大帝实行的变革所以易于取得成就，是因为当时的道德风尚同气候完全不相适合，这些道德风尚是由于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由于对外国地区的征服而被带进我国的。彼得大帝在引进欧洲民族的欧洲习惯和道德风尚时，发现了他自己也不曾料到的便利。"

这里的结论是：彼得改革的成就是由于气候的作用。不要以为，叶卡捷琳娜真正愿意考虑地理环境对于各族人民历史发展的影响。她满足于当时的一些流行观点，认为这种发展，主要地——如果不说唯一地——是由于女皇的活动。在她所写的《关于俄国史的札记》里，有些段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她在那里写道："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语言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才智和勤奋而增进和扩充的。君主通情达理，致力于争得本国人民和语言的光荣，这个民族的语言便会繁荣。由于相反的原因，许多民族语言业已湮没无闻"。这就是说，甚至语言的历史也要用君主的活动来解释。很难说，叶卡捷琳娜是否真正相信立法权力是这样万能。她对农奴制的极端慎重态度，以及她坚决不愿制订不利于贵族的法律，都证明在实践上，她从来没有忘记她的权力的实际界限。但在理论上，由于她对理论思维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很少这样的爱好，所以易于忘记这种界限。当然，她要使用一切力量来说服俄国人，要他们相信他们的"福祉"完全掌握在女皇的手中。为求达到这一目的，她不惜用一切方法来强奸一切理论。

她在给莫尔德维诺夫的一封信中写道："经我同意和批准编写的历史或历史札记，除了歌颂国家，充作后代竞取的目标和借镜

---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445页。

外，别无其他目的。任何其他不大辉煌的方向，都会是有害的"①。

这封信是在《消毒剂》一书问世以后20年写的。但是，当叶卡捷琳娜对神甫夏普进行文学征讨时，这种对"辉煌的方向"的最强烈的追求，无论在历史或政论方面，就已经是她的特点了。在那时和在其后，由她看来，"歌颂国家"是和歌颂女皇相一致的。神甫的主要错误，在于他对女皇叶卡捷琳娜所统治的国家，未加赞许。神甫的这个错误应由《消毒剂》一书来改正。

叶卡捷琳娜甚至过分热心地抓了这件事。

神甫夏普在描写下戈罗德时说，这个城市也象俄国的所有城市一样，是用木材建筑的。叶卡捷琳娜认为必须用下列报导对这一描写进行批评：

"这一城市于1767年被烧毁，后来按照正确的计划，用砖石改建。所有在女皇叶卡捷琳娜朝代遭受这种灾难的城市，都是这样。例如，特维尔已用30万卢布建成。"②

这一报导的不真实是很难逃过俄国读者的注意的。但是忿怒的"伏尔泰女弟子"太不谨慎了。她认为应该和可以感到奇怪的是"有些献媚的人竟然建议彼得三世宣布贵族是自由的，仿佛贵族并不总是自由的一样"。如果相信这位历史中光彩方向的光彩女代表，则我国贵族以前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军职的，只不过彼得一世在纳尔瓦战役之后才看出不能不限制——显然只是暂时地——贵族的这一自由③。完全可能，叶卡捷琳娜那时已充分了解莫斯科国家内部生活的历史，从而知道她的大胆的论断是多么不符实际。但是……"任何其他不大辉煌的方向，都会是有害的"哟！

叶卡捷琳娜很了解俄国农民的极端艰难情况。她不只一次让

---

① 1790年10月4日信。

② 《十八世纪》，第4卷，第241页。

③ 同上书，第315页。

她的近臣知道这一点。然而如果她在很了解这一情况之后，竟然颁发了一些加重这一情况的指令，则不言自明，她在需要反驳傲慢不恭的外国人时，是不能尊重真理的要求的。她写道："普通俄国人的状况不仅不比许多外国为坏，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还要好些。人民应付的小额捐税较少，而且大都知道要付些什么：在义务上没有自由，但只要付清了，便可完全自由行动了。"①

由于波尔京很可能看过《消毒剂》一书，所以这位有学识的少将关于俄国农民的愉快认识来自何处，便很显然了。完全可能，方-维津也浏览过叶卡捷琳娜的论争著作。如果事实上确是如此，则他对俄国劳动人民比西方各国工人阶级生活得好些的欢快信念，也是从这里来的。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叶卡捷琳娜文学生涯的"辉煌方向"对于我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贵族的思想代表，都欢喜这个方向。

叶卡捷琳娜不了解为什么夏普在谈到俄国时，"嘴里经常发出奴隶一词"。她以为唯一的解释是他的恶意，"总想用些最能贬低事物的词句"②。如果恶意不使法国神甫陷入迷途，那么，他就应该理解，不仅俄国农民，而且一般地，任何俄国小市民，也都在事实上比西欧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消毒剂》的作者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他相信"假如我们将每一个人的情况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样情况相比，那就不难证明，在俄国，公民（原文如此！）所受压迫最小，所付小额压榨最少；所负担的义务都很明确，而且他们所做的是近乎愿意（！）的事；政府只是对违法行为实行惩处；这些法律尽管为数很多，而且在某些场合里相互矛盾，但远远未到其他国家那种法令如毛的程度。……不难证明，我国法律，不管怎样，也是欧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328页。

② 同上书，第427页。

洲最简单，而且大都是最明确，最合理的法律。”①

出席法典委员会的代表们，对于他们的选民的福利远远不是这样有信心。他们羡慕西欧“幸福”居民的权利和优越地位。可是他们的怨言达不到神甫夏普，也不能成为他反对《消毒剂》作者的武器啊！《消毒剂》作者知道，外国人不了解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细节，因而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

伶俐泼辣的叶卡捷琳娜没有放过转入进攻的机会。她很知道当时西方国家政体的弱点，坚决断定西方的生活比俄国坏。可以说她比所有斯塔罗杜姆之流，更早地使用了克柳切夫斯基称之为历史比较法萌芽的论争方式。

她答复法国人夏普说：“你们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的确，你们不充军到西伯利亚，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地方；你们的加拿大被英国人夺去了，在红衣主教里舍尔时期，你们就丧失了它。但波尔多地区和奥隆沙漠难道不是你们的放逐处所？至于非常委员会，巴士底监狱，夏托一特罗姆佩特以及类似的地方，神甫先生，你都喜欢吗？据说，由于一种方便的发明，即用表格方式签署的 lettre de Cachet（密旨），这些地方总是填得满满的，这当然是对公民的充分保障啰；再小的阴谋，只要你有敌人，就可使整个家庭的幸福遭到浩劫”②。这些语句，对于明理和公正的俄国读者，是会造成其作者所难以预料的印象的。即令读者相信，法国真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们的，那他还是会问问自己：这又有什么可喜的呢？难道俄国“公民”由于当局的专横而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其处境要比那些在波尔多受苦受难的专制政权的牺牲者好些？难道那些关在俄国城堡牢狱中的人们，要比关在巴士底监狱里的犯人的日子好过些？但是要使《消毒剂》的读者在头脑中产生这些问题，他们必须具有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328—329页。

② 同上书，第297页。

公正的情操，然而这种情操却不是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代表所常有的。社会生活给社会思想盖上了自己的烙印。农奴制在俄国国内关系中的统治，迫使那些利于维持这个制度的人们，从那些实际上毫无可供慰藉的见解里，找到慰藉。叶卡捷琳娜是深知人类的弱点的，当她采用那个多少有些冒险的历史比较法时，当然要有意识地寄希望于这一情况。

在《消毒剂》里最使人吃惊的，是它的作者的天真的、同时又是无边无际的自吹自擂。叶卡捷琳娜在驳斥夏普所说在俄国没有人敢于思想，专制制度在那里扼杀了聪明才智和一切感情时写道：

"我国政府远远没有压制聪明才智和一切情感，而只是从事于鼓励和奖掖聪明才智，赞助一切忠诚和有益于社会的情感。当俄国人很快就要亲眼看到一部受到一切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情感的驱使，又为女皇所亲手签署的著作——我所指的是为制订新法典而颁布的《敕令》——问世时，他们怎能不有所思考呢？"①

另一地方，在谈到《敕令》所依据的原则时，叶卡捷琳娜热情地颂扬了叶卡捷琳娜。她说："这些原则引起欧洲、特别是有理智的人们的震惊，可惜，这样人的数目，在世界上不是很多。"②

她可以补充说，这些引起欧洲震惊的原则，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剽窃"得来的，而她自己则从来无意将其贯彻到俄国生活中去。当然，对这一点她没有补充。

由于对理论的疏忽大意和不拘泥于确定的历史观点，叶卡捷琳娜可以随心所欲地反复宣称：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人。她欣然重复了这一般论点。但是在欣然重复这一论点时，她又认为为俄国民族性唱颂歌是有好处的。

《学术侍从》觉得，彼得前的罗斯是迷信、愚笨、无知和停滞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449页。

② 同上书，第239页。

的黑暗王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除对彼得时代的最强烈理想化外，在我国著述界产生了一种趋向，想将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对莫斯科旧事物的严峻判决，予以复查。我们在诺维科夫那里已经见过这种趋向。现在指出，这个趋向在«消毒剂»里获得了最强烈的表现，它的作者极为欣然地重复着：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人。

她在这里同她的"老师"伏尔泰完全决裂，对于夏普所说俄国在彼得登极以前都是处于愚昧无知之中，坚决予以反驳。她写道："我们以前说过，现在仍然要重复，在彼得朝代之前，我们同所有欧洲国家，也许除意大利外，都是并驾齐驱，步伐相同的。只是在这位皇帝死后的混乱时期，才推迟了我国的发展。"①

旧罗斯——混乱时期以前的罗斯——在教育上不比西方国家差，而在道德风尚上却把它们远远抛在后面。«消毒剂»的作者在这里写了一首真正的田园诗。

"离婚几乎是未见的事。子女对父母表现了极大的尊敬。"最使叶卡捷琳娜宽慰的是，仿佛在所有契约的后面都注明：违背自己诺言的一方，是可耻的。

她兴高彩烈地说："这样，羞耻当时是人们对自己的最大约束。我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其道德风尚提出象这个公式那样有说服力的有利证据。这个公式只是在人们不再象以前那样生活，而道德风尚也不再是那么简单时，才被放弃。显然，这个变化可能发生在混乱时期，混乱震荡了伊凡·瓦西利耶维奇皇帝以后的国家和家庭；在此以前，道德风尚都是很单纯的。"

在一个存在着严酷的刑事处分的国家里，却有这种非常优良的道德风尚，这会显得费解。但叶卡捷琳娜总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424—425页。参阅第289页。——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时承认："彼得把自己的国家向外国人开放……。他愿望他的臣民出国旅行……迫使他们自己花钱在欧洲所有国家学习"，——简言之，愿望他们启迪俄国。

他要人相信，肉刑用的树枝和鞭笞是从罗马传到我国的；总地说，"所有这些可怕的东西，很不幸，都是我们从其他民族那里因袭的。"从这里完全自然地产生一种助长我国民族自尊心的结论，即不是俄国应该仿效西方民族，而是西方民族应该仿效俄国。叶卡捷琳娜建议："让这些西方民族，如果他们有理性的话，以我们为榜样，根据女皇叶卡捷琳娜制定的《敕令》第十章改造他们的刑事法院罢；这个《敕令》在巴黎和伊斯坦布尔是受到取缔的"①。

这样，彼得向西方学习，而叶卡捷琳娜则教育西方。

在我国19世纪的著作界，对旧俄生活的理想化有时是由于先进作家想为其民主纲领提供历史根据。因此，——我顺便指出，——封地市民会议时代的罗斯，比莫斯科大公和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在当时更加受到理想化。不言自明，叶卡捷琳娜怎样也不会向往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自由"，她对它既无好感，也无恶意。她甚至认为吕里克大公是一个没有丧失某种"开明"倾向的专制君主。驱使她把旧的俄国道德风尚理想化的，并不是什么民主的热潮。她的理想化的用意是为了歌颂俄国生活的那些导致俄国君主无限权力的形成和巩固的方面。叶卡捷琳娜写道："在欧洲没有哪国人民能比俄国人民更喜爱自己的国王，更依恋自己的君主。"② 当然，整个文明世界都知道，俄国在18世纪过程中经历过多少次宫廷政变。这些政变使外国人对俄国人如何依恋君主，发生怀疑。但叶卡捷琳娜对此却不感到难为情。她写道：

"对此，我想说一件使许多人惊异的事情，即俄国除了在民族感到陷于衰败时，从未发生革命。我们的一些朝代是严酷的，但我们艰难渡过的只是那些衰败的朝代。我们的政体，按其类型，是需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291页。我上面已经讲过，《敕令》是怎样在俄国也受到取缔的，叶卡捷琳娜事前不是不知道，也许就是由她发动的。

② 同上书，第301页。

要毅力的；如果没有毅力，则不满会普遍存在，因此，如果事情不好转，就会发生革命。”①

这就是说，由于俄国人民对君主的喜爱为欧洲所仅见，只要给“我国政体”以更多的毅力，就可保证不发生革命意图。叶卡捷琳娜是不缺少毅力的。她更善于为自己罗致有毅力的助手。因此，她只要对俄国人民的性格大加颂扬，并以从事这种性格的理想化为深谋远虑的国家事业，就万事大吉了。总之，我们的“女皇政论家”在按保守的方向热心实行这一理想化方面，是超过了所有与她同代的俄国作家的。

毋须说明，这种理想化，同叶卡捷琳娜驳斥丑化俄国制度的外国人的全部言论一样，对于俄国怎样能够和怎样应该对待西方的问题，是没有提出任何严肃、有效的答案的。

X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从她的个人利益的观点来考虑俄国对西方——因而也是对彼得改革的态度问题的。这就是说，当她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时，她不是以理论的指示，而是以实际利害的见解为指导的。按照她的意见，她所写的都是对巩固她的权力、扩大她的光荣一向有益的东西。波尔京的观点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等级的观点。因此，他的眼界要广阔得多。在这种眼界的范围内，局部地也有郑重考虑理论要求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贵族等级的利己主义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地方，他就不顾这些要求了。当等级利己主义的需要与理论的要求相抵触时，波尔京便从学者一变而为“辩护士”。

这是无可避免的。过去和现在，这一现象都反复出现在屈从于等级（或阶级）利己主义影响的一切学者和政论家身上。俄国贵

① 《十八世纪》，第4卷，第299页。

族的思想代表不是这一一般规律的例外。我们知道，M·M·谢尔巴托夫公爵在法典委员会发言时，多么强烈地服从于贵族等级的利己主义需要。

18世纪下半期，谢尔巴托夫公爵堪称是俄国贵族等级的最优秀思想代表了。但是，他的贵族思想意识亦有其特殊的色调。波尔京在门阀与官吏的斗争中站在后者一面，而谢尔巴托夫在委员会里却热烈地保卫了门阀。

他在这一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决定了他对彼得改革的态度。

作为贵族的思想代表，他一般地不能同意改革对官宦等级不利的方面和不利的后果。这里他有时很接近波尔京。例如，在他的政治小说《瑞典贵族C先生在奥菲尔游记》里，他暗示彼得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是犯了错误。他用以支持他的这一意见的论点，几乎同我们在波尔京那里所看到的完全一样。象波尔京一样，他也希望这一错误将在往后得到改正。但这不过是一种次要的细节。下面才是具有首要意义的特点：

谢尔巴托夫虽也承认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赞同彼得建立了"有秩序的管理制度，促进了科学及军事艺术的认识"，但对改革的急进性，其难受却不亚于波尔京。这是可以从他对彼得反对笃信上帝的丑恶表现的斗争的出色评价中，看得出来的。

请注意，精通当时西方先进著作的谢尔巴托夫，按其宗教观点，是自然神论者，而全然不是东正教的基督徒。过分相信宗教，在他看来，是一种能够带来极端有害后果的现象。例如，他把深入俄国王公心中的"过度笃信上帝的精神"，看为造成鞑靼人征服俄国的条件之一。他写道："由于屈从这种精神，王公们便会陷入迷信（原文如此！）和信鬼神，不再关心所谓尘世的和不能永存的一切，而只顾企求永恒的生命"。僧侣和一般宗教界人士用一切力量支持世俗当局的这种情绪而"钻进社会管理机关，他们到处排除了

坚定慷慨的德行，而代之以僧侣精神"①。

如果在18世纪，"信鬼神"能给俄国带来这样可怕的危害，那就可以假定，我们的开明公爵会把取缔它看为俄国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了。然而谢尔巴托夫却并不同意彼得在这方面的措施。的确，他欣赏彼得对于"没有必要搞出的奇迹"，"斋戒期间不敢吃荤的迷信"，"未经证明的形象"等等，并未赏识，但他觉得沙皇改革家过早地实行了反对迷信的斗争。

谢尔巴托夫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对俄国道德风尚的危害》中问道："他是在什么时候搞这一斗争的呢？是在人民尚未经受教化的时候搞的；这样，由于在未经教化的人民中取缔了迷信，他就取消了他们对神圣法律的信仰"②。谢尔巴托夫将彼得的这种行为比作园丁不适时地剪去树枝。不适时地剪除树枝，是要削弱树的成长的。谢尔巴托夫继续说道："这样，废除迷信，给信仰的最根本部分带来危害；对地狱的奴隶式畏惧是消失了，但对上帝和对神圣法律的爱也一同消失了；至于一时由信仰造成的道德风尚，由于缺乏其他教化，便因丧失了这一支柱而趋于沦落"。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斯塔罗杜姆思想的另一说法，按照这个思想，现时的智者由于铲除成见，也就从根本上离开了德行。我们已经知道，波尔京也是同意这一思想的。根据一切迹象，可以看出，这个思想在当时的贵族思想代表中是极为流行的。他们不能不认识，他们这个等级的越来越扩大和巩固的特权，同先进国家的"现代智者"所争取的目标，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因此，他们在阅读"现代智者"的著作，甚至部分地为这些著作所吸引时，也都反对其中的实际要求，宣布这些要求有害于德行。在俄国贵族思想家的这种情绪之下，他们不能不害怕彼得的某些——并不是全部——

① 《俄国古代史——谢尔巴托夫公爵著》，第2卷，第574—575页。

② 《俄国旧闻》，1870年，第2卷，第3版，第25页。

改革方法所特具的急进性。他们所欣赏的一句谚语是：欲速则不达（Тише едешь, 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①。

如果谢尔巴托尔赞赏这一谚语不亚于波尔京，如果他对彼得改革的任务和过程的一般见解，是由与他同代的贵族的利益决定的，那么，作为这一等级的世袭门阀部分的思想代表，对于改革中一些未为反对门阀的贵族所注意，甚至为他们所赞同的方面，也都表示谴责。

他在法典委员会里就已证明，名门贵族是在良好的道德气氛中受教育的，只有这种气氛才能养成青年人的高贵自尊心和对祖国的无私服务。如果不美化旧贵族的道德风尚，是不可能抱有这种意见的。不仅如此。俄国的历史过程越来越使门阀给官僚让路。因此，门阀的思想代表自然要产生把过去理想化的倾向。然而彼得改革是不怜惜过去的。所以，门阀的思想代表就会承认改革的历史必要性，也对它比官吏的思想代表有更大的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谢尔巴托夫甚至把旧事物理想化时，也在我们面前表现为身受法国启蒙著作影响的作家。启蒙著作往往对原始民族的生活，极端美化。谢尔巴托夫也是这样看待原始民族的生活的。他关于这些民族说："他们的法律无论好坏，他们都是严格遵守的；他们的义务是神圣的，几乎没有听说有人背叛自己的妻室或亲属；他们无比坚定。他们以毫无畏惧，视死如归为光荣"。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农奴制的门阀辩护士，竟然认为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及由于这一制度而决定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是原始社会的优点之一。他继续说："他们（即原始人民——著者）

① 站在道德风尚和法律相互作用的观点上，他们都认为道德风尚比法律具有更大意义。然而他们的这一意向也与其说是由于理论的见解，不如说是由于实际的顾虑。他们反复说：plus boni mores valent quant bonae leges（害怕政府对于改善农民生活过于热心）。

的慷慨是值得称颂的，因为社会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一切，都在社会里平均分配，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看到野蛮流浪的未开化的人民掠夺他们同胞的劳动果实，使自己的境况优于别人”。

谢尔巴托夫既然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抱有这种观点，但他又主张向“彼得大帝朝代以前的俄国道德风尚情况”过渡，这就使人感到有些奇怪了。对于彼得前的道德风尚无论谁是怎样想法，很显然的是，它们同原始的道德风尚是很少共同之处的。但谢尔巴托夫以为旧的莫斯科生活所以同原始民族的幸福生活相仿佛，是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没有“追求享受”的行为，而他觉得追求享受是败坏俄国道德风尚的主要原因。

在旧莫斯科由于没有追求享受的行为，所以“几乎每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境况，没有匮乏地用自己的收入来生活，都能备有必需的一切，而不追求更高的欲望的东西，因为更好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青年人受到畏惧上帝，顺从父母，尊敬本氏族老人等等教育。谢尔巴托夫愉快地描述青年人每逢假日早晨都来到长辈亲戚那里致敬，“象亲属和自己人那样照顾老年人”。他尤其津津有味地列举彼得前俄国达官显贵的“高贵自尊心的特征”。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最自专的君主也不得不尊重这种自尊心，不得不尊重旧习惯，“不仅对贵族的请求表示迁就，而且尊重高贵的门阀，超过别人”。

XI

彼得改革（谢尔巴托夫说它是必要的，但也许是多余的变革），破坏了俄国习俗，使“追求享受”进入俄国人的心灵，导致旧世系的衰落，产生了对财富的普遍追求。为了供应无限度的开支，贵族开始巴结君主和显贵。“粗野不文明的行为由于道德风尚的影响是减少了，但代之而来的是阿谀和自私；是谄媚逢迎，玩忽真理，诽谤君主和其他恶行，这种恶行现在（1788年——著者）遍及宫廷及达

官显贵之家牢不可破”。①

按照谢尔巴托夫的意见，这一切就是彼得所实行的虽属“必要，但也许是多余的”改革的后果。他认为这些后果都是不足取的。因此，有时人们也称他为斯拉夫派的先行者。但是他的观点并不比波尔京的观点更与斯拉夫派的观点相似。使他和《列克勒尔克注释》一书作者同斯拉夫派相接近的，只是那种保守情绪，也许还有某些预期在未来才能实现的事情，如迁移首都，——斯拉夫派说：首都应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

就其思想方式——当然不是就其实际意图——而言，谢尔巴托夫又同波尔京一样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生。但波尔京试图在分析历史发展过程时使用科学的观点，吸收了某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宇宙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之一，而谢尔巴托夫则保持了历史唯心主义。

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最深刻原因在于人们的观点及其道德风尚的改变。他在谈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当这个社会引起他的注意时，——保持了这个观点，在评价彼得改革时也是站在这个观点上。

就这点说，他又同波尔京相接近。波尔京未能制订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结果只是停留在法律与道德风尚相互作用的概念上，并认为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道德风尚比法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最后，谢尔巴托夫与波尔京相似，还在于他想把旧的俄国道德风尚理想化。就令不谈理想化的程度，谢尔巴托夫的心理动机，也同波尔京并无二致。

谢尔巴托夫在描述俄国道德风尚遭受破坏时，深切惋惜世袭名门贵族丧失了他们旧日的高贵自尊心。波尔京虽亦极为珍视贵族的称号，却对此并未表示惋惜。波尔京是官级制的拥护者和门

① 《俄国旧闻》，第2卷，第20页。

阀的敌人，他对贵族的自尊心有不同的看法。在他关于这种自尊心的观念里，没有谢尔巴托夫显著强调的那种对政权保持独立性的因素。当然，谢尔巴托夫的这种独立感，也不是没有限度的①。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的门阀思想家毕竟在这方面与官级思想家大不相同。

说俄国道德风尚是在追求享受的影响之下遭到破坏的，这就等于说，它们是由于变坏了而遭到破坏。某一社会的"追求享受"，是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尔巴托夫断言，"因果的科学是给理性带来最大满足的科学"，他大概感到他在说明俄国道德风尚遭受破坏的过程时，过于含混地规定了这一过程的原因。象他的那些同时代人未能超越道德风尚和法律相互作用这一概念一样，他在未能利用"道德风尚"来解决问题之后，立即求助于政府的立法活动。他从这种活动里找到了贵族道德败坏的两个原因。就中第一个原因，在彼得改革前的时代里，即已开始发生作用。

谢尔巴托夫说："按门第决定官阶制度的破坏（其实这既有害于为国家服务，也不利于非任何权利所能代替的名门世系），在贵族中消灭了高贵自尊心，因为从此受到尊敬的不是门第，而是官级、服务和功绩。而由于每人都在争官夺位，而不是任何人都能作出直接的功绩，所以因缺乏功绩而不择手段地阿谀逢迎国王和显贵的现象，比比皆是。"②

贵族自尊心消失的另一原因，同彼得的改革活动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他往往迫使贵族同他们的奴隶一道服兵役。当过去的

① 这种独立感不曾妨碍这位公爵最尊敬地请求叶卡捷琳娜由国库清偿他的债务。他在向女皇提出这一申请的信里，把她称为"集伟大君主品质和伟大哲学家品质于一身的女皇"（参阅 B.A. 米亚科京（B.A. Мякотин）论文集第2版，第110页，《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政论家》一文。）但在《论道德败坏》一文中，他却对同一女皇极端丑化。不错，论文是在1788—1789年中写的，而信则是在1773年写的。但谢尔巴托夫关于贵族等级丧失高贵自尊心的惋惜之词在立法委员会里就已经发表过了。

② 《俄国旧闻》，第2卷，第24页。在法典委员会里，谢尔巴托夫便谈到这个问题。

奴隶服务到担任官职时，他们时常成为自己的主人的长官，并对他们使用笞刑。此外，名门青年在参军进入士兵行列之后，长期脱离他们的亲属。谢尔巴托夫抱怨说："贵族世系因服兵役而分散，这是他们这类人从未见过的事情。"①

这一情况给高贵的贵族自尊心以致命的打击。我们的作者问道："那些从幼年即已战栗于长官鞭笞之下，除服役外别无他途可以争得尊敬的人们，他们得不到他们同类人的支持，没有联合和保护，孤零零地陷于强者之手，又怎能保持德行呢？"

不能不承认，谢尔巴托夫所指出的这两个原因，使他所描述的道德败坏过程更易为人所理解。原来道德败坏是名门世系无权的结果；不过还有一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弄明白：那种使名门世系丧失其全部重要性的社会力量对比，是怎样在俄国形成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谢尔巴托夫必须摆脱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的限制，去发现那些既决定各种作用于法律的道德风尚，又决定各种影响于道德风尚的法律的更深刻的原因。然而不仅是他，就是当时比他深刻得多的作家，也都没有能作到这一点。他只限于将道德风尚与法律相互比较，作为两个平行的原因，两者之间没有共同的根源。我们在他那里读到："我说过，追求享受和奢侈，能够在人们的心灵里发生这种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来自制度本身的原因，它们根除了坚定意志和良好道德风尚。"

我们不向谢尔巴托夫要求他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只是指出，何以他对根除了坚定意志和良好道德风尚的种种制度的回顾，在这里不曾追溯到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前。在另一地方，他认为贵族道德风尚的败坏发生在更久远的时代，即发生在伊凡雷帝时代。

这位沙皇对最显贵的大贵族的不信任，使他们不能为祖国服

① 《俄国旧闻》，第2卷，第24页。

务，谢尔巴托夫说："因为他不仅到处重视鞑靼王子超过自己的俄国公爵和大贵族(他们的祖先服役几百年)，甚至对于那些很难称为人类的西伯利亚的爵爷们，也重视超过对于自己的公爵和大贵族。贵族的心情沮丧了；适当的高贵自尊心被消灭了，对祖国的爱熄灭了；代之而来的是卑贱，奴颜婢膝，唯私利是图。"①

既然这样，则我国道德风尚的败坏，是在彼得改革以前很久就发生的了。同样显然的是，在对名门世系的态度上，彼得是忠于莫斯科国家的历史传统的；他的改革活动所以未能满足谢尔巴托夫，主要就是由于这一原因。门阀的思想代表是不能有别的看法的。如果说他是斯拉夫派的先驱，那无论如何也不是 19 世纪莫斯科的斯拉夫派的先驱②。

总结本章到此所说，必须承认，对于俄国是否乐于欧化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一致作了肯定的答复。但卢梭不在内，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启蒙思想家。

至于俄国能否完全吸收西欧文明，则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不是完全确定的。他们当中某些人看出了俄国社会制度同先进欧洲国家社会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虽是极为有理有据地认定第三等级是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但又怀疑俄国启蒙事业的前途，因为俄国这一等级发展得很脆弱，或如他们所感到，完全缺乏这一等级。

对于这两个问题，当时的俄国作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当中某些人深信俄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可以选择任何«体制»。另外一些人由于考虑到俄国"道德风尚"的某些特点，由于认为道

---

① «俄国史»，第 5 卷，第 3 篇，第 223 页。

② 参阅叶舍夫斯基的论文：«论俄国道德风尚的败坏(已出版的谢尔巴托夫公爵论文集)»«文哲学院»(«Атеней»)杂志*，1858 年，第 3 期。

* Атеней 古罗马最高学府，亚得里安皇帝(117—138 年)朝所建立，教授哲学、修辞、文法和法律。——校者

德风尚是社会发展的最稳定因素，则对此表示怀疑。至于俄国应否吸收西欧文化问题，他们的答复虽然是肯定的，但也附有重大保留。十分清楚，他们作出这种保留是由于受了等级利己主义的驱使：他们正确地感到，完全吸收西欧文化，对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等级的特权，是有危险的。

XII

任何特定的等级(阶级)，其思想方式总是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于在这个等级的内部从来没有完全的利益一致。我们已经看到，我国门阀的思想家同官级的思想家便有分歧。但在等级思想方式的范围内，甚至由于年龄也可以产生颇为重大的差异：《父与子》之间的意见分歧，就是一个颇为常见的历史现象。

缺乏经验的青年人几乎经常比饱经世故的老年人对抽象观念表现了更大的爱好。这并不是说，属于最高等级的青年人不珍视他们的等级特权。极为常见的是，特定等级的青年成员珍视其等级特权，并不亚于老年。只是他们对于特权想得较少，因为他们一般是更多地抽象想象。这是从卡拉姆津(1766—1820)的例子中看得再明显不过了。

他在《俄国旅行家书简》中说："所有关于俄国性格改变，关于俄国道德面貌丧失的可怜哭诉，或者不过是戏言，或者是由于缺乏深思。我们同留着大胡须的祖先不一样：这更好吆！外表和内心的愚笨、无知、游手好闲、烦闷，这是他们应有的命运；而在我们面前，则展开着增进理智，取得高贵精神享受的一切途径。所有的民族特性在人类特性面前都化为乌有。主要的事情是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斯拉夫人。对人类良好的东西，对俄国人也不会坏。英国人或德国人为人类作出的有用、有益的发明，也都是我的，因为我

是人!”

可能以为，这些话是对谢尔巴托夫关于俄国道德风尚在“需要、但也许是多余的”彼得改革影响下遭受破坏的哭诉的答复。23岁的卡拉姆津把这种哭诉称为可怜的哭诉，断然反对当时在俄国人关于彼得改革讨论中渗入的民族主义因素。我国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派可能极为赞赏这一尖刻的议论。他们当然会在“英国人或德国人对人类作出的有用有益的发明，也都是我的，因为我是人”等语句下签字。

只有别林斯基，作为他们当中最精通我国文学史的人，也许会对“人类”这个概念，抱有某种怀疑。他是对的。

我所引录的这些片段，是卡拉姆津1790年5月在巴黎为答复法国的俄国史学家列维克而写的。按照列维克的意见，不能称彼得为天才，因为他虽然想启迪俄国，但只会模仿其他民族等等。就其本身而言，这个意见不算恰当。但是只要对它略加深思，便可看到，这位法国史学家对彼得改革的观点的深刻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俄国民族的态度的人道精神，远远超过了俄国旅行家。

列维克从责备彼得的模仿性开始，更进而责备彼得没有充分模仿其他民族。列维克说:“为了迫使俄国人模仿其他民族，那就必须将他们摆在与其他民族相等的条件下。为此必须给他们以自由。当俄国人取得了自由的时候，他们便会在工业方面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们。大权在握的彼得，是能够迫使贵族解放农民的”。但他没有作到这一点。彼得更加重了对俄国人的奴役。彼得一方面要求“他们模仿自由的人们，而当他希望他们在发展科学和艺术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时，却束缚了他们”①。这就是为什么他所愿望于俄国的成就，没有能够达到的原故。列维克

① 列维克全集:《俄国史，原始记事、真实地名和最优秀自然史家长编》，第9卷，巴黎，第531页及542页。

出色地写道："他的过于广阔的权力范围，妨碍他的愿望的实行，他可以利用奴隶的手来建造船舶，但不能使奴隶获得外国资本家的信任"。为了证明这一点，列维克举出了俄国商人索洛维约夫的例子。"这个商人被彼得派往荷兰经办商务，他在那里发了财，并且获得了荷兰商人的信任。但后来由于拒绝给彼得宫廷某些官员以贿赂，他们在皇帝面前诬陷他，遂被立即召回俄国。他的荷兰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受到重大损害，而俄国同荷兰刚刚开始的商务关系，亦告停歇。"①

列维克关于彼得一方面想启迪俄国人，同时又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障碍，妨碍他们的自然才能的发展，——这个思想是完全为卡拉姆津所不能理解的。他断言"各国人民的教育和启蒙道路，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一个跟着另一个走"，而完全忽视了各国人民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走上这一道路的。在他那里，整个问题就是衣服和胡须问题。他说："彼得大帝要我们穿德国式服装，因为这方便些；又把我们的胡子剃掉，因为这样舒适些。长衣不灵便，妨碍走路……等等。他似乎没有读过列维克的议论：即彼得从俄国人身上脱下长袍后，给他们戴上了新的锁链。

列维克的另一条使我们的旅行家大为震惊的意见是：没有彼得，俄国人也会在启蒙的道路上迈出根据彼得指示所迈出的步伐。卡拉姆金讥讽地铨释这一意见说："这就是说，即令彼得没有教诲我们，我们也能学会的！怎样学呢？自己学吗？可是国王曾经耗费多少精力来克服我们的顽固愚昧哟！可见，俄国人是不愿意，无决心接受教育的。"

如果列维克承认俄国人是不愿意，也无决心接受教育的，那他就自陷于可笑的矛盾，因为他断言俄国人就令没有彼得也能过得

① 列维克全集：《俄国史，原始记事、真实地名和最优秀自然史家长编》，第9卷，巴黎，第543页。

去。然而问题就在于他完全不是这样想的。他表示反对卢梭，因为卢梭说俄国无意吸收文明。他在指出彼得的改革创举立即得到有才能的俄国人士的活动的支持时，说过：历史学者和政论家虽然乐于歌颂这位国王，但似乎又以诽谤俄国人民为乐。列维克假定，俄国人就令没有彼得，也能在启蒙方面取得同样的成就。这个假定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根据的，即在彼得改革开始以前，俄国已有强烈的启蒙愿望。当然，卡拉姆津可能认为这种信念是没有根据的。但无论如何，他应该对它加以考虑，并在反驳列维克时，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彼得改革开始前的俄国内部情况和社会需要。他没有这样作，而只是空洞地断定"如果按照事物的自然的，从容不迫的过程，就是两个世纪也很难作出我们的国王在30年内所作出的成就"。

个人活动与事物自然发展过程的对立，我们在以后各卷里还将不只一次看到。这种对立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的。事物的自然过程不排除个人的作用，而是相反，以这种作用为前提，是经过它来完成的。对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整个问题在于阐明哪些社会条件造成某一个人的活动，哪些条件促进和妨碍这种活动。但这种对立，人们曾长期认为不仅在理论上是容许的，而且是寓意深刻的。然而当我们看到，争论的双方都承认这一对立为合情合理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当中哪一方更接近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呢？

由于把人们的自觉活动看为他们的自由的，即无规律的活动，所以很明显，那些求助于事物自然发展过程的人们是更接近于社会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的。求助于事物自发过程，这本身就是对规律的模糊认识的表现。因此，不能不承认，卡拉姆津在反驳列维克时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比这位法国历史学者肤浅得多的思想家。

与方-维津，波尔京和谢尔巴托夫不同，年轻的卡拉姆津是无

条件地拥护启蒙运动的。但他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是极端抽象的。他在国外旅行回国数年后慨然写道："一定要脱离愚昧的阴影，经过疑难，期望和迷误的幽暗途径，达到灿烂的真理；我们将达到无限美好的境地，不顾一切阻碍，并在其芬芳的怀抱里，享受天堂的幸福"。但怎样达到呢？卡拉姆津对此未加说明。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不能通过对真理的敌人进行实际斗争而投入这仙境真理女神的怀抱。社会斗争仍旧是一种他完全不能理解的现象。他在侨居日内瓦时写的一封信（1790年1月23日）中写道：

"在这个小国里，发生了纷争。多么奇怪的人们！他们生活得既安宁又富裕，却还另有希求！"迁居巴黎后，由于那里发生了不可比拟地更尖锐的政治斗争，他在同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人们确信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需要德行的时候，那时，黄金时代就会到来，人们在一切政治体制下，都会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这种极端表面认识下，卡拉姆津会完全忽视他的俄国同代人的具体生活条件。但我们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未看到的东西，并不都对我们毫无所谓。卡拉姆津极为珍视（尽管是不自觉地）那些他由于极端肤浅的历史发展观点而未能分析的社会制度。当法国革命使他感到政治风暴有时会彻头彻尾改变一定社会制度时，他开始以一个完全自觉的保守派的身份表态。这时他写道："革命解释观点：我们看到，国家制度即令有些局部或偶然的缺点，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所有优秀有识之士都站在当局的旗帜之下，决心只是促进现行事物秩序的胜利，而不想标新立异。"

这些话的写作时代（1802年）超出本篇的范围。暂时我们所研究的只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卡拉姆津。在这里只要指出，卡拉姆津在反驳列维克时虽是无条件地赞扬了彼得改革，但是由于经

验的教训，他在《古代和近代俄国札记》里却对这一改革进行了辛辣的批评。这样，他便从无限美好的真理女神的膜拜者和西方启蒙运动的讴歌者一变而为斯塔罗杜姆，断然否定了他自己的旧信条：**对人类良好的东西，对俄国人不会坏**。

第十章　专制政体问题
——帕宁兄弟，谢尔巴托夫，克尼亚日宁，克列切托夫

I

波尔京引述先进法国作家，力图证明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俄国的沙皇制度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至于君主独裁制度，按照波尔京的说法，就在土耳其也不存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述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作家——伏尔泰的一种表达很不恰当的意见。现在很难确切说出，波尔京的这种论点，对18世纪大多数俄国读者造成怎样的印象。但法国先进作家虽对叶卡捷琳娜说过许多恭维话，然而一有机会，他们都毫不掩饰地表示，法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纵然有缺点，毕竟比存在于君主独裁俄国的制度要优越得多。我们已经知道，雷纳尔怎样尖刻地谴责这一制度。狄德罗天真地赞赏过那些"毫无作为"的国家的幸运，但也认为"俄国女皇是一个君主独裁的女皇"，盖属定论；他问叶卡捷琳娜二世，她是否决心保持君主独裁制度，并将其传给她的继位者，或者，她愿意弃绝它？他在向女皇提出这一微妙问题的短简里，坚决表示，俄国比法国治理得坏些，并解释这是因为俄国毫无个人自由，而君主的权力则过于巨大①。叶卡捷琳娜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堆废话，既无知，又无

① M. Tourneux，«Diderot et Catherine II»，(图尔努：«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564，567页。另参阅谢梅夫斯基的论文：«论18世纪和19世纪最初25年俄国国家制度的改革»，见«往事»1906年第1卷，第9页。这篇论文是同一作者的«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社会观点»一书的第1章。圣彼得堡1909年版。

理，且不审慎。如果波尔京有机会读到狄德罗的这一短简，他也可能要嗤之以鼻。然而尖刻的评价，本身是无说服力的。实际上，就是彼得时代的官宦，去到西方国家，也都感到在那里生活，要比俄国自由得多。毫无疑问，俄国人从对西欧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从西欧政治著作的研究中所得印象，都促进了俄国政治思想的觉醒。这一事实已为安娜·伊凡诺夫娜即位时所发生的事件所有力地证明。但这些事件也证明在我国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不利于我国政治自由思想的发展的。第一，西方影响只能扩展到俄国人民中多少有些教养的部分，而我们在关于法典委员会的一章里看到，18世纪俄国所有各阶层中最有教养的贵族中，还有许多简直一字不识的人。第二，俄国政治思想的成就，受到农民和官宦等级间的对抗的极为强大阻力。官宦等级为求巩固和扩大其对农民的权力，不能不取得中央政权的支持。因此，他们不愿同后者进行斗争，限制其权力。后来，在亚历山大一世朝代，卡拉姆津在其给 И. И. 巴赫京的长信中关于农民生活问题说：

"在君主制的国家，所有各个部门都应是君主制的。同样的原则必须贯彻到这一伟大整体的各个分支部分，使它们保持巩固的联系；因此，农村幸福之需要地主，正如一般臣民之需要国王"①。

如果同样的原则必须贯彻到国家整个的各个部分，如果地主应该是所属农村的君主，则俄国实际上就应该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了。卡拉姆津是对此坚信不疑的。18世纪的整个俄国贵族也是对此坚信不疑的。但君主的权力可以是无限制的，也可以是被限制于一定范围的。卡拉姆津在幼年就喜爱西方的先进思想，就是在成年时期，也不反对"用法律来限制农奴的义务，并将政治上的单一权力置于受理性和良心的驱使而制定的、不可违反的规约

① 《俄国旧闻》，1871年，第3卷，第338页。着重点是原书的。

的保护之下"①。但我国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绝大多数，对此却另有想法。他们坚持一种信念，以为在农奴制的农村，地主的权力仍应不受限制，因而对于帝国的"单一权力，也就乐于妥协了。"俄国社会关系的客观逻辑对于俄国人的主观逻辑的影响是这样强大，以致在18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在政治方面比安娜·伊凡诺夫娜即位时变得更为保守。爱好揽权的叶卡捷琳娜深深懂得贵族的这种情绪，她一方面出卖农民，让贵族对他们任意处置，同时断然决定在自己的政治权力方面，不作任何让步。

这种让步的问题，在她刚想篡夺政权时，不得不考虑。那时在接近宫廷的人士和彼得三世的近卫军中，由于彼得三世的野蛮古怪行为引起了暗中的不满，H. И. 帕宁伯爵曾同她谈到这一白痴皇帝被废黜的可能，主张在她的儿子保罗幼年时期，立她为摄政王。他同时希望限制年轻的国王的权力。大概，E. P. 什达科娃公爵也有这个意思。B. A. 比利巴索夫说，叶卡捷琳娜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帕宁的有利于保罗·彼得罗维奇的理由，但未承诺她自己将满足于充任摄政王。他的这个论断是以叶卡捷琳娜本人的谈话为根据的②。但她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话，是怎样也不能完全相信的。应该假定，她欣然承诺了帕宁所希求的一切，同时预先打定主意，一有可能，便违背自己的诺言。当这种可能真正出现，也就是当愤然反对彼得三世的近卫军欢呼宣布叶卡捷琳娜为专制君主时，她在7月7日的"详细"诏书里还是"最庄严地"允诺"使一些国家规定成为法律。按照这些规定，我们可爱祖国的政府，将使自己的权力有相当的界限，在子孙后代，每一国家职位亦将有其界限和法律"。那时，她还不知道帕宁的政治观点，在6月28日政变的参加者中流传到什么程度。所以，就是已经把政权篡夺到手后，她还是认为必

① 这一切都是他本人的说法。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传记》，第2卷，第3页，以及该书注释5。

须表示同意这个政权不得超出"相当的界限"。将权力纳入"相当的界限"，这就意味着限制它。然而叶卡捷琳娜是力求成为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君主的。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在"诏书"里顺便确定了彼得三世所错误地实行的独断专横政制和叶卡捷琳娜所约许的君主制的差别，叶卡捷琳娜将按照这种君主制的精神统治。由于叶卡捷琳娜已经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所以帕宁兄弟和他们的同道者也不得不满足于这种distinguo（杰出的）事了。但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更坚决地争取"诏书"所允诺的使国家制度合法化，因为这些制度虽仍旧使俄国成为君主制国家，但可使俄国摆脱独断专横。叶卡捷琳娜故作姿态，表示她没有忘记她的诺言。同年（1762年）8月，她在关于恢复为她受过苦难的别斯图热夫-留明伯爵的爵位的"诏书"里写道："任命他为皇帝的首席顾问和宫廷中新成立的皇帝顾问委员会的首席成员，以示奖励。"

受命起草新的皇帝顾问委员会草案的 H. И. 帕宁，没有浪费时间。他的草案在7月里即已完成并呈送叶卡捷琳娜。可以看出，帕宁是前述独裁政制和君主制的差别作为草案的基础的。

草案第4节规定："所有按照国家规制和君主专制的实质，属于本人照管和决定的事务，概括地说，所有属于专制君主亲自照管的国家兴革事宜都列为皇帝顾问委员会范围"。为使"仁慈的"君主在其伟大不懈的劳作中"少犯人类难免的错误"，第4节所列各项事务分为4个部门，由专设的"国务秘书"领导。这些国务秘书，照草案的说法，应是"我们的活记录"，他们向勤奋的君主提出有关国家事务进展的准确报告，每一秘书各在所属部门"分担我们所关怀的事务的一部分"。顾问委员会除星期六以及星期天和其他假日外，应每天集会，在女皇出席的情况下，讨论工作。除领导外交部、内政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4个国务秘书外，草案还任命了若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顾问的总数不得少于6人或至多8人。顾问委

员会的最重要职责是:“在他们执行我们的命令时如果感到这些命令抵触国家法律或有损人民利益，他们有向我们提出报告的自由权。这当然还不是限制君主的权利。此外，在草案的第 8 节里断然写道，在委员会会议上，在各成员之间交换意见后，我们根据君主的命令通过最后的决议”。尽管如此，叶卡捷琳娜对于帕宁兄弟及其同道的这些实质上非常谦逊的愿望，还是感到不满。她怀疑按照草案起草人的主张，对独裁政制的限制将在事实上成为对君主制的限制。她的这种怀疑，可从草案附录报告的某些措词中得到证实。

报告说到，整个国家的主要的、真正的关怀，的确都集中于君主一身。但 Н. И. 帕宁立即补充说:“君主除了在选拔出来的少数辅佐人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工之外，别无他法可使政权发生有益作用”。叶卡捷琳娜完全不愿同任何人——甚至不愿同她的儿子，“分享”她刚刚获得的无限权力。所以，她虽然一般批准了帕宁的草案，甚至拟定了皇帝顾问委员会 8 名成员的名单，但她对草案正文提出了无数修正，极力对这件她不乐意的事情，进行拖延，——如比利巴索夫所说，对草案实行了“皇帝的拖延”。但是象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拖延总有了结。在 1762 年 12 月，叶卡捷琳娜所能想到的一切修正，都作好了，剩下的只是签署成立顾问委员会的“诏书”了。叶卡捷琳娜在 12 月 28 日确实签署了这个“诏书”，但她没有把这份由她签署的“诏书”公布，而是撕裂了它。这样，Н. И. 帕宁的一切努力，尽付东流。

II

由此可见，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代表，俄国的君主政权在 18 世纪之内，又一次击退了一部分欧化官宦等级把它限制于一定范围的企图。С. Г. 斯瓦季科夫指出，帕宁兄弟的愿望远不如 1730

年枢密院成员和贵族的要求①。这里所用的“远”字未必恰当。帕宁兄弟的草案是再谦逊不过了。但是应该指出，如果1730年枢密院成员的“发动”，在当时留在莫斯科的贵族代表中引起某种立宪风潮，那么，帕宁兄弟的意图，却似乎没有在有势力的贵族阶层中获得任何支持。女皇的亲信，采取了一切办法劝告她不作让步。炮兵总监维尔博阿在研究 H. И. 帕宁所拟草案时写道:

“我不知道这个长篇大论的草案是谁写的，但我觉得，似乎他是在保卫君主制的姿态下，用巧妙方式，表达其实行贵族政体的倾向。这一强制性的，依据国家法律成立的皇帝顾问委员会的有势力成员(特别如果他们是任性的，爱好功名利禄而又机灵的时候)极易于成长为分夺政权的人物②。叶卡捷琳娜正好有着同样的意见，所以在她确信帕宁兄弟一派的力量还很弱小时，决定不让步。这就是为什么建立皇帝顾问委员会的意图，在其仿佛很接近于实现时，却遭到了失败”。

经过这一失败，帕宁兄弟及其为数很少的同道们，不仅要对叶卡捷琳娜本人和她的无数宠臣的君主制，而且要对他们独断专横政权，俯首听命了。关于帕宁兄弟的小团体在保罗成年时阴谋推翻叶卡捷琳娜而立她的儿子(似乎他应先制定宪法)的消息，应该说是不可靠的。E. C. 舒戈尔斯基发现的文件表明，这个消息所说的“宪法”不过是 H. И. 帕宁给他的学生保罗的政治遗嘱。这个遗嘱一部分是口授的，一部分是根据 H. И. 帕宁的指示而写的，在 H. И. 帕宁死后，由方-维津交给 П. И. 帕宁。П. И. 帕宁不打算把他哥哥的遗嘱交给王位继承人，他在给保罗的信中写道，“因为不幸的是，根据我们祖国的可怕先例，只要对君主独裁制发出反对的议论(哪怕这种议论是以全部宗教法规和自然法律为根据的)，便

① «1700—1895年间的俄国社会运动»，顿河罗斯托夫1905年版，第23页。

② 比利巴索夫，书见前，第2卷，第136—137页。

会给祖国儿女的整个世系，造成可怕的灾难。他认为更慎重的是在继位人成为君主之前，将这一危险的文件保存在自己的手里。由于他不希望活过叶卡捷琳娜，所以他采取了相应的办法，在他死后将 H. И. 帕宁的遗嘱连同上述信件一同交给收信人，在这封信里，他已称保罗为全俄君主。①”

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设想，帕宁兄弟经过1762年12月的失败，已不想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朝代实现他们的计划了。H. И. 帕宁的遗嘱开始就叙明了我在论方-维津的一章里所指出的思想，即认为“授予君主以最高权力只是为了谋求他的臣民的福利”，而君主在这一真理的启迪下自己懂得，一个“作恶的政权”是多么不完善。遗嘱的作者继续写道：“直接的专权，只有在杜绝任何作恶时，才是真正伟大”。接着，H. И. 帕宁断言，在国内尚无根本国家法时，君主和国家的地位，仍然是不巩固的。

他说：“没有君主和国家的共同力量所赖以确立的这个支柱，所有制订最有益的规定的意图，都是没有基础的。谁能维护它们的巩固性？谁能保证继位者不会在一小时内就将前朝的全部规定予以废除？谁能担保立法者自己由于受到掩盖真理的人们的纠缠和包围，不会在今天就毁坏昨天所创造的一切？”

H. 帕宁认为，在独断独行统治着的地方，是没有巩固的社会（“共同的”）联系的；“那里有国家，但无祖国；有臣民，但无公民；也没有那种用相互权利和义务的纽带将其成员联合起来的政治整体。”他的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对于“宠臣”统治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风尚败坏的描写，也很不坏。按照 H. И. 帕宁的说法：“滥用权力在这里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国家和国王、国王和宠臣之间，已经毫无差别。宠臣的专断决定一切。每一个人的财产和安全都动摇了。精神沮丧，心灵堕落，思想方式既低下又卑鄙。”

① 信写于杜金村，注明日期为1784年10月1日。

可以看出，帕宁在这里是作了一幅写生画①。

为了避免发生上述一切，需要有些基本法律。但是帕宁不曾立即说明这些法律应该是怎样的法律，却长篇大论地讨论君主是多么需要保持公正和温良。他训导他的学生说："公正使君主受到尊敬；而温良则使君主受人爱戴"。就其政治意义说，这种训导是毫无内容的。但当Н.И.帕宁转而为"自由人"下定义时，遗嘱的语调重新在政治上变得严肃起来了："自由的人是不仰承任何人鼻息的人；与此相反，专制君主的奴隶则对本身和财产，都不能处理；除君主的恩典和赏识外，对所领有的一切，都无任何其他权利。"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政治自由同财产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作者断言，不侵犯财产权，就不可能侵犯自由；相反，不侵犯自由也不可能侵犯财产。

所谓基本法律，按照他的理解，首先是对财产和自由作出"安排"的法律。他将"规定公共政权行使形式的法律"，也列入基本法律之内。

在谈过这些一般性观点之后，Н.И.帕宁请保罗对这个最辽阔，而按面积计算又为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国家略加思考。这个国家只有两个城市："就中一个城市里，大部分住着穷人；而在另一个城市里，大部分住着穷奢极欲的人"。这个国家的强盛和光荣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但这同一国家可以在几小时内陷于灭亡的边缘，"庄稼汉只是在人的面貌上有别于牲畜，谁也不能领导"。"这个国家给外国提供了沙皇，但其自己的皇位，却听命于兽性暴徒的乌合之众（原文如此！），他们保卫着沙皇权贵。"在这个国家里，虽有

① 当时，最少在首都，对于宠臣的痛恨是极为强烈的。1774年3月，П.И.帕宁伯爵为波将金晋爵事写信给А.Б.库尔兹金公爵说："现时如果不是全体公众，也是公众的很大一部分，都极为痛恨和憎恶宠臣。所有接受这一称呼，或希图获致这一称呼的人们，除了让所有俄国人看到他们受到正义的裁判，成为老弓箭手射击的目标外，不能有其他希望"。(«俄国旧闻»，1873年9月，第342页)。

一切政治等级人物，但按照帕宁的意见，没有一人有任何优点；他们相互间的差别，只在于空洞的头衔。在这个国家里，本应只能因对国家有功而取得，因而应成为高贵灵魂的唯一目的的贵族身分，已在“尽情争宠的宠臣面前黯然失色”。贵族阶层名存实亡，他们卖身给掠夺祖国的无耻之徒。最后，帕宁还将这个国家里人奴役人，以及某一等级的人可以成为另一等级的人的原告和法官等等情况，列为这个辽阔的、但世界上人口相对地最稀少的国家的弱点。Н. И. 帕宁完全正确地从这里得出结论：“因此，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要么成为暴君要么成为牺牲品。”

这一关于两个等级的相互关系的卓越说明，是同帕宁关于在他所说的国家里所有等级的差别只在于空洞的头衔的意见，极相矛盾的。此外，这个说明使我们可以断定，他最少是反对当时统治着俄国的那种农奴对地主的依附形式的。

Н. И. 帕宁所描写的国家、很同波丹所描写的封君采邑君主制相似。但是 Н. И. 帕宁未能给这种国家以确定的名称。按照他的说法，它不是君主制，因为它没有基本法律；但它又不是君主独裁制，“因为一个民族从来不曾让君主独断专横地进行治理”；又不能称它为贵族国家，原因是它的最高统治机关是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是由君主的独断专横来推动的。最后，“一个使其人民在极端愚昧的黑暗中爬行，默默地负担着残酷奴隶制压迫的国家，是不象民主制的”。

由于我国的完全政治混乱，任何一个开明的有德行的君主，按照 Н. И. 帕宁的说法，“都会利用确定不移的法律来保障公共的安宁”。

Н. И. 帕宁的见解就是如此。可惜，死亡使他不能草拟他所希望的俄国宪法草案①。他未及完成的事业由 П. И. 帕宁负责完成

① 他生于 1718 年，死于 1783 年 3 月 31 日。

了。П.И.帕宁显然是完全同情他的哥哥的计划的。但是，这一著名的"平定普加乔夫起义的人物"所写的，却是一些不很明白的东西。

III

他起草了三种文件：1)对于帕宁伯爵部长死后遗留的意见的补充；2)在保罗依法登极后预定公布的两件诏书草案。

这第一个文件，只是明确地表明了一点：即"帕宁伯爵将军"完全不主张对异教的宽容。他的草案宣布东正教教会为俄国的统治教会，自不用说；但他还主张对吸收这个教会的教徒去信仰另一种宗教者，处以死刑。至于俄国各个不同等级的权利问题，则在有关的章节里，写得令人遗憾的简略。例如，在第15节写着："关于贵族的权利"，第16节写着"关于宗教界的权利"，等等，直到第19节（这一节本应谈到"农民的权利"的），都是如此。但是П.И.帕宁究竟要求一些什么权利，——始终秘而未宣。

第一篇诏书最少比较详细地谈到最高等级。其第七点宣布高贵的贵族等级是国家的首要成员，是君主和国家抵御国内外敌人的支柱和防卫力量。但他们的优越地位只归结为一个权利：即"继承土地和臣民"的权利。关于贵族等级的政治权利，连提都不提，恰恰相反，贵族是君主和祖国的防卫力量这一事实，似乎表示作者对贵族业已获得的"自由"，对彼得三世业已给予他们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准备予以确认的免除强制兵役的自由，想要实行某种限制[①]。

最初，П.И.帕宁泛论贵族等级服兵役为道德上所必须。后来，为了准备根据，他在第11点里宣布，"以单一薪饷为生活来源"

① 《诏书草案》是П.И.帕宁在1784年写的，而叶卡捷琳娜发给贵族权利证书，则是1785年的事情。

的贵族，非经父母允准，无权辞职。

第一篇诏书草案纵谈我国道德风尚的败坏，却完全不提基本法律。关于这种法律，П. И. 帕宁准备在第2篇诏书草案里写，而这个草案，他在向君主提出时所用语调是最少信心的①。

但在第2篇诏书草案里，基本法律问题也是说得非常不确切的。读了这个草案，会以为最基本的基本法，是保卫专制君主权利的法律。

事实上，诏书第1条写道：

"所有未经本条明文规定，未在我们往后为祖国提出的基本法条文以及国家政体中明确规定的一切，都无例外地在依法行使权力的君主及其后的全俄王位继承者的全部统治期间，予以保留，并确认为不可改变，不可侵犯。"

在其余的6条中，有3条专谈王位继承问题，其余3条重复我们所熟知的关于基本法的必要性的理由，不过，这些基本法的措词，在这里也是扑朔迷离，不可捉摸，这位一股劲儿想要克服其长兄遗作缺陷的作者，怎样也无法把它写得明确。

Н. И. 帕宁本人虽然真诚地仇视独断专横，并坚决地谴责了它，但他却无充分确定的政治思想方式。他不很明白，为了对独断专横加以限制并在我国建立西欧意义上的君主制度，到底需要一些什么。至于П. И. 帕宁，他虽同情其长兄的政治观点，却在政治思想上更少明确性。他在这方面可能更为胆小。不管怎样，这位"平定普加乔夫起义的人物"，其政治创作结局是完全失败的②。

П. И. 帕宁的失败使我们想起方-维津观点中的大量矛盾，这些矛盾我在专论他的一章里已予指出。方-维津碰巧作过 Н. И.

① "如果可能，请在即位时首先只批准这里所写的七条，这便是为诏书提出的格式。"

② 有关Н. И. 帕宁政治遗嘱的问题，请参阅舒米戈尔斯基所著《保罗一世皇帝》一书，第53页，及附录。

帕宁的秘书。他根据后者的指示而写的那些论独断专横的危害的作品，是很欠思考的，这一方面是因为Н.И. 帕宁的不完全明确的政治思想，经不起逻辑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位«纨袴子弟»的作者对于政治完全缺乏修养。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给一位帕宁的信中说俄国制度优于西欧政治制度，而根据另一位帕宁的指示起草的文件，又宣布俄国是一个缺乏任何统治形式的国家①。

保罗在做了国王之后，当然立即看到了П.И. 帕宁的这一失败的著作。但当他还是王位继承人时，他便常常听到帕宁兄弟谈论基本法律问题。这是可以从他对于我国缺少基本法律，时常表示惋惜中看得出来的。有一次，他把从帕宁兄弟那里听到的东西，回敬帕宁兄弟。例如，1778 年秋，他在给 П.И. 帕宁的便条中写道：

"国内的安宁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的安宁。为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安宁，必须制止对他本人和与他类似的人的折磨；除了依靠法律，还能依靠什么来制止呢？他们彼此连结，所以必须考虑公共安宁的这一基础"②。

这里一眼就可看出Н·И·帕宁所津津乐道的一些思想。有趣的是，保罗没有说出所谓基本法律究竟是指哪些法律。似乎他这样作是出于慎重的考虑：他不允许自己"更多地谈到这一问题，因为这会使我不知不觉地接触到法律的稳固性和不可动摇性所赖

---

① Н.И. 帕宁不患那种寒酸的爱国主义的毛病，他没有夸耀俄国的秩序而贬低西欧秩序，这还可由下列事实来证明。某次，他在同他的学生保罗·彼得罗维奇共进午餐时提到托尔涅奥，并对这个城市作了不好的评价。亲王问道："那里的国王比我们坏些，还是好些？"Н.И. 帕宁答道："国王吆，当然是我们的好些。但是，老兄，谈什么都不能拿来同自己比。可以认为那里的国王不好。这很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都行。我们会在这种比拟中迷失方向的"。(«波罗申札记»，第 2 版，圣彼得堡 1887 年，第 175 页)

② 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Кобеко: «Цесаревич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圣彼得堡 1887 年，第 175 页。

以决定之点，断言每一个人及其世系的存在和状况永远不变”①。然而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接触到这一非常重要之“点”，则皇太子会比 Н·И·帕宁伯爵将军更加束手无策。后来，这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太子非常令人信服地表示，他所重视的只是两个基本法律：1）直系继承皇位法，他是通过自己的沉痛经验才对这个法律有所理解的；2）关于一切人都须柔顺地服从他的君主意志的法律。这后一个法律，他在他的短促统治的整个过程中，都坚决贯彻执行。然而正是这一法律，在实践上取消了君主制和独断专横之间差别，而这一差别则是保罗的教养者 Н·И·帕宁在理论上规定的（不过并无充分根据），并且基本法律的要求，也是根据这一差别提出的。

1778 年秋，保罗将他豁免贵族服兵役的下述看法通知了 П.И.帕宁：

“自由当然是任何人的最宝贵的东西，但对它应有真正的理解，这种理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获得，又只有通过基本法律才能加以控制（使其为善）。由于没有基本法律，所以不可能有象样的教育，从而产生了对事物的种种不正确理解，产生了滥用权力以及种种怪事”②。

这种看法所以值得注意，因为第一，它重复了当时在欧化贵族中相当流行的所谓教育农民的思想，以为这是解放农民的先决条件。很显然，贵族所以保持这种思想，是因为他们并不想在他们的农奴村庄，颁布任何基本法律。

此外，保罗的看法的特点还在于它表明，在他的头脑里，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对他最关重要的兵役问题。

帕宁兄弟在说服王位继承人相信颁布基本法律的必要时，也

① 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圣彼得堡 1887 年，第 175—176 页。

② 同上书，第 179 页。

许过于迂就了我刚刚指出的保罗的心理特点。最低限度，就 П. И. 帕宁说，这一假定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1778 年秋，保罗一方面不很合时宜地引述基本法律可能产生的利益，同时又在给 П. И. 帕宁的信中，对俄国贵族滥用其豁免兵役的自由，表示不满。而在 1784 年秋，П. И. 帕宁为了补充其长兄的政治遗嘱，在筹备保罗登极大典时，起草了一篇诏书草案，除了颇为含混地谈论基本法律的利益外，完全确定地提出必须收回贵族豁免服役的自由，或予以某种限制。因此，不禁要问：谁对谁更有影响？是 П. И. 帕宁对保罗，还是保罗对 П. И. 帕宁？

这样，帕宁兄弟的政治反对派立场在实际意义上是极端脆弱的，在理论上也是殊少令人满意的。这一切都很显然。尽管这样，这种立场对于俄国解放思想的发展，却不是没有积极影响的。我们不要忘记，某些同代人，特别是后代人，都把它看得比实际上更有力，更活跃。

十二月党人 M. A. 方-维津的父亲，对他谈过我在上面提到的所谓以推翻叶卡捷琳娜和拥立保罗为目的的密谋，以及保罗发誓要颁布宪法，等等。关于密谋的消息是不可信的。但是关于密谋的各种传说，却给十二月党人以模仿的榜样(虽然，这只是为数颇多的榜样之一)。我们知道，许多十二月党人读过 Д. И. 方-维津所写的 Н. И. 帕宁的政治遗嘱①。由于 M. A. 方-维津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的有关密谋的传说，那篇谦逊的遗嘱遂成为他们的完备的制宪法案的导言，似乎这个法案是参加密谋的人们所草拟，并经保罗签字的②。这当然可以增强他们的立宪意图。如果我们将亚历山大时期的这些活动家的观点拿来同帕宁兄弟的意图作一比

① 见谢梅夫斯基：《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社会思想》，第 231 页。

② 见方-维津：《俄国政治生活现象述评》，重印于《十二月党人丛书》，第 5 卷，莫斯科 1907 版，第 30 页及以下各页。

较，则政治思想的继承性就会显得更加明显了。

IV

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国贵族中，帕宁兄弟及其关于基本法律的巨大意义的观点，虽然是少见的，但毕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所熟知的谢尔巴托夫公爵也想过这种法律，并称之为根本法。他认为“根本法律是君主制[①]区别于独断专横或君主独裁制的必要特征，后者只是听凭自己一人的愿望，……而“破坏一切法律”。谢尔巴托夫一般说来，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天才的政论家的。关于独断专横或君主独裁制，他写过一些真正优秀的篇章。

按照他的说法，君主独裁制“毫无顾忌地……在一切方面扰乱每一公民的生活和安宁。只要碰上这一肮脏的东西，便会中毒，便会成为社会危害。君主独裁制甚至不能称为政体，因为它是一种折磨，除了独裁君主的愚笨的刚愎自用之外，别无任何法律和规章的。在专横的政体里，人民是为君主而创造的”。为了造福于自己的人民，专制君主必须首先消灭“独断专横”。谢尔巴托夫问道：“实际上如果人民只是在专制君主让他们享用自己的生命时才有生命，那么，怎样的法律才能加惠于这种人民呢？”

谢尔巴托夫把呻吟在独断专横压迫下的人民比作在狂风恶浪中乘船航行的旅客，桅杆倒了，风帆和罗盘都没有了，“船仍在行驶，但制不住暴风的狂吼，不知道哪儿是浅滩，哪儿有暗礁，也不知道飘流的地点”。就令它达到了码头，这也只是一种幸运的偶然，而不是常规。独断专横的统治者不奖励有功，反而嫉忌有功的臣民。在封官时，他只是一意孤行，随心所欲。卡里古拉封他的马为执政官。谢尔巴托夫挖苦地说：“也许很多比马还不如的人，独断专横的君主也要任命他们为最高官吏罢！”在君主独裁制的国家里，德

① 他写道：“君主制必须有根本法律，必须保持一切已有的规定”。

行不受尊敬，因为有德行的人本身便是对独裁君主的活针砭。在那里，理性被迫害，“因为它有害于专横独断，因为谁要探讨那些构成社会基础的外来道德风尚，他就会用聪明的眼光观察自己的情况。”谢尔巴托夫认为“君主独裁制”的危害已是这样明显，所以它不可能在开明的国家中存在，或最低限度，不可能在这些国家长期存在。“因为事实上，任何人只要考虑到自己对神圣的法律，对祖国，对自己，对家庭和亲属的义务，都会认为他的责任和幸福将驱使他去推翻这一没有任何巩固基础的偶像。”

这样，在建立了专横统治的国家里，居民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尽可能迅速地推翻它。在较为开明的人们看来，同它实行任何妥协迁就，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问，在把它推翻以后，应该建立什么政治制度呢？

这位世袭名门贵族的思想家不可能是民主制的拥护者。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不错，他承认，初看来民主制是一种最符合自然规律的政体。“既然人都是同样的父亲所生，难道他们不应求得在现社会中已被铲除的地位平等？”然而，谢尔巴托夫保证说，如果仔细考察，则民主制是一种最难使人满意的政体。它为不断的派系斗争敞开大门；在民主制下不可能保持国家机密；人民利用其政治权力拒付国家必需的税款；而且由于不能重视真正的功绩，把不值得尊重、但善于钻营的人提居高位。

看来，谢尔巴托夫出于对贵族世系的同情，是要以贵族制为最好的制度了。他的确承认贵族制有许多优点。他写道，例如在贵族政体下，国家事务的进行不是以一个人（君主）的专断，而是以国家最有聪明才智的人们的最健全的考虑为根据；阿谀奉承在这里不能得逞；军队不是由善于钻营的宫廷贵胄，而是由最老练的又最勇敢的指挥官来统领；青少年受到社会公德规章的教育。贵族制的这些优点，都是很重大的。但虽然如此，贵族制也有它很大的弊

病。如果在贵族制里，事情是由大多数决定的，那就不应忘记，“多数并不经常都更优秀”。此外，由于在贵族制下无可避免的争论，事情办得很慢，这在战时是很危险的。个别的达官显贵由于追求私利，“力求永远保持爵位和财富”。总之，在贵族制下，易于发展过分的享受追求，给国家带来危害。

关于政治权力的起源问题，谢尔巴托夫和他的有教养的同时代人一样，都主张契约论：人们牺牲其原有自由的某一部分，是为了保证安宁地享受其余的部分。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按照谢尔巴托夫的意见，决定于我们现在称之为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那些力量。君主制是从家长权力中产生的。同家长在重大事情上与他的长子和最聪明的儿子商量一样，君主在自己的周围设立一个“由他的人民中最明智、最博学的人们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会向他提出能够造福于国家的建议，劝阻他实行有害于国家或具有专横性质的措施。这种顾问委员会的存在和基本法律的存在，就是使君主政体区别于“独断专横”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当君主消灭顾问委员会的权力时，他便成为暴君。反之，当顾问委员会剥夺君主的权力时，就产生了贵族政体。除前面所说贵族政体的优点和弱点外，还须补充指明，如我们的名门贵族思想家所承认，贵族总想压迫劳动群众。他说：“卑贱的人民，在哪儿也不象在贵族政体下那样不幸。”有些古代作家在观察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时得出结论，认为卑贱阶级的人民同压迫他们的高贵阶级的斗争，使**贵族制度**为**民主制度**所代替。这一为18世纪许多作家所具有的观点，亦为谢尔巴托夫所赞同。他断言民主制的产生是人民遭受达官显贵“折磨”的结果。

由于对民主制毫不同情，谢尔巴托夫以为一个国家如果建立**君主制度**，为利至大。通过以上所说各节，不难了解，他对俄国建立起来的制度，是不会误解的。他坚决不承认它是君主制。他在

《为我的思想和我过分勇敢地发表过的言论而辩》一文中写道:“我指责我国政府的成份,说它是完全独断专横的政府成份,那里虽有成文法,但都屈从于国王和达官显贵的权力。”而且就是“这些成文法也都是在国王的办公室里撰写的,人民疾苦的真实情况完全不能渗透进去”①。因此,这些成文法也受到谢尔巴托夫的“指责”。他说:“我指责我们的法律,因为它们的制订不惟未经人民的同意,而且未经主要政府的同意。我指责现已明白显示的事实,即在制订这些法律时,对于人民的状况、利益和需要,既不了解,又不关切。”

谢尔巴托夫将这种立法方式的责任不仅归之于国王,而且归之于他们的亲信顾问,这些人忙于从事宫廷阴谋,不愿了解国内真情实况和人民的需要。

在《致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书》中,谢尔巴托夫对于那些实际上掌握着俄国命运的人们,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我看到被你们践踏的人民,看到你们把法律变成具文;看到公民的生命财产化为乌有(原文如此!),看到你们的傲慢和残忍使人民丧失了朝气;公民的自由徒具虚名,甚至受害者也不敢提出申诉”。

达官显贵在社会阶梯中爬得很高。但社会地位的高低,不应在机械的意义上,而应如谢尔巴托夫所说,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去理解。从机械的意义上说,甚至粪便也可升得很高,——例如,升到高塔顶上。但只有机械的上升是不够的。谁的**官衔**比别人高,他的德行也应比别人高。由于俄国的达官显贵完全不能满足这后一要求,所以谢尔巴托夫把他们比作爬上高塔的粪便。他不以这种

① 在同一论文的另一地方,他说:“我指责女皇所写的法律,这些法律是在她的阴暗的办公室里写的,而她却想利用它们来达成不可能达成的愿望,医治她所不了解的创伤。”

侮辱性的比喻为满足，还用嘲弄的口气质问国家的统治者："你们这种人，这种优雅的人，是否象蛆虫生活在粪堆里一样，生活在罪恶之中呢？"

我们的作者提醒达官显贵要记住他们对国王、对人民的义务。国王用"人民的财宝"来养肥他们，他们应该对国王说真话，即令这种话可能使国王不愉快。至于对用自己的财宝来养肥他们的人民，他们应该对人民"宽容，关怀人民的幸福"，以为报答。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才配称为人民的恩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知识阶级对人民有责难"的萌芽，我们在19世纪的俄国先进著作里，还将碰到这一理论。不言而喻，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的内容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它在向在学青年发出呼吁的拉夫罗夫笔下所取得的形态，与它在向"国家达官显贵统治者"发出指责的谢尔巴托夫笔下所取得的形态，是迥然不同的。

谢尔巴托夫提醒统治者们记住他们对人民的责任，这表明农奴制观点并未妨碍谢尔巴托夫——亦如其未妨碍苏马罗科夫一样——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谋取人民的福利。作为一个拥护教育的人，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把教育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当然，他的方案给教育以等级的性质。奥菲尔国① 的每一个有教堂的村庄，都有学校。儿童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和算术。在城市的学校里，——为市民和商人子弟开设的，——除上述课程外，还学习工艺。贵族学校学习"绘画、数学、初等几何，舞蹈和武器操练。"在初级学校之上，设有省立学校，在这里除几何外，还讲授军用和民用建筑，历史及"部分物理"。最后，在学院里，教授高等数学和自然科学。

此外，不妨补充一点，即熟悉当时我国法庭审判情况的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讲授公开诉讼程序。这当然不只是对贵族等级有

① 空想政治小说。——校者

利。

V

抨击“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如果孤立地看，是意义不大的。叶卡捷琳娜的讴歌者有时也大声疾呼，反对达官显贵。请看他的以下诗句：

你，这第二撒旦拿巴尔！
整天在想些什么哟？
是不是想让你的年华
在游嬉、懒散、欢娱中流逝？
…………
这广阔的世界对于你，
是否只为了看到奴颜婢膝，
只为了在你的难以侍候的午宴席上
珍肴满桌，
醇酒盈樽，
东方现星光，咖啡多油腻？
是否只为了不从事劳动，
刹那间，
你孤独无依？等等等等。

姑且不说杰尔扎温对于这些“撒旦拿巴尔”歌颂过，而在其他诗篇里又大声疾呼地攻击过，然而这种攻击的本身却是他对叶卡捷琳娜进行歌颂的一种手段。他坚信叶卡捷琳娜是不象这些粗鲁贵族的。谢尔巴托夫对于俄国国内生活问题的态度，却是严肃得多。他虽然也对叶卡捷琳娜说些恭维话，但从来不愿同“独裁制”迁就妥协。在所著《俄国史》中，他使人理解到，独断专横在我国的建立，是违反我国人民的意志的。他说：“值得指出，诺夫戈罗德人

民在选出三名公爵(即吕里克,西涅乌斯,特鲁沃尔——著者)为君主时,并未给他们以无限制的权力,而只是托付他们保卫国境不受敌人侵犯。……但后来吕里克取得了这样的权力。”在同一著作的最后一卷里,谢尔巴托夫竭力赞扬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因为他同意对自己的权力加以某种限制。按照他的意见,舒伊斯基“由于在其领土上既博爱又仁慈,赢得了好声誉,得到了最高贵的美好结局”。在所著《俄国道德风尚的败坏》里,他在论及安娜朝代时指出,在她即位时,达官显贵们预定了“一种宏图,……要给国家制订根本大法,规定由参政院或议会(原文如此!)限制君主的权力。”我们的作者在这里只是惋惜傲慢和虚荣使这一美好的宏图未能实现。这些根本法律规定剥夺君主的某些“过多的权力”(谢尔巴托夫本人的用语),而将其赋予若干名大官显贵,“从而使大批贵族世系大为伤心;同时,又规定用许多君主来代替一个君主”。最后,在他的政治小说(《奥菲尔国游记》)里,皇帝也受法律的限制,法律阻止皇帝滥用权力。奥菲尔国的居民认为,由于沙皇既不是手工业者,又不是商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他们感受不到其臣民所感受到的需要,所以他不宜于自己制定法律。”这再一次指明,谢尔巴托夫所希望的宪法应能极大地限制君主的立法权力。但怎样限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他那里没有找到确定的指示。

正如上面业已指出,他认为在君主的周围,应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或参政院,这个顾问委员会“不仅应制订根本法律以规定国王的权力,而且应根据根本法律为他补充一些人员,使他能够保证履行交给他的职能”。象帕宁兄弟(以及保罗)一样,谢尔巴托夫认为在各种根本法律中,王位继承法应居首要地位。在另一点上,他也与帕宁兄弟一致,即尽管他是自然神论者,但他并不是无条件地主张信教自由。他虽然也说,对于分裂派教徒不能用惩罚,而要用训导来进行斗争,但在他所建议的反对分裂派的办法里,我们却看到

使他们受“损害和羞辱”。他想使分裂派教徒支付更高的税款，负担更大范围的宿营义务，丧失包工的权利和出庭作证以及充任保证人的权利。最后，他建议对分裂派教徒恢复彼得一世在1722年法律中规定他们必须穿戴的特殊服装；这似乎就是为了通过“羞辱”对他们施加影响。谢尔巴托夫对回教徒也不反对加以约束①。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坚信“统一的法律”可以增加国家的力量。从这一切也可看出，如果我们根据他对专断独裁的厌恶（这种厌恶无疑是真诚的），便把他看作百科全书派的学生，或者认为他具有在19世纪即已最后形成并取得自由主义称呼的那种思想形态，那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谢尔巴托夫很熟悉与他同时代的西欧著作，他不是，也不可能是解放哲学的彻底拥护者，或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和解放哲学都是反对“旧制度”的斗争的思想成果。而谢尔巴托夫则是一个顽固的农奴制拥护者。就这方面说，他显然大大落后于H. И. 帕宁，因为帕宁最低限度强烈地谴责了使一人成为另一人私产的社会制度。奥菲尔国的“最高政府”是纯粹的贵族政府。尽管在某一个部——“房屋建筑、国家收入和商业部里，也有15名商人代表，但组成这个政府的贵族代表，为数却大得多（75人），因而国家权力完全集中在贵族阶层的手中。”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在国家机关供职，在那里也成为贵族的特权。

对于谢尔巴托夫，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下述情况：

1785年叶卡捷琳娜发给贵族的特权状完全未能使他满意，因为照他的意见，特权状赏赐给贵族的权利，是微乎其微的。他对它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批评。例如，关于贵族向最高当局提出有关自己的需要的申请权问题，谢尔巴托夫指出，贵族应有权“向政府提出，何时何地的政府法令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关于自己需要的

① 必须指出，谢尔巴托夫是共济会会员，有些学者认为共济会会员是竭力主张信仰自由的。

申请权，他批评特权状只不过允许贵族“在挨打时可以尖声喊叫”[1]。按照特权状，总督对于贵族会议的权力是这样大，以至贵族在前来参加这种会议时，只不过成为他们本身遭受压迫的见证人，而这种会议的场所则变为贵族受压迫的纪念馆和他们的自由的监狱。贵族特权状的其他条文，也都在同样的精神上受到谢尔巴托夫的批评。

另一方面，同年发给商人的权利状，谢尔巴托夫认为最低限度在当时文化条件下，在某些方面未免过于广泛。他写道，当然，由与自己平等的人审判，是至为珍贵的，但不宜将“勉强识字”的商人选为法官。他觉得最好是将贵族或同商业无关的人选入所有商人法庭。“为了对商人表示尊重”，他觉得在商人法庭里，只要有一名商人代表就够了。

不仅这样。如果奥菲尔国任职国家机关是贵族的特权，那么，那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不属于贵族家庭的人们才能迁升到最高官级。总之，谢尔巴托夫是反对“平等的幻想”的，甚至对于贵族，也是如此。他的政治幻想，没有超过由世袭贵族取得政治权利的范围，在法典委员会里，他已是这种贵族的思想代表了。

然而无论谢尔巴托夫的贵族意图仿佛距离自由主义有多么远，但事实是，他对当时存在于俄国的政治制度不仅不满，而且深切憎恨。当一个人憎恨他周围的秩序时，他是会想方设法去革除它的。革除这种秩序的最自然方式，是由受到它的折磨的社会阶层起来同它斗争。看来，谢尔巴托夫是懂得这一点的。他写道，如果独断专横在“俄国畅所欲为，则这一切都会从我国奴隶的卑贱屈从中产生”；他希望能使他的同时代人抱有坚定的信念，“一同热爱祖国”，尽力给他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奥菲尔国最高权力虽受到根

① 《祖国的忠诚儿子对诏书上贵族权利的注释》，《谢尔巴托夫全集》，第1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300页。

本法律的限制，根本法律虽有力地限制了他们危害公民的可能，但仍有两个皇帝被推翻，死于狱中。作为一个18世纪的俄国人，谢尔巴托夫不能跟着这种范例走得很远。但他很知道，当时俄国的政变不是用贵族世系的力量完成的，官吏并不支持门阀的政治欲望。不仅这样，谢尔巴托夫显然也意识到一个真理，即被奴役的农民和奴隶主贵族（不管是它的哪个阶层）之间的对抗，是对"君主独裁制"的最有力支持。这一点必须予以假定，因为奥菲尔国的普通老百姓是禁止向国王致贺的。这一禁令的理由是："人民一般在任何地方都少受教育"，"因为人民所表达的欢乐和热忱，实际上毫无意义，却可能使某些国王感到骄傲，仿佛以为他们为人民所热爱，从而产生有害的后果。"然而奥菲尔国不是俄国。更确切地说，只有在俄国实现了谢尔巴托夫的政治主张之后，才能说奥菲尔国是俄国。在真实的俄国，贵族不能使最高当局与人民隔绝，人民是把最高当局看为自己的关怀者的。这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政治地位。一些在奥菲尔国可以设想的事情，在真实的俄国却成为不可能。谢尔巴托夫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一方面咒骂"奴隶的卑贱屈辱"，同时却以使俄国从君主独裁制的国家转变为君主制的国家为自己的实际目的。他的论道德风尚败坏的文章，结尾时希望以后我国会出现这样的国王，既能通过自身的优良典范，又能特别是通过根本法律的颁行，恢复优良的道德风尚。当这样的国王出现时，"那时，被放逐的美德将离开冷落的荒漠，而在城市和宫廷里建立自己的统治；法庭将不因收受贿赂和畏惧强暴而裁判不公，对达官显贵的逢迎畏缩将被消除；对祖国的爱将重建在公民的心中；受到称赞的将不是生活豪华和财富，而是公正，功业和无私"。关于这种能够完成这一良好的革命的国王的出现，他认为只应"祈求上帝"。

在等待这种国王的出现时，作些什么呢？努力服务国家，适应

现存的秩序，并且在适应过程中有时应该走得远一点（按照我们现时的尺度说）：所以，他向在《论道德风尚败坏》一著中称之为顽固的“君主独裁制”顽固维护者的女皇，提出了他本人的请求。而当他看到祖国的大量灾难，感到痛心疾首时，更在充满愤慨的尖刻论文中倾吐所怀，……虽然事先他就知道，这些论文不会刊行。谢尔巴托夫的政论文章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还是被束之高阁，未获刊行问世①。用赫尔岑的俏皮话说，谢尔巴托夫公爵作为政论家，是当时的一个“多余的人”，一个“聪明的废物”。对于叶卡捷琳娜，杰尔扎温基式的颂歌要比对独立的政论家的论文更合口味。

VI

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克尼亚日宁是独裁政治的敌人，因为他写过一部悲剧《诺夫戈罗德的瓦丁》，一度在“上流社会”中造成混乱。据说，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由于出版“瓦丁”而被革去了俄国研究院院长的职位，而克尼亚日宁本人则受到著名的舍什科夫斯基的传讯，并于其后病死②。这不合乎事实。克尼亚日宁死于1791年1月，而《瓦丁》的出版则是1793年的事情，不可能给它的作者造成任何不幸。由于这部悲剧，克尼亚日宁的儿子和其他与剧本有这样那样牵连的人，受到了警察的侵害。剧本本身受到取缔，不许发行。

---

① 在本世纪50年代，这些政论文章开始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出版物中出现。论道德风尚败坏一文在1858年于伦敦出版（上面的摘录，引自1870—1871年，《俄国旧闻》的较为完整的版本）。《给国家的达官显贵统治者的信》，在1872年《俄国旧闻》中出现。90年代，在И.П.赫鲁晓夫的编辑下，谢尔巴托夫全集第1卷（圣彼得堡1896年）和第2卷（圣彼得堡，1898年）出版。研究谢尔巴托夫的最详细的著作《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政论家》，是B.A.米亚科京写的，收入他的论文集《俄国社会史》中（见该集第102—166页，圣彼得堡1906年版）。

② 在A.C.普希金的《历史述评》里，甚至说“克尼亚日宁是在树条抽打下死去的”。

科佐达夫列夫当时任研究院顾问，在其送给达什科娃的关于《瓦丁》的报告里，说《瓦丁》作为一部创作，是不包含任何危险的东西的。他还指出，《瓦丁》的结局是国王平定叛乱，这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克尼亚日宁的不幸的悲剧是共和制观点的表现，那会是莫大的错误。何况克尼亚日宁从来不是共和派。他怀着忠实臣民对女皇的真挚情感。尽人皆知，他的第一部悲剧《狄东》就是献给女皇的。在献词里，他向叶卡捷琳娜说：

你把权力的系统变得自由、温和和严整，

你是第一个给了我们幸福的平等，

你无例外地将幸福生活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在"致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书"中称叶卡捷琳娜为欢快的女皇，不仅是所有臣民的慈母，而且——当然，更高颂扬地——甚至是缪斯。他又一次肯定：

我们享受这样大的幸福，

这是在她以前百年未遇……

当然，可以假定，在克尼亚日宁写《瓦丁》时，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证明这一假定，也许可以说《瓦丁》所以写于1789年，即写于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这不是偶然的。可是，这一假定是没有根据的。

法国的风暴当然只是使克尼亚日宁特别谨慎。我们从他的儿子那里了解，1789年这里所说的"悲剧，已交剧院上演，角色也已分派；但不久法国革命爆发了，克尼亚日宁看出，他的剧本不合时宜。他将剧本收回，摆在书房里的书桌上，直到他死去。"

悲剧的内容也完全不能证明作者有反君主的情绪。如果谢尔巴托夫在所著《历史》中断言吕里克是违反诺夫戈罗德人的意志而取得专制权力的，那么，在《瓦丁》里，吕里克的权力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他不是篡位者，而是人民的忠实仆人和恩人。

瓦丁在战争发生时一度离开了诺夫戈罗德，因而不知道诺夫戈罗德的情况，他的朋友共和派维戈尔向他说道：

战争刚一开始，你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达官显贵不择手段地作恶多端。
强大的祖国只是受灾受难，
城市里但见傲慢、嫉忌和叛乱。
宁静的茅舍沦为地狱，
神圣的真理从这里远远离去。
自由在动乱中日益沦丧。
内讧带来了野蛮的毁灭，
在同胞的尸骨上建造起死亡的宫殿。
要使全体人民都沦为贪婪乌鸦的食物。
为了选拔暴君疯狂地搏斗。
整个沃尔霍夫，血雾弥漫。

我们看到：自由沦丧不是由于吕里克的任何阴谋，而是由于达官显贵的傲慢、嫉忌和凶恶。吕里克应戈斯托梅斯尔的邀请前来援助，他只求在诺夫戈罗德恢复秩序，或如维戈尔所说，只想给诺夫戈罗德人民恢复他们的幸福生活①。

他完全不想给自己保持权力。但戈斯托梅斯尔接受经验教训，在临死时认为必须立吕里克为公爵。

他嘱托人民要使吕里克保持权力，
来结束人民的呻吟痛苦和灾难。
我们的人民为他的伟大功绩所感动，
将救星立为自己的统治者②。

---

① 这使我们想起叶卡捷琳娜，因为克尼亚日宁说过，她“无例外地将幸福给予我们每一个人”。

② 第1幕，第2场。

瓦丁的女儿拉米达在同她的亲信谢列纳在谈论吕里克时说道:

你记住,

他是多么光荣和不可战胜,

他所求只是要造福于我们。

他为此在心灵里得到鼓励, 英勇无畏,

停止了我们哀怨和呻吟,

但他放弃了这里一切人所羡慕的王冠。

这时——

人民害怕贫困灾祸的重临,

泪水润湿了这位英雄的脚印,

整个城市普遍存在深沉的痛苦,

仿佛我们的末日已在临近①。

的确,拉米达是爱上了吕里克的。但这位钟情的少女的倾诉,在这里是同坚定的共和派的证词,完全吻合的: 专制权力不但不是吕里克夺来的,而是由人民交托给他的,可以说,是由人民强加给他的。他当然不会忘记这一点。他对拉米达说:

显贵和人民在这里给了我王冠,

由衷地服从我的法律,

他们认为我的权力高于自由②。

人民认为高于自由的权力,不能不是很巩固的。这一点,吕里克本人和诺夫戈罗德的共和派, 都很明白,他们当中的一人(普列涅斯特)向瓦丁解释为什么他们迄今尚未起来反对吕里克的原故:

瓦丁啊, 你自己明白,

吕里克的王位是唾手而得的,

① 第2幕,第1场。

② 第2幕,第1场。

宅来自人民的要求，

要推翻宅有多么困难！

你会看到，

他的美好的权力将取代他所夺来的自由，

他的权力将是多么受到尊敬。

祖国的眞正儿女，——

能够痛切感到奴隶制的耻辱，

能够为世界上有人掌握着他们的自由，生命和光荣

　而引以为愧的，

为数毕竟寥寥。

此外，还可补充，吕里克的温良和公正，越来越巩固了诺夫戈罗德人民对他的依恋。由于瓦丁起义给予他的深刻印象，气量豁达的公爵，尽管爱上了瓦丁的女儿，即前面所说的拉米达，却仍然决定放弃王位。然而人民跪着请求他不要放弃。这时吕里克痛苦地，同时又是自豪地向瓦丁说：

你旣然认为国王的权力应受惩罚，

那就请看我的公民在心中怎样为宅辩护罢！

你对此还能有何话说呢？[①]

瓦丁"刺死了自己"。他的女儿拉米达也是这样。这当然就是答复。如果说，这个答复使我们对瓦丁和他的儿女的德行肃然起敬，但这种答复怎样也不能算是胜利：因为瓦丁和他的同志们的起义所代表的人民，表示反对他们。当然，克尼亚日宁并不是为了减少观众对吕里克的同情而在悲剧收场时让他发出如下的感叹：

啊，号角！啊，可怕的号角！啊，正直的天主！

…………

我的尊荣对我只不过是负担！

① 第5幕，第3场。

纵然受苦受难，
我也定要为这个国家
为我——一个痛苦的监护人——的职责
不计牺牲。
我应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统治者，
我将不迷失路途前进！
天主啊，无论你在哪里，
我将为你而复仇！

这是对权力——虽然不受限制，却是根据人民的意志而存在，并完全为人民的幸福而行使的权力——的尽情歌颂！吕里克是18世纪法国解放哲学代表人物常常寄予希望的理想统治者之一。叶卡捷琳娜为什么感到气愤呢？难道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吗？

VII

我们知道，苏马罗科夫就很喜欢利用悲剧主角的道白向观众发表他对一般人类的"职责"、特别是对国王的职责的看法。又知道，观众很喜欢从戏院舞台上发出的训导式言论。《纨袴子弟》一剧所取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如果不说最大部分）应归功于斯塔罗杜姆的台词。训导式的台词是当时的风习：法国启蒙思想家利用剧院作为传播他们思想的手段。克尼亚日宁没有任何理由不模仿这一流行的习惯。他的主角是比苏马罗科夫的主角更情愿谈论"职责"问题的。《罗斯拉夫》一剧的命运表明，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论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为1817年出版的克尼亚日宁文集的序言中写道：

"在这部悲剧上演时，许多观众非常热烈地接待了伟大诗人的这部卓越创作。可以说，每一首诗都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罗斯拉夫》有许多充满高尚情操的诗段。它的主角宣称：

灵魂卑弱的暴君，爱情、奴隶的英雄，

幸福与职责既不相配称，

追求幸福，

定将恶贯满盈。

同一悲剧的另一地方，罗斯拉夫向赫里斯季耶任说：

你有责任迫使我背叛，

但我啊，

将光荣地为社会牺牲！

被戴上枷锁的罗斯拉夫在同留波米尔谈话时豪迈地说：

我蔑视暴君的迫害，

为了社会

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叶卡捷琳娜是不反对这些诗段的，这里面没有任何足以危害她的权力的东西。反对爱情，如果它妨碍履行对社会的责任，或妨碍为祖国而自我牺牲，这是君主政权的绝对拥护者也都能作到的。据说，在法国革命开始前，叶卡捷琳娜也不害怕在舞台上发表政治言论。当时，人们指出 Н. И. 尼古拉耶夫的悲剧《索列娜和扎米尔》上演的经过：

莫斯科总司令禁止(1786 年)上演这一悲剧，认为剧里有些反对君主专制的尖刻言论。当时，女皇写信告诉他："作者所反对的是专制暴君，而你们却是称叶卡捷琳娜为慈母的哟！"这几句话可能感动了当时的许多天真俄国人。这些话是写得很聪明的。然而一些学者却每每夸大了这些话的意义。实际上，《索列娜》的经历要比克尼亚日宁在更早以前所写的悲剧《弗拉季米尔和雅罗波尔克》的经历好得多了。

这部悲剧原定在宫庭舞台上上演，但后来"由于许多剧场的故障"，"摆了下来无人过问"。根据斯托佑宁的假定，叶卡捷琳娜认

为，弗拉基米尔公爵在舞台上以多神教徒的身份出现，是不合适的。这可能使人感到意外，因为这里所说的是伏尔泰的女弟子。但是如果注意到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如同一斯托尤宁所提及，在即位以后写过："当剧情涉及偶像受牺牲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我在剧院里看到后老是感到痛苦"[①]。在《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波尔克》问题上，叶卡捷琳娜除了笃信宗教之外，还有其他动机。在这部悲剧里，有许多类似以下的独白：

俄罗斯啊，

你被自己的执拗的王公的情欲现在搞成什么模样啊！

你的命运决定于娇妻的眼色，

英雄的国家，在今天——

已沦为情欲的游乐场地哟！

在多情的叶卡捷琳娜的朝代，这样的台词可能在来到剧场的观众中，造成不利于女皇的构想。因此，最好是将克尼亚日宁的创作摆起来不问。但不管怎样，叶卡捷琳娜显然在法国革命以前很久，便已在她认为需要时，对文学创作实行严格检查了。

此外，还须记住，克尼亚日宁在《诺夫戈罗德的瓦丁》一剧中所安排的几个共和派，他们所反对的，不仅是"专断独裁的暴君"，而是整个君主专制的权力，无论皇帝慈父或女帝慈母，都是一样。地方行政官普列涅斯特承认吕里克是宽宏大量，温良公正的，但他对吕里克仍抱着不可克制的猜疑态度。他深信，吕里克一俟王位巩固，便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现在他守法，

　在一切方面都同我们平等；

① 见B.Я.斯托尤宁的论文：《作家克尼亚日宁》，《历史通报》，8月号，1881年，第443页，关于克尼亚日宁，另参阅Ю.韦谢洛夫斯基的论文：《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卓越剧作家克尼亚日宁及其悲剧》，见《文学概论》第Ⅰ卷，莫斯科，1900年，第319—379页。

但在往后，

他将把一切法律和我们一同践踏在脚下。

吕里克戴着假面具。纵令不是这样，纵令他是真正公正，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力也定将使他变坏。

哪一个戴上王冠的英雄不失足？

不陶醉于自己的至尊至大？

哪一个穿上龙袍的沙皇不腐化？①

这样理解君主权力对于君主道德的影响，使真正忠于人民幸福的人们不可能与君主达成任何妥协。正因这样，瓦丁和他的朋友，事实上，怎样也不愿同吕里克妥协。就这点说，克尼亚日宁剧中的主角，同科尔涅尔剧中的阴谋家钦纳是完全相反的。

当叛卖向奥古斯特揭开了阴谋的全部线索时，皇帝宽宏大量地向钦纳建议友好：

Soyons amis, Cinna, c'est moi qui t'en convie…

（钦纳，让我们作朋友吧！提出这个请求的是我……）

钦纳赶忙握着罗马统治者向他伸出的手。他深受感动，高声说道：

O vertu sans exemple! O clémence qui rend,

Votre pouvoir plus juste et mon crime plus grand!

（啊，这无与伦比的美德，它使您的权力更正当，使我的罪恶更深重！）

同这样的阴谋家尚可和解。但是同瓦丁是无法可以和解的，因为他是在手里拿着武器时被俘，因为他虽处在吕里克的权力之下，却对于吕里克的和解建议答复说：

你？戴王冠的？成为我的朋友？

别再迷惑人了，

① 第2幕，第4场。

还是使天堂与地狱相连接

比这更容易①。

当人民再次将吕里克刚刚拒绝过的权力硬加给他的时候，瓦丁看到他自己已被外在的条件所击败。他对吕里克说：

我看到，

你的权力出于天意。

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和制信念。他用无限轻蔑的言词辱骂他的跪倒膜拜的同胞：

啊！卑鄙的奴隶，

为自己请求枷锁！

啊！耻辱，

公民的精神从此毁灭！

瓦丁呀！这样的社会，

你竟是它的一员！

在克尼亚日宁的悲剧里，冲突是以瓦丁和他的女儿的自杀来解决的。在当时俄国的现实条件下，对于这一冲突，谁能作出哪怕是部分地与此相似的解决呢？"鞭刑刽子手"舍什科夫斯基会根据叶卡捷琳娜的指示，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悲剧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冲突的。任何其他的解决都是叶卡捷琳娜所不能同意的。既然如此，她自不能同意在俄国剧院的舞台上出现象瓦丁，普列涅斯特，维戈尔这样的不肯悔改的共和派。我们假定，在克尼亚日宁那里，他们都遭到失败，并且受到人民纵然间接、却是极为坚决的谴责，而人民的幸福，他们是愿意维护的。可是克尼亚日宁将他们描绘得那样高贵，那样无限忠于自己的思想，所以就令他们遭到完全失败，他们也还是危险的人物。对此，叶卡捷琳娜不仅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国王的脑袋落在断头台下以

① 第5幕，第3场。

后，就在她即位之初，也都不能同意。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的讽刺刊物，还不曾贸然美化不肯悔改的君主政权敌人，而叶卡捷琳娜却已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它们关闭了。为了博得她的赞同，必须使瓦丁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大家都知道，在她模仿“莎士比亚”写作的剧本«吕里克生平»里，对于瓦丁的传奇式起义，是怎样作了说明的。

剧本开头便认为瓦丁的图谋等于背叛①。此外，还说他的“背叛”不是由于对共和制自由的喜爱，而是由于对吕里克的嫉忌，“自己想坐上祖父的王位”②。最后，当胜利的吕里克向他告别时，瓦丁跪下来温顺地说：

“啊，国王！你是天生的胜利者，你的仁慈征服了一切敌人，制止了粗野无礼！……我永远是你的忠诚臣民”③。

这就是叶卡捷琳娜所需要的历史剧。我们的剧作家在描绘现存政权的敌人时，不能越出科尔涅尔在 «Cinna, ou la clémence d'Auguste»④ 一剧中所塑造的典型。然而克尼亚日宁超越得太远了。所以，«诺伏戈罗德的瓦丁»引起了叶卡捷琳娜的强烈不满，尽管它的作者想要描绘的是君主政权的胜利。以瓦丁、维戈尔和普列涅斯特为代表，在俄国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对俄国居民发生有害影响的角色。他们的范例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而在法国革命的时代，就更危险了。毫不足怪，叶卡捷琳娜认为«瓦丁»的出版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她质问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你发行这样有害于我和我的政权的条规，我什么事情得罪了你呢？”达什科娃想向她证明，克尼亚日宁的用意是极为善良的。但她只能平息叶卡捷琳娜的情绪，却未能使她回心转意。我们看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① 第 5 幕，第 2 场，地方行政官多勃雷宁的台词。

② 第 1 幕，第 5 场。

③ 第 5 幕，第 5 场。

④ «钦纳或奥古斯特的仁慈»。

的①。

VIII

不能把剧中主角所发表的观点当作剧作者的过错。这里的问题只能是性格描写的艺术真实，——因而也只能是观点的艺术真实。这是无可争论的。可是，叶卡捷琳娜完全是从另一方面考虑这个问题的。她可以说:"就令瓦丁、维戈尔、普列涅斯特所说的台词符合他们的性格,但其政治内容也会给我造成危害,对我的臣民发生于我不利的影响,因此我宁可禁止«瓦丁»的发行"。按照她的考虑,她也许是对的。

我已经不只一次说过，当时俄国的经济制度使俄国不可能发生象 18 世纪解放哲学那样的比较认真的运动。我们知道,甚至我国的"伏尔泰门徒"也未能很好地吸收这种哲学思想，但是先进的法国学说一经进入俄国，总还对俄国思想界有所推动。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谢尔巴托夫公爵在社会方面是一个大的保守派。但他对"君主独裁制"的憎恨，却显然是在法国著作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克尼亚日宁很可能到死还是相信叶卡捷琳娜二世给整个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的。他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君主派。但是他剧本中的那些桀骜不驯的共和派，他们的那些显然从法国人那里抄袭来的演词，是可能引起或巩固读者或观众心中的政治反抗的。如我在前面一章中所说，问题在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是我国先进知识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开始——尽管这个开始还很微弱。这个先进知识界对于过去因受彼得改革的直接影响而忠心耿耿地服务过的政权,业已开始采取否定的态度。

---

① «诺夫戈罗德的瓦丁»由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以单行本印行，后来收进«俄国剧院或俄国剧作汇编»第 39 编，其后又在 1871 年 8 月号«俄国旧闻»中重印。我在上面所引述的«瓦丁»是根据这个版本的。1897 年,А.Л.布尔采夫在所编«俄国珍本书概述»中,重印了这部悲剧。

康捷米尔时代的“学术侍从”把专制制度看为“摩西权杖”，认为可以利用它，也只有利用它去克服莫斯科的野蛮愚昧。这批人远远没有立时承认自己的失败。但在18世纪下半期，已经不用担心俄国会回到彼得前的旧时代了。当然，颂歌的作者——由于《瓦丁》的创作而引起叶卡捷琳娜不满的克尼亚日宁也包括在内——“歌唱”：“愚昧无知的针芒现在已是完全软弱无力”①，这是违反真实的。愚昧无知虽然放弃了彼得前的某些旧阵地，然而依靠一大批斯科季宁之流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它仍旧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因此，先进的俄国知识界热烈欢迎了政府一切这样或那样反对愚昧无知的措施。他们决心用一切力量支持这种措施。然而痛心的是，他们开始觉得愚昧无知每每受到开明的叶卡捷琳娜的政府的支持。因此，在他们中间，渗进了不满情绪，在他们的某些代表人物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果‘摩西权杖’不过是停滞的工具，那该怎样办呢?”这时，他们开始谈论和写作一些引起“慈母——女皇”的最强烈愤怒的东西。

我很快就要详细论述18世纪先进知识界的两个最大代表人物：A. H. 拉季谢夫和 H. И. 诺维科夫。现在我想用两三页的篇幅一谈不很出名，但却才华出众，不很显赫，但却真诚坦率，笃学深思，饱经患难的费多尔·克列切托夫。他的榜样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克列切托夫，贵族出身，但似乎景况不很富裕，最初在卡拉切夫斯基省长办公厅任司书(1761年)。后来，他在陆军总司令拉祖莫夫斯基的司令部、司法部任抄写等职。1775年，他在迁升为少尉后辞职，但数年后，他又从军，被任命为少尉，并被派到最高权力机关参政院贵族铨叙局工作。他在官级上的缓慢迁升到此结束。

① 克尼亚日宁在给达什科娃公爵夫人信中的用语。

在其后的时日里，等待着他的只有失败和残酷迫害[1]。

克列切托夫在他的办公厅同事中仿佛是一只白色的乌鸦，迥然与众不同，因为他博览群书，努力思考，甚至提出了广泛的写作计划。

后来，他被关进秘密审讯处，讯问他为什么从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中作了许多摘要。特别使秘密审讯处注意的是《论国家政体》一书的摘要。这些摘要所以引起注意，不仅是根据教区管理局的观点。

摘要说，社会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政府，并对它进行任何变革；任何政府的主要目的应为谋求人民福利[2]，而最大的"人民福利便是自由，社会构成国家，社会的自由有如人体的健康。"接着，摘录里还记录一种见解，认为法律无论如何应该制止统治者的傲慢骄横，以及需要一种威胁贵族的临时或经常政权。

在科罗尔科夫论文所引述的摘录里，没有看到共和派的观点。摘录甚至说，善良公正君主的统治，也可能带来黄金时代。不过又补充说，"如果不是这样的君主，则本应提高臣民精神状态的根本基础，亦可转化为卑鄙下流和奴隶制。"这当然是秘密审讯处的官员所不乐闻的。很显然，克列切托夫的思想已不满足于流行的政治权力概念。但这还不是说，克列切托夫已吸收了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学说。应该记住，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说的种子，已经落在有了特殊准备的土壤上了。

克列切托夫幼年很少学习。他受的是"家庭教育"，这种教育所用教科书，按照那时的旧习俗，是赞美诗集和其他圣经。这位好

---

① 见Г.М.科罗尔科夫的论文《费多尔·克列切托夫——18世纪的什利谢尔堡囚犯》，1906年8月号《往事》杂志。

② 这很象爱尔维修。爱尔维修证明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科罗尔科夫有可能了解克列切托夫的案子，可惜从他的论文里看不出谁是《论国家政体》一书的作者。我们只能了解到，在这本书里发表了当时的先进政治观点。

学的少年极为勤奋地读了这类印行的作品。它们给了他深刻印象，就是成年以后，也常吸引他的注意。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形成的观点，表现为先进的法国哲学思想和或多或少经过独特诠释的基督教学说的混合体。

然而这些混合的——直接了当地说，混乱的——观点最初并不包含任何反对派的东西。克列切托夫长期相信，叶卡捷琳娜是一个能够带来黄金时代的君主，他决心竭尽所能，促进她的开明计划的实现。他想建立一个“全民的自由恩惠及于一切人的团体”，这个团体的目的是建立学校，以便在俄国普及法律知识。作为一个根据本身经验、深切了解我国司法可怕的人，克列切托夫认为对人民实行法律教育，是保障人民幸福的最必要条件。他天真地以为叶卡捷琳娜的政府只会赞同他的善良意图，便向女皇本人，以及东正教最高会议、主教和其他达官显贵，发出请愿书，竭力证明尽快组织他所计划的那个团体的必要性。同时，他在时而发给一般公民，时而发给妇女，时而发给僧侣的宣言里，大谈教育的利益，最后，还写了诗，再次说明公正审判对于社会是多么重要①。

长篇诗«卡米洛娃五梦»包含着整个历史哲学。克列切托夫在那里叙述了各种权力的产生过程：

社会实行法律才有了法官，
要在许许多多对象中选出优秀的人们充任。
从各式人等中选出来的法官进行会审，
他们根据真实……
会比所有的人更合理地裁判。

最初，案件都是由人民自己审理的。后来，“由于很难将人民召集到法庭”，所以决定给最聪明的人以元老称号，委托他们裁决

①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国17世纪的讽刺作品多么无情地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

“一切争论”。但是，元老们开始滥用赋予他们的审判权。出现了谎言，纠纷，争吵，斗殴。因此，公民们对自己说：

……我们将选出国王，

又将选出长老给他帮忙，

这长老应给所有人以公正的审判。

让他们都向我们宣誓：

国王将成为我们的慈父，

长老将是(温顺的)绵羊的善良牧人。

请注意，这里将君主制描写为同灾祸斗争的手段，而灾祸是由于元老院，即贵族制的建立而产生的。克列切托夫是完全不同情门阀贵族的等级意图的。在门阀同官吏的论争中，他是站在官吏方面的。他写道，光荣应归于对国家有功绩的人，而不应归于贵族祖先的子弟：

这对国家有何补益：

如果他做了五百年贵族，

对社会未做任何好事，

却享有他祖先所享有的同样权利。

我还可进一步指出：在他的摘录里，看不到他对于摘自《论国家政体》一书中的思想，即需要建立一种使贵族畏惧的政权的思想，不敢有任何反对的意见。

在克列切托夫那里，君主的世俗权力是由长老的宗教权力来补充的。至于民主制，则一字未提：民主制由于一个非常单纯的理由，即所谓“人民召集”很难，而宣告结束。作者的政治自由思想，只不过表现在对法律——即帕宁兄弟所说的基本法律，而谢尔巴托夫则称之为根本法律——有所暗示：

在俄国要使良好的道德风尚取得成就，

必须建立普遍的规章制度：

使善良的子弟不因有了坏的父亲而惨遭杀戮，

使坏人不因祖先的善良而把尊荣享受。

对任何人

都给予应有的权利。

这几行诗里所包含的暗示是这样微弱，断然不能成为其作者的革命情绪的象征。而且对于一个恰好在写作长诗《卡米洛娃五梦》时又写出《叶卡捷琳娜明智统治颂》的人[①]，也不可能怀疑他有这种情绪。

由于在1787年前，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是出版了一部小册子《不是一切，也不是乌有》，所以在这一年，他想用特殊的期刊形式，将这些著作出版。关于出版这个期刊的通告，也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题目为：《新刊物的发现；使用者的心灵；关于一切和为了一切；关于告知所有人的所有一切，或俄国爱国者和爱国主义》[②]，但是，他在这件事上没有成功。

彼得堡的总主教认为这一新小册子的标题可疑，因为"关于一切和为了一切"等语句，是在作弥撒时唱的。他通知警察局长注意他。警察局长同教区管理局进行洽商。教区管理局在对病中的克列切托夫进行审讯后，认为这个案件不能受理，便将原案转送下纳德沃尔法院。总而言之，如果戈里所说，整个官僚机构都转动起来了。这个总主教向官僚机构使尽全身解数的结果，是禁止克列切托夫从事"这种不能许可的著作"，禁止"任意"刊行。

这意味着：停止著作生涯。这对克列切托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开始痛恨女皇，虽然不久以前，他还曾在颂诗里过分誉扬过她。他开始对她，对一般俄国制度发出尖锐的批评。这便给他带

① 在科罗尔科夫的论文里写明，这篇颂词写在1775年，但根据叙述的过程，这是误植，颂诗是在1785年，亦即在写完《卡米洛娃五梦》后一年写的。

② 标点符号的安排均按原稿。

来了新的、比以前更不愉快得多的官僚机构的压迫。

IX

1793年4月，有一个叫马列涅斯基的人，——塔季谢夫的家庭理发师，当时克列切托夫就住在塔季谢夫的家里，——给彼得堡省长写了封告密信，说"他(即克列切托夫——著者)愤恨当局无法无天，反对滥用职权，主张恢复人民的权利"。告密信里附有给女皇的呈文，报告她：克列切托夫"辱骂和责备"她，"咒骂皇太子和国家"，"骂整个元老院是贼和强盗"。最后，这个叛徒报告说，"克列切托夫要开化俄国，使人民摆脱沙皇的枷锁，要通过总的立法，使法律成为不可侵犯"①。

马列温斯基的告密，为一个名叫斯克沃尔佐夫的人、特别是为登记员奥库洛夫的供词所证实。奥库洛夫是克列切托夫的朋友。除对女皇，皇太子，总主教等的尖锐批评外，秘密审讯处还听到奥库洛夫说，克列切托夫在谈到法国革命时曾补充说，这样的爆炸也可能在俄国发生。进行侦审的官僚们开始明白，他们所处理的是一个很危险的罪犯。

作为一个"道德恶劣，灵魂肮脏"的人，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暴徒"，作为一个"人类的恶魔"，打算"在俄国建立一种足以毁灭国家现有一切完美事物的政体"的克列切托夫，被判在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要塞监禁，"非经皇上赦免不得释放"，也就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上写了无定期，并不是因为法官认为可能在往后释放这个犯人。不是的！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要塞决定将他关押到"赦免"，还有另一理由，"因为更重要的是"——判决书承认，——"有时会接到一些通知，要对他进行侦查"②。

① 《论国家政体》，第47，48，49页。

② 同上书，第58页。

这个理由很快就得到证实。被判刑一月后，克列切托夫再次被转押到秘密审讯处，因为案卷里发现了他的凶恶意图的新证据：在他的一节札记里说到必须“阐述彼得三世事业的伟大”。叶卡捷琳娜政府想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事业。克列切托夫解释说，这里所指的是两道“上谕”：“第一，关于贵族自由的上谕”，第二，关于不得将诉讼人交给他们所控告或检举的人审讯的上谕。其后，还向他提出了若干类似的问题。例如，在另一札记里，可以看出，他准备——只是准备——写些关于宗教信条的新解释。他的这个意图也被指为犯罪，因为旧信条是“大批殉难者用血写成的”。这些罪名不能认为是严肃的。更重要的是克列切托夫对于女皇的下述评价。他们问他：他所说的一种思想——也是写在案卷里的——认为耶稣是全人类的君主，是什么意思？法官气冲冲地补充道：“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许多君主；君主的称号，是指经过加冕的君主制元首”。克列切托夫答道：“我想只承认耶稣基督一人为君主，至于加冕登极的元首，我认为只不过是法律的维护者和执行者而已”。

他的万恶的意志，现在当局看来是比以前更加不容怀疑了。检察长在关于他的案子的新报告里写道：

“根据他的思想和他所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不愿有君主，而更关心的所有一般人的平等和自由；因为他说过，既然给贵族以自由，为什么不把自由也推及农民呢？他们也是人呀！”不能不承认，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贵族政府看来，这种思想不能不是“肮脏卑鄙的”：关于贵族自由的诏书发布后，农民发表的意见同克列切托夫在这里所发表的意见，完全一样。他们在一些地方拒绝服从地主。必须把发表这种主张的“恶魔”更远地囚禁起来。根据叶卡捷琳娜的命令，克列切托夫被转押到什利谢尔堡要塞①。

① 《论国家政体》，第60页。

克列切托夫直到亚历山大一世即位后，才从监狱获释。释放了许多被叶卡捷琳娜判罪的人，却不愿宽恕他，可能是因为克列切托夫尖锐地批评女皇的时候，不曾饶恕这一王位继承者的原故。

在总结这一饱经患难，对叶卡捷琳娜深感失望的失败者的观点时，必须首先指出，他的观点是很温和的。克列切托夫虽不否认他对女皇的尖刻的批评，并企图用他在病中易动肝火来解释这种批评，但他对于奥库洛夫说他同情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变，却是矢口否认的。根据他的解释，可以看出，他认为革命是"最大的罪恶"，俄国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及时的改革来避免它。在法国的恐怖开始前，可能他对革命的态度曾经有所不同；但恐怖吓坏了他，正如它吓坏了在法国和在法国以外的所有反对旧制度、又希望不费巨大代价换取自由的人们一样。我们在下面就将看到，许多十二月党人也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革命是罪恶，应该用及时的改革来阻止它在俄国出现。

不仅如此，克列切托夫尽管在这里同人民想到一处，认为贵族的自由应该逻辑地导致农民从奴隶依附中解放出来，尽管他也仿佛同意应该有使贵族畏惧的法律，但是他对于人民，还是抱着一种鄙视和不信任的态度。他否认强加给他的所谓通过武装叛乱以解放农民的意图，力言他"不可能有这种思想"，因为他知道，"群氓的解放会给社会生活"带来怎样的灾难。他坚信给粗鲁无知的人以自由，"等于给儿童利刃以代替玩具"。他在发挥这一思想时还说，"自由的真正力量，就是有知识的人也不都知道，而我国人民的很大部分，却是连字都不识的"[1]。

如果"群氓"的解放是一种对社会生活极为危险的事，如果另一方面，掌握国家命运的人物又对"群氓"的幸福极为鄙视，那就没有出路了，那就毫无希望了。克列切托夫有时不由自主地得出这

① 《论国家政体》，第57页。

样的结论。由于他停止在这种结论上，所以他就不得不情绪悲观了。

一个愿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如果把人民只看为一群没有历史能动作用的乌合之众，那必然感到自己力弱势孤。先进的俄国知识界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越来越坚决地（有时甚至不惜自欺地）绞尽脑汁，考虑出另一种对于劳动群众的观点，使他们能够相信，这种乌合之众尽管没有知识，却既能理解和保卫自身的利益，又能理解和保卫与自身利益相符合的整个社会利益。

我们在拉季谢夫著作里，已可看到这种观点的萌芽。①

---

① 就此一提：克列切托夫同奥库洛夫谈到拉季谢夫被捕时，虽然谴责叶卡捷琳娜对拉季谢夫的残酷态度，但断言"拉季谢夫的书是胡闹和乱扯"。(«论国家政体»，52页）这一尖刻的否定批评所根据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

第十一章　西方和俄国对18世纪解放哲学的反动

I

18 世纪的先进哲学，是法国第三等级的实际意图的理论表现。这个哲学受到利益与这些意图相矛盾的阶级的反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为这样的现象所欺骗，即在某些法国贵族的沙龙里，曾经兴趣盎然地谈论百科全书派的著作。这是一种极端表面的爱好，只能略为减少新哲学思想传播的困难。试一回想«百科全书»的命运罢。它的编者和出版者对于它的命运，总是非常担心的。它的主编，高贵的狄德罗，通过自己的痛苦经验，深知在实现新哲学的解放理想的道路上，有着多少障碍。我们知道，他曾经用这样的思想聊以自慰，即认为在一个“什么也未作过”的落后国家里，解放理想更为易于实现。先进的法国人竟然以落后为进步的保证，——这一事实已足表明，他明确地认识到在欧洲的先进国家中，新哲学的追随者将不得不经受多么严重的斗争。

世俗当局和宗教当局，都同新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世俗当局通过检察官而行动，这些检察官为控告“渎神著作”(Productions de l'impiété)① 的作者提供法律的形式；这个当局又通过刽子手而行动，这些刽子手在法官判决取缔这些著作时予以焚毁；最后，这个当局还通过狱吏来行动，当被判有罪的作者被押解到巴士底狱、温森或其他监狱时，他们便生活在这些狱吏的监

① 作为例子，我可以指出检察官舍耶在 1770 年对«自然体系»及 6 部其他“坏”书的公诉。

管之下。

宗教当局由各种地位较高的天主教会官员出面行动，他们揭发新思想家的“错误言论”，从而引起检察官口若悬河地对这些思想家进行轰击[①]。教会的观点又为整批作家所拥护，这些作家在包括剧场在内的各式各样集会场所，高谈阔论，作为呼应。耶稣会的机关刊，«Le Journal de Trévoux»（«特雷沃报»）和冉森教的机关刊«Les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教会新闻»）为反对解放哲学，进行了猛烈的系统的宣传。

除了这些官方敌人之外，解放哲学还有一些非官方的敌人。这后一种敌人对它抱着同样仇视的态度，对它即令不是更为危险，也是同样危险的。我所说的是神秘主义者。

什么是神秘主义呢？费尔巴哈早就对这一用语的过于不确定，正当地表示不满。因此，我认为在这里指出神秘主义宇宙观的那些对社会思想史最为重要的方面，是有益处的。现在向佩平请教，他写道：

“神秘主义的名称，一般用于这样一种道德—宗教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关于神、自然和人的明确概念，为普通人的认识所不能达到，亦为真正宗教所不能提供；它只能通过与神的直接接近，只能通过与最高的神的世界的神奇统一，才能达到。这种统一是在毫无结果的理性的一切活动范围之外发生的。”[②]

这一定义，就我们的目的说，可以认为满意，因为它所突出的，正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些方面。

① 不过，天主教会不仅通过布道演说，而且时常利用直接告密的方式，来轰击所谓“有害的”作家。一位法国作家曾经指出，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几乎没有一次僧侣代表大会不要求国王和检查机关注意“哲学”的进展。对«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的迫害，便是由1770年僧侣代表大会给国王的呈文发动的。用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国王送交这一呈文的人，向国王控诉«自然体系»的作者是继续“以观测天体景象为乐，他对天体进行侮辱”。

② «俄国共济会»，彼得格勒1916年版，第204页。

一个社会制度如果是巩固的，则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信仰体系，也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这个社会制度过时了，则上述体系也就趋于瓦解。我们在18世纪的法国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旧秩序”的衰落，在法国带来天主教会影响的削弱。然而不是所有脱离天主教影响的法国人，在那时都放弃了精灵论宇宙观。在人类文化史上，以为宇宙是由一个、几个、或许多精灵统治着的信念，在各种真正宗教产生以前就已存在。这种信念比许多真正宗教存在得更久。在一些古代宗教解体时，精灵论观点仍旧非常流行。这时，神秘主义——其特点，如佩平所说，在于信仰人与神、与一般灵魂能够直接统一——开始加强起来。

类似的情况，在法国的“旧秩序”开始全面崩溃时，亦曾发生。“旧秩序”的解体，带来了天主教影响的衰落。但这在许多法国人中又造成，或加强了神秘主义的趋向。这些法国人尽管不再满足于天主教，却尚未能对宇宙过程具有科学观点，尚未能把这个过程看为具有自己的原因，因而也具有自己的解释的规律性过程。

对于真正宗教，也不是所有神秘主义者都漠不关心。在这里，也如象一切地方一样，形式各有不同。有些神秘主义者完全同真正宗教决裂；另外一些神秘主义者则力图同某种真正宗教保持联系。例如，18世纪的俄国神秘主义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认为自己是东正教的忠实信徒。但是，一般地说，所有神秘主义者，都不很重视，甚至很不重视真正宗教的教条和仪式。有些人甚至攻击真正宗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科学宇宙观的拥护者。否。这个宇宙观，对于爱好神秘主义的人们，也许比对于真正宗教的信徒，更为格格不入，更可憎恶。因此，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神秘主义者所以反对某种真正宗教，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真正宗教不是同不信神现象作斗争的充分有力依靠。

例如，18世纪法国的著名神秘主义者圣-马丁（1743—1803）

在反对天主教时说:“神甫产生了哲学家,而哲学家则产生普遍的毁灭和死亡”。很显然,他认为他那时代的主要罪恶不是天主教,而是解放哲学。毫不奇怪,他所极不喜爱的哲学家们也对他以牙还牙。伏尔泰批评“一个无名哲学家”① 的著作 «Des erreurs et de la vérité ou des hommes rappelés au principe universel de la science» (《人的谬误与真象产生科学的普遍原理》)(1775 年出版),在他所读过的书中,是最荒谬的一本②。

我国有位学者不久前在谈到这本著作时说:这本书的作者“在神秘的伪装下对宗教和当局进行攻击”③。我们已经知道,应该怎样理解圣-马丁对天主教的攻击。至于他对当局的态度,那是完全同他对宗教的态度一致的。他不满意当时的法国制度,但同时又断言,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不能寄希望于人的智慧,而只能寄希望于法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天意的干预。18 世纪神秘主义著作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圣-马丁的宇宙观,其一般特性可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即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最大反动派、天才而热情的约瑟夫·戴-麦斯特尔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

完全可以理解,神秘主义者所极不喜爱的哲学家,对于神秘主义的真正本性,一点也不曾看错。刊载在《百科全书》中的论文«Théosophes»(«通神论者»)的作者说,神秘主义者是一批患着周期性疾病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与他同代的神秘主义者,极尽所能地设法缩小理性的范围,而将人类的知识限制在新旧约全书以内。他说,如果政府听信他们的意见,我们将陷于野蛮愚昧之中。

神秘主义在批驳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时,主要地攻击了唯物主

① 圣-马丁的笔名。

② 他写道:“我不以为曾经是什么时候出版过比这本书更荒谬、更无知、更无稽、更愚蠢的著作”。

③ 瓦休京斯基的论文«法国的共济会»(见«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米尔古诺夫和西多罗夫主编,第 I 卷,第 52 页)。

义者 圣-马丁称他们为唯物哲学家(“les philosophes de la matière”)。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唯物主义哲学，而且只有唯物主义哲学，才是同神秘主义哲学完全对立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及其全部属性，都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神秘主义者则认为自然不过是神的启示。

根据圣-马丁的理论，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而精神世界又是神的世界的象征。根据唯物主义理论，认识的唯一来源是人的智慧所阐释的经验。根据神秘论者的理论，最深刻、最卓越、最真实的认识，是通过神的启示达到的。神秘主义的自然哲学不过是神智学。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他所不了解的东西。神秘主义者却说：为了了解，就得相信。唯物主义者轻蔑地否定魔法，而且同样轻蔑地对待一切巫医和巫法。而在神秘主义者的眼光里，魔法是一种比普通自然科学更值得尊重，更为严肃的东西。圣-马丁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人的精神成为“超自然的东西”(Aux choses surnaturelles)。

这个圣-马丁说，应该用人来解释物(自然)，而不应用物(自然)来解释人①。这寥寥数语，最明显不过地表示了神秘主义宇宙观和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对立。

唯物主义人性论的出发点是：人性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环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唯物主义者的意见，是社会制度。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性，意味着即令不用物，也应用社会关系来解释人。当然，神秘主义者是不会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的人性理论是从人的精神这个概念出发的。他们说，在人的精神里存在着神火的质点，为了对人进行适当的教育，只要利用这种神火的质点就行了。由于这种质点来自神授，所以非常明显，社会关

① 根据这一观点，他说应该研究的是自然的目的性规律及其存在的始因，而不是现象。

系不能对它有决定影响。天堂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不能通过社会改革进入天堂。进入天堂必须通过一定的精神"锻炼"，主要是通过神秘主义的精神"锻炼"。这种"锻炼"的目的，就是求得人神的直接统一。

温德尔班得在阐述著名德国神秘主义者雅科布·白约梅(1575—1624)的"哲学"时指出，应该承认，这一哲学的道德后果是逃避现实世界①。这一见解不仅对白约梅的"哲学"说，是正确的。任何神秘主义的道德观，都不过是宣传逃避现实的人间世界而进入幻想的精神世界。神秘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的道德观，无知地把它看为利己主义宣传。实际上，神秘主义者的道德观才是利己主义的，他们归根到底只是想使他们自己的灵魂同精神世界保有称心如意的关系。

唯物主义的人性论认为必须实行社会改革。在彻底神秘主义者的眼光里，这种改革没有任何重大意义。

18 世纪的神秘主义一方面是旧制度解体的产物，同时又是对当时的革命潮流的反动。这就是为什么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法国革命前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而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伦理学，则在革命风暴后的政治和思想反动时代取得主导地位②。

II

18 世纪的神秘主义，在一些地方深深地渗入了共济会运动。

---

① 《新哲学史》，韦坚斯基（А. И. Введенский）校订的俄文译本，第2版，第1卷，第99页。

② 关于圣-马丁（他的著作在 18 世纪俄国神秘主义者中享有很大威信），请参阅卡罗：《圣·马丁的生平和教义》（«Caro, Essai sur la vie et la doctrine de Saint-martin»），巴黎 1852 年版；弗朗克：《十八世纪的法国神秘主义哲学》（Frank: «La philosophie mystique en France au XVIII siècle»），萨库林在所著俄文本《俄国唯心主义史纲——奥多耶夫斯基公爵》中，作了很好的阐述，见该书第 1 卷，第 1 篇，第 395—422 页。

我说在一些地方，因为，比方英国的共济会“体系”，就没有神秘主义的精神。诚然，英国共济会不吸收“无意义的无神论者”入会。共济会会员一定要相信宗教。但安德生牧师的著名《宪法新书》，则将一切共济会会员所必须遵守的宗教，归结为简单的道德要求的总和。那时的英国共济会运动表现了在英国革命和复辟时代相互残酷斗争的各种基督教派的妥协趋向。当引起 17 世纪英国革命的主要社会需要得到满足，而革命后的反动又得到消除时，各种宗教教派之间的斗争便丧失其社会意义了。И. М. 赫拉斯科夫说："在信教自由法案、人权法案(1689)通过以后，由于保证英国未来经济蓬勃发展的乌德勒支和约(1713)的签订，英国统治阶级的人们，觉得一切都已满足。继续纠纷，在他们看来，是可惜的，是不必要的内讧。自然，“无意义的无神论者”构成对“文明基督社会”的威胁，是不适宜于自由制度的；罗马的天主教由于同情反动的君主制，也受到怀疑。但在所有其余“忠诚和正直”的人们之间，已不可能有重大分歧了。至于细微末节，那是不值得争论的。各种不同教派之间的神学论争，现在也属于这种细微末节的分歧”①。

1815 年出版的安德生《宪法新书》的新版本——其第一版于 1723 年出版——写道："不同的宗教和祭神方式，不应成为把任何人——只要他信仰天和地的光荣建造者并履行神圣的道德责任——开除出法兰克共济会的理由"。② 这里没有我在上面所说的神秘主义。相反，可以说，这几句话的作者的观点，是同伏尔泰的自然神论相接近的。

当然，伏尔泰是以更加彻底性著称的。他实际上满足于信仰“天和地的光荣建造者”和履行道德的要求，但是，甚至唯理性主义

---

① 《18 和 19 世纪英国共济会的产生和发展》——《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 1 卷，第 22 页。

② 引自赫拉斯科夫，同上书，第 33—34 页。

的共济会支部也只准许基督徒参加;至于犹太人、回教徒以及其他人,则是不许参加的。尽管共济会的多神教范围不很广泛,但是多神教的存在这一事实,已足证明英国"体系"的共济会组织是不受神秘主义的影响的。英国"体系"渗进了法国,但法国的共济会支部在观点上却比英国先进得多。1769 年由著名天文学家拉兰德建立的科学支部,就是这样的支部。这个支部的会员有赫赫有名的伏尔泰、弗兰克林、孔多塞、杜巴迪、西哀士、巴里、罗姆、卡巴尼斯、加耳、卡米尔·德摩伦等人①。图卢兹的《百科全书》支部的"工作"方向也是如此。它几乎是在革命前夜建立的,建立后赶忙为支部的图书馆买了一部"百科全书"。支部建立一年后便吸收了 120 名会员②,他们大都是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的③。但是,英国已于 17 世纪完成了第三等级革命,而在当时的法国,这个革命却只是接近于爆发。上面已经阐明,旧秩序的崩溃造成神秘主义的产生和传播。神秘主义也渗进了许多共济会支部,其会员开始积极研究各式各样"秘密科学"(Sciences occultes)。这些法国共济会支部的性质是反动的。在他们中间,神秘主义成为反对法国新哲学的工具。

德国由于当时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远远落后于法国,所以神秘主义的精神在先进思想家中所受到的反击,较为软弱,其传播亦较快。按照佩尔采夫的说法,在那里,神秘主义成为一种社会传染病,甚至思想清醒的人,亦未能免。这位学者引述了很负盛名的历史学者缪勒的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摘自缪勒在 1790 年写给他的兄弟的信),他说:

---

① 瓦休京斯基:《18 世纪的法国共济会》——《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Ⅰ卷,第 55 页。

② 法国的共济会支部平均有会员 15 到 30 人。

③ 瓦休京斯基:同上书,第 55—56 页。值得注意的是,"百科全书"支部的会员,大部分为手工业者。

“在我的身上，有一种通常不能在同一个人心灵里兼收并蓄的东西：在世俗事务上，我赞成温良，赞成秩序，赞成宁静，赞成理性的统治，但我的信仰却自然而然地，不要书本，不要负责，变得越来越加神秘主义…… 我事实上认为神秘主义是真正普遍的宗教”①。

因此，当佩尔采夫说，德国共济会的发展过程是德国通灵术，魔法，甚至直接招摇撞骗术历史中最显著的一页时，我们不能责备他是过甚其辞。在魔法、欺骗以及政治蒙昧主义方面，“金玫瑰十字会”或“蔷薇十字会”会员的“努力”，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人。

“蔷薇十字会”的起源，迄今尚未完全查明。它的创始人，据说是生活在17世纪初期的安德列。但是在17世纪，“蔷薇十字会”已否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存在，还不能认为已经证明。但是，在下一世纪，“金玫瑰十字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俄国，却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那时，它很迅速地与共济会合流。

佩平说：“它的老巢在柏林，它的主要特点是蒙昧主义及迷信同政治反动的非凡混合。18世纪启蒙运动所反对的黑暗停滞的传说，似乎都在“蔷薇十字会”里结合在一起。”象其他较晚的共济会体系一样，“蔷薇十字会”完全放弃了英国共济会的比较合理的传说，而竭尽全力研究神秘主义和一切可能的“秘密科学”。“蔷薇十字会”吸收了以贝姆为首的神秘主义哲学，以及“通神炼金术”和“通神魔术”一类最无稽的幻想。他们鄙弃简单的炼金术和魔术，似乎这都是愚蠢的物质的法术，而在事实上梦想炼出哲学家之石、黄金，等等②。

谢梅卡在古代文字发掘学会收藏的文件里，找到了两件有趣的手写本。其中一件解说怎样在“蔷薇十字会”的第七级进行“秘

---

① 《18世纪的德国共济会》——《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I卷，第62页。“德国共济会取得了完全确定的贵族特征”。（佩尔采夫，同上书，第68页）

② 佩平：《俄国共济会》，第488—489页。

密炼金术”。对于所有愿意了解18世纪神秘主义反动使用了什么精神武器来同先进法国哲学斗争的人们，谢梅卡所详细阐述的这一手写本的内容，是极为值得注意的。

手写本的作者建议在月圆时收集五月露水，以两分男血及三分女血与之混合。保存这一混合物的容器，应放在温暖的地方。很快在容器底上出现红色的沉淀，留在表面的称为menstruum（溶剂）的东西，应分存在单独的玻璃瓶里，随时将其倒进第一容器。此外，还要给第一容器增加一克用动物制成的“酊”。作者保证，若干时期以后，在容器里会出现两个活的生物：“男孩和女孩”。如果注入容器的血是从纯洁的人身上取出来的，则男孩和女孩都将很美丽。在相反的情况下，他们都将是半人半兽。在遵守必要条件时，这些生物可存活一年，在这一年里，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所要了解的一切，“因为他们怕你，尊重你”。不仅这样。在这容器的中心，还将长出一株果实累累的嘉树。经过一年以后，女的和男的吃了树上的果子，因而死去。这时容器里的东西凝结起来，分为四个部分。上部是“耶路撒冷的天堂”及其全体居民；第二部分是琉璃世界（原文如此！）；第三部分是“红色的琉璃大海；最后，第四部分是魔鬼的黑暗住处。”末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变为一条可怕的蠕虫，四天以后消失，等等。

谢梅卡所找到的另一手写本指明怎样制造“乌里姆”。利用这一奇异的东西，可以看到一切，“既可看到星座，又可看到地下、山岳、山谷以及一切地方”。同一手写本还有关于神术的说明，仿佛神术可使人与灵魂交往，并驱使他们。这个手写本的作者用训导的口气说：“神术不是游手好闲的尝试，也不是推理的幻想，而是一种使你达到完全净化的科学。你的灵魂将如天使，你的意志将伸展到能使用一切天才的魂灵，进行有益的事业”①。

① 见谢梅卡的论文：《18世纪的俄国共济会》——《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I

读者自己会看到，只有既丝毫不懂得科学的对象，也丝毫不理解现象研究的科学方法的人，才会把这种梦呓当作科学。传播以上所述的“神怪”知识，意味着用荒诞有害的胡言乱语造成头脑的混乱。然而整个“蔷薇十字会”的秘密智慧，却正是处于这个水平。对于那些想用这个污浊的水源去解除折腾着他们的精神饥渴的人们，是应该为他们深切惋惜的！

III

在很大程度上俄国化了的特兰斯瓦尼亚德国人约翰·格奥尔格（俄国人称他为伊凡·叶戈罗维奇）·什瓦尔兹（1751—1784），曾在我国努力传播“蔷薇十字会”的神秘主义。

他在1776年由И. С. 加加林公爵聘请到俄国，充任拉赫曼诺夫子女的家庭教师。他在拉赫曼诺夫一家居住的莫吉廖夫省会，学会俄文。但在1779年，他迁居莫斯科，受聘为哲学和“小说”讲座的编外教授。这时，这一精力极为充沛的人，在俄国扮演了神秘主义宣传家的角色。

为求便于传播神秘主义的观念，必须削弱法国先进哲学的影响。于是，什瓦尔兹在他的哲学演讲里，大事抨击法国先进哲学。看来，这些演讲在听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出名的《犹太复国主义通报》出版人拉布金，对什瓦尔兹的哲学演讲作过如下的回忆：

“当时髦的作家贪馋地吸收着一些不成熟的思想的时候，什瓦尔兹作出了高贵的努力，驱散弥漫的黑暗……。他在一所私人住宅里，发表了为自愿出席听讲的人们前所未闻的演讲。他同他们一道研究了爱尔维修、卢梭、斯宾诺莎、拉美特利等等，将他们同敌

卷，第167—168页；佩平：《俄国共济会》，第493—495页；关于化学造“人”的手写本的德文本，于1745年在德国出版（法兰克福和来比锡）。

对的哲学家进行比较，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找出每人的优点。仿佛新的光明照亮了当时的听众！这一德行出众的人物曾给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以多么好的方向啊！"①

什瓦尔兹的另一学生Л. 马克西姆维奇说："只有他才能教导和说服误入歧途的青年去忏悔自己的弱点，确认自己对无上智慧的创世主的依赖。他是在自己的住宅里发表他的演讲的，准许任何名位的人听讲，解释从古代和近代作家著作中提出的最疑难的问题，用最明白易懂的方式，证明创世主和圣经的真理……"

什瓦尔兹在批驳斯宾诺莎、拉美特利、爱尔维修，乃至卢梭（如所周知，卢梭是反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时，公开宣扬神秘主义。作为"小说"的教授，他在大学里讲授"批判美学"。在他的这些演讲里，他以"罕见的激情"，研讨绘画、雕刻、建筑，教导他的学生相信"相法和手相，进行魔法和巫术的奇异发明，使自然向超自然转化"，等等。

什瓦尔兹是著名德国神秘主义者雅·贝姆（1575—1624）的学生。后者的特点，如果说不在于他的科学—哲学思维能力，那最少也在于他的含混理论探索的深刻性。16世纪40年代的俄国先进作家对贝姆作过如下评价：

"他的灵感，他的神秘主义直观，使他达到那时的科学所不敢想望的无限广阔的思想境界，达到人类在昨天才认识到的真理"②。这都是哪些真理呢？赫尔岑所指的是：贝姆坚信物质和精神不是两个单独的因素，而是一个统一的实体。换言之，贝姆是主张一元论宇宙观的。但贝姆的一元论同人类在昨天（用赫尔岑的说法）所认识的一元论，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是很不相同的。费尔巴哈完全正确地指出，唯心主义一元论解决精神与物质

① 参阅《吉洪拉沃夫全集》，第3卷，第I篇，第75页，《什瓦尔兹传》。

②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23页，1876年日内瓦版。

之间的矛盾的办法，是简单地取消物质，宣布外部世界是唯一精神实体的表现。贝姆的一元论正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而且是一种不通过逻辑，而通过神秘想象得出的唯心主义一元论。黑格尔说，贝姆的蛮横深刻性缺乏知识[①]。赫尔岑也有近似的见解。他说：

"贝姆的这一高超理论穿着奇特的神秘的、炼金术士的外衣，为各种离开淳朴真理认识的光怪陆离、狂妄错乱的倾向提供基础：什韦登堡根派、埃卡兹哈森、施迪林格和他们的追随者，戈爱洛及现代德国通灵术士、符咒魔师、痳疯病患者，腐败堕落分子，所有这些全身痉挛、狂吠乱叫的家伙，他们的黑暗宗教力量，极大部分来自雅·贝姆"[②]。

IV

什瓦尔兹是贝姆的信徒之一，这些信徒由于不能适当估计贝姆的理论探索（尽管是很含混不清的探索）的深刻性，一股脑儿钻进他的离开真理的光怪陆离、狂妄无稽的倾向。这种倾向有些原已包含在这个有才华的德国鞋匠的学说里，有些则是后来在他的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什瓦尔兹的哲学观点到底怎样，可从他在1782年9月3日到12月31日在他的住宅里作的关于三种知识的演讲中，明显看出[③]。

什瓦尔兹的三种知识如下：1）猎奇的知识；2）娱乐性知识；3）有用的知识。属于第一种知识的，是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为什么打雷？何谓空气？土地怎样长出植物？以及其他相似的东西。什瓦尔兹称为娱乐性知识的，是绘画、诗、音乐以及其他艺术。这种知识"使我们有视听之娱，并用想象来培养我们的智慧。"但我们的

① （《历史哲学讲话》），《黑格尔全集》，第15卷，第327页。

② 《赫尔岑全集》，第2卷，第224页，日内瓦1876年版。

③ 吉洪拉沃夫：同上书，第77页。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演讲是从1782年8月开始，继续到1783年4月5日。

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有用的知识，这种知识教会我们“真正的爱，祈祷，使精神达到更高概念”。按照什瓦尔兹的意见，“为了自身的幸福，人必须求得后一种知识，因为人在这一生不过是过客，而在将来则是公民”。前两种知识，就其本身说是好的，但如使人忽视唯一必要的有用知识，则属有害；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猎奇和娱乐性科学会使人不信神明、受到诅咒。什瓦尔兹解释说：“因为堕落不是别的，而是由于只见到自己的力量，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而拒绝神的帮助，使自己成为行为的中心”①。

各种哲学体系都是相互矛盾的。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和狄德罗的唯物主义都是同时代（与什瓦尔兹同一时代——著者）的哲学。狄德罗是无神论者，而卢梭则说他在每一创造里都看到神。由于这些哲学分歧的存在，什瓦尔兹作出结论，认为哲学家不能解释宇宙，而请他的学生回到圣经中阐述的旧体系中去。什瓦尔兹在他的第7篇演讲中说：“一部圣经包含着全部人类知识的真正来源。在圣经里秘藏着……创造的秘密，我们祖先的作为，人类的堕落，诅咒，报应，拯救和未来景象”②。

什瓦尔兹宣扬人与神的神秘结合，观察神和认识创造秘密的可能。每人不但有肉体和灵魂，还有精神。属于灵魂的，有低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包括道德倾向。灵魂不过使人接近于具有更高级力量的精神。高级力量发达的人具有圣灵的特征，他们构成精神世界的第一状态。人的精神（不是灵魂——著者）的力量，是超感觉的，超人的。在它的帮助下，人进入精神的天国。为了发展人自身的这种力量，必须自幼年便按照耶稣的学说来教育人③。

---

① 吉洪拉沃夫：同上书，第77，78，79页。另参阅图卡列夫斯基：《诺维科夫和什瓦尔兹》（《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I卷，第206页）。

② 图卡列夫斯基：《18世纪俄国哲学史》（人民教育部杂志，1911年5月，第34—35页）。吉洪拉沃夫，同上书，第79页。

③ 图卡列夫斯基：同上书，第35页。

但是，什瓦尔兹认为，按照耶稣的精神进行教育，并不是对人进行道德教育。我们知道，道德倾向本来就包含在灵魂之中，低级精神力量属于灵魂。道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在于同神的神秘结合。

青年什瓦尔兹的"哲学"思想倾向，在这几段话里是说得颇为明确的。为求充实，我们还可引证莫斯科鲁勉措夫博物馆收藏的手写本。这个手写本的标题为：«什瓦尔兹札记的译本»。涅泽列诺夫详细叙述了这些札记的内容，认为事实上，这不是什瓦尔兹原著的译本，而更可靠的，是一个学生的笔记的译本。这个意见是应该重视的。学生不都经常正确理解教师的意思，教师自然不能对别人的"不成熟思想"的失误负责。因此，我们对于学生的笔记，必须慎重对待，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在学生的笔记里，是可以看到一些有关教师思想方式的极为有益的指示的。

例如，在我们所说的手写本里，有一处是为了批驳爱尔维修而写的。这里提到这位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种思想，以为"人是象钟表那样的机器"。这一思想受到批驳，理由是：人有理智和意志。爱尔维修仿佛假定人完全没有这种力量，人所有的只是被动的力量。仿佛根据这一假定，爱尔维修断言，人的本性完全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他的独立活动是来自"外部，是外表的"。所有这些都写得非常幼稚，很可能是出自缺少修养的学生之手。可以信赖的是，什瓦尔兹对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批判，显示了善于更多的使用哲学的概念。但他不理解爱尔维修的观点，这都是可以从他一直不理解，一直胡乱论述绝大多数哲学史家这一事实中，明显看出的。所以，如果我们假定，尽管"札记"的作者对于什瓦尔兹的哲学论点写得很幼稚，但毕竟距离这种论点的一般性质不很远，那我们是不会犯大错误的。

试举一例：«札记»的作者想为精神世界的存在，提出哲学证

明。他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原理：即人是“动物界和精神界联系”的纽带。这一原理的根据是：“如果我们从自然现象开始，那我们就可看到在人以前的一个不间断的序列。这个序列怎么会停止于人呢？这是否人的意思呢？”在这一“哲学”论点之后，接着就是对自然各界的说明。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矿物界的事物是由土和液体构成的。在植物界，我们也是看到土和液体，不过“精巧得多”。动物界也是土与液体，不过是“精巧到最高度，精巧到红白分明”。人自然是特殊的一界，人包含着所有“前述的一切”，此外，还包含着理性。理性“能够统治感觉，所以能消除真正的疾病，如果这样作为其自身完善所必需”①。

我们由于了解什瓦尔兹的观点，完全可以假定，他的思想过程，在这里并未受到很大的歪曲。人的现状，是一个道德堕落的现状。根据什瓦尔兹的观点，«札记»的作者断定有三种精神堕落的状况：1)魔鬼；2)动物或兽的灵魂；3)人的灵魂。手写本在一处写道：“我们人是一种腐烂的、发臭的器皿，在这种器皿里，所有善良纯洁的东西都会发酸，发臭”。对于人的这一悲观看法，由于有了另一乐观的信念而有所减轻，即“相信人的灵魂本身具有引导者的神的火花，这引导者将把人的灵魂引向上帝”②。

这些叙述虽是幼稚笨拙，却不妨碍我们去认识一切唯心主义、特别是神秘主义哲学所特有的一些思想。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假定，学生是颇为正确地理解了老师的思想的。

抄写本的另一地方，叙述了什瓦尔兹对爱尔维修的社会教育观点的批判。对于这一部分叙述，也可以作出同样假定。抄写本在这里正确地提到爱尔维修有一种思想，认为“人民的德行和幸福不是由于他们的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而是由于他们的法律的明

① 涅泽列诺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 167 页。

② 同上书，第 167—168 页。

智”；宗教对于人民的德行和幸福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抄写本批判这一思想所用的理由是：法律能够强迫我们成为善良的公民，但不能使我们的心灵纯洁；因为能使心灵纯洁的，只有宗教。

什瓦尔兹将爱尔维修的追随者分为3类：第1类，由于懒惰不作思考的追随者；第2类，生活在不停歇的嬉娱游乐中的追随者；第3类，情感冲动的追随者，由于“人在情感冲动时是视而不见的，所以他是醉汉”①。

我们不去研究这一毫无根据的迂腐分类，只指出什瓦尔兹对爱尔维修的“批判”，极为明显地暴露了什瓦尔兹和所有与他相似的神秘主义者的极端保守主义。相信社会道德的进步须以社会制度的改进为前提，可促使人们要求社会改革。相反，相信德行就是心灵的纯洁，决定于“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则可使人们对这种改革漠不关心。保守主义者经常强调“心灵的纯洁”。保守主义者所极为喜爱的心灵纯洁论之一，便是我国18世纪农奴制辩护者所说的必须先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道德，然后才能考虑他们的解放。这一思想也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即人民的教育和“德行”都同“法律”没有因果联系，因为“法律”是表现和调节社会关系的。

什瓦尔兹关于不应否定重大实际真理所赖以确立的“理论成见”的意见，也是不无意义的。例如，重大的实际真理认为应有德行。但这一重大真理是未开窍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怎样帮助这种可怜人呢？必须给他们灌输相应的“理论成见”。例如，对一个无知的波斯人，应告诉他，恶人的灵魂在死后，将不能走过通向德行善良人们所在地的独木桥；对未受教育的基督徒，应向他说明地狱的痛苦，等等。“谁要取消这些极度英明的最早导师们用作象征性概念的成见，那他就是恶人。他毁坏了成百万灵魂赖以安全

① 涅泽列诺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168—169页。

达到天堂的明亮灯塔"①。换言之，目的证明手段的正确。如果成见有助于达到有益的目的，那就应该受到尊重，而任何反对成见的人，就应受到谴责。不难想到，法国百科全书派同"理论的"成见以及任何其他成见进行过极为激烈的战斗，他们在什瓦尔兹看来，应当是凶恶有害的人，应当是人们进入天堂的最可憎恨的障碍了。

涅泽列诺夫对什瓦尔兹给他的学生作的人及其 3 因素的图解，作了如下说明：

"两个四角形，一上一下，角与角相联；在其联结点上，划一条粗的短线；两个四方形的延伸边，上下各形成一个三角形；上面的三角形上划一线，写明：'精神世界，天堂'；下面的三角形上也划一线，写明：'物的世界，肉体世界'。用波纹线将两个四方形分为三角形：这样，整个画面就是六个三角形了。中间的两个三角形表示人自身的因素，在其旁边写明：'精神。树是上下都生长的，人则向上(向下？——著者)生长到物的世界，向下(向上？——著者)生长到精神世界。树根愈是牢固多汁，则树的存活愈久，也愈安全。'在上面两个三角形的旁边写着：'精神，思想的理解力。我们自身构成这种精神。它在我们出生时有可能存在，但不是实际存在。'其余两个在下面的三角形表示肉体。在一个三角形的里面写着：'组织，三个因素 θ ♀ ☿ (即块、硫磺、汞)，生活的慰藉，生命的精神'；在另一三角形里面写着：'四种自然现象的物质'。"

这种人类特性的图解，把我们完全引向最荒谬的神秘主义领域。涅泽列诺夫由于什瓦尔兹同法国启蒙思想家进行激烈斗争而对他抱有好感，为了替他遮盖，特指出这位神秘主义者毕竟不曾象"帕拉采尔斯的化学教材"那样，"将硫磺等同于精神"②。这可能，而且也许是可靠的。但是就他所发表的这些东西来说，已完全足

① 涅泽列诺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 169—170 页。

② 同上书，163 页。

够使他成为最坚定的蒙昧主义者了。为了从百科全书派的攻击之下保护毫无掩饰的宗教，他说，只有术士和神秘主义者才完全懂得宗教。他教导说:“魔术是一种神的科学，利用这一科学，术士们可以认识真实的自然世界和自然精神。术士是真理的寻求者，自然通过自己的精神在一切动物里同他交谈，并出示自己的签证”①。这样看来，魔法是这一“哲学”反对法国理性哲学的最新武器了。

对于具有这种思想方式的人，“蔷薇十字会”及其愚昧的幻想和其对“荒谬”法国启蒙运动的仇视，自应是真正智慧的忠实捍卫者和传播者了。毫不足怪，什瓦尔兹在1781年秋旅行德国时同柏林“蔷薇十字会”会员发生了亲切交往。

柏林“蔷薇十字会”会员热衷于魔术，他们坚称他们与精神世界有直接交往。就在接纳什瓦尔兹入会前不久，他们为普鲁士皇太子召来马克·阿夫烈利和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灵魂。由于特殊装置——当然是“物的”装置——的作用，这两个灵魂在电闪雷鸣中出现，使这位普鲁士王位继承人吓得魂不附体，不能亲自向两个灵魂问话。但是善良的灵魂宽恕了他的人的弱点，主动地“用阴沉的声调”向他宣读了训示。这样的场面以后还不只一次重演，而且代灵魂说话的是一个萨克森人，“一个腹语②专家兼相面术士”③。

“柏林蔷薇十字会”会员召来灵魂以教训虚弱的皇太子，所追求的是一种纯粹世俗的目的，即使皇太子屈服于他们的影响。难怪当时领导他们的是克里斯托弗尔·维尔纳，这人——如果相信

---

① 引自B.И.图卡列夫斯基同上论文(«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1卷，第216页)。

② 腹语。一种不动嘴唇而能说话的技巧，听起来好象由腹内或由旁边的地方说出来的。——校者

③ 见Я.Л.巴斯科夫为«18世纪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所写序言，彼得格勒科学院俄国语文部出版，1915，XX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说法——是“一个骗子和阴谋家”。在这位皇帝哲学家死后，这一爱搞欺骗和阴谋的教主，事实上在普鲁士起了重大作用。他作了国务部长和精神事务部长。佩平最正确不过地指出，他的历史声誉，是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他的时代是迫害一切活思想的时代：康德就遭受了他的迫害[①]。

柏林的启蒙运动拥护者，对维尔纳和其他“所罗门科学”代表，都是极不相信的。莱辛的拥护者尼古拉甘心情愿把他们看为秘密的基督教徒。但是什瓦尔兹对于他们在德国启蒙学者中的恶劣声誉，却不觉得难受。相反，启蒙思想家对于“蔷薇十字会”会员的抨击越强烈，什瓦尔兹对他们的信任就越大。我国有些学者设问：为什么什瓦尔兹没有看出柏林“蔷薇十字会”会员对政治反动的顽固爱好呢？他们解释说，这是由于什瓦尔兹本人的意图的辩护性质。然而同情政治反动，乃是什瓦尔兹的哲学蒙昧主义的自然的和必要的补充。如果相反，什瓦尔兹竟然憎恶政治反动，那倒是怪事了。

V

现在很清楚，什瓦尔兹是一个精力极为充沛的宣传家和很有天才的组织家。他善于坚定不移地、才能出众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翻译研究室”，“从事最优秀作者和劝谕性著作的俄文翻译”。后来，他还组织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会议”，毕业生在这里宣读和讨论他们的著作。不用说，由于什瓦尔兹的影响，青年们的作品，都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精神的。我们下面将看到，我国大学生当时在传播神秘主义和反对先进法国哲学的斗争中，起过多么巨大作用。然而什瓦尔兹的影响不仅限于在校青年。他力图在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原因倾向于神秘主义的莫斯科社会

① 《俄国共济会》，第223页。

阶层中，发挥和巩固其影响。1782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成立了“学术友谊会”，也从事慈善事业。

人们把什瓦尔兹在在学青年中的影响，比之于格兰诺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所发挥的影响；又将他对他的朋友的影响比之于斯坦克维奇的影响。米柳科夫写道：“什瓦尔兹以其极为严谨、高贵，然而无疑地比斯坦克维奇更为热情的气质，同样成为他的小组的思想和道德先知者，在知识和教育程度上显著地超群出众。这两人都死得过早，但两人在他们的倾慕者的心灵和思想里，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①。

这里有许多正确的东西。但是以下情况，却怎样也不应忘记：

格兰诺夫斯基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观点很温和的人。然而他的很温和的观点，却无疑地具有进步的性质。他痛恨反动现象，如果说，他与赫尔岑和奥加廖夫不同，对社会主义抱着否定的态度，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未能适当估计“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巨大意义。斯坦克维奇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自己从来不曾根据他所掌握的哲学体系，作出革命的结论，而且他很可能甚至没有想到从这种体系里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个体系尽管有保守的情绪，这种情绪曾笼罩着其创始人的晚年，但却包含着一些因素，使它在后来，如赫尔岑所异常恰当地指出，成为革命的真正代数。因此，如果格兰诺夫斯基和斯坦克维奇对他们的倾慕者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那这种影响也是进步的。相反，什瓦尔兹却是在神秘的蒙昧主义的精神上影响了他的学生和朋友，使他们失去掌握当时先进思想的任何可能。当人们称什瓦尔兹为一个热心启蒙运动的人物时，他们忘记了他所致力的“启蒙”，事实上

---

① 《俄国文化史概要》，1904年，第3卷，第2版，第354—355页。雅莫希可夫在他的论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诺维科夫》(载《创举文集》，第163页)里，亦将什瓦尔兹比同格兰诺夫斯基。

是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黑暗和凶恶的反动。他的活动愈是有计划，愈是坚决，愈是勇于牺牲，便愈是对刚刚开始欧化的俄国社会带来更多的危害。

Г. 谢梅卡承认，“蔷薇十字会”在西方是“思想落后的现象”；但他却以为它在俄国，则是“崭新的事物”①，带来了一定好处。按照他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俄国蔷薇十字会”是“我国的第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它第一次用广泛开展慈善事业和同动摇我国文化正确发展过程的‘伏尔泰主义’进行斗争的形式，团结俄国人，引导他们为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服务”②。

当然，如果认为法国解放哲学进入俄国，破坏了我国文化的正确发展过程，因而反对这个哲学是俄国社会思想的首要任务，那就应该“首先”对“俄国蔷薇十字会”为解决这一任务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感激。但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问问自己：难道只用这种稀奇古怪的“蔷薇十字会”的荒诞幻想就能够同“伏尔泰主义”作斗争？这最少是未经证明的，而如果证明了，那也会是一种有利于这个“伏尔泰主义”的有力理由。

Г. 谢梅卡又说：“这是俄国的第一个哲学体系”。由于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所以在18世纪起了不小的启蒙作用：“蔷薇十字会”同对俄国精神格格不入的“伏尔泰主义”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尽管它很极端，也很混杂，但它却使俄国思想界受到教育，有了纪律，破天荒第一次给他们以真正的精神食粮，教养他们——尽管是借助于神秘主义的神智学和共济会自然哲学——进行经常、紧张和前所未知的抽象思维工作③。

谢梅卡深信，任何唯心主义体系都胜似任何唯物主义或接近

① 重点是谢梅卡划的。

② 论文见前，(《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Ⅰ卷，第171页。

③ 同上书，同页，这里的着重点也是谢梅卡加的。

唯物主义的体系。而由于神秘主义的神智学和"共济会自然哲学"都同唯物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认为，只要指出（并强调）"蔷薇十字会"会员理论的无可争辩的唯心主义性质，就足以在读者的心目中证明它的正确，就足以把它说成是"真正的精神食粮"。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神秘主义的神智学及其信口雌黄的理论结构，或是"共济会自然哲学"及其化学试验（如在实验室里制造"人"），都完全不包含任何所谓"真正精神食粮"。"蔷薇十字会"会员的理论不仅不能使俄国人的思想有纪律，相反，只能使他们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无法接受逻辑的纪律[①]。

欧化的俄国人在对"蔷薇十字会"有所了解之前，有可能认识一些真正堪称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无论坎捷米尔的唯心主义见解有时显得多么脆弱，但也距离"蔷薇十字会"的荒诞幻想非常之远。罗蒙诺索夫在哲学上是沃尔弗的学生。沙坚教授亦曾将沃尔弗的哲学带到莫斯科（1756 年 6 月）；但是，按照吉洪拉沃夫的说法，他不曾停留在这个哲学之上，而是注意康德以前的哲学思想发展[②]。因此，完全不能说"蔷薇十字会"这个宇宙观体系，是俄国人第一次看到的唯心主义"新事物"。

我在上面已经指出，只有滥用启蒙一词，才能谈到"蔷薇十字会"的启蒙意义。这一点已为谢梅卡本人所间接证明：他所以觉得，象"蔷薇十字会"这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思想落后现象"在我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启蒙意义，乃是由于"蔷薇十字会"会员对与俄国精神格格不入的"伏尔泰主义"影响进行了有成效的斗

① 俄国著名"蔷薇十字会"会员之一 И.В.洛普欣写道："对人的秘密的真正活认识，对自然界的观察或对其精神的不朽躯体的观点，只有在照亮复活的新生命的神赐的光照下，才能发现"。这里什么都有，可就是没有思想的纪律。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会说，这里没有知识，它让位给虚构的幻想了。（参阅洛普欣：《论内部教会，论真理的唯一途径，论谬误和毁灭的不同途径等等的若干特点》，第 50—51 页）。转引自 В.Ф.萨沃德尼克出版的《18 世纪俄国共济会史料》，第 1 辑。

② И.С.吉洪拉沃夫：《文》第 3 卷，第一篇，第 47 页。

争。换言之，由于俄国精神的特点，反对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斗争，在俄国获得了启蒙运动的意义。这样的论点，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莫斯科的“蔷薇十字会”会员曾从事慈善事业，这一事实是无可怀疑的。这当然使他们受到尊敬。例如，洛普欣对于“施舍”的观点，表明他对受苦人的一定同情。洛普欣在他的《札记》中写道：

“顺便说说施舍。很奇怪，许多人竟然想反对它。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他们想为他们不愿施舍辩解。”他同意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反对贫困。但这些措施，在他看来应该第一，尽可能铲除贫困的根源；第二，应该不使穷人丧失“唯一的糊口方式”，更不得对他们实行压迫。此外，在这个问题上，更不能用私人的义务来抵销政府的义务。洛普欣问道：

“私人有点爱护自己的亲属的心意，给他们以救济，这有什么过错？别人怎能用施舍得来的几个戈比去喝酒？如果有人因为得不到施舍而日夜挨饿，或企图犯罪、或抱怨命运，弄脏了灵魂，那么，拒绝施舍的人，如果他还有仁爱之心，其灵魂又怎样呢？”①

洛普欣承认，他有时也苦恼地拒绝给乞讨者施舍，如果他怀疑他们想用施舍给他们的钱去喝酒。他说：“但是，当我把应该（原文如此！）施舍的钱收回以后，在思想上责问自己，怎么，难道你自己不曾喝醉过，难道穷苦无告的人不能贪杯？因而当我加倍施舍给他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很高兴的”。

这段话没有思想的深刻性，但明确地表示，洛普欣比他的同代人要善良得多，这些人嘲笑洛普欣对穷人的态度，他们对于向自己求助的人，完全心安理得地不加理睬。因此，我们尽管不同意谢梅卡，也许还是可以说，我国18世纪的欧化社会，由于当时的“道德败坏”，是需要象神秘主义的神智学和共济会的自然哲学这样的腐

① 《特级机密参事和参政员洛普欣生平和任职若干情况的札记，由他本人亲自写稿》，伊斯坎德尔作序，伦敦1850年版，第44页。

朽拐杖来实行其利他主义的。对于这个社会的某些人，这显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利他主义不能没有这种拐杖。

但是，第一，这一历史事实不能把腐朽的拐杖变为什么"新的"东西；第二，这一历史事实在这里不仅不能提供任何解释，而且它本身也需要解释。如果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这些欧化社会的人们，虽然不是这个社会在当时的最优秀人物，但毕竟都竭尽所能，以求有益于他们的亲属，则这一解释，就更成为必要了。

另一学者——基哲维特尔——也向我们提出同一问题，不过提法有所不同。

他在为科学院出版18世纪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员通讯集》而写的卓越论文《18世纪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员》中写道：这些人虽然都有明显的错误，我们却不能不对他们寄予同情，因为就令不说他们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也应看到，他们的错误不是衰老没落的错误，而是当时新生的俄国知识分子的青年期的错误。按照基哲维特尔的说法，这种错误的基础是对理想的真诚向往，对小市民的庸俗习性的真正嫌恶①。这当然是如此。但是我国新生的知识分子何以恰好犯了这种错误，而不是犯了其他错误，其历史——更确切些，其社会——根源又在哪里呢？换言之，为什么他们的青年意向使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走上西欧先进国家反动没落势力所铺设的道路呢？

为了解答这一异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社会观点，说明这些观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

---

① 《俄国思想》，1915年，10月，第124页。

VI

组成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小组的俄国人，不满意周围的现实，而追求理想。他们的这种不满意，表现了彼得改革的影响，因为这个改革极大地便利了西欧概念流入我国。当时欧洲文明所产生的唯一有生命力和有成效的理想，是先进法国哲学所表述的法国第三等级的理想。这个理想否定了一切贵族特权，而我国当时知识界的很大部分，却是在这种特权的庇荫之下成长和受教育的。为了认真信奉这个理想，必须完全抛弃贵族等级的观点，然而能够作到这点的，却只有个别人。的确，我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时是倾向于这一理想的。这时，他们变为"伏尔泰主义者"，成为"百科全书派"，他们翻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似乎整个地同他们的过去精神实行了决裂。但是很快，旧的"酵母"开始起作用，我国拥护法国资产阶级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为自己的鲁莽担心，因而恢复了他们过去的宗教信仰和过去的信念，以为没有贵族特权，主要的是没有农奴制，是怎样也不行的。我们知道，洛普欣的情况，便是这样。他在翻译了霍尔巴哈的《自然体系》第2卷最后一章，叫人把它抄得齐齐整整之后，立即感到"无法形容的懊悔"，烧毁了译文，变为一名顽固的俄国保守派，对于他所珍惜的获得宗教认可的社会制度，赋予重大意义。他——当然不只是他一人——的遭遇，同方-维津没有两样。但是，《旅长》一剧的作者在恢复其过去的宗教信仰时，作得非常直接了当。而这却非所有的人都能作到。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使其对"百科全书派"的尽管很短暂的爱好，不留下任何的影响。他们在体会到"百科全书派"的善恶观后，不能完全满足于他们自己的旧宗教概念。这是很痛苦的。然而愈是痛苦，他们愈要相信。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8世纪的神秘主义搭救了他们。

这种神秘主义是由从另一方面引起法国解放哲学的同一社会发展过程产生的，它是反对第三等级运动的精神武器之一，它比旧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更能给经历过“伏尔泰主义”的灵魂带来完全的安宁。因此，同新的法国学说决裂的俄国人们，对它趋之若鹜。洛普欣正是从神秘主义，而不是从他的同胞们——他们由于过于单纯，将共济会员看为反基督的敌人的奴仆——所信奉的旧约宗教概念里，找到了安宁。这类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愈是强烈，愈是迫切，他们便愈是看重神秘主义。

有些学者认为，洛普欣和他的神秘主义的同道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所寻求的是真正的共济会，而所找到的——由于什瓦尔兹的殷勤中介——却是最坏的共济会，即“蔷薇十字会”。然而既然这些人需要用神秘主义的水来解除他们的精神饥渴，所以这种水愈是浑浊，便愈能适合他们的口味。这同愿意醉饮的人们宁愿喝烈酒而不愿喝淡酒一样自然。

A. И. 赫尔岑曾经感到奇怪，何以洛普欣既然主张人道主义，却又在维护农奴制上表现“顽固不化”。根据赫尔岑的意见，洛普欣在这方面是“不由自主地自相矛盾，因而是徒托空言”。作为例证，赫尔岑提到洛普欣在一封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里，一方面说他对奴隶一词感到羞愧，他希望所有俄国人都获得自由，但又补充说，“敌人入侵的危害不及限制地主权力之大”①。

关于这点，皮克萨诺夫竭力反对二元论的思想方法，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只知道两种历史现象——“光明和黑暗”。皮克萨诺夫与赫尔岑相反，断言“洛普欣很少有完整、齐全的宇宙观”②。实际上，皮克萨诺夫同赫尔岑一样错误，不过，他的错误属于另一方向。

---

① 见伊斯坎德尔为洛普欣札记伦敦版所作序言。

② 《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Ⅰ卷，第228页，《伊凡·弗拉基米罗维奇·洛普欣》一文。

就对农奴制的态度说，洛普欣在莫斯科的“蔷薇十字会”会员中，全然不是例外。正如巴尔斯科夫公正地指出：他们都与农奴制度和平共处，甚至都支持农奴制度。“诺维科夫在离开施利谢尔堡后，主管一个‘农奴’村。他象一般地主一样，酿制伏特加酒．并在极为困难条件下发明了各种不同器具”。波兹泽耶夫逼使他的农奴举行暴动；A.C.斯托罗加诺夫伯爵“按照女皇的评定，是一个最温和，实质上最人道主义的人，他的心善良到脆弱的程度，但他却热烈维护奴隶制度。这是可以显示他的精神气质的”①。此外，还可指出，“蔷薇十字会”会员A.M.库图佐夫以极为认真严肃的态度谈论农奴的分配。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在公布公报（关于出卖农村的公报——著者）时，必须训诫（原文如此！）某些家仆；我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分配时，我会得到哪一些，但我将力求使家仆的分配能够平均。这里有两名理发匠，一名是费林尔·格里戈尔耶夫，另一名是谢尔盖伊·斯米尔诺伊，请注意，别将两人都分给一方”②。

诺维科夫给他的“上级”写的三封信保存下来了，这些信是用他的共济会化名“科洛维翁”签发的（他的另一共济会化名是eques ab ancora）。在其中一封里，谈到印刷所工作。他指出：“在印刷所工作的监督上，最主要和最值得关切的，是对工人进行不断监视，使他们上班，认真劳动，防止他们盗窃和停产，处理他们的不断争吵等等。因为您……局部地知道，很大一部分工人由于象以前一样未受监视，所以放荡酗酒。对他们的监视应该严格认真。以上敬

① «18世纪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序，第57—58页。的确，诺维科夫由于受到迫害，他的业务经营搞得很坏。他的家庭有时几乎挨饿。这虽然无可原谅，但却可以解释一些情况。

② E.塔拉索夫引自论文«俄国共济会史。被忘却的“蔷薇十字会”会员A.M.库图佐夫（根据未刊行的文件）»。这篇论文收入«C.Ф.普拉托诺夫纪念文集，由他的学生、朋友和崇拜者执笔»（圣彼得堡1911年版）。

乞批示”①。这些话同肖尔巴托夫关于工人极端堕落的意见很相似。关于工人的这种严格评语，使人想到诺维科夫对于工人当前生活的毫不关心。这封信是什瓦尔兹死前写的。

巴尔斯科夫说，在我国“蔷薇十字会”会员中，只有C.H.加马列亚对农奴制的态度是例外。我们很快就可看到，应该怎样理解加马列亚对当时俄国实际的态度。无论如何，巴尔斯科夫也象赫尔岑一样，都认为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对农奴制的态度是同他们这些“人道主义者”自相矛盾的②。然而问题是：这里任何矛盾也没有的。

1784年洛普欣在他的印刷所里刊印《共济会刊》。出版者在告读者书中说，这个刊物的发行，是为了使参加共济会的会员和会外人士能够获得关于共济会的真实报道。在这个刊物的第一篇文章里，我们了解到：危险的是“那些善于在头脑单纯的群众中引起愚蠢和不幸情感的人们”，“共济会分会除对无知者外、对任何人都是欢迎的”③。这是很彻底的。我国的“蔷薇十字会”会员所以拥护农奴制，不是出于任何误解，而是由于他们是当时俄国完全依靠剥削农奴以维持生存的那个等级的思想代表④。他们大多数对法国**第三等级**的先进思想家有好感，所以只能极为短暂，因为他们不能够长期抛弃**贵族**的观点。

给灵魂带来和平的神秘主义吸引了他们，因为它是对第三等级的革命意向的反动。他们用死后幸福的约许来转移人们对社会上层建筑的注意。洛普欣在参加“蔷薇十字会”后，在他所写“训诫

---

① C.B.叶舍夫斯基：《俄国史文集》，第258页。

② 《18世纪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序，第57—58页。

③ 引自涅泽列诺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177—178页。

④ Г.巴尔斯科夫对于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员怎样估计社会“地位”，甚至其相互关系的差别，作了有趣的指示。他又说，“贵族老爷”的这种特点，引起外国共济会员（什列德尔男爵）的注意。

问答”中说，真正的共济会应该对所属人们的未来幸福，寄予最大关怀。另一神秘主义者用诗表述了同一思想：

灵魂凝视着永恒，

你将看到什么呢？

那里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里是神！

受苦的人们，微笑罢！

神秘主义者与法国哲学相反，他们向受苦的人们说这种宽慰的话，不仅不能动摇现存秩序，而是支持了它。如果洛普欣和那些保持着同他一样保守情绪的人们，对神秘主义趋之若骛，那并不是说，他们“不过问政治”，也不关心社会制度问题。洛普欣对于这种问题的极为关心，可从后来他对亚历山大一世打算消灭农奴制所感到的恐惧中，窥见一斑。他证明“人民要求抑制”以保护其本身的利益，“而为了保持公共秩序，没有比地主管理制更好的警察了”①。这一观点在地主之间，流传最广。我们知道，在地主中间，这一观点还与另一信念，即认为俄国地主的无限权力应以俄国君主的无限权力为补充等等，同时流传。洛普欣对于这一流行的信念，也是同意的。他的政治保守主义，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表现得极为明显。例如，在所著«训诫问答»里说，真正的共济会员必须敬重他的国王，“在任何惊涛骇浪中，不仅对善良和温和的国王要服从，而且对执拗任性的国王，也要服从。”总之，共济会员“应该服从最高当局，不仅由于恐惧，而且出于良心的责任”。

VII

其他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也抱有同样保守情绪。当拉季谢夫由于所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而被捕时，特鲁别

① 这段引文，在伦敦出版的«洛普欣札记»里没有，而是见于另一版本（«历史和古物学会讲座»，1860 年）。

茨科伊公爵写信给库图佐夫说:“现在告诉你,曾经为你写过书,并同你一道在莱比锡留学的那个人,由于他的大胆著作,正在受审;据说,这是一部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公开处分的书。我的朋友,这就是他的轻浮骄傲的头脑给他带来的结果。这就是不以基督教规为基础的敏捷的才智的正常后果。我知道你的善良的心肠,知道这个消息会使你伤心。但据我所听到,他应该遭到现在威胁着他的命运,因此你不应为他忧伤,而只应祈祷万能的主,把现在威胁着他的惩罚,变成使他认识自己的秽亵言论并悔恨自己的手段”①。

这封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790年8月1日。库图佐夫尽管在观点上同拉季谢夫有着根本差别,但旧时的友谊连接了他们。他在一年半后写给拉季谢夫的信中,表示了一种笃信宗教的希望,认为《旅行记》作者的被流放,将给他带来道德的好处。他写道:“我的朋友,说起来使我难过,但我对你的友情使我想起一种真理:你的处境对你是有好处的。你离开了所有的人,抛弃了使我们眼花缭乱的一切事物,你将因此更能遨游于你自己的天地之中,冷静地看看自己,从而较少偏见地判断你以前通过虚荣和尘世浮华所看过的一切。也许,对于许多事情,你会有完全新的看法,说不定你会改变你的思想方式,会发现许多你以前从未丝毫注意过的真理”②。这封信表明,它的作者距离最起码的政治自由思想有多么远。所以,塔拉索夫关于库图佐夫是自由的爱好者,“不过有某种局限性”等等意见③,是似是而非的。这里的局限性是这样巨大,是任何自由爱好都谈不上的。

① 《18世纪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我在这里不提出同被放逐的朋友通信的策略性问题。库图佐夫的信是对拉季谢夫来信的答复,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更为恰当了。信里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对于思想不一致的朋友,毫无训诫开导之意。(同上书,第168页)。

③ 《普拉托诺夫纪念文集》,第232页。

特鲁别茨基认为拉季谢夫所受到的惩罚，是再轻微不过了。尊贵的“蔷薇十字会”会员写道：“至于拉季谢夫是罪犯，根据我所听到的他的书的某些片段，我可予以肯定。我的朋友，请相信，除了在我们慈爱女皇的统治下，他会由于自己的罪恶而在断头台上失去自己的头颅；就令在伊丽莎白统治下，他也会在秘密审讯处受到虐待，因为他在书中不仅撕裂了一切社会结合体，而且对神圣的沙皇也不放过。但为了这一切，他受到什么惩罚呢？不过是剥夺了他继续为害的手段，而且监禁也不是永远的，只是在使他醒悟，往后从犯人变为社会有益成员所必需的期内。因此，我的朋友，请不要为他的命运担心，请祈祷热切关怀犯人悔改的救世主，给他以忏悔的泪水，洗净他的狂妄行为罢，那时他将投入时刻准备予以宽恕的女皇的怀抱。她将及时地释放他，我们也将看到他从罪犯变为有用的公民，自己咒骂所写的那些条规”①。对于这一切，任何解释，都是不必要的。

洛普欣对“不幸的拉季谢夫”胆敢写书攻击现存秩序，又予以指责。他在给同一个库图佐夫的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你的意见是极为公正的。我完全同意，如果祖国的臣民和儿子认为有责任向自己的国王呈报某种真理，他应该以恭敬、爱戴的心情，直接地、秘密地当面陈述。我相信叶卡捷琳娜是经常能够接受的；而不应散发足以扰乱社会安宁的书籍”②。

现在很清楚，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员的通讯集»当时受到政府(所谓秘密检查所)的监视。他们知道这一情况，所以认为必须在信里使自己的政治观点带有保守外貌。然而“蔷薇十字会”会员在这里还是暴露了事实上属于他们和为他们所极端坚持的东西。在亚历山大一世朝代初期，他们已可不必担心政府的迫害，但在那

① «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第92—93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时，他们还是用极端保守的精神发表意见的。

保守主义是什瓦尔兹本人和所有他的俄国学生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基础。自然，这种保守主义也是有其历史的。最初，它更多地以本能的形式，而不是以对社会政治关系的成熟观点的总和的形式存在的。

法国革命在实践上运用了先进法国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它是促使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保守主义从本能的范围彻底转变到自觉范围的推动。如果在以前，他们以仇恨的心情谈论新的法国理论，那么现在，他们又对新的法国实践感到莫大恐惧了。洛普欣供给 В. Я. 科洛科尔尼科夫和 М. И. 涅夫佐罗夫两人到国外留学。他在给库图佐夫的一封信里说，他劝他们两人在莱顿获得博士学位后，不要在巴黎进修，因为“那里现时遍地骚乱，最好避开那里的生活”(1790 年 11 月)①。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忠实学生科洛科尔尼科夫和涅夫佐罗夫，也都怕去法国。他们在 1790 年 11 月 6 日从莱顿写信给洛普欣说：“我们将于明日启行，按照您的吩咐去瑞士，在伯尔尼或洛桑停留下来，因为在这两处都有研究院。为了绕过法国，我们将取道几个德国城市，即克列夫，科隆和美因兹；这样，我们将不仅绕过法国，而且绕过布拉班特，因为那里的骚乱更有甚于法国”②。

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寄信给库图佐夫(1791 年 3 月 13 日)，埋怨某些法国神秘主义者突然用革命的语言说话：“啊！我的朋友，多么狡猾的魔鬼哟！他通过所谓哲学家使法国人的思想抛弃宗教。在作到这一点后，他又迷惑他们的思想去推翻皇帝的权力，而现在更利用现有的迷信，在基督教的掩饰和名义之下，企图建立有害的无头政治，在这种政治之下，除了混乱，是什么也不会有的。他

① 《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员通讯集》，第 21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可以建立自己的王位，废黜真正的基督学说，因为这种学说对于他的统治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学说是以服从上帝和皇帝为基础的。按照基督的说法，皇帝的心掌握在神的手中，因为基督是秩序的法律，是为了改正错误的；因为基督的精神将使人的心灵从一切由于堕落而遭受的罪恶中净化出来”①。

库图佐夫在给洛普欣的信中保证：“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当中永远不会出现米拉波和与他相似的怪物。基督教徒和反对神授权力的扰乱者，是完全矛盾的”。(1790年11月)②。显然，当时，在最坚决的保守派的眼光里，米拉波是法国变乱的最可怕的代表人物。1791年库图佐夫在给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信中，再次“以数学的精确性”表示相信，“真正的基督教徒永远不会模仿米拉波”。对于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这一点是完全不需要用数学来证明的。他完全同意，真正的基督教徒“怎样也不会成为米拉波”，同时还一般地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永远不会同意现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但却经常乐于为保卫国王而流血……总之，基督教徒在尼隆的管理下，将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将不敢起来反对他发誓效忠的权力，因为他在这里不期待安宁，但他知道，对权力的忍耐和服从，对上帝和国王的克尽厥职，是使他不在这里，而在那里得到预期的安宁(因为在这里不可能有这种安宁)的一种途径。在那里他将由于在这里的忍受，而得到安宁，作为报偿”③。

洛普欣在1794年所写的一文«心的倾诉，这颗心尊敬君主的仁慈，因为看到有害的后果，害怕平等和狂暴的自由的梦想。这种梦想把心灵上盲目无知的形象结合起来，不去设身处地寻找自己苦难的原因»。详细证明了在人间不可能建立幸福的生活，就是在

① «莫斯科蔷薇十字会员通讯集»，第101—105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同上，第112页。

最好的政体之下，混乱亦将无可避免。因此，个人最好不要去想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在一切可能的政体中，现在，——更确切些说，现在更有甚于任何时候，——他觉得无限制的君主专制是最不完善的政体，然而从我国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偏见，却维护它，以为对于象俄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应以它最为合适。按照洛普欣的说法，专制君主体现最高的存在，他的法律"记录着最高存在的规章"。洛普欣在为君主制辩护的同时，还对法国进行了激烈的攻击。

他大声疾呼："啊！不幸的国家！你处于多么可怕的变化无常（原文如此——著者）和灾难境地之中哟！德行成为罪恶，神圣纯洁的法律被认为是迷信和有条件的习惯。粗鲁、无耻、残暴——尤其是兽性的残暴，凶恶的俏皮话的针芒，这一切构成成群结队的折磨者的本质，整个人民则处境凄凉。"不言而喻，对于俄国贵族的保守思想家，法国革命者所企求的平等，是一种在人间不能实现的空想。他宣称，不平等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所有的人都向我们宣布服从"权力的必要和利益。整个大自然都向我们描绘着平等的不可能……。在最高的精神村落里，统治着神所建立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构成人的本质和结构，万能的创世主使令人惊奇的千差万别统一起来"①。

对于洛普欣的保守主义和他的宗教信仰的严格一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就是约瑟夫·第·麦斯特尔本人也会对于这样的一致，大加赞赏。但是这种一致，在其他"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观点里，也比比皆是。

他们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唯一责备，是在谈到法国革命时，他们挖苦这位女皇对百科全书派的装腔作势。不过，就是这一责备，也是从批评某些政府官员对危险的法国革新家实行庇护，造成有

① 《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Ⅰ卷，第240页，前引皮克萨诺夫的论文。

害后果的方式表示的。因此，它更多地具有暗示的性质。此外，这种责备都是在私人通信中提出的，尽管这些信的作者知道，由于"邮电检查"，它们会为伏尔泰的女弟子所知悉。

法国革命及其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成为欧洲，特别是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一个时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想寻求阶级调和的方法。在本书下一卷，我将指明，对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恐惧，影响我国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方式。但在18世纪，法国革命业已在我国社会中引起巨大的慌乱。法国革命在俄国所遇到的敌人，几乎没有比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更自觉、特别是更彻底的了。他们当时在我国欧化人士中占有最显著的地位，这些人士由于害怕西方对俄国的革命影响，开始对西方采取否定的态度。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种作用的恐惧，在诺维科夫的讽刺作品中，即已局部地有所表现。可惜，在神秘主义的影响下，对西欧自由思想的恐惧更加笼罩了这个优秀人物。关于他对神秘主义的爱好和这种爱好对于他的影响，我们往后再谈。现在先指出另外几人。

洛普欣写道："我虽然不很了解外交商业事务，但我觉得可以不无根据地大胆说，俄国政策的主要技巧，应该是尽可能不仅减少对欧洲的依赖，而且尽可能减少同欧洲的政治和道德关系。所谓道德关系，我指的是风俗，因为欧洲风俗惊人的腐败，腐蚀着俄国古代灵魂和躯体的健康"①。这一思想深刻存在于我国神秘主义者的世界观，后来在舍维列夫的论文里更获得了广泛发展。

但在舍维列夫发展这一思想之前，它在涅夫佐罗夫——就是那个在莱顿毕业于医科大学，由于法国和比利时发生骚乱，不愿前往这两个国家的涅夫佐罗夫——的一些论文里已被反复提出。由

① 《洛普欣札记》，第189—190页，伦敦版。

于是“当今哲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涅夫佐罗夫甚至对药典也用神秘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①。他表示坚决相信，整个西方的历史只不过是法国革命的准备，而“北方(即俄国——普列汉诺夫著)则将不仅使许多国家摆脱新拿破仑的桎梏，而且会放出灿烂的光辉，普照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②。涅弗佐洛夫的这一思想曾被收进俄国国粹派的学说，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涅弗佐洛夫给青年写道：“亲爱的青年们！……要敬重有教养、有德行的外国人，但不要全部接受外国所作所为和所推崇的一切，而应在许多方面学习自己的浑朴忠厚的祖先”③。他自己学习浑朴忠厚祖先的结果，可从他对小说、悲剧和喜剧的否定态度中，窥见一斑。使他深为不快的是，罪恶多端的歌德，竟成为“美的先知者”④。

涅夫佐罗夫的著作活动，是在19世纪最初20年。我认为现在就指出这种活动是有益的，因为他在所写论文中发表的观点，是在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已故佩平说，我国19世纪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危害社会的瘟疫。但是，他不承认它同18世纪神秘主义的血缘关系。可是只要提起涅夫佐罗夫、拉卜金和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亚历山大时代的神秘主义者，便可得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即亚历山大时代的神秘主义直接来源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神秘主义，而且同它在本质上相

---

① 在奥国医生承认奎宁是医治疟疾的必需药物时，这个医学博士却在1809年1月《青年之友》杂志中写道：“世界已存在七千多年，希波克拉忒斯关于疟疾写了许多东西，而美洲的发现，从那里输入奎宁，则不过三百年。难道在那以前，人类只有受疟疾的折磨，而没有可以治疗这种病的药物？否，我不这样想。上帝是圣智的，慈悲的，关怀自己的生灵。在他们生活的一切国家和地方，上帝都给与所需要的一切。”(关于涅夫佐罗夫，请参阅别索诺夫的论文，见《俄国丛谈》，1856年，第85—129页。)

② 《俄国丛谈》，1856年，第3卷，第120页。

③ 同上书，第121页。

④ 同上书，第118—119页。

同。

VIII

这样，赫尔岑说，地主反对洛普欣，是反对人和反对神秘主义者。这种说法是一个重大错误[1]。姑且抛开“人”的问题不说，我们可以坚决断定，无论就洛普欣和其他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说，神秘主义者都与地主十分协和，都成为地主的必要的补充，并给地主以所期望的支持。

读者在这里也许要提醒我注意，巴尔斯科夫认为C. M. 加马列亚在这方面是例外。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位诺维科夫的朋友的一切，使我们不得不把他看为一个真正清廉的人，他完全不关心任何等级特权，甚至对于自己的简单财产权利也淡然置之。当政府为了奖赏他在白俄罗斯的劳绩，分给他 300 名农奴时，他也拒不接受，理由是他不知道怎样管理自己的农奴，更害怕照管别人的农奴。有一次，强盗抢劫他，他坦然将自己的表和钱包交给强盗，回家后还祈祷强盗不要将从他这里夺去的财物用去作坏事。另一次，他自己的仆人偷了他的东西逃走。在这个仆人被抓到时，加马列亚将被偷的钱赠送给他，释放了他，并对他说：“逃走罢！”[2]。我们看到，加马列亚的行为，同我们时代的托尔斯泰伯爵的主张很符合，但**托尔斯泰自己却不曾这样作过**。加马列亚所宣传的东西，同不以暴抗恶论是很相仿佛的。

他在一封信里这样表述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如果对他们(即对人——著者)不以爱相待，而是以法官自居，并且是一个严厉的法官，对自己毫不检点，那么，我就不是从事自己的事业，就是走向不应走去的地方，教诲不应教诲的人。……我最好是

---

① 《洛普欣札记》伦敦版，序，第 651 页，注释。

② M. H. 隆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的马丁派》，莫斯科，1867 年，第 167 页。

首先自己实践业已认识的真理，然后以亲爱的态度告诉别人；而如果他们不按照我的意见去实践，那也不要愤怒，因为他们是站在、或匍伏在他们主人的面前，主人有力量使他重新站立起来。我毋须对他们，而只是对自己负责，因为我最好是注意自己”①。

对恶不抵抗的理论，在这里得出了托尔斯泰伯爵所不曾得出的结论。加马列亚甚至认为，对恶连愤怒也不允许。非常明显，他是站在后来托尔斯泰伯爵所主张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观点上去了，因为只有站在这种观点上，才能接受对恶不抵抗的理论。加马列亚愿意向自己的亲近者提出良好的劝告，但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对他们表示愤怒，因为他们的心掌握在主人的手里，归根到底，每人都只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不可能否认，加马列亚的禀赋是宽容无私的。根据形式逻辑的观点，应该承认他是俄国“蔷薇十字会”会员中最彻底的一员。谁强调“精神凝视着永恒”，谁宣扬对转瞬即逝的人间幸福漠不关心，他就会逻辑地对剥夺他的这种幸福的人们，放弃抵抗。

我国神秘主义者，在理论上都接受对恶不加抵抗的理论。例如，洛普欣在所著«真正基督教徒的素质和职责简述»一书中，对于真正基督教徒应该怎样对待想要同他争讼和剥夺属于他的财产的人的问题，是这样答复的：

“如果有人想要同他争讼和夺去他的外衣，那他就应该把衬衫也送给他；如果有人想追使他一道走一俄里，那就同他走二俄里。这就是说，他应该以无限温顺的精神将自己和任何私产为爱而牺牲。”

他在同样的意义上在那里答复了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真正

① 很可惜，我未能看到上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出版的加马列亚的信简。因此，我的引文都是根据涅泽列诺夫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一书，第175—176页。关于加马列亚，参阅 M.B. 多夫纳尔-扎波利斯基和西多罗夫主编下出版的«共济会史»第2卷。

的基督教徒应该怎样对待欺侮他的人？

"在从容不迫地接受欺侮之后，应准备用爱来接受更大的欺侮。"①

但是，洛普欣曾在刑事法庭工作，并与他的朋友进行民事诉讼②。很难设想，他会宽恕想要盗窃他的财物的仆人，或夺去他的表和钱包的强盗。就这方面说，他完全没有加马列亚所特有的那种彻底性。其他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也都没有这种彻底性。尽管这样，他们却都比加马列亚更忠实于神秘主义的精神。这仿佛奇怪，但这却是事实。

神秘主义是对第三等级推翻旧秩序的努力的反动在精神上的表现。企图废除某一特定秩序的人，并不轻视这个秩序。我们所熟悉的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也不曾轻视旧的秩序。相反，他们对于旧秩序的基础，——即令不是对于它的所有个别部分，——都是重视的。同基督教宣传轻视人间幸福，而主要注重灵魂的挽救相反，第三等级的思想家主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人间事务，让人们"在这里，在人间，建立天堂。"对新的法国哲学的反动，无可避免地再次导致了一种观点的宣传，认为灵魂的挽救，才是值得真正基督教徒注意的唯一幸福。加马列亚的行为便是由这种观点促成的。但是，这种观点的历史意义——它决定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在于它是一种反对当时革命趋向的论据，亦即一种维护旧秩序的精神手段。由于这种观点造成了对最高等级特权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它超越了目标，在历史上成为一种不适当的东西。提出这种观点的理论，同其本身的特性发生了矛盾。这一在加马列亚那里不曾看到的矛盾，由于洛普欣和他的亲近的同道们

① 《洛普欣的共济会著作》，第1辑，第2篇，第68页。

② 关于他同他的好友屠格涅夫家庭的诉讼，请参阅前已引录的皮克萨诺夫论文（《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Ⅰ卷，第234，236，237页）。

的不彻底性而获得解决。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看来，他们是不彻底的，但是从产生18世纪神秘主义和保证这种神秘主义在欧洲大陆的颇为广泛流传的历史的客观逻辑观点看来，他们却是比加马列亚更彻底些的。

如果形式逻辑促使神秘主义者对最高等级的特权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那怎样也不能说，这种漠不关心包含了什么进步的东西。完全不包括！

宣传对现世幸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漠不关心的一种情况就是对等级特权的不闻不问——意味着宣传逃避我们的罪恶世界。谁逃避我们的罪恶世界，他就是表示不仅对最高等级的特权，而且对那些受这种特权折磨的人们的现实命运漠不关心。在等级特权的敌人力图按照新的原则改造社会的时候，谁宣传逃避我们的罪恶世界，他就是不知不觉地支持这种特权、为“有罪的人们”，即为那些利用其特权地位来这样那样剥削人民群众的人们效劳。

再说一次：同赫尔岑的意见相反，洛普欣和他的共济会同志们的神秘主义情绪，同他们的农奴主和地主信念，是共处得很好的。就这点说，皮克萨诺夫是对的。但是，他认为洛普欣具有完全彻底的宇宙观，却是一个错误。洛普欣和我国所有蔷薇十字会员的宇宙观的结构，都是不完全的。在他们的灵魂里，显然存在着一种因素，赫尔岑在他的著作里把这个因素称之为“人”。这个因素同“地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事实上是与“地主”不相协调的。当“人”与“地主”发生冲突时，“神秘主义者”所支持的是“地主”，而不是“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是在“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之下进入莫斯科“蔷薇十字会”的灵魂的，而“神秘主义者”则认为“百科全书派”是魔鬼的工具。

当然，这毫不妨碍我们把洛普欣对穷苦人的同情态度，完全归

因于他的心地善良。但他在为他的这种态度辩解时说，如果缺乏及时的救济，那就会促使穷人犯罪。洛普欣这样说，仿佛他是同意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主张，因为后者反复强调说：人的行为取决于他们的地位。同样，当他决定对嗜酒的穷人予以救济时，他问过自己："难道你自己不曾饮酒过量？难道贫苦无告的穷人不能偶尔贪杯？"他仿佛也是重复爱尔维修的讽刺语句："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人们希望不幸者完美无缺）。可是，在法国第三等级的先进思想家要求改造社会关系的地方，我国抱有神秘主义情绪的贵族思想家，却仅限于给穷人几戈比的施舍。这就可看出他们同先进法国思想家之间的距离该有多么大了。

洛普欣反对刑事惩罚的极端严酷性。这也表示他未能脱离西欧启蒙思想家的影响。"逃避惩罚，纵然无用，也比等待严厉惩罚更能防止犯罪。"——他的这个思想① 也完全是从贝克莱那里抄袭得来的——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抄袭，都是一样。但在这里，也有一个把俄国贵族思想家同法国新哲学信徒分隔开来的距离，这就是洛普欣关于刑事惩罚的性质和范围的意见。他在原则上不反对体罚，而只是认为应予减轻。作为莫斯科刑事法庭的首席成员，后来又任该庭庭长，他经过莫斯科卫戍总司令丘尔内谢夫伯爵批准，开始对盗窃犯和诈骗犯不用鞭刑，而实行这样一种"体罚"，使被惩罚的人能够去作新兵②。这是贝克莱所不会同意，也很难为加马列亚所赞同的。但这却符合俄国实际生活的客观逻辑，因为它在意识上反映了多少被西方影响减弱的特权等级的因素。

众所周知，洛普欣在1802年同斯洛波博茨克-乌克兰省的H. A. 涅列丁斯基-麦列茨基一道侦查案件时，对反正教仪式派表示了极大宽容；根据赫尔岑的意见，由于他的庇护，阻止了凶残警察

① 《札记》，伦敦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对这一教派的匪盗式袭击[①]。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善良举动，也可能是由于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神秘主义是不重视真正宗教的教条及其仪式的。但是，如果神秘主义者不重视教条和仪式，那也是解放哲学对旧信仰的瓦解作用的结果。此外，俄国的神秘主义者，由于是彻底的保守派，对于仪式并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②]。因此，就是在洛普欣的宽容态度里，也还是可以看到"百科全书派"对他的尽管不很长久的影响的结果。

最后，——然而最重要的，是莫斯科"薇薇十字会"会员的所谓启蒙活动以及他们在粮食歉收的1787年对饥饿农民的广泛救济，也只是由于他们所憎恶的法国解放哲学在他们的心灵里将"人"同"地主"及"神秘主义者"结合起来的原故。

关于"地主"，这里毋需多说：因为谁都知道，地主总是自我安慰地说："让庄稼汉忍耐一会儿，没有关系"。神秘主义者力图与神结合，全神关注永恒的生命，对于人们在人间的暂时痛苦，不以为怪。相反，"人"由于受了哲学的良好影响，——这个哲学主张人们应首先对他们在地上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的改造——却不能不时常对人民的灾难作出反应。所以，如果莫斯科的"蔷薇十字会"会员对于饥饿农民的痛苦呻吟没有保持充耳不闻的态度，则他们在这里所走的正是解放哲学指示的道路，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我国"蔷薇十字会"的"启蒙"活动，也是这样。当然，神秘主义者也是不反对开办学校和出版报刊书籍的，如果在学校里和刊物中宣传的是与他们的观点和精神情绪相符合的挽救灵魂的东西。尽人皆知，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在1784年建立的莫斯科"印刷公司"所出版的书刊，主要就是追求拯救灵魂的目的。这类的出

---

① 关于反对正教仪式派案件，请参阅《札记》第118页，伦敦版。

② 他们断言，正教教会的仪式要比其他基督教派的仪式更接近原始基督教的仪式。

版物为数众多①。我国社会思想史中极为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我国知识分子所开办的第一个“秘密”印刷所，是为共济会会员刊印各种著作的印刷所。佩平在总结具有共济会思想方式的莫斯科“启蒙学者”的出版活动时，对于这个活动的消极特征虽然完全无意强调，但也说：

“诺维科夫及其小组在俄国著作界留下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造成一种非常沉重的感受。这一结果本应是内心追求和多年劳作的成果，但却是一批充满扑朔迷离的神秘主义，充满愚昧无知，幼稚谬论和幻想迷信的书籍”②。

自然，带来这种辛酸结果的活动，是同当时真正启蒙思想家、即第三等级思想家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种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同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作不妥协的斗争。但是，我国的“蔷薇十字会”会员在刊物上广泛传播与新思想相对立的理论以反对新思想时，还是向时代作了让步：第一，“印刷公司”同时出版了教科书③，从而无论如何促进了在俄国人民中传播知识。第二，在

---

① 人们有时说：“印刷公司”所出版的大多数著作，并不都有严格的共济会内容。这是事实。但是，就在没有共济会内容的书籍中，也有许多拯救灵魂和神秘主义的东西。属于这类的书籍有：瓦西里·韦里基，约翰·兹拉塔乌斯特，格里戈里·纳济安津，季奥尼西伊·阿尔索阿吉特，伊乌斯丁·菲洛索弗等人的著作；属于这类的书籍，还有一些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诗集如：《马尔尼奥：对幼稚者毒打》，盖斯涅尔：《阿韦利之死》，比戈布：《约瑟夫》，米尔顿：《失乐园》，莫扎尔：《丹尼尔在大沟》，《哭泣或关于生、死与不死的深思》，克洛什科特：《救世主》，加列尔：《罪恶的起源》，等等。除诗集外，还出版了不少著作，部分地反对宗教自由思想，部分地直接宣传神秘主义，如：古戈·格罗岑：《反对无神论者和无畏论者的论述》，约翰：《论基督教真理》，约翰·马逊：《论自我认识》，杰尔加特：《自然神学或上帝存在的证明以及从创造物事实中得知神的本质》，波尔德吉：《神的与真理的形而上学》（Я. 贝姆的学生），等等。佩平说：“这些书和类似的书，是向直接神化的纯粹共济会著作的过渡。普拉东总主教曾受委托审查诺维科夫所出版的书籍，除不多的几本外，他批准了所有的书。

② 《俄国共济会》，第329页。

③ Г. В. 雅库什金说，印刷公司出版的教科书，价廉物美。（《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诺维科夫》——《创举》，第166页。）

它的印刷机上曾刊行“百科全书派”的一些“卑鄙古怪的产品”①。第三，这一点最重要：对于这种并不符合神秘主义的死后理想的积极社会出版活动的需要，其本身就是百科全书派的“卑鄙产品”所引起的西欧社会运动在俄罗斯的反应②。叶卡捷琳娜很懂得这一点。她不能容忍神秘主义。但她对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迫害，并不是迫害神秘主义者，而是迫害那些倾向于离开政府搞社会活动的人们。

人们也许要提出问题来反驳我：为什么在我国表现出这种倾向的是神秘主义者，——尽管这在他们是自相矛盾的——而不是仿佛处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直接影响下的“伏尔泰主义者”呢？

对于这一无疑地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首先也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回答：谁是我们所探讨这一倾向的最显著、最典型的代表呢？

任何人都会说：诺维科夫。涅泽列诺夫教授正确地指出：我国共济会在这位优秀人物所参加的一切地方，都无成效：它是“排他性的和固步自封的，——它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最为热衷的是信仰者的数目，而不是真理和社会福利，因而共济会已完全不能吸引整个俄国社会来参加它的活动。非常可能，我国共济会的贡献逐渐成为诺维科夫和他的同志们的个人贡献”③。姑且假定，诺维

① 这是总主教普拉东的用语。这些“百科全书派的产品”就是指那些与印刷公司其他出版物不同，受到他的极为坚决严厉谴责的书。

② M. И. 涅夫佐罗夫亦未能摆脱这些“产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尽管他力图避免旅行法国和比利时，因为那里发生了骚乱。在回到俄国以后，他同他的同伴B. Я. 科洛科尔尼科夫一道在里加被捕，受到可怕的舍什科夫斯基的审问。这个禽兽问他：“你是否知道你现在什么地方？”他答道：“不知道”。——“怎么不知道？你现在是在秘密审讯处”。——“我不知道什么叫秘密审讯处。也许把人抓起来，带到森林里，说这是秘密审讯处，并开始审讯”。——“女皇命令，如果你不答复问题，就重重打你”。——“我不相信，写过制法委员会上谕的女皇，会下这个命令”。只有敬重（哪怕是违反自己的意愿）启蒙作家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因为叶卡捷琳娜就是根据这些作家著作中的思想，作出她的“上谕”的。不过，涅夫佐罗夫不属于洛普欣、库图佐夫和其他贵族神秘主义者所自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关于他，我们往后还要论及。

③ 《1769—1785年间的杂志出版人诺维科夫》。

科夫未能吸引“整个俄国社会”来参加活动；但是在莫斯科神秘主义者的一切慈善事业和启蒙创举中，都可看到诺维科夫的思想和意志，这却是确凿无疑的①。

既然这样，那就很明白：对于上面所指出的莫斯科神秘主义者的倾向（这个倾向使他们有利地区别于“伏尔泰主义者”）的解释，应该求之于那些决定诺维科夫启蒙和慈善活动的目的与性质的社会条件。

我们知道他是一些讽刺杂志的出版人。现在，我们必须对他的活动作出更全面的了解。

① 什瓦尔兹也是象他一样的精力充沛和富有进取精神。但什瓦尔兹死得早。

第十二章　尼·伊·诺维科夫的活动

I

我国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属于统治等级①。

就这方面说，他们同我国“伏尔泰主义者”完全相似②。由于社会地位的相同，这两个派别虽然在对宗教的态度上极为分歧，而无论在教育上，或在其成员的习惯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

神秘主义者也好，伏尔泰主义者也好，都精通外文，特别是法文。精通语文，当时仿佛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俄国贵族的特点。这一情况对当时公立学校的教育大纲，发生影响。试举一例。莫斯科大学在开办之初，便附设了两所中学：即贵族中学和普通中学。贵族中学里除古文外，还学习德、法、意等国语文；而在普通中学里，则只学习古文。贵族中学由于课程较多而极大地优于普通中学。只要一看贵族中学的教学大纲，便可看到，这个大纲的制订

① Г.皮克萨诺夫说，他们都属于有爵位的贵族和世袭旧贵族的高级官吏。他用他们的高贵社会地位来解释——最少是部分地解释——他们对共济会的向往。按照他的说法，他们在其他范围的统治习惯，使他们感到统治教会当局纪律森严的压力，而统治教会的统治集团又每每是依附于他们的。他机智地指出：“小教会”，即共济会的教会，如果仔细的研究，都是高级教会，即贵族教会。（见《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1卷，第246页，前引论文）。在这篇论文的另一处（第255页），他称俄国的共济会教会为“老爷教会”。我认为这后一名称更为恰当。不过，所谓“老爷”，我认为是指一般贵族、而不只是指世袭贵族和有爵位贵族的代表。官吏等级和僧侣等级之间的对抗，在伊凡三世时代就已暴露，而在16世纪，更在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瓦拉穆奇迹创造者的谈话》中，得到表现（见该书第I卷，第2篇，第3章）。很自然，这一冲突在18世纪取得了新的形式。但是，如果以为在这一世纪里，只有贵族的最高阶层才用敌对的眼光看待僧侣等级，那是没有根据的。

② 我们知道，一些暂时爱好过“伏尔泰主义”的人们，每每变为神秘主义者，因此，这一情况就更易于理解了。

者力图把该校学生教育成为能够在上流社会不受冷落的人们。在这个学校里，除各种新语文外，还学习击剑，跳舞，音乐和绘画。对于普通中学的学生，上级认为没有必要让他们学习这些“艺术”①。

因此，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公立学校里不能读到西欧作家著作的原本。他们当中的那些想补充所受教育不足的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得外文知识，或者只有满足于翻译的版本。至于那些除此之外还想促进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的教育的人们，只有自己从事外文翻译，并且——由于我国出版事业的不发达自己出版自己的译件。

在颇为长期的过程中，在我国用俄文出版的书籍，只有比较有教育的非贵族知识分子和未受过适当教育的“县贵族”才去阅读②。

对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俄国作家曾表示不满。诺维科夫可能在所出版的讽刺刊物中表示的不满，更有甚于所有其他的人。在出身上，他是贵族和地主，但在教育上，他是一个真正的非贵族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在学习方面并不怎样幸运的知识分子。他虽然进过莫斯科大学的附属中学(贵族中学)，但在1760年“因懒惰和缺课”而被开除。现在不能确定，他事实上是否懒惰。但我们知道，诺维科夫在被开除后参军(1762年)，努力弥补本身教育的缺陷，并帮助他人自学。1766年他——当时是伊斯梅洛夫团的一名上士——便出版了波波夫从法文翻译的书：«两篇小说：阿里斯托诺耶夫奇遇和普罗米费耶夫人们的出生»③。译者在这本书里附

① 参阅«И.С.吉洪拉沃夫文集»，第3卷，第1篇，第397页及注释，第63页。

② 当时能够拿起笔杆的俄国贵族，每每写法文。例如，在保罗亲王的居住地加特奇纳市，时常上演Г.И.切尔内绍夫伯爵所写的剧本。但所有这些剧本都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出版也是用法文书名«Théâtre de l'arsenal de Gatschina»(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圣彼得堡，1887年，第302—303页)。我们从波罗申的笔记中了解，亲王在少年时代便对俄国剧本抱有成见。

③ 提醒读者，我保持着原件的写法。

录了《给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诺维科夫的信》，“称赞他崇德笃学，给人类赢得了坚固不拔的光荣”。此外，我们还了解到，波波夫的“思想产品不佳”，是他同诺维科夫结识的原因。波波夫约许将他的一切作品和外文译件都告诉诺维科夫。信的结尾写道:“我往后将对我们应该经常尽其力所能及为之效劳的社会，作出任何重要贡献”。波波夫的那些与这里所表述的观点相同的高贵思想，便是在同伊斯梅洛夫团的青年上士谈话的影响下产生的。由此可见，诺维科夫早年便扮演了一个热情宣传家的角色。不过，不管波波夫怎样说，舍勉尼可夫所引用的资料是毫无可疑之处的，他认为诺维科夫在那时就制定了出版计划。

但只是经过若干年后，他才能够着手实行这些计划。他为了等待有利于出版事业的条件，一度根据政府的任命担任法典委员会的文书工作，编写法典委员会“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同时编辑《代表大会会刊》。诺维科夫传记的作家认为，他在法典委员会的职务，对于他往后的发展，给了巨大推动。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还可以补充说，编写“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应使他能对他本人——即令不是按照出身，也是由于教育和同情——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获得广泛的了解。当他在1769年开始出版《雄蜂》杂志时，他已明白看出了他的启蒙活动的方向。吉洪拉沃夫就指出，他承担了在中等阶级中进行讲解，也就是进行教育的困难任务。同一学者称他为我国“小市民文学的创始人①。的确，诺维科夫给“小市民”作了很多工作，并且很重视他们的关注。不过，必须附以重大保留，才能说他所创作的作品是市民的。我们马上就可看到，何以如此。

① 《吉洪拉沃夫全集》，第3卷，第1篇，第131—145页。

II

“小市民”即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教育的条件而接近诺维科夫，毫无疑问，是他以作家和出版家身分所服务的中等阶级的读者。他热烈同情非贵族出身的知识界；当他看到他们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事情上都被迫向贵族，特别是向富有和显赫的贵族让步时，他是极为愤慨的。在他出版的«雄蜂»杂志里，刊载了一篇故事，说有三个人争取同一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一个聪明、有学问和勤奋的人”。竞争者之一是贵族，天生愚钝，无知，而且道德堕落。他的全部优点在于他有两千名灵魂（农奴）（故事的作者挖苦地说：“但他自己却无灵魂”。），还有许多显贵的亲戚。第二个求职者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他虽无多大智慧，却受过教育，而且品行端正。第三个求职者，“按照某些愚蠢的贵族的说法”，是一个卑贱的人，亦即小市民。他具有很大的天赋才智，长期在俄国和外国学习。他的道德品质是毫无缺点的。他是“真理的卫士，扶贫济困，疾恶如仇，憎恨奢侈，诚实端庄，爱人类，爱科学，爱祖国；而且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和睦的邻居，明察无私的法官”。此外，他以前还有过许多职务上的功绩。故事的作者在罗列了这位候选人的大量优点之后，向读者提出了一意义深长的问题：“得奖的是与大贵族有亲姻关系的蠢汉，还是德行优异的有功绩者呢？”①作者本人显然毫不怀疑实际生活怎样回答他的问题：愚蠢，但却富有，而且有显贵亲戚的贵族，既击败了不富裕、但多少有点学问的地主，也击败了很有学问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毫不足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都争相阅读诺维科夫的出版物。除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外，他在商界中也有读者。诺维科夫表现为贵族等级恣意横暴——每每是极端野蛮的横暴——的

① «雄蜂»，第Ⅰ部，第4印张。

敌人，其他所有的居民都多少受到这种横暴的折磨，商人等级在法典委员会的代表亦对于这种横暴提出控诉。在可能范围内，《雄蜂》及《绘画》的出版人热烈维护商人，而反对贵族的胡作非为。例如，在《雄蜂》杂志，第1部分，第4印张上，刊登了一篇有意思的报道，说一个穿着阔绰的妇人在商场上偷了两件贵重的网袋，被偷的商人不愿当着其他顾客使她丢脸，决定到她家里去向她说明，却遭到残酷的折磨："这个贵族妇人不但揪掉他的头发，打伤他的眼睛，而且用鞭子打得他皮开肉绽"。这个报道的作者对于这件事情，大声疾呼地说道：

"合该倒霉的可怜商人！你是一个诚实健康的人，怎么胆敢向一个高贵的女贼去讨回你的网袋呢？你应感谢这位女贵族，她不要你赔偿名誉。事实上，她对商人难道不是极为宽大吗？"

诺维科夫不只一次谴责"显贵的老爷"盲目地爱好外国的一切，盲目地宁用外国的工业品而不用俄国的工业品。他证明某些俄国工业品——例如呢绒，——已不比外国的坏。他很少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许，他对这种问题完全没有兴趣[①]。但是，对于工商等级的活动，他却赋予重大意义，因为他坚信这种活动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②]。他对于当时这种活动的性质，不曾抱有多大幻想。在《绘画》杂志（第2部分，第18印张）里，我们看到，他指出——不过，是顺便提到的——我国大多数商人不懂得"商业的基本规章"。似乎，他——一个拥护彼得改革的人——对于这个无知的大多数的仪表，也不很喜欢[③]。但是，在商人等级中有少数人，诺维科夫

① 他以《莫斯科通报》附刊的形式创办的《经济杂志》（波洛托夫曾在这里工作），同经济理论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② 在他的国民财富观点里，可以看到许多重商主义的成分。

③ 《雄蜂》杂志（第1卷，第37页）登过一篇揭发性的故事，说一个商人邀请"法官"在一家饭店吃饭，饭前举行了谈判，同饭店老板谈判的有两人：一人穿着一般城市商人穿的衣服，另一人则穿着"整洁"。这"整洁"在这里是含有深意的。

认为他们有进步的愿望，他愿意给他们以帮助。这一点，可以说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要记住，这个少数只是一个很微薄的阶层。我们手头极少资料，足以确定在诺维科夫各种刊物的订户总数中，商人占多大的比例。我们知道，例如，他在1773年创办"印书业促进会"和开始出版杜-加尔东的《中国概况》时，在外省完全没有订户，而在首都，很大一部分订户是宫廷官吏①。此外，我们知道，诺维科夫在1773年初出版的《俄国古代维夫利奥费卡》，只有几个商人和霍尔姆戈尔斯克县的一个农民订阅②。据涅泽列诺夫统计，这类订户不到9人，而其他订户则为贵族("贵族"，"高级贵族"以及"大人")或僧侣③。在《曙光》出版的第一年，有52名商人订户，而当时订户总数达800人。次年，《曙光》有49名属于商业等级的订户，而订户总数则为620人④。这些数目不大的数字，不足以证明商界对诺维科夫的出版物有何广泛兴趣。当然，他的别的出版物可能在商人中有更多的订户。可能，他的讽刺杂志在这些人中可能比《俄国古代维夫利奥费卡》一类的专门刊物，或《曙光》杂志一类的宗教宣传刊物，更有销路。但一般地说，不能不承认，最少在70年代，诺维科夫的出版物传播得并不广。他自己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775年3月从莫斯科写给科吉茨基的信中说：

"我没有任何本地新闻可以告诉你，不过，宫廷的迁离对我的业务造成了种种混乱，使我无法知道，怎样在本年出完《维夫利奥费卡》，因为订户不惟未见增加，而且其他的书，也几乎完全无人购

① 见 B. 谢缅尼科夫的论文：《诺维科夫早期创办的出版社》，《俄国藏书家》，1912年9月，第41页。

② 列为农民的，实际上可能是商人。

③ 《诺维科夫》，第204页。

④ 涅泽列诺夫：《诺维科夫》，第226、270、272等页。

买①。

由此可见，不仅《维夫利奥费卡》以及类似的专门书籍销路不好，其他的书也是如此。此外，叶卡捷琳娜的宫廷虽非由俄国史专家组成，但却购买了诺维科夫的专门出版物。这很能说明问题。能够说明问题的，还有一个事实，即诺维科夫在1777年决定出版《圣彼得堡学术通报》时，是把这一出版物献给卡卢加省贵族的。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为什么这时注意的是卡卢加省的贵族，而不是任何其他省份的贵族。但是，对于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同情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的出版家不能没有贵族乃至宫廷官吏的支持就行了。这一极有意义的事实，当然是由于我国当时的落后，在诺维科夫的社会观点上，留下了非常显著的烙印。

III

我们在《钱袋》杂志第4和第5印张的一封很有意义的信中读到："小市民在学习，贵族在游手好闲，商人在经营商业增加国富"。这封信很可能是出自诺维科夫的手笔。根据这些警句，应该说，我们的作者也象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家一样，对于贵族是抱着否定态度的。如所周知，法国第三等级的思想家认为，第三等级包括特权等级以外的全部法国人民（toute la nation moins les privilégiés）。但如对诺维科夫的讽刺刊物更仔细的研究，你就确信，他对于贵族的整个阶层，并不是一视同仁。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同一职位的三个竞争者中，《雄蜂》只是将富有的地主描绘为懒汉，而不富裕的竞争者则是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尽管他所受的教育没有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样精深。因此，按照诺维科夫的意见，不富裕的地主比富有的、显贵的地主更能接受教育。

对于他的这点意见，似乎可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一个事实来

① 《诺维科夫早期创办的出版社》，《俄国藏书家》，1912年9月，第47页。

反驳：即在1775年，当组成宫廷的“达官显贵”离开莫斯科时，诺维科夫的书几乎停止出售。但就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不是实际情况怎样，而是我们的作者不顾上述事实对于这种情况的想法。而他的想法却正是我所说的那样。非常明显，他对不富有的地主的同情，无可比拟地大大超过他对富户和显贵的同情。他挖苦外省贵族中的落后守旧分子①，但对他们当中的进步分子，则寄予巨大希望。他认为，在思想上他们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接近，这两个阶层的共同力量能够抵制“达官显贵”对俄国社会生活的有害影响。在《雄蜂》第八印张上刊登的一封署名齐斯托谢尔多夫给出版人的信，对于达官显贵和普通贵族之间的对抗。作了很有意义的指示。据齐斯托谢尔多夫说，一名宫廷官吏曾当他的面责备诺维科夫出版活动的粗鲁无礼，说什么“显贵的老爷毕竟不同于普通贵族，怎么能对他们象对普通贵族那样要求呢？”这样，在显贵老爷和普通贵族及普通人民之间便有了重大的对立。齐斯托谢尔多夫认为这种对立是完全自然的，他讥讽地建议出版人“继续刊登我们现在在《雄蜂》上所读到的那些剧本，不过当心，别将大贵族及其夫人的面孔照入你的镜子！写些讽刺贵族，讽刺小市民（原文如此！），讽刺衙门小官，讽刺出卖良心的法官，讽刺一切有过罪恶的人们的作品罢！嘲笑城乡居民的恶习罢！铲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压制弱点和罪恶罢，只不过不要触动达官显贵。”

在《雄蜂》的下一印张（第9印张），发现齐斯托谢尔多夫本人就是一个“小市民”。自然，这个小市民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这点完全不重要。相反，对于俄国社会思想史，重要的是诺维科夫在其第一个讽刺刊物里，便代表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用任

① 参阅《绘画》杂志第I卷（第15和第23印张）刊登的“县贵族”特里丰·普利克拉季耶维奇、他的妻子和兄弟给他们的儿子和外甥法拉列伊的很有才华的信件。

何其他社会阶层代表的名义，将显赫的大贵族同所有其他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按照诺维科夫的意见，人民反对显赫大贵族的事业，其发动和领导，应属于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法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历史过程，将整个"国民"同整个特权等级对立。法国先进作家所认识到的这一矛盾，自然地使他们提出废除一切等级特权的要求。与法国先进作家不同，诺维科夫和他的同志们将普通贵族列入"国民"以内，心里只是将"显赫的大贵族"同国民对立起来，自不能在原则上否定这些特权。他们自身的思想的逻辑发展，必然会使他们同贵族特权妥协，促使他们只是极为单纯的要求显贵的老爷不要滥用他们的高贵地位。在《雄蜂》第I卷第32印张上，我们看到一位署名"我"（显然就是诺维科夫本人）的人向显贵老爷所提要求的一个有趣味的清单:

"我"希望，显贵的老爷们既然"身居高位，与众不同，也应该在德行上出类拔萃"；他们在升官晋爵时，"不要忘记与他们有别的贫困人们仍然处于贫困；不要忘记这些人要求他们的帮助，正如他们处于贫困时也会要求帮助一样；希望他们对于贫困者的请求不要听而不闻，无论他们多么苦闷，他们还是能作些好事的；希望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的幸福，而不是致力于自身的幸福；希望他们不要将现在能够作到的事情推到明天，因为需要紧迫，时不我待"。

在这一希望的清单里，看不到对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任何暗示，哪怕是不着边际的暗示。"我"丝毫不反对现存的秩序，而且深知在这种秩序之下，不能没有"显贵的老爷"。"我"的全部希望，就是想使显贵的老爷参加慈善事业。您会同意，比这更温和的纲领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为了使读者相信自己的希望的充分现实性、诺维科夫指出，在俄国的现实生活里，是有许多德行完善的显贵老爷的。他甚至写出了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 O…，П…，H…，C…，B…，

Ш…, Б…, В…①，这在当时是显得鲁莽些。直到现在，也还有人以为确是鲁莽。在 19 世纪末，E. 舒米戈尔斯基先生还对《雄蜂》的鲁莽，表示极不赞同：

舒米洛夫斯基写道："将一部分达官显贵称为慈善家，而毫无证据地怀疑其他达官显贵，诺维科夫的行为当然是不慎重的"②。

我在前面说过，诺维科夫——在出刊讽刺刊物时期——是俄国最先进人物之一③。现在我们又一次看到，当时我国先进人物该是多么谦和谨慎。

由于我国经济落后，同当时在法国发生的情况相反，特权阶层和非特权阶层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在一切存在着特权等级的地方，概莫能外，——尚不曾成为我国社会政治进步的动力。有见识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阶层，尚未成长到在原则上否定贵族特权。这个阶层几乎完全没有越出对"大权贵"采取无害的反对派的态度，并在这种反对派立场上，认为自己是同所有其他贵族团结一致的。这种贵族无论对于"大权贵"的贪婪暴虐行为时常多么不满，当然不能违反自己而去提出废除农奴制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非贵族出身的有学识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农奴制很少采取否定态度的原故。

商人对于农奴制，也不曾表示原则反对。索洛维约夫说，他们自己就希望获得奴隶；他们所不满意的只是在我国，占有农奴，完全成为贵族的特权。在关于制法委员会的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当时我国商人的特点，在社会方面，是保守的、甚至部分地具有反

① 这些字母所表示的人名是：О — Орлов（奥尔洛夫伯爵），П — Панин（帕宁），Н — Нарышкин（纳雷什金），С — Салтыков（萨尔蒂科夫）；В — Вяземский（维亚泽姆斯基），Ш — Шувалов（舒瓦洛夫），Б — Бецкий（别茨基），В — Всеволожский（弗谢沃洛日斯基）。这里所说的论文，见标题为《对话，我与雄蜂》。慈善的达官大贵的第一个字母，原是《雄蜂》提出的。"我"认为所提完全正确。

② 见他的论文：《女皇政论家》，《俄国档案》，1890 年，第 I 卷，第 41 页。

③ 《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书见前，第 15 卷。

动情绪。在政治方面，他们对警察的横暴表示不满。然而这种不满也不曾促使他们图谋广泛的改革。当他们看到叶卡捷琳娜欣然迎合了许多贵族欲望时，他们遂热衷于对彼得时代的理想化。但是把这个时代理想化，意味着朝后看，而不是朝前看。我们在关于制法委员会的一章里还看到，我国商人当时显得不很能接受他们的代表所乐于引述——时常是不恰当地引述——的西方进步影响。我国商人的这种情绪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他们当中出现一些人，对杂志和书籍完全漠不关心。他们当中的个别人也曾摇摇笔杆，但这样的人不多，而且就是这不多的人，也都没有思想勇气。

诺维科夫比他的读者多少勇敢一些。然而不过是多少而已。在他出版其讽刺杂志的时候，普加乔夫起义的威胁，部分地正在发动，部分地已经临近[①]。但在他的这些讽刺刊物里，对于被奴役的农民的首创精神，毫无我们在拉季谢夫那里所看到的那种信心，哪怕是有条件的信心。诺维科夫很同情在**坏地主**统治下的农民。但这位拥护启蒙运动的人，却难得想到教育农民。不仅如此。可以认为他对于教育农民并未感到重大需要。我在前面提到，巴尔斯科夫先生说，诺维科夫在他的庄园里进行农业经济试验，完全不以这些试验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而感到难受[②]。巴尔斯科夫所

---

① 《雄蜂》第1卷出版于1769年，第2卷出版于1770年；《绘画》出版于1772年；最后，《钱袋》出版于1774年。

② 的确，有些资料可以反驳巴尔斯科夫的意见。诺维科夫在1798年3月27日写给A.Ф.拉布金的信中说：他的村庄是他和他的兄弟共有的，他的兄弟惯于当家作主，所以他们的共同产业，都是由兄弟支配的。诺维科夫说："我一切都听从他，也许，我们的性格不同，特别是他过于固执己见，因此，我的主张都没有用。由于每每不按我的规章办事，我只好顺从，看着使我痛苦的事情发生。可以说，我几乎是象一个外人一般生活着"。（《俄国藏书家》，1913，第3期）。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自述。但是诺维科夫为了什么而痛苦呢？是为了他的农场建立在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还是为了他的兄弟在使用农奴劳动时实行了过分严厉的规章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诺维科夫的信没有答复。但在他给拉布金的另一封信里，——巴尔斯科夫所指的很可能就是这封信，这封

指的试验，是诺维科夫在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进行的。涅泽列诺夫就这样说过，可以说这时的诺维科夫，已经不象诺维科夫本人了。请看从过去的诺维科夫的刊物里抄录的一些例子罢！

在《绘画》杂志的第一卷第19印张里，刊登了一封信，嘲笑轻信的人们竟求助于算命占卦。信的作者说，这伙占卦算命的老太婆，是一批坏蛋；他对于不仅在普通人中相信这种老太婆，感到愤慨。他说：

"普通人除了从事极端愚蠢和荒诞的迷信之外不会作出更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先生，您能相信许多贵胄之士和中层人物，也都丢尽了脸，他们在这种场合里的表现同愚蠢无知的人们也都一模一样吗？对于这些人，最少应该希望他们有健康人的头脑，而他们却是这样单纯，以致受了这种女人的欺骗！这是很令人难受的！高贵的人物愈是混同于无知的群众，便愈是受到公正聪明的人们的嘲笑……"。

这种对"无知群众"的极为鄙薄的评语，在诺维科夫的杂志里，编辑部都不加任何反驳和保留地刊登出来了。

在《雄蜂》刊登了一些讽刺性的"特写"。这些"特写"所以值得注意，不是由于才华显著——这些"特写"是连才华的影子也没有的，而是由于其内容，最少其中一篇的内容。它嘲笑一个名叫胡多斯梅斯尔的人，这人毫无统率部下的能力。"任何一个奴仆都敢于同他顶嘴，劝告他，甚至要他听从他们的吩咐，只不过不鞭打他，而他也不敢鞭打他们。人们为此时而称他为主人，时而称他父亲，人们在他那里象生活在天堂里一样！……只是胡多斯梅斯尔在部下中，却如服苦役。"

信是在1802年写的，——诺维科夫谈到他所经营的一个小呢绒厂，这个厂完全不是什么"别人的"厂了，——他的兄弟已于1799年逝世——他认为在工厂生产中使用农奴劳动，是完全自然的。（同上，第27页）。我已经指出，诺维科夫经营的极端紊乱，是一个足以减轻他的责任的情况。

对于这点意见，编辑部也不作任何批评。相反，《雄蜂》的编者在刊登这些"特写"时，向"青年作者"说了如下鼓励的话："您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希望更多地收到这样的文章，可惜不常收到。如果往后您送来象这样的文章，我将非常感激"①。

在关于讽刺杂志的一章里，我曾假定，诺维科夫在心灵深处，对农奴制是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我在那里已经补充说明，即令他对农奴制是抱着这个态度。但在他的出版物里，这一态度却并未表现出来。我们在这些出版物里所看到的，不是对地主权力本身的攻击，而只是对这个权力的滥用的攻击。我刚刚引述的事例，使我们有根据断定，诺维科夫的出版物甚至在反对权力滥用时，也未能摆脱那些把农奴制看为一种自然的、不容批评的制度的居民阶层的意识。

当我谈到诺维科夫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教育时，我并不想说，他认为不需要对人民进行任何训导。在关于讽刺杂志的一章里，我叙述了登载在《钱袋》杂志，标题为"民间娱乐"的喜剧的内容。诺维科夫为这一喜剧而写的序言，主张"为人民写喜剧"，这种喜剧应包含道德教育，应"表演适于人民模仿的范例"。读者根据其所了解的"民间娱乐"剧本的内容，会同意我的见解：即这一剧本所包含的道德教育就是一条陈腐的规章，认为地主应善待自己的农奴（但不避免感化性的体罚），农奴应爱善良的地主。就令是最顽固的地主，只要他不是站在斯科季平和普罗斯塔科夫之流的水平上，也断然不会反对对农奴主提出这样的建议和对农奴提出这样的训导的②。

---

① 《雄蜂》，第2卷，第XIII印张。

② 诺维科夫在1773年5月写给科济茨基的信中说：贵族"不过是受国王的委托对若干与他们在一切方面相同的人们进行监督的人。"（引自涅泽列诺夫的《诺维科夫》一书，第206页）。涅泽列诺夫在这里也愿看到对农奴制的原则否定。事实上，诺维科夫在这里所表示的观点，实质上，不过是复述了从彼得前罗斯流传下来的波索什

在本著第1卷的历史导言里，我曾指出，法国国王在同封建主斗争时，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而莫斯科大公和沙皇，由于我在那里所指出的历史条件，在同重臣大贵族斗争时，却只能从官宦的某些阶层中找到支持。我那时就补充说明，这一情况对于我国历史过程的整个未来发展，曾有重大影响。现在，我们看到，在彼得改革影响下产生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情况。

IV

有些学者断言，诺维科夫是小市民文学的出版家，他的出版物是以"中间等级"为读者对象的①。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事实上，诺维科夫通过他的出版物所接触的"中间等级"，其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最大部分，是由贵族构成的。就在诺维科夫以后很久，——包括赫尔岑以前的时代在内，——我国反对派的文学不得不主要寄希望于贵族等级的某些人士。

在本书往后各卷里，我们将看到，这一情况怎样影响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至于诺维科夫的时代，我们业已看到，他一方面扮演了反对"名门显贵"的反对派文学领导人的角色，同时又未能（即令他愿意）捍卫必须进行严肃认真的社会改造的主张。这种主张也不符合我们所说的"中间等级"的其余两种成分，即商人和官宦的情绪，他们当时还都很保守。

诺维科夫的出版物所反对的"名门显贵"，当时曾很受法国影响。这一事实已足以引起那些对"名门显贵"抱着反对派情绪（尽管这种情绪极端谦和）的居民阶层对这种影响的不信任。但是还

科夫观点。的确，诺维科夫在复述这一观点时，提到农民是在一切方面都与其主人相同的人。可是，完全不曾在原则上否认奴隶制的谢涅卡，不是也曾向罗马的奴隶主提到这一点吗？波索什科夫说："地主不是农民的永恒主人"，而他自己却领有农奴。他的范例，部分地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诺维科夫的心理。

① 这是H.C.吉洪拉沃夫的说法，见《全集》，第3卷，第1篇。

有另一原因加强了“县贵族”，商人和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对法国人的恶感：这一“中间等级”由于自己的保守主义不能够同情法国先进作家的改革要求，害怕他们的大胆结论。中间等级对于“伏尔泰主义”，比领略过法国先进作家的禁果的洛普欣和其他“显赫”贵族即令不是更为害怕，也可能是更为无知。诺维科夫在这方面也是我国“中间等级”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对“名门显贵”的恶感，其来源之一在于他相信精通法文的人们过于迅速和轻易地接受不正直的作家的论点，这些作家“根据物理学，证明太阳、月亮、地球和一般宇宙结构，能够不经过神而取得其存在”。他以为“其他的人”，显然是指那些不懂法文，或懂得不多的人们，能够对旧的宇宙观保持更稳定的传统依恋心情，因而更能够对大胆的法国思想家的“幻想的反神证明”，采取蔑视的态度。最少，在一封署名P…的人的信里，就是这样说的。这封信包含着关于作者的一次笃信宗教的梦境的极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发表在诺维科夫的最好的讽刺杂志《绘画》上。信的作者补充说，对于无神论“传染病，除了时常提醒青年注意，凡是忘记上帝的人定将引起上帝的正当震怒之外，别无他法可以防止”①。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很合当时的“小市民”读者的胃口的。

诺维科夫虽然由于勤奋读书，填补了他在学识上的大量缺陷，但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的造诣永远不足以使他理解法国哲学。在关于方-维津的一章里，我已说到，法国哲学理论以奇怪的方式在诺维科夫的思想里同“卷发科学”的规则交织在一起。理论思维显然为他所不能理解。在狄德罗到达彼得格勒时，诺维科夫说：“他是一个聪明的法国人，但他是不信神的，对他不能信任”。对于这种说法，毋需再补充什么了。

如果我们想对诺维科夫这时的观点加以总结，我们无论如何

① 见该杂志第2卷，第21印张。

不应忘记他的自述，说他直到70年代上半期，还一直站在"伏尔泰主义"和宗教的歧途上①。实际上，就是他在世的这一阶段，我们的作者接近宗教，远远超过于接近"伏尔泰主义"。对于他关于自己的证词，必须在这样的意义上去理解：即他并不觉得当时应对法国新哲学家的一切意图，都予以坚决驳斥。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当时的一些出版物中，意外地看到一些关于最"优秀"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作家的赞语。

诺维科夫作为受了西方影响，已认识到学习必要的社会阶层的文坛代表，对于凡是可以促进这些阶层见识的事情，都予以热烈的同情。他虽然不喜欢法国人，但他看到法国在文化方面远远超过俄国，因而对法国人不无羡慕之感。但他却用一些历史的理由来宽慰自己：

我们在《钱袋》杂志上读到："俄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探讨上的敏锐、智能和洞察力并不亚于法国人，他们有更多的坚定性、耐性和勤奋（原文如此！）。法国人和俄国人在科学探讨上的差别，整个地在于这一人从事科学比另一人迟得多。"

在谈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事业震惊了整个世界，她在俄国传播科学和艺术的热情与路易九世在法国并无二致，并对她备加恭维以后，作者继续写道：

"如果看看俄国在科学艺术探讨上所取得的迅速成就，那就应该作出结论，认定俄国的科学和艺术，将比法国在更短的期间，达到完善"②。

但是，如果仅就宫廷官吏的狭隘范围说，俄国教育从来没有重大成就。这个思想是诺维科夫所欣赏的思想之一。就在他越来越热衷于神秘主义，烧毁了许多他以前所崇拜的东西的时候，他也继

---

① 洛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的马丁教派》，第99页。

② 《钱袋》，第3印张。

续保持了这一思想。在他的《莫斯科月报》里，发表过一篇在许多方面都很出色的论文：《论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论文的作者坚持，教育必须把根子扎到人民的土壤中去。他写道："人民是科学成果的第一手收集者。这种成果到达'显贵'的人们（又是'显贵'！——著者），是很晚的。不要以为这种成果是突然在某种人民中繁荣起来的，或以为只要从其他国家来了一些学者，就能得到成果。这种学者能够粉饰沙皇的宫廷；要说他们能够使整个国家都有学识，那是极为罕见的"。

文章引述了一些历史事例，以为证明：

"普托洛梅·菲拉德尔夫、康斯坦丁·波尔菲罗盖尼特、查理大帝和阿尔弗雷德虽然都曾从各地邀来了大批学者，但在他们那里，科学并未建立，就令在皇帝的庇荫下有所繁荣，也只是在国王加意培育的时候；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培育，便会遭受另外气候的严峻压力；剩下的东西都会同所有在其庇护者短期培养下结成的果实，一道凋谢①。

V

在19世纪40年代，A.C.霍米亚科夫曾竭力证明"脱离生活的知识的无用"②。实质上，这就是《论艺术和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文作者所发挥的同一思想。就其本身说，这一思想并未包含任何特别斯拉夫派的东西。在罗蒙诺索夫的著作里，也可找到这种思想，——不过，如德国人所说，他是"在另一联系上"提到这一思想的。这一思想亦曾为雷纳尔所提出和详细阐述。"③

诺维科夫以及方-维津、洛普欣同斯拉夫派的亲近，是由于对

① 《莫斯科月报》，1781年，第1辑，第282，283页。

② 见《外国人论俄国》和《俄国艺术学派的可能性》及其他论文。

③ 见前面关于俄国对西方的态度一章。

西方先进思想的恐惧。由于法国是这种思想的主要策源地，所以，象方-维津一样，他坚决地认为德国人比法国人好。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对话»里，德国人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光明正直"的典型，而法国人则被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按照当时俄国作家的习惯，给了这法国人一个明显表示其道德特征的名字：舍瓦列·德·曼松日①。对法国先进思想的恐惧，无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的特点，但不能把这种恐惧看为斯拉夫派所独有的特征。此外，在前面的一章里已经指出，诺维科夫是彼得改革的崇拜者②。

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诺维科夫并不曾从俄国的旧生活里找到足以与西方先进社会思想运动相抗衡，又能使他从这种抗衡中得到持久的满足。对于这一点，必须加以说明。

在一段时期里，诺维科夫极度热衷于把过去黄金时代——彼得时代、甚至彼得前时代——的俄国道德风尚，加以理想化。他在出版«钱袋»时，显然处于这种理想化的高潮。"光明正直"的德国人在这本杂志里向虚伪的法国人咆哮道：

"啊！当人力能够促进俄国人的教育，恢复他们的由于使用钱财而被毁坏了的过去道德风尚时，那时，就可将他们摆在人类楷模的地位上了"。

接着，我们的作者又让他的善良德国人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见解，说明为什么莫斯科罗斯的几个国王都不急于教育其人民。

善良的德国人说："我觉得英明的俄国古代国王仿佛预感到，由于给俄国引进艺术和科学，俄国的最珍贵宝物——道德风尚，便

① «钱袋»，第2印张。

② 的确，19世纪的斯拉夫派并不都反对彼得改革。波戈金便决心拥护这一包括剃胡须在内的改革。

会遭到无可挽回的毁坏；因此，他们宁愿其臣民对某些科学部门茫然无知，但具有优良道德的人，是忠于上帝、国王和祖国的”。

这一见解使我们想起波尔京对于莫斯科国家不愿派遣其臣民出国的解释，而诺维科夫补充提出的理由，则仿佛是从《解毒剂》中抄来的："不要反驳我，说俄国人在古代亦有缺陷。我答复你，所有的民族在任何时期都有其特殊的缺陷：请注意读读本国历史，你就可看到，那里的野蛮愚昧更有甚于俄国"①。波尔京和叶卡捷琳娜就是这样考虑的。

如果其他国家更为愚昧野蛮，显而易见，俄国应是最文明的国家了，不应是俄国向其他民族学习，而应是其他民族向俄国学习了。可是，诺维科夫在真正接近于这一结论时害怕起来。他怀疑起来了。

《钱袋》的下一期，没有把善良的德国人同万恶的法国人的对话登完，却刊登了一篇有意义的给出版人的信。信内对古代俄国德行的理想化，提出了尖刻的抗议，断言出版人爱好这种德行，是一种道地的狂妄行为。

信的作者写道："您一定出生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说，那时俄国的沙皇在新婚的第一日用蜂蜜沾发，而在第二天便与皇后一道洗蒸气浴，并在那里共进午餐；那时全部科学就是一部教堂日历；那时用长柄勺饮酒和吃蜂蜜；那时没有亲眼看到未婚妻就结婚；那时一切德行都掩盖在密密的长胡须里；那时由于各种不同的标志……架起木材实行火刑，或者根据特殊宗教信条将活人埋入土中"。

信的作者"搜寻"了《钱袋》出版人所捍卫的那些俄国古老德行，指出出版人的方法完全不能成立。出版人听信了老年人的口头传述，他们固执地说：在古时生活得好些，在古时人们更富有，

① 《钱袋》，第3印张。

也更聪明，在古时庄稼长得好些等等等等。然而，“不是所有的口头传说，都值得相信”；最好是读些书。而最值得信赖的书，是法国书。“法国人民最爱钻研科学，特别是语文科学；就是我国历史，他们也在我们之前进行了研究（原文如此！），给我们提供理解，开化我们的愚昧无知。”根据法国资料，作者断言，谈不上什么古代罗斯德行。他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就是在彼得前的罗斯业已变得强大时（例如，在沙皇伊凡·华西里耶维奇时代），俄国也还是受着君主独裁制的折磨，愚昧无知依然保持着以前的力量，因为道德风尚是不能用“鞭笞、压制和剑来改正的”。可惜，信中谈到彼得改革的地方，有很多删节，这当然是由于害怕检查机关的原故。关于彼得改革，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他”不曾从这方面进行对俄国人民的教育，因为他所求教的不是唯一能教育我们的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

接着，在信里谈到旅行巴黎，学会法国上流社会习俗的好处。显然，诺维科夫（这封信很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想按照他的习惯，将推崇法国而否定俄国古代德行的人，描写为轻浮的、甚至可笑的人。可是，他未能作到这一点：读者看到，信里提出的论断，都有其颇为严肃的根据。诺维科夫许诺给信的作者回信，“要他勿自命不凡，以为他的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都是不能反驳的”。《钱袋》的出版人不曾履行诺言。显然，他对俄国古代德行的怀疑，比他最初感到的更为深刻，他已无法收拾。因此，即令他接近于吉洪拉沃夫称之为“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特种斯拉夫派”① 思潮，但他在这方面的坚定性却不算突出。他对俄国古代德行的推崇，已为对这种德行的怀疑所代替。这对他的观点的往后发展过程有强烈影响。

---

① 《全集》，第3卷，第1篇，第260页。

VI

佩平断言，在诺维科夫的发展里，既无突然的间断，也无方向的改变[①]。这对，也不完全对。我们在下文将看到，这在什么意义上对；现在只是指出，佩平的这一论断需要作哪些修正。

当一个18世纪的俄国人由于对无神的"伏尔泰主义"感到恐惧而变为神秘主义者时，他是不怎样自相矛盾的。神秘主义只是这人以前就保持过的方向的最后一步而已。但是只要没有走到这一步，这个对"伏尔泰主义"心怀恐惧的人，还是在逻辑上和心理上，有可能对那些从彻底神秘主义者观点看来毫无意义的社会任务，发生兴趣的。对于这种任务的丧失兴趣，可以称之为"伏尔泰主义"思想敌人的发展过程的**间断**。而这种间断，在诺维科夫那里也可看到。

他虽然在出版其讽刺刊物的时代是法国先进学说的敌人，但在这些学说的间接影响下，他毕竟还对改善当时存在于俄国的事物秩序，有过某种——尽管极为微弱——意愿：试一回忆他对"名门显贵"的反对态度，他对残酷地主的抨击，他对我国当时"司法"的嘲笑等等。但在他热衷于神秘主义时，他却认为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同人对神的态度问题相比，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他以前的视线尽管由于成见而显得非常模糊，可是贯注于**人间**，而现在却转向**天上**了。死后存在的思想成为诺维科夫的主导思想。如果他还象往常一样谈论**教育**，如果他在什瓦尔兹的热情支持下，利用其与富有的神秘主义者的联系，以在当时俄国前所未见的规模扩大其出版活动，那也不应忘记，他现在是以真正"坟墓"精神（用波米亚洛夫斯基的话说）来教育人民的。诺维科夫的第一个神秘主义刊物——前面提过的《曙光》杂志，便充满了这种精神。

① 《俄国共济会》，第173页。

在这个刊物里，宣传人是为幸福而创造的，而幸福则在人自身。如果他有德行，他虽身受桎梏，也是幸福的：灵魂是禁锢不了的。有德行的人，无论其人间灾难有多么巨大，但死亡将结束这种灾难；而在死后的生命里，等待着他的，将是永恒的幸福。因此，在呻吟痛苦中饱受折磨的善良人，可比拟于在明天就要成为皇帝的囚徒：这样的囚徒，没有人说他不幸。所以，死比生好，黑暗使灵魂脱离人间浮华，迫使灵魂专心致力于自身，也比光明好。生与死的对立，不过是躯体与灵魂的对立。灵魂一旦摆脱了躯壳，它将洞察真理，生活在自身以内。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应孜孜以求的幸福，而道德就是要帮助别人得到这种幸福的。在《曙光》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发挥一种思想，认为人间的绝顶才智给艺术和科学带来许多好处，但艺术和科学在我们死后，却使我们仍旧非常低贱；因此，对于艺术和科学，不应重视①。在另一篇文章里，宣传"愚昧无知和极深奥的科学，在法律的考虑上，都是有害的"，我们应该"盲目地信神"。有趣的是，《曙光》曾预见到"克莱采奏鸣曲"②的哲学。它宣称不同性别的恋爱是恶，因为在恋爱里暴露着"人与兽的共同性"。看来，很难在"坟墓精神"方面比这走得更远了。然而《曙光》却走得更远：它说，"笑难道不是罪行"。

如果，笑一般地"难道不是罪行"，那就很明显，讽刺作家的嘲笑一定不符合我国神秘主义者的胃口了。诺维科夫一度拥护"指名道姓"的讽刺，现在却认为只能对"一般的恶习"进行讽刺，就是说，只能进行不伤害人的讽刺，而这正好是《万有》，与《雄蜂》相反，一度维护过的那种讽刺思想啊！的确，就在成为神秘主义者后，诺维科夫有时也感到打击恶习的需要。《莫斯科月刊》谈到："刺伤

① 加马列雅坚决支持了这一理论。当维特堡向他介绍他的莫斯科大教堂建造方案时，他向这位天才的建筑家指出了热衷艺术的危险性。

② 克莱采·罗多尔夫(1710—1831)法国卓越提琴家、教育家和作曲家，贝多芬的第47号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克莱采奏鸣曲就是献给克莱采的。——校者

恶人到心灵深处，用他的觉醒的良心去折磨他，”这是仁爱的责任，这种“德行的复仇”，是上帝容许的。为了进行这样的“复仇”，必须有“指名道姓”的讽刺，更需要对制度的讽刺。然而指名道姓的讽刺和对制度的讽刺，是同神秘主义的情绪不相协调的。因此，现在诺维科夫只是在极罕见的时候提到它。不仅这样，他现在愿意比当年的《万有》更严厉地谴责它。在《长眠的热爱劳动者》① 里，刊登了一篇给出版人的信（又是“信”！），说的是信的作者如何梦游帕尔纳斯克公路的故事。他在公路上，在各种不同文学部门的代表中，遇到一些讽刺作家和批评家。他看到，他们的形象很不美观。他们的眼睛象闪电般发光，言谈毫无顾忌，经常发出“漫骂和丑恶言词”，他们象强盗般攻击别人。大量讽刺杂志的发行人，需要经历多少沧桑，才能对讽刺作家形成这样的理解哟！

诺维科夫以前也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在，他的政治冷淡态度，获得了思想根据。如果德行能将一个最不幸的人变得形同奴隶，而这奴隶在明天（即在死后）便会成为皇帝，那就不需要搞政治了。《莫斯科月刊》宣扬说，只有恶人才不自由，而有德行的人则在任何国家里都享受平等的自由。读者看到，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自由：是通过逃避人间关系的罪恶世界而获得的自由啊！

然而诺维科夫就在逃出我们的罪恶世界以后，仍然对法国解放哲学保持着厌恶态度。在他的所有神秘主义刊物里，仍然继续实行反对百科全书派的斗争。在《曙光》里就发表了《善士旅行记》，其中一章的标题为《卑鄙的人们》。这章里的卑鄙人有斯威夫特，拉洛希福可，贝利，《拉美特利》和爱尔维修。

A. 涅泽列诺夫指出：“不要以为《曙光》同百科全书派的斗争，在于对这些作家进行谴责。在一篇文章里把他们称为‘卑鄙的人们’，这只是个别的事实，也可说是偶然的事实。杂志进行了另

① 这个刊物是诺维科夫在1781—1785年间出版的。

一种争论:它反对新哲学学说的实质。在这里,所有的证明都归结为一个目的,——证明灵魂的不朽"①。

当然,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些或那些作者称为卑鄙的人,这是一种个别的事实。然而这种个别事实在这里却完全不是偶然的。诺维科夫在所出版的讽刺刊物里不只一次说过:使人成为卑鄙的,不是出身,而是不道德。于是在这些刊物里,百科全书派被描绘为不道德的宣传家。而在他变为神秘主义者后,他更加相信他们是不道德的。7月份的《曙光》把新哲学家称为卑鄙的人,而在12月份的《曙光》里,又证明有德行的人,都相信灵魂的不朽。诺维科夫认为反对这种不朽的应该是哪些人呢?显然应该是那些没有德行,不道德的人,也就是"卑鄙的人"。不过,事实上,并非所有解放哲学的宣传者都反对灵魂的不朽。从这里应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诺维科夫由于对解放哲学的各种类型都较为了解,所以不曾将其所有代表人物都归于卑鄙人的范畴。但很明显,就是这样,他也仍然要将拉美特里和爱尔维修以及所有彻底唯物主义者,都归入这一范畴的。

A. 涅泽列诺夫在他的著作里摘录了刊登在《晚霞》的一篇讽刺诗《致伊济斯科耶夫》。诗里提出问题:"什么动物最不象人?"答复是:"哲学家"②。这比《"卑鄙人"》一点也不好些。刊登在这一杂志并为涅泽列诺夫教授所引录的一些只为宗教法庭所应有的意见,都可与这首俏皮讽刺诗相提并论。例如,在同一杂志里刊登的索伦《谈谈自由思想者》一文中提出,根据列维特的书,对于不信神的人,应该用石头砸死③。涅泽列诺夫对此作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认为诺维科夫没有看出在他的杂志里"扔进了"一些内容与

① 《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第250页。关于在诺维科夫出版的神秘主义杂志中所表达的观点的阐述,我都是以这一著作为依据的。

② 《诺维科夫》,第323页。

③ 同上,第322,323页。

他的观点的一般特点相矛盾的作品①。然而不幸的是，这里任何矛盾也没有。

这一"扔进了"以哲学家为最低级动物并主张用石头把哲学家砸死的«晚霞»，是诺维科夫在什瓦尔兹密切参加下出版的(1782—1783年间)。有些学者说，什瓦尔兹是这个刊物的主要领导者②。我们已经知道，什瓦尔兹是一个多么顽固和彻底的蒙昧主义者。涅泽列诺夫教授完全错误地断定在诺维科夫刊物中发表的那些认真的著作，在批驳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学说的时候，通常都未提出必须取缔发表这种学说的著作③。当诺维科夫还在出版讽刺刊物时，他就以为怎样也不能没有书报检查。他说："国家的共同安宁，特别是每一公民的安全都要求禁止出版充满反对神圣法律的书籍，国王和祖国都憎恶这种刻毒而富于诱惑性的作品，它们能够危害青年人的心灵，或导致无辜的人作恶。这种作品的作者不配称为作家，而应认为是社会的败类。"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指出对书刊进行宗教和政治检查的必要：前者主要检查能够动摇宗教信仰的作品，后者主要检查有关道德风尚的作品④。毫不足怪，我们的作者在耽溺于神秘主义之后，更坚决地相信书报检查在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中所能带来的好处，更牢固地吸收了把不信神的哲学家看为"败类"的观点。在他的第一个神秘主义刊物«曙光»里，«善士旅行记»的作者呼吁国王"歼灭通过出版自由而流传的不信神"⑤。在同一方向的最后刊物里(在«长眠的热爱劳动者»中)，谈

① «诺维科夫»，第323页。

② 例如，B.H.图卡列夫斯基就是这样说的(见«18世纪俄国哲学流派史»——«教育部部刊»，1911年5月，第36页)按照图卡列夫斯基的意见，"诺维科夫过分忙于出版业务；因此，材料的选择大部分由什瓦尔兹主持。"见他的论文«诺维科夫与什瓦尔兹»。(«俄国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1卷，第209页。)

③ «诺维科夫»，第322页。

④ «绘画»，第2卷，第20印张。

⑤ 涅泽列诺夫：«诺维科夫»，第243页。

到“所有诽谤神的书籍，反对神明的漫骂，破坏社会幸福的学说和意见，敌视政府的议论，辱骂性的作品等等，都应予以烧毁”①。涅泽列诺夫补充说，这篇内容毫无自由主义的文章的作者，要求对渎神的作家进行刑事预审②。但这毫无补益。一般说来，法庭审判当然比行政审查好些。但在法庭是根据野蛮的刑法作出裁判的条件下，被告的利益还是要受到损坏的。《自然体系》的作者难道会由于这一著作是根据议会的裁决、而不是根据某一行政官吏的命令被烧毁，而感到许多的宽慰？一个作家要求烧毁他所不喜欢的流派的书籍，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蒙昧主义者。

涅泽列诺夫以为诺维科夫不是用“共济会的妄诞想法、而是用哲学思想来对抗18世纪的解放哲学”③，这也不对。当然，在诺维科夫尚未成为共济会员时，他自己不能依靠“共济会的妄诞想法”同这一哲学斗争。但是，他那时的哲学思想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关于“不信神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创世智慧和关于“不信神的”人们的不道德等等陈腔烂调。而在他参加共济会后，特别是在他由于什瓦尔兹的影响一变而为“蔷薇十字会”会员时，否定哲学和科学思维的最主要方法，便成为他的“哲学”的主要特征了。

VII

涅泽列诺夫力图证明，仿佛诺维科夫与真正的共济会员——更确切些，与“蔷薇十字会”会员——相反，不曾相信“神秘的科学”。事实上，在他的神秘主义杂志里，有些论文嘲笑过这种科学。然而在这些杂志里刊登这种论文，并不足以证明涅泽列诺夫意见的正确。诺维科夫的思想方式从来不以严格的彻底性见长。因

① 引自涅泽列诺夫，同上书，第400页。

② 同上书，同页。

③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348页。在《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一书的许多地方，反复提到这一意见。

此，在他的讽刺杂志里，除对解放哲学进行猛烈攻击之外，又完全意外地看到一些对这一哲学的最优秀代表的赞扬。同样，他的神秘主义杂志在宣扬最愚昧的“坟墓精神”的同时，有时又发表一些清醒的思想，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宫廷官吏受到教育，不能算是开明的国家，或如他认为君主专制的政制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以及认为对于“神秘科学”应予嘲笑等等。但这些例外的情况，丝毫不能动摇一般的通则；它们只能证明，法国解放哲学的启蒙影响，就在那些认为这个哲学极端危险，认为同这个哲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道德上责无旁贷的人们当中，也部分地在流传。洛普欣和其他出身名门贵族的俄国神秘主义者，也都未能逃避这种影响。诺维科夫和他所呼吁的那些多少有些学识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尤其不能防止这种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足以说明洛普欣的宇宙观的性质。它也不曾决定诺维科夫的世界观。

至于特别是关于他对“神秘科学”的态度，则根据他在受审讯时所作供词，可以构成正确了解。他在一次供述中说：

“关于在查抄的文件中所说的炼金术和寻求点金石① 以及其他化学的实际工作处方，尽管那里有，但是由于我们当中还没有人知道这种工作的实际发现，所以对于这一切，迄未进行。在库图佐夫离开柏林之前，谈到（关于这一点，我不记得在我的供词的什么地方提及）库图佐夫将从事实际化学工作的学习。但是这一诺言曾否实行，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到特鲁别茨基公爵说，库图佐夫写信告诉他，说他已学习实际工作”②。

可见诺维科夫全然不否定炼金和制造点金石等等的可能，而

①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камень 点金石，中世纪炼金术士，认为可以点石成金祛除百病的石头。——校者

② 隆吉诺夫：«诺维科夫与莫斯科的马丁教派»，附录 1105 页。

只是由于一个完全充分的理由，即还未得到其"实际发现"所必需的东西，而没有从事这一工作。

召灵工作，显然经常受到诺维科夫的嘲笑。他在给 A. A. 勒热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召灵不过是瓦阿洛夫的一种秽亵行为，或在圣经的许多地方受到咒骂的所谓某种魔术"①。当然，对某种魔术的这种态度，使我们对诺维科夫的健全理性，表示欣赏。但是，第一，否认某种魔术，不过对魔术的各种形态之一——"坏"魔术，缺乏信仰。谁否认"坏"魔术（某种魔术），他便是相信好的，真正的魔术。这种信仰已足以在非常确定的意义上说明一个人的宇宙观的本质。第二，没有什么比相信"某种魔术"为"真正共济会"主要特征的想法更错误。"英国系统"距离这种信仰很远，但这不妨碍它成为共济会的系统。就是在"蔷薇十字会"会员中，也并不普遍承认召灵的可能。洛普欣有时也表示反对"某种魔术"。我们是否说，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封给勒热夫斯基的信里，诺维科夫虽坚决反对"某种魔术"，而对"蔷薇十字会"会员的智慧，却备加赞扬，认为莫斯科共济会员能有这种智慧是什瓦尔兹努力的结果。他说，"由于他们（即莫斯科共济会员——著者）所不应有的幸运，他们获得了共济会的拥抱和祝福的最大和过度奖赏（句义不明——著者）；他们闻到了天国的纯洁的和振奋人性的共济会气息，使他们能够从广阔无边的宇宙开天辟地以来不断涌现的源泉中，解除认识上的饥渴"②。

只有学会了"蔷薇十字会"会员思想方式的"真正共济会员"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

① 1783 年 2 月 14 日信。（见 Я. Л. 巴尔斯科夫：《莫斯科共济会员通讯集》，第 243 页。）

② 巴尔斯科夫：同上书，同页。

诺维科夫一方面否认召灵的可能，同时却完全站在神秘主义的立场上。他给卡拉姆津写的一封著名的信表明，由于这一原因，他对科学采取什么态度。他在信里阐明了他对真正哲学的任务的看法。他说："我不喜欢冷酷的哲学，我觉得真正的哲学应是火热的，因为它来源于天国"。这种哲学通过直接的途径引向真正上帝的认识。在他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问题："自然界只有一个，还是更多？我们所看到的可见、可感觉的世界是否为上帝所创造，或者不是？何谓天？天是否只有一个，还是更多？神的三分性是否印在所有的生物上？我们对此应该怎样理解？"诺维科夫认为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摩西说上帝创造亚当作丈夫，又创造了妻子？而尽人皆知，按照他的说法，亚当存在时，还没有夏娃，当亚当需要睡眠时，夏娃就从亚当的肋骨里创造出来了。"诺维科夫在这里不知不觉地接触到在研究闪族人民的神话时产生的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不言而喻，他不曾从科学——应该指出，科学在当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从神秘的发现中寻求它。他象自认为掌握了最高知识的一切神秘主义者一样，从上而下地看待科学。他说，"在我国的尊敬天文学家的允许下"，科学发现 7 个以上的行星，这是"梦呓"："不可能更多或更少，就是 7 个行星；因为上帝只是创造了 7 个，并使每一个行星具有相当力量"。这样的见解是毋需评说的。

使诺维科夫感到不快的是，"现在物理学家"不满足于 4 大原素，而接受为数更多的原素。"化学家将以前的一切都抛弃了，而给我们一些什么气体，也就是给我们一些毫无意义和力量的空洞词汇"。诺维科夫拒绝列举学者们的一切"梦呓"，责备他们说："尊敬的古代哲学家和元老都不是这样理解哲学的"①。

---

① 我手头没有加马列雅的《通讯集》，它的第 2 卷刊登了诺维科夫写给卡拉姆津的信。我的摘录是以佩平所著《俄国共济会》一书（第 257 页）为根据的。米柳科夫在

这样的观点，他不仅在写给卡拉姆津的信中说过。在给X.A.切博塔廖夫的一封信里，他很惋惜"现今的开明世纪摒弃一切奇迹；新哲学家称这为迷信。我祝愿有这样一个语法学家，能用"迷信"一词的词源来向他们证明：迷信的不是那些相信奇迹的人，而是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①。

更能说明诺维科夫的思想方式的是他写给同一切博塔廖夫和M.O.穆德罗夫的信(1813年6月17日)。我们从这封信中了解到，在与他的齐赫文斯克庄园邻近的村庄里，死了"一个年青的糊里糊涂的妇人"，但是她在一昼夜后复活了，叙述了她在死后所不得不进行的9次谈话。一个坐在宝座上的金光灿烂的人对她说，他们将放她回到人间，不过要她向人们传达各种训诫。

这位金光灿烂的人吩咐说："向你的公爵夫人说，她命令在新教堂圣洁化后举行几对夫妇的结婚仪式，而同时却命令在旧教堂里举行青年人的葬礼，这事她作得很蠢。如果她命令在新教堂里举行安魂祈祷，而在旧教堂里举行婚礼，那她就做得更好了。"接着又训示说，闻闻鼻烟和吃土豆不是罪过，而憎恶自己的亲属，嫉忌他，想他作坏事等等，才是罪过，等等。可怜的诺维科夫竟然相信"年轻的糊里糊涂的妇人"的这些胡言乱语。他用教导的口气说，"这些奇遇是值得注意的"。

涅泽列诺夫教授显然以为，真正共济会的主要特征，是承认利

所著《俄国文化史》中说，在18世纪，科学本身所走的道路，似乎是朝着自然哲学所致力的同一方向："当时震惊社会的学术新事，是化学的一些最新发现。事物看来简单，……却很复杂。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基本元素，人们期待在这些元素里找到一切基础的基础，找到将一些事物转化为另外一些事物的钥锁。"尊敬的史学家的这一猜想，为晚近研究诺维科夫的一位学者Г.К.博戈柳博夫所复述（《诺维科夫和他的时代》，莫斯科1916年版，第149页）。但是，我们看到，18世纪的化学发现亦曾使诺维科夫产生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同米柳科夫和博戈柳博夫向神秘主义者提出的那些思想，却毫无相似之处。然而，神秘主义者却在帕拉采尔斯时代就已致力于发现"一切基础的基础"了。

① Б.Л.莫德扎列夫斯基：《诺维科夫传》，《俄国藏书家》，1913年4月，第34页。

用“某种魔术”召唤灵魂的可能这类迷信。这是可笑的。然而姑且假定这是对的。那时就会发生一个问题：诺维科夫对于那个妇人的不可听信的胡说的天真信任态度，同这种迷信有何区别呢？

涅泽列诺夫教授自己看到，有许多事实确证诺维科夫是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但他却断言这些事实都发生在诺维科夫业已停止发行他的杂志以后。

在我所引证的涅泽列诺夫的著作里多次说：“诺维科夫终于成为真正的共济会员，但他成为真正共济会员，是在《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停刊以后，也就是在他业已发表了那些足以使他在我国文学和学术史上取得崇高地位的观点以后”。为什么教授对于使诺维科夫堕落成为共济会员的“沉沦”——这种“沉沦”是紧接着他的最后一本杂志的停刊发生的，而这最后的杂志又特别明显和有力地表达了这种观点，——感到奇怪呢？然而根据涅泽列诺夫教授自己的言论，事情的经过完全不是如此。

我们的学者将导致诺维科夫“沉沦”的过程，规定在1784和1785年时期。他说：“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在著名的活动家的心灵里，开始完成变革，这种变革，部分地说，是同后来击倒果戈里的变革相仿佛的”[①]。可是，《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就是在这些年代出刊的。因此，诺维科夫正好是在他的沉沦过程完成的时候，特别明显和有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的。这确实是奇怪的。当果戈里开始遭受那“击倒”他的变革时，他已无力从事文学活动了。涅泽列诺夫的年代学知识能说是优良吗？

不优良！我在上面引录的诺维科夫写给A.A.勒热夫斯基的信，表达了他对莫斯科共济会员“由于不应有的幸运”，能够“闻到天国的，纯洁的，振奋人性的共济会气息”的喜悦。这封信便是在1783年写的，也就是在《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出版以前写的。只是

① 《杂志出版家诺维科夫》，第429—430页。

这一点，已足以使涅泽列诺夫教授的人造结构，象纸架的玩具小房子一样解体了。

VIII

非常可能，当佩平谈到诺维科夫的思想发展过程，缺少飞跃和变革时，他所指的就是这种幻想的结构。如果这样，那他是对的。在«长眠的爱好劳动者»停刊以后，在诺维科夫的心灵里，并未发生任何变革：他仍旧是神秘主义者，他在开始出版«曙光»以前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主义者。

Г. 图卡列夫斯基没有重犯涅泽列诺夫教授的错误，后者对于诺维科夫精神境界的年代考证，了解得太坏。但是图卡列夫斯基却犯了另一不小、如果不是更大的错误。他错误地解释了诺维科夫的神秘主义观点，毫无根据地将他的神秘主义观点同其他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观点对立起来。请看他关于这点是怎样说的：

"如果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那就很明显，应该按照爱人类，救助亲属的理想和其他基督的美德来建立生活；那时，躯体和人间生活才是合法的和必要的。"①

"但如果神的王国在天上，如果人间生活只是通向未来的过渡，那就应使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目光倾向天上，而让'躯体的生命'死去。谁都明白，必须'模仿基督'。但是怎样模仿呢？应该象阿伦特②所宣传的那样，模仿基督救苦救难？还是应该象福马·克姆皮斯基所号召的那样，模仿基督受苦受难呢？"③

图卡列夫斯基以为，什瓦尔兹以其"深刻的智慧"(！)，也许对

①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 I 卷，第 219 页。

② 约翰·阿伦特(1555—1621)，德国新教神学家。——校者

③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 I 卷，第 219 页。

于这个问题找到了一切人所满意的答案。但是，什瓦尔兹死了，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于是，共济会分裂了：诺维科夫走上了阿伦特所号召的方向；而洛普欣，科洛科尔尼科夫，涅夫佐罗夫和其他的人，则追随了福马·克姆皮斯基；最后，特鲁别茨基，库图佐夫和彼德罗夫“走进了炼金术”①。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人造的结构。

当然，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是有各式各样的。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无可避免的。但这只不过是同一宇宙观的不同式样而已。这里是任何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间的分裂，都谈不上的。如果有过这种分裂，那么，为什么诺维科夫在他的所有信简里，对此连暗示也没有呢？为什么洛普欣在他的“札记”里对此一字未写，而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在他们的通讯里提也不曾提呢？

图卡列夫斯基对于“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这一原理的内在逻辑的完全错误理解，使他犯了错误。

实际上，这一逻辑同图卡列夫斯基对于上述原理的错误理解是直接对立的。

如果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则一切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相互关系问题也包括在内——都无多大意义了，都不值得有德行的人注意了。当然，应该按照理想去建立生活，但理想全然不是要去建立正确的社会制度。前面已经指出，诺维科夫的第一个神秘主义刊物《曙光》就坚决断定：有德行的人就在不自由时，也是自由的。

不仅如此。如果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那么，我们的主要工作应在于对神保持应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可以根据永恒的观点，作更好的理解的。诺维科夫在成为共济会员之后，掌握了永恒的观点。而一旦掌握了它，则人间生活便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在

①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 I 卷，第 220 页。

他的眼光里丧失了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曙光》杂志里便出现了那种"坟墓精神"，以为死高于生，也胜于生。这种"坟墓精神"的无数变种之一，便是我们前已了解的洛普欣的意见，以为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对于所属人们的关系，应该主要是关心他们的未来生命。就这方面说，在洛普欣和《曙光》出版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因为这一方面比任何其他方面都更重要。

如果人们的尘世关系是一种暂时的关系，在提高到永恒观点的神秘主义者的眼光里，没有价值，那么，他不给道德概念增加任何社会内容，便是完全忠于自己的理想了。这种神秘主义者对于人们的行为，只是采用个人道德的标准进行衡量，他重视个人道德，因为它决定人对神的关系。我们在诺维科夫的神秘主义杂志里，就看到完全相同的道德观。诺维科夫想 per enumerationen simplicem（通过反省）简单修身法来改善人。同现时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一样，他侈谈什么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善良的德行，那该多好啊！"因此，如果可能使人们了解到他们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应该首先尊敬高贵的品质和德行作为模范，那时，我们将看到每人都乐于承认自己是这个中心的重要的适当的部分。"① 诺维科夫在这里用以叙述他的思想的假定形式（如果可能，等等），不应使我们发生误会，因为他是坚决相信他的理想完全可以实现的。他说："就是一个最不端正的人，如果能用温和的方式给他证明他的错误，他也不会长期抗拒"②。

通过德行较高的人对德行较差的人施加影响，使人们的个人道德趋于完善，——这就是诺维科夫在变为神秘主义者后所制定的纲领。然而所有"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纲领，也都完全

① 《曙光》杂志的预告，第 12 页。

② 这也可解释诺维科夫-神秘主义者对"指名道姓"讽刺的否定态度；在这种讽刺里缺乏应有的"温和"。

是这样啊！唯一的差别是：诺维科夫比其他人更为积极地实施了这个纲领而已。这一差别极为值得注意。它完全不是由于对“神的王国就在我们自身之内”这一原理的理解的分歧。在诺维科夫和他的亲密战友的活动里，可以感到我国“中间等级”——实质上，就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方兴未艾的毅力①。

这使我们回到前一章末尾所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神秘主义者比“伏尔泰主义者”更热心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按照他们的理解）呢？

我说过，研究诺维科夫的活动，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一活动，可用下述方式作出所求的答案：

如果神秘主义者比“伏尔泰主义者”在上述事业上作了更多努力，那么，这是因为在他们当中有“小市民”，“小市民”中的最积极分子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而诺维科夫便是这种知识分子的最优秀思想代表。

IX

这一答案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新问题：

怎样解释这样一个初看来奇怪的事实，即神秘主义的宣传不仅在保守的《名门显贵》的某些阶层，而且在“小市民”阶层中也有成就呢？

为了解答这一新问题，必须回忆一下我们关于我国特殊“中间等级”的情绪所业已了解的各种情况。

---

① 前章已经说过，什瓦尔兹对于吸收在校青年参加他的事业，极为关心。诺维科夫竭力仿效他的榜样。在他所出版的神秘主义杂志里，经常有许多大学生参加工作。С.Г.斯瓦季科夫把《长眠的爱好劳动者》称为俄国的第一个学生杂志，因为那里有十一名大学生充任职员。而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是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根据斯瓦季科夫的意见，在18世纪的俄国大学里，无疑地，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占优势。（见他的论文：《1775到1915年间的大学生出版物》，单行本，第2页；《俄国大学生的过去与现在》，单行本，第3页。）

组成这个等级的人们感到需要自学，需要为教育而工作。他们的这一需要是西方影响的果实，是法国第三等级的斗争的反应。但是，我国的社会关系还如此不发达，所以果实过于干枯，反应极为微弱。我国的小市民阶层怎样也掌握不了法国第三等级的意识形态。他们重视教育，但又希望尽力使教育清除法国的自由思想。"伏尔泰主义"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一自由思想的唯一表现形式，他们对它感到恐惧和愤懑。在俄国小市民的心灵里，对"名门显贵"的不满，同"根据物理学"证明旧信仰不能成立的法国作家给予他们的恐惧，牢固地交织在一起①。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间等级"同神秘主义接近，因为神秘主义者同样对于"罪恶的伏尔泰主义者"是避之惟恐不及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

"中间等级"虽力求自学和从事教育活动，但却过于贫穷，不能在他们当中为此筹得必要经费。

我们已经知道，当1772年春，宫廷离开莫斯科时，诺维科夫的出版事业陷于极大混乱。他恳托科济茨基请女皇给予帮助。他写道："没有这种帮助，我将被迫抛弃我的事业，半途而废。当我为祖国服务的热忱受到我的同胞的这样不良对待时，怎么办呢？"女皇暂时支持了他——尽管主要是在他着手出版某些专刊的时候。没有必要重复，她是多么不喜欢他的讽刺作品。此外，她还不能忍受他的企业是由别人创议开办的。当然，叶卡捷琳娜的宫廷都模仿她，而这个宫廷又是那个传染了"伏尔泰主义"的"名门显贵"的集中地，诺维科夫在他的出版物里曾对他们的法国渎神观点和非俄

① 诺维科夫从施里西尔堡释放出来后，一度希望罗斯托普钦伯爵能够"成为上帝仁慈的真正伟大工具，真正造福我们的祖国"，或者，说得简单些，希望"这一名门显贵"能够有益于共济会。但是，当诺维科夫有机会结识罗斯托普钦时，他首先问："他是否哲学家，即是否自由思想者（现在这是同义语），他是否认为我们所喜爱的东西是愚蠢和智力不足，或只不过是愚弄愚人？"（波戈柳波夫：《诺维科夫和他的时代》，第471页。）顺便说，罗斯托普钦虽曾表示，他认为"结识诺维科夫，使他感到荣幸，但在1812年，却指责诺维科夫交结拿破仑"！

罗斯习惯，进行攻击。他的这些攻击引起了宫廷界的不满。因此，很明显，依靠宫廷支持的打算，是没有根据的。必须在其他方面寻求支持。这种支持，诺维科夫在那部分害怕法国自由思想，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名门显贵"中找到了。屠格涅夫关于诺维科夫对洛普欣及其同志的态度，发表一种有趣的观点："诺维科夫时常是他们的工具，同时又把他们当作工具来使用"①。由于这句话说得很简括，很难完全准确地了解它的意思。但是，必须承认，它包含了许多真理："富有的名门贵族所以是诺维科夫的工具，因为他们为他的广泛出版事业和慈善活动，提供了经费。"

1781年塔季谢夫出钱帮助"友谊协会"。继他之后，向"协会"提供大量资金的有两位特鲁别茨基公爵，有切尔卡斯基公爵、丘尔科夫、屠格涅夫和其他的一些人。

1784年《友谊协会》会员建立《印刷公司》，其资本来源为：洛普欣兄弟——10,000卢布；两位特鲁别茨基公爵——6,000卢布；切尔卡斯基公爵，屠格涅夫，丘尔科夫和拉德仁斯基——每人5,000卢布，施雷德尔男爵——3,500卢布；库图佐夫——3,000卢布，等等②。

1787年饥荒时期，诺维科夫从波霍佳申那里得到了一大笔钱。以波霍佳申为代表，我国"中间等级"（在这个字的真正意义上）对饥民进行了救济。波霍佳申是一个富有商人和厂主的儿子。

所有这一切，后来给叶卡捷琳娜以借口，最初是怀疑，后来却正式责备诺维科夫出于贪婪的目的，力图将富有和有权势的人物"罗致"到他的"协会"中去。读者明白，诺维科夫和他的同道们吸收这些人物参加他们的事业，是同自私自利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

① 见Б.Л.莫德扎列夫斯基对诺维科夫写给М.Я.穆德罗夫的一封信的注释（《诺维科夫传》——《俄国藏书家》，1913年4月，第41页）。屠格涅夫的这一卓越评语的一部分，我在前面已经引述（论《自由》印刷所）。

② 波戈柳波夫：《诺维科夫和他的时代》，第329、330、332页。

伏尔泰的女弟子，由于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却对此毫不理解。但事实明摆着：具有神秘主义情绪的"名门显贵"阶层，曾以资金支持诺维科夫。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诺维科夫成为神秘主义者以后的事情。但在这以前，由于从"名门显贵"获致物质支持的必要，亦使他同这一社会阶层的某些人接近，因为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笃信宗教的情绪，毕竟比同样"显贵"、然而毫不信神的伏尔泰主义者，对他更为同情。

当然，同神秘主义者的某种接近，并不等于信奉神秘主义。因此，我刚刚指出的情况还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18世纪俄国"市民阶层"的最著名，最积极，最富于牺牲精神的代表却满脑子神秘主义。然而这一意义深长的重要事实，是迫切需要解释的。

必须指出，卡拉姆津在他写给拉法捷尔的信里，部分地对这一事实有所解释。

在这封信里，根据诺维科夫本人的口述，谈到外部条件迫使这位最佳讽刺刊物的前出版家致力寻求"服务祖国的其他途径"①。

图卡列夫斯基在评述卡拉姆津的信时，对诺维科夫的心理过程，作如下描写：

"诺维科夫理解到他的讽刺杂志的失败，是由于当局的横暴，理解到他想用讽刺作品使其走上新生活的人们，虽然怀着好奇心阅读他的刊物，但并不显示道德上有所改正。"他寄予希望的新组织——共济会支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意图，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自己不知道怎样达成自己的意图。所以，诺维科夫才着手进行一种艰难、缓慢、但却可靠的工作——通过书籍来教育俄国人民②。

图卡列夫斯基在这里又搞错了。诺维科夫在担任伊兹道洛夫

---

① 着重点是我加的。

② 《共济会的过去和现在》，第1卷，第189—190页。

团上士时，就已经提出了通过书籍来教育俄国人民的任务。在他看来，出版讽刺杂志就是达成这一目的手段之一。如果上述杂志的被取缔，可能使他有了某种新的想法，那么，这也不可能是他早已熟知的想法，以为书应成为教育俄国人民的手段。至于对他在1775年参加的共济会支部，他在某一时期，确曾感到不满，但这完全不是由于这些支部不了解用什么方式去教育俄国人民，而是因为它们的观点在当时一般地并不明确。此外，他还怀疑它们热衷于政治。当时在俄国，瑞典的共济会系统占优势。柏林朗德斯洛格的代表列赫尔男爵到达俄国，曾劝他反对这一系统。在受审时，诺维科夫令人感动地叙述他"流着眼泪"，请求列赫尔指示他，按照什么特征才能不失误地区别真共济会和假共济会。列赫尔也"流着眼泪"答复他说："任何具有政治形式的共济会，都是假的。如果你看出哪怕是政治形式及与政治联系的影子和关于平等自由等字眼的谈论，你就认定它是假的"。从此，诺维科夫，据他自己说，对瑞典系统的共济会，就抱着更慎重的态度①。

这个系统的共济会并不崇拜平等和自由。但是，他们对于政治阴谋却不外行，而诺维科夫由于精神的单纯，把政治阴谋混同于政治。由于诺维科夫对"政治"毫无兴趣，由于刚刚通过自身的经验认识到在他服务祖国的道路上（尽管只是对弥漫着祖国的社会谎言，进行最微弱的暴露），遍地都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所以他想用向同胞们指出达到笃信宗教的最好途径的方法，为他们作些好事。既然不可能维护他们的人间利益，他便从这样一种思想中得到宽慰，以为人间利益是暂时的，若与准备死后生活问题相比，乃是微不足道的。换言之，他已变为一个神秘主义者了。

他参加共济会的动机，同迫使年轻的奥尔丁-纳晓金出亡国外和杜克斯·赫沃罗斯季宁削发为僧的动机，是一个样的：他不能

① 隆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的马丁教派》，附录，第76页。

同他周围社会的邪恶妥协，又未能在人间找到克服这种邪恶的手段。由于感到自己在人间生活中是多余的，他便眼巴巴地望着天上。

无论是坎捷米尔，无论是塔季谢夫，无论是18世纪上半期的其他欧化俄国人，都不曾有奥尔丁-纳晓金、赫沃罗斯季宁和诺维科夫那样的遭遇。"彼得巢窝中的小雏们"和紧接着彼得改革时代的活动家，都相信掌握在无限制权力手中的"摩西权杖"，将开化俄国。无论奥尔丁-纳晓金或赫沃罗斯季宁，都还不曾有这种信心，显然在诺维科夫那里，这种信心也业已消失；但是诺维科夫放弃它，不是没有巨大困难的，就在他的《绘画》杂志里，他还对喜剧《啊！时间！》的作者，致以整篇颂词呢！

当我说诺维科夫不曾在人间找到克服社会罪恶的手段时，我指的不仅是他丧失了对"摩西权杖"的希望，而且指的是他对古代俄国德行的失望。如果他对这些德行保持了信心，那也是因为他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被迫放弃讽刺和政论，"终于醉心于对旧事物的理想化，想要找出一些能够教育俄国人恢复其过去道德的手段"①。当然，所有这种手段都会具有完全乌托邦的性质，但是这些手段会继续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同胞的人间生活条件上来；也许，还会防止他走上涅泽列诺夫教授正确地称之为"沉沦"的那一步。但在刊行那篇未完之作《德国人和法国人对话》以后，诺维科夫陷于对俄国旧德行的不可克服的怀疑。因此，在《钱袋》停刊以后，他感到一无是处，于是他"消沉了"，走进了神秘主义。

涅泽列诺夫教授相当恰当地将诺维科夫的"沉沦"同果戈里后来所经受的变革进行了比较。果戈里也消沉过。但是当他的沉沦完成的时候，他的作品的先进读者，没有模仿他；笼罩着他们的各种情感，在别林斯基写给《友人通讯集》作者的著名信简里，获得了

① 《钱袋》，第3印张，善良的德国人和罪恶的法国人对话的续篇。

光辉的表现。可是诺维科夫消沉时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就我们所知，他的沉沦没有在“小市民阶层”中引起不快的惊讶，他们不久以前还满意地读过诺维科夫的讽刺杂志。相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信任地在他们的引路人所选择的新道路上，追随着他。在校青年热烈地参加他的新的——神秘主义的——出版物的工作，年龄较长的“小市民”开始阅读从他的印刷所印出的拯救灵魂的著作。

这是一个完整悲剧。诺维科夫既然在神秘主义里找到道德的安宁，便将其全部少见的精力投入“哲学”宣传，这种哲学认为死高于生，从而否定在人间进行任何积极活动的意义。这位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在俄罗斯成为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代表，这种知识分子尽管当时还是保守的，但已不能安于自己的地位；而他却开始传播一些观点，从根本上破坏对社会制度问题的任何兴趣。关于诺维科夫在当时的“启蒙”活动，只好用海涅的话说：

Er sang das alte Entsagungslied,
Das Eiapoppeia vom Himmel,
Womit man einlullt, wenn es greint,
Das Volk, den grossen Lümmel …
（他唱几曲驯服忍受的老调，
那天堂里摇篮旁的催眠歌声，
每当老百姓发出了怨言牢骚，
便催得愚民乡巴佬入梦……）

他激昂地高唱低沉忧郁的歌，比较有知识的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高兴地听着，用坟场的重唱词与之亲切地合唱。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悲剧不是某些个别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阶层的悲剧。笼罩着诺维科夫的情绪，是同很大一部分欧化“小市民阶层”的情绪相符合的。现在，我国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在对18世纪先

进思想的精神反动的旗帜之下出现于社会活动的舞台的。新酒装进了旧皮囊。

这一情况的本身，即已值得注意。但是由于那时我国当局连“第三等级”的这种举动都不容许，所以这一情况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莫斯科的“蔷薇十字会”会员受到迫害。伏尔泰的女弟子对于她的臣民的独立创举——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来不予宽恕。何况在这里还有一种情况使她特别担心。

根据彼得一世颁布的法律，俄国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裁定，指定继位人。但是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市民不很了解“女皇的真正意愿”，相当强烈地倾向于一种信念，以为俄国皇位的继承权不属于叶卡捷琳娜，而属于彼得三世的皇太子——保罗。叶卡捷琳娜知道这一情况，因而对自己的皇太子极为猜忌。一次，保罗·彼得洛维奇亲王逗留巴黎时，——如所周知，他在1782年5月用谢韦尔内伯爵的化名去过巴黎，——曾与路易十六世进行谈话。路易十六世顺便问他，是否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没有一个他可以依靠的人？保罗生动活泼地答道：“Ah bien, je serais bien fuehé, qu'il y eût auprès de moi le moindre Caniche fidèle à ma personne dans ma suite; ma mère l'aurait fait jeter à l'eau avant que nous ayons quitté Paris”（“如果在我的随员中有一只哪怕是极小的忠实于我的小狗，那也将使我感到极大的悲哀：我的母亲会设法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将它抛进水里”）①。

这使我们对于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现在请想想，对于亲王表示忠实的不是一只小狗，而是整个一个具有钱财和社会联系的组织。显然，叶卡捷琳娜一定会要把它“淹死”。这种组织便是莫斯科“蔷薇十字会”。

Г. 舒米戈尔斯基不怀疑，当时的俄国皇位继承人曾从А. Б.

① 科别科：《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太子》，第237页。

库拉金公爵那里获悉共济会的机密，并在他的影响下，成为自由的共济会会员。这位学者认为，在这件事上，C. И. 普列谢耶夫是库拉金的助手。根据另外的报道，保罗曾由И. И. 耶拉根吸收参加共济会①。无论如何，亲王曾对共济会发生兴趣，而共济会则认为将亲王吸收到他们一边，是有重大好处的。象彼得堡的共济会一样，莫斯科共济会亦曾力图与亲王发生关系，而且他们作到了。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力图逃避“政治”，同时却不免玩些“政客手腕”。当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警察一般地曾注意侦察俄国共济会、特别是注意侦察莫斯科蔷薇十字会的活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通讯受到检查。整个问题在于，在“蔷薇十字会”会员同保罗的关系中，警察到底发现了什么，是否根据当时我国的法律，有什么犯罪行为？舒米戈尔斯基抄录了下面一首歌，据他假定，这首歌是洛普欣写的，刊登在1784年《自由共济会刊》第I卷第I篇里。歌词说：

我们把你，保罗，
看做是天国的爱的保证，
对你的美好的一对，
象仙人形象一般尊敬。
　你头戴王冠，
　将是我们的父亲！
由于命运的赏赐，
彼得使王朝更增鼎盛，
给你以果实，
又嘉惠于所有我们。
　你头戴王冠，

① 舒米戈尔斯基：《保罗皇帝与共济会》——《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139—142页。

将是我们的父亲！
幸福、真理、和平
同你一道降临，
在王座前，
穷人和孤儿不怕不惊。
你头戴王冠，
将是我们的父亲！
你已明显看到，
进入神殿的不朽者的大门，
是既危险又艰辛。
你有科学艺术之神的母亲，
定将完成这一历程！
彼得的血无上珍贵，
俄国女神的后裔，——
啊，热望之子，
象伟人般前进罢，
幸福的永恒世界，
这将是你的前程！

舒米戈尔斯基在这首歌词里听到某种可怕的暗示。他说："叶卡捷琳娜不用去猜测人们的心意，便可从反复重唱'头戴王冠，你将是我们的父亲！'中，估计出这首诗的用意"①。可是，当命运的过程将给他戴上王冠时，如果责备忠诚的臣民希望王位继承人成为他们的父亲，那就奇怪了。必须"猜测人们的心意"，才能在这种希望的刊物表现里，发现积极干预命运的自然过程的愿望，企盼继位人成为皇帝的时刻的到来。叶卡捷琳娜可能怀疑"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准备支持保罗，如果他企图夺去她的权力。经过对

① 同上书，第145页。

"蔷薇十字会"的多年侦察和各式各样的刁难，这位伏尔泰的女弟子认为必须"消灭这个受到尊敬的团体，使不符合正教的书籍，不得出版"。1792年4月30日，她签署了逮捕诺维科夫的命令。

当然，这个案件的侦察，是完全同叶卡捷琳娜在制订她的《敕令》时所剽窃的先进作家的法律原则相矛盾的。被告的利益一贯受到侦审人员的破坏。尽管这样，当局未能在"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的行动里，发现任何犯罪事实①。将他们交付刑事法庭，已不合适。然而由于女皇无论如何要消灭诺维科夫，她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因而也是一个危险的狂徒，所以不得不使用"摩西权杖"。根据叶卡捷琳娜的命令，诺维科夫被关押在什利谢尔堡，为期15年(对于这样的命令，贝卡里亚会怎么说呢?!)他的财产被查封：所有由"印刷公司"出版的书籍，予以没收。受到这个案件诛连的洛普欣说："检查继续了几年，许多书被烧毁，几乎所有的书都不见了。许多参加过去的印刷公司的人，都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我受到的损失更大"②。

关于所有这一切怎样粗暴地破坏了最起码的司法要求，是完全不用谈了。但也不妨指出一点，即对于抱怨蒙受破产损失的洛普欣，毕竟还算比较便宜。他不仅未被拘押下狱，甚至未被逐出莫斯科：由于他的年迈的父亲患病，准许他留在那里。

用叶卡捷琳娜的话说，其他"同谋犯"，都受到不同的惩罚。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И.П.屠格涅夫被放逐到他们的庄园。恩加雷切夫公爵，丘尔科夫、波兹杰耶夫、赫拉斯科夫和许多其他的人，他们纵然焦急惶恐，都未受到折磨③。波霍佳申未受影响。但科洛科尔尼科夫和涅夫佐罗夫却吃了许多苦头，他们在回国途中在里

① 关于这个案件，请查阅波戈柳波夫前引著作，第432页及其后各页。

② 《札记》，第63页。——引自被抄没的诺维科夫藏书。1,964卷被送交宗教学院，5,194卷被送交大学，18,656卷被烧毁。

③ M.隆吉诺夫：《诺维科夫和莫斯科马丁教派》，第353页。

加被捕[①]。科洛科尔尼科夫在拘押中很快死去，而涅夫佐罗夫则长期患精神失常。保存下来的他的申请书，请求将他移住另一房间，因为在他的监狱隔离室下面，据他说："保存了许多燃料，我想，那里有许多死人"[②]。这是很明显的昏话。显然，涅夫佐罗一度在外国害过的毛病又复发了。不了解秘密审讯处是否很快就终止了对这位病犯的折磨，也不知道是否很快就将他送进病院，但他只是在1798年4月才被释放的[③]。

波戈柳波夫认为，涅夫佐罗夫的长期监禁不算什么惩戒[④]。就算这样罢。但是请问，侦审以及侦审过程中舍什科夫斯基威胁要将他打死，是否促使涅夫佐罗夫生病呢？如果是的，那也许比惩办更坏。

涅夫佐罗夫是僧侣出身，出国前领取"友谊协会"大学生奖学金[⑤]，在大学念书。他是诺维科夫－神秘主义者学派的一个典型的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他的观点虽然完全反动，但他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教育"其亲人的倾向。后来他抱着这一目的，甚至实行了他那种"到民间去"。据别索诺夫说，常常看见他在广场上，挤在人群之中，热烈兴奋地高谈阔论[⑥]。

巴格良斯基医生同诺维科夫一道关进什利谢尔堡监狱。大部分学者继隆吉诺夫之后，都断定巴格良斯基是根据他本人的申请关进去的，因为他想照料诺维科夫。但是，涅泽列诺夫教授引录一

---

① 罪名是：他们在外国学医是由洛普欣供给的。

② 《诺维科夫案的新文件》(波波夫编)，见《俄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第2卷，第143页。

③ H.库尔曼的论文：《米海尔·伊凡诺维契·涅夫佐罗夫》。(《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211页。)

④ 同上书，第444页。

⑤ 他仿佛是这个协会的第一个领取大学生奖学金的人。见波戈柳波夫：书见前，第329页；库尔曼：文见前。(《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205页。)

⑥ 文见前。《俄国丛谈》，1856年，第3卷，第126页，—— 涅弗佐罗夫死于1827年10月。这里所说的"到民间去"是他晚年的事情。

名秘密审讯处官员的报告，——这个官员于1784年奉派到什利谢尔堡"视察在押的秘密人犯和他们的生活状况"，——说巴格良斯基医生是"因为翻译淫书"而被关押的①。我们没有根据忽视这一报道。

对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比对"名门贵族"处分得更严厉②。这同当时情况的内部逻辑毫不矛盾：在学校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挨打时要"光着屁股"，而少爷们挨打，则是穿上衣服的。

诺维科夫的一名农奴也同他一道关在监狱，罪名不详（据马卡罗夫的报告）。然而非常明显，他的下狱，就因为他是农奴：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东西，他必须跟随他的主人

诺维科夫曾向叶卡捷琳娜请求宽恕。从我们现在的眼光看，他如果不作这件事情，那就更好。在拉季谢夫以及后来的十二月党人的行为里，我们也看到某些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值得惋惜的特点。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当时的现象，必须对于他们那些时代的精神状态，加以注意。

在什利谢尔堡，巴格良斯基，诺维科夫和他的农奴，都被关押到保罗即位时，也就是关了4年。巴格良斯基获准剃胡须和放风散步。诺维科夫却未能享受这些优待。至于他的"不知为什么"关进监牢的奴隶是否放风吸吸新鲜空气，这未查明。

我们已经看到，诺维科夫直到死前（1818年7月31日）还是一个极为顽固的"蔷薇十字会"会员。然而就是什利谢尔堡也未能扼杀他对"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爱好。他同他的朋友加马列雅一道，积极勤恳地为浩大的著作准备材料："出版一部书，收进一些关于炼金术、神秘主义、魔术以及其他的书；出版金色"蔷薇十字会"

---

①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382页。

② 非贵族出身知识分子加马列雅只是受到警察的传讯了事。然而这一个非常老实的人完全无害，是一望而知的。

会员和其他真正共济会员以及古代系统的著作;编辑俄文译本,便利人们认识上帝、自然和人的本身,从许多荒谬途径中向他们指明唯一认识这一切的唯一真正途径"①。

1812年在距离他庄园不远的地方,出现了法国部队。诺维科夫安然留在家里。在拿破仑开始撤退的时候,他对于敌军抛下的士兵,力予救济,因而引起当局对他的新怀疑②。时间没有消灭这位卓越人物心中的高贵感情。回想起他所遭受的折磨,回想起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自身所完成的那些极度不利条件,以及这些条件驱使他进入神秘主义、魔术和其他"知识"的死胡同,真是令人伤感! 实在说,诺维科夫的遭遇应该是好得多的。

① 波戈柳波夫,书见前,第467页。

② 同上书,第471页。

第十三章　亚·尼·拉季谢夫

(1749—1802)

黑格尔在他所著的《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历史哲学》)中写完古代东方史述评后，转而研究西方时说："在希腊，我感到象在我的家乡"。现在，当我离开神秘主义者转而研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谢夫时，我想起了他的这一番话。

拉季谢夫的宇宙观，虽然同我们时代先进人物的宇宙观不尽相同，——由于非常明显的原因，在这里要尽同，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却由于种种近亲的纽带而彼此联系。他所学习的思想，就是18世纪末卓著成效的社会改革所据以完成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一部分迄今仍具有意义，一部分则成为制订我们现时各种概念的理论材料。

如果我们继黑格尔之后，也把18世纪的解放运动称为光辉的日出，那我们就应该说，与神秘主义者相反，拉季谢夫是高度评价和真诚崇拜这一值得纪念的现象的不多俄国人之一。可以进一步说：他是这些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我们已经看到，诺维科夫的情况对于他的思想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相反，拉季谢夫的处境，却甚有利于他掌握当时最进步的理论。那时不懂法文是不能成为有学问的人的．而他在十来岁时就掌握了它。不过，在父母家里，教他法文的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原来他是一个逃兵。不久，这个流亡者马尔斯的小学生被送到莫斯科，住在母系亲戚 M. Ф. 阿尔加马科夫的家里。他在这里的法文

教员，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此外，除了这位教师，拉季谢夫还有几位别的教师：几位大学教授给他上课，他的监护人则是阿尔加马科夫。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阿尔加马科夫设法把他的小亲戚人选为王后的少年侍从，因此，他被带往彼得堡。1765 年叶卡捷琳娜命令派 12 名青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学。拉季谢夫便是这 12 人中的一个①。

一个叫博库姆少校的人，被派担任这批青年人的督学。这个"皇室侍从长"盗窃在他监管下的学生，——把拨给他们的费用，大部分塞进自己的腰包。此外，他对这些学生的态度也极为粗暴。由于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他命令建造一间特别的笼式小房，禁闭犯错误的学生。这一切当然为他的受害者所不乐意。他们当中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开始发生"事故"。

后来拉季谢夫说："我们考虑学习的时间不及考虑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方法的时间多。象在社会里一样，苦恼超过了忍受的限度，便产生绝望的挣扎；在我们的团体里，也开始了群众性集会和频繁的密商，进行着在搞密谋时所常见的一切。人们约许相互支援，言谈激烈。勇敢是值得称赞的，胆怯的声音听不到了，思想也很快就统一起来了。"约言之，发生了我们现时所说的学生闹事。一位同学根据大家的决定，打了博库姆一记耳光，而博库姆则象对待刑事犯一般，猛击了不服贴的青年。

他们的处境变得非常困难，以致想逃亡美国。幸而俄国驻萨克森的公使 A. M. 别洛谢尔斯基公爵搭救了他们，他极大地克制了他们的贪财和易怒的督学的教育努力②。

① 据他的儿子尼古拉说，拉季谢夫的同学有：亚诺夫、切利谢夫、库图佐夫、鲁巴诺夫斯基、涅斯维茨基公爵、Ф. 乌沙科夫、M. 乌沙科夫、纳萨金、特鲁别茨基公爵、奥尔苏费耶夫。后来，又派了科佐达列夫和沃尔科夫来代替死去的涅斯维茨基公爵和特鲁别茨基公爵。

② C.Г. 斯瓦季科夫似乎认为，俄国国外留学生同他们的政府监护人的这一冲

"事故"妨碍学生去"考虑学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故"引起抗议的精神,有时驱使学生考虑一些在其他比较顺利条件下完全不会注意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同博库姆的冲突不仅未能剥夺莱比锡俄国留学生对正式学习大纲规定的必修科目的兴趣,而且未能剥夺他们对许多其他学科的兴趣。

例如,根据叶卡捷琳娜亲自写的训令,他们必须学习拉丁文、德文、学习道德哲学和罗马法,"特别是自然法和民法"。但是,拉季谢夫按照自己的意愿,除这些科目外,还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和医学。

象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哪怕是极少数青年努力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便会经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在我国留学莱比锡的学生中,也有一个对自己的伙伴起着领导作用的人物。这便是费多尔·华西里耶维契·乌沙科夫。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使我们有根据认定,他曾以突出的思考能力,没有止境的求知欲和性格的刚强,而出类拔萃。当叶卡捷琳娜决定派遣拉季谢夫等人出国留学时,他已在政府机关任职,但他力争出国,而且获得批准。他不象他的伙伴们那样年轻,比他们更有能力听大学里用德文讲授的课程,也更有能力认真读书。他们在自修方面选择书籍和科目时,也接受他的指导。乌沙科夫没有读完大学便死在莱比锡,终年23岁。然而多么奇怪,他的早死竟成为我国某些学者责备18世纪解放哲学的理由。

突,是我国最早的学生运动。这不完全准确。1763年,寡妇斯特凡宁科娃向基辅神学院长控告4名学生,似乎他们偷了她的木材、院长作了严厉处分:他命令对两名被控告的学生用树条抽打,对其余两名则剥夺其"资格"。受害者向基辅的主教提出了申诉,要求对他们所受的侮辱和殴打予以"昭雪"。哲学班的个别学生声援了他们,在同称他们为暴徒的院长激烈争辩后,以集体离院作为威胁。(见M.B.多夫纳尔-扎波尔斯基的论文《谢明·伊凡诺维奇·加马列雅》——《共济会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28页。加马列雅也是那一刚强的院长的受害者)。这些学生运动的结果如何,不了解;但很可能,它们也都不是最早的学生"闹事"。

事情是这样：据乌沙科夫传记的作者拉季谢夫说，乌沙科夫死于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肉欲过度和漫无节制的必然结果”。

拉季谢夫断言，乌沙科夫“在贵族社会”中的周旋，使他养成了纵欲的习惯。对于拉季谢夫的这个见解，涅泽列诺夫教授曾以教训的语气作了补充。他说：

“当时与时髦的唯物主义哲学相适应的欧洲社会道德，不仅使乌沙科夫，而且使拉季谢夫羡慕不置。拉季谢夫在记述亡友的生平时，也对爱情和青春表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同乌沙科夫的观点一样，充满肉欲”[1]。

不能不同意，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俄国，“贵族社会”的道德，确能养成青年人寻求“过度肉体享乐”的习惯。我们的宫廷习惯和妻奴、妾奴风俗可以成为“纵情声色”的典型范例。然而，如果我们不知道，唯物主义者对健康人的机体需要的态度，早已被解释为色情宣传，那就很难理解，这同唯物主义哲学有何关系。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把这种需要看为使人沦为“禽兽”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诺维科夫的《曙光》杂志在谈到性爱时，就发表过这种意见。各式各样的唯物主义者都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而认为对人体正常需要的满足，断然不包含任何值得责备的东西。但这距离宣扬过度肉体享乐是非常遥远的。如果“贵族社会”的代表，在某一历史时代，——例如，在复辟时代的英国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俄国，——有时引述唯物主义哲学而为他们的某些“享乐”无度辩解，则这里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哲学，而只在于贵族社会的道德和产生这种道德的社会条件。至于乌沙科夫本人，不难看到，他的爱情观，是完全没有道貌岸然的涅泽列诺夫教授想强加给他的那种色情特点的。

---

① 《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文学流派》，第323—324页。

II

对此，应予补充说明：乌沙科夫就其根本哲学观点说，并不是什么唯物主义者。不过，毫无疑问，他虽然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他对于唯物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却几乎是完全理解的。他在性爱和一般"情欲"问题的观点上，也表现为唯物主义者。

他在所写短文《论爱》中说："道学先生反对情欲，他们按照在他们想象中创造的人来谈论一般的人，或者加深其抽象的形而上学，用响亮的词句证明，凡不符合尽善尽美（对此毫无解释）和事物本质秩序（对此并无了解）的行为，都是反德行，都是罪恶。"

乌沙科夫驳斥了这种"反德行"概念：按照他的意见，"凡能促进全体人（如这不可能，最少也应当促进许多人）的幸福与快乐"的行为，都应称为德行。因此，他认为，凡危害人类幸福与快乐的行为，都是"反德行"。他觉得只有根据这种观点，才能对性爱问题进行考察。

满足人的生理需要，就其本身而言，对于德行既无积极关系，也无消极关系。这种满足只有当人们由于某种心理感受的影响而作出这样或那样对亲人有利或有害的行为时，才会成为善或恶的来源。性爱在自然状态上，也就是在社会产生以前，纯然是一种生理行为。但自社会产生，事情就在这样的意义上发生了变化，即男女之间，除生理的欲求之外，还有一些感情，能够驱使人们对社会作有益、或有害的行为。因此，从这时起，对爱情问题从德行观点进行考察，就成为适当的了。

乌沙科夫说，男人总是想变得能够取悦于女人，而不是相反，即不是女人想变为男人所中意的样子。因此，在社会里的爱，由于它的基础不只是肉体感受，而是数以千计的感受，这种爱决定于成见、习惯和境遇，它根据女人所受教育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而变为

善或恶。然而女人的教育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社会，它使女人鼓励男人进行有益于社会的事业："母亲因儿子未能戴着桂冠归来而流泪；少女将自己的心献给光荣的人"。而现在却不是这样。现在，女人学的是游戏和娱乐，"她的整个智慧都局限于表面的荣华"，她的道德感情经常受到装腔作势和虚伪造作的歪曲。她"由于无知而中伤别人，由于未获应有尊重而沽名钓誉，由于经常生活于被迫状态和从事细微末节而变得奸诈狡猾。"她力图驾驭她的爱慕者。乌沙科夫坚决劝告男人不要受女性的有害社会的影响。他问道："难道值得作她的牺牲品？难道值得为了取悦于她而使自己的头脑塞满了种种费解的细微末节？难道值得为了使她高兴而放弃爱真理，将一逝不返的光阴贡献给她？"接着，我们的青年作家颇为详细地列举了男人由于取悦于卖弄风情的美妇人而遭受的危害，最后并呼吁读者发出国民应有的情感。按照乌沙科夫的说法，只有"力求认识人的真谛的人，只有用有益的好知识充实自己的智慧的人，只有力图反对这种肉欲的人，只有以服务祖国和扬名世界为最大快乐的人"，才能逃脱女性设置的天罗天网。

在肖伯纳的剧本《坎第得》里，莫列尔牧师的助手米勒向女速记员赫尔内特说："啊！女人，如果你能够驾轻就熟地掌握男人的长处，就象你掌握他的弱点那样，那时任何妇女问题也就没有了"①。

请看，米勒的话，同莱比锡的俄国留学生乌沙科夫在他很早以前所说的话，完全一样。

妇女利用男人的弱点，对男人发生有害的影响，所以妇女问题就在于使男人摆脱妇女的有害影响。米勒没有说完他的意思：我们没有听他说及如何使妇女不去掌握男人的弱点，而去掌握他的长处。可以假定，按照他的意见，这个任务应通过**教育**来解决。至

① 第1幕，第3场。

于乌沙科夫，那我们就不仅可以假定，而是可以肯定地说，他认为，只有教育，才是使妇女摆脱她在"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缺陷和毛病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才是解决妇女问题的锁钥。但是，极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教育观点是很广泛的，这种广泛性是他研究当时唯物主义者的结果。乌沙科夫所谓教育，是指社会环境对个人影响的总和。他乐于给他同代的妇女灌输他所说的古代母亲和"少女"所表现的那种国民应有的感情，而且认为要作到这一点，除了按照古代方式改造我们的社会外，别无他途。而由于这种改造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要作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需要先进国民的努力，所以，乌沙科夫劝告先进的国民先不要接受妇女的诱惑。关于这一劝告，也许可以大加评论。但是有一点却不能说，即不能认为它是由于肉欲的驱使。

我所叙述的乌沙科夫《论爱》一文的内容，使我们了解，莱比锡的俄国青年留学生领导人所注意的是在理论上多么严肃和在实践上多么重要的问题。他的讨论权力与惩罚目的问题的另一论文。也证明他的理论探索的深刻。

关于这种权力的"探讨"，共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乌沙科夫考察了这一权力的基础；在第二部分，考察了这一权力归谁所有；在第三部分，他谈了死刑问题。

乌沙科夫坚持契约论，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惩罚权起源于社会成员的协议：他们不能不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反对恶意分子的损害，"有其目的，就有其手段"。对于第二个问题，他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解决的，即惩罚权属于单独的或集体的国王。最后，对于死刑，乌沙科夫谴责它是一种不符合其本身目的的措施。

读者自己看到，在这种"探索"里，俄国留学生是以先进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为榜样的。乌沙科夫在一个地方直接引述了"《犯罪与惩罚》一书的作者"的言论。但在没有直接引述的地方，也可完全

明显看出，他竭力研究了贝卡里亚在当时的新著作[1]。除贝卡里亚的影响外，还可看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2]。

犯罪调查学者认为社会惩办罪犯，是通过以恶报恶的办法来恢复正义，乌沙科夫在考虑这一意见时，提出了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就在现在，也对分析臭名远扬的不以暴抗恶的理论，具有价值。

他说，一个不幸折断一支腿的人，如果为了以恶报恶，要将另一支腿也给折断，那将是一种毫无理性的行为。社会的情况是同个人的情况相仿佛的。社会是一个法人，其一切行为都应以求得社会幸福为旨趣，而"以恶报恶则等于促成无可挽回的恶。自己去作反对社会生灵的恶，这种行为需要丧失理智，而丧失理智不是权力。"这些话完全包括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曾经轰传一时的托尔斯泰学说所特有的真理：如果社会在对罪犯的态度上是以以恶报恶为目的，则这个社会无疑地只能增加在其内部所作的恶的总数。但乌沙科夫不满足于这一无可争辩的真理，他也没有说社会不应使用暴力来保卫自己的利益。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应该剥夺罪犯危害其亲近人们的可能。但它同时应该设法对他进行道德感化。它必须使用这两种手段，以期减少在它的内部发生的恶的总数。不能不承认，乌沙科夫虽然在这里没有完全解决怎样使恶本身——在这里是说对社会犯罪分子的暴力——成为善的来源，但他的"探索"过程要比托尔斯泰伯爵的思考过程正确得多。

不过，应该指出，在研究用什么方法才能感化罪犯时，乌沙科夫发表了一些现在看来不仅幼稚，而且幼稚中兼带残酷的主张：他将他的感化希望寄托于单独监禁。"关进监狱的罪犯，看到自己满身耻辱，受到一切人的蔑视，如果单独一人，就会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有力的忏悔。"

---

① 学术著作《犯罪与惩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1764年出版。

② 贝卡里亚本人就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因袭了许多东西。

先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更广泛地提出了犯罪意向的感化问题。他们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是犯罪的来源。为了消除这一矛盾，——同时也消除犯罪的意向，——必须这样组织社会，使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符合①。的确，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只有不多的人以为可以达到这两类利益的完全适合。但是他们都证明，最少要用一切力量来谋取这种适合，因而使他们的理论具有改革的性质。不知为什么这方面的理论，在乌沙科夫关于惩罚权的探讨里没有得到反映。同先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例如，同爱尔维修相比，——他在这里显得是一个思想方式颇为温和的人。

他说："所有各时代的经验和现时的国家状况，都证明财产平等的不可能。而财产的不平等则一方面造成贫困，另一方面造成

---

① 康尔多塞写道："Le perfeetionnement des lois, des institutions publiques, suite des progres de ces sciences, n'a-t-il point pour effet de rapprocher, d'intensifier l'intérêt commun de chaque homme avec l'intérêt commun de tous? Le but de l'art social n'est-il pas de détruire cette opposition apparente? Et le pays, dant la constitution et les lois se conformeront le plus exactement au voeu de la raison, et de la nature, n'est-il pas celui ou la vertu sera plus facile, ou les tentations de s'en écarter seront les plus rares et les plus faibles? Quelle est l'habitiude vicieuse, l'usaqe contraire à la bonne foi, quel est même le crime dont on ne puisse montrer l'origine, la cause première, dans la législation, dans les institutions, dans les préjugés du pays ou l'on observe cet usage, cette habitude, ou ce crime s'est commis?"(«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 Dixième époque. Des progrés futurs de l'esprit humain».)

（随着这些科学的进展而出现的法律及公共制度的完善化，对每个人的一般利益与全体人的一般利益的彼此接近和同时提高会没有效果吗？社会学科的目标难道不是要打破这种表面上的对立吗？而那种宪法和法律同理性的意愿和自然的意愿最密切符合的国家，不正是那种美德最通行无阻、引诱人离弃美德的力量最少见而最薄弱的国家吗？有哪种恶习惯，有哪种违反正直诚实的风俗，甚至有哪种犯罪，我们不能从见得到这种风俗、这种习惯或这种犯罪的国家的立法、制度、偏见中指出它的根源、它的基本原因呢？）

〔《人类精神进展的一幅历史图画素描——第十时期。人类精神的未来进展》〕

奢侈。"爱尔维修也说过同样的话。

但是，爱尔维修一方面承认财产平等的不可能，同时又认为立法者必须努力减少财产的不平等。而关于这一点，乌沙科夫却一字未提。也许，他的缄默是因为经济关系不属于他所从事的法律研究的范围。然而如果他常常想到经济，那么，在法律研究里，他也会对于经济有所表示(哪怕只是顺便一提)。由于他自己就曾看出，极度的贫困经常接近于犯罪，所以这样做，就更恰当了。因为很明显，既然极度贫困促使犯罪增加，那么，为了同犯罪进行斗争，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就是必要的了。可是，乌沙科夫没有作出这一结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值得注意的法律研究使我们有根据去设想，经济问题并未引起他的注意。

这一优秀人物，尽管害着重病，却孜孜不倦地力求深造，他象所有18世纪先进法国启蒙思想家一样，极为倾慕普卢塔赫英雄的私德，但他不仅与财产不平等妥协，而且由于这种不平等，对他的惩罚理论作了重要修改。他写道:

"一个有才智的人或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对于刑罚的感受，要比一个无知的人或身强力壮又习于贫苦的人，更为敏锐；所以对于这两种人，如果实行同样的罪行同样的惩罚，则对于一种人会比对于另一种人更为残酷，精神痛苦将不能与罪恶相配称。"这就是说，对于有才智、或过着舒适生活的罪犯，立法者应予以更轻的惩罚。对于这种观点，18世纪的先进法国人是很难同意的。如果在这里完全不谈监狱能否促进犯人的道德改造问题、可以同意过着舒适生活的人比从童年起就习于穷苦的穷人，更难忍受监狱中的物质艰难。至于道德的痛苦，怎样也不能说穷人比领有丰富物质财富的人，更易于忍受。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愈是堕落的犯人，要比堕落情况不及他的犯人，更少感到监狱中的道德痛苦，那会是更为公允的。但道德堕落的程度既不决定于物质幸福的程度，也不决定

于“才智”。我们已经知道①，18世纪的先进法国人深信，特权等级人们的道德水平**低于人民的道德水平**。如果乌沙科夫保持了他的先进的同时代人的这一观点，他一定会认为，对于穷人的惩罚，应比对于“过着舒服生活的富有者”的惩罚为轻。可是就令他同意这一观点②，他在“关于惩罚权的探讨”里，也一字未提。因此，他所得出的结论，很少符合第三等级思想家的学说，而更多地符合贵族等级的陈腐偏见，这个等级的代表在19世纪还常常说，我国庄稼汉不怕坐牢，因为就是在监牢里，他也比在家里吃得好些。

III

研究乌沙科夫的著作也许是多余的。但事实上，这种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些比任何其他人更倾向于法国解放哲学的18世纪俄国人。乌沙科夫是莱比锡俄国留学生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观点，对于那些决定他的许多同学的日后活动的概念，具有重大影响。拉季谢夫写过乌沙科夫“生平”，而且保存了乌沙科夫的上述论文，他在许多方面，纵然不在一切方面，都是同意乌沙科夫的。我们分析乌沙科夫的观点，同时也就了解了拉季谢夫的见解。

拉季谢夫的见解的最主要特点，在于同法国先进思想家理论的或多或少的接近。因此，我们必须注意指出我们在拉季谢夫本人的见解和他的学长乌沙科夫观点中所看到的种种偏离这种理论的地方。

我们看到，乌沙科夫在其关于惩罚权力的论文里，是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为榜样的。此外，我们又看到，他一方面追随启蒙思想家，同时对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又不经常确切地站在与他们相同

① 《……人类精神的未来进展》，第7章。

② 这里一提他对贵族妇女教育的评语。他把上流社会中卖弄风情的妇女，描写为堕落到了极点的人。但他无法否认，在劳动农民环境中教养的妇女，在道德方面要比那种妇女高尚得多。

的立场上。例如，同爱尔维修一样，他承认财产不均的不可避免性，但比爱尔维修更易于与这种不均相妥协。他表示应减轻对富有阶级罪犯的惩罚，从而他所暴露的情绪，也不是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情绪。质言之，他落后于同时代的先进法国人。不难了解，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法国，日益接近的社会变革的风暴，比在遥远的俄国、甚至比在叶卡捷琳娜派出俄国学生留学的德国，都要明显得多。因此，先进法国思想家所走上的"极端"，——用我国许多善意的学者的话说，——使德国教授和他们的德国和俄国学生感到恐惧。①

试举一例：一位显贵的俄国旅行家②在途经莱比锡时，向俄国留学生推荐爱尔维修的著作«精神论»(«De l'Esprit»)，按照拉季谢夫的说法，这位显贵旅行家"只是对这本书有偏好，对这本书的尊重超过其他的书"("也许其他的书，他根本不知道"。——拉季谢夫挖苦说)。乌沙科夫和他的所有俄国朋友，遵照这位显贵旅行家的建议，相继"读了这本书，而且用心地读，学会了照那本书思考"。但是，他们虽然学会了按照爱尔维修的著作思考，虽然完全领会了这部书的绝大多数次要的理论原则，却不曾接受构成这些原则的基础的唯物主义感觉论。乌沙科夫甚至感到必须批驳爱尔维修。他留下了他批判«精神论»最初几章的5封信。这些批判并无任何创见。乌沙科夫反驳爱尔维修的论点，是从各式各样德国哲学家那里抄袭来的，而这些德国哲学家的特点，又在于他们比法国哲学家更强烈地倾向于同旧世界观妥协。但对俄国社会思想史具有不小意义的一种情况是：乌沙科夫对爱尔维修的完全没有创见的批判，在拉季谢夫的思想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特别是在他一生中最艰

① 虽然，乌沙科夫对妇女问题的观点，要开扩得多。值得指出，19世纪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总是开扩地看待这个问题。

② B.B.卡拉什假定，这位显贵旅行家是奥尔洛夫伯爵。

难的岁月里，在他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活中，感到需要宗教的安慰时，他强烈地想到这些批判，咒骂这位法国思想家。而他在青年时代却是按照他的书来学习思考的①。

在他那时所写的著作«论人及其死亡和不死»里，他几乎重复了乌沙科夫在莱比锡用以反对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全部哲学观点。我们往后在研究拉季谢夫生平的这一时期时，将对此摘要进行考察。但我们的叙述还离这一时期很远。

1771 年 11 月，拉季谢夫回到俄国。他带着为祖国贡献其全部力量的热烈愿望，回到了祖国。在他所写«乌沙科夫生平»一书中，他在谈到他的朋友，未来的神秘主义者库图佐夫时，说道："回忆我们多么焦急地想看到自己重新回到我们的出生地，回忆我们在看到将俄国和库尔良德分开的分界线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如果有谁，冷淡无情，在这种兴奋情绪中，除了看到放肆，有时甚至胡闹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那我是毋须为此玷污纸笔的；但如果有谁虽懂得什么是激动若狂，却说我们没有这种情绪，我们不能牺牲生命来谋求祖国的利益，那么，对于这种人，我说，他是不了解人心的"。祖国没有为他的青年活力找到使用的地方，没有找到需要使用他的巨大的英勇奋发精神的地方。

同库图佐夫和其他在外国留学的伙伴一道，他被派到参政院工作，职务是记录员。他的儿子尼古拉说，这一职务没有给拉季谢夫带来多大喜悦。"不通俄文，同小官小吏为伍，高级官僚对待他们这批人的态度同对待其他小职小官的态度毫无差别，这一切都使他对这一职务感到厌恶。"因此，先是库图佐夫，后来是拉季谢夫，都转任军职。他被任命为大尉，派在当时彼得堡军区总司令布留斯伯爵的总司令部任军法官。据他的儿子说，担任这个新职，是

---

① 在写给沃龙佐夫伯爵的信里（伊尔库斯克，1791 年 11 月 26 日），提到«Helvetius de memoire maudite»（«回忆可诅咒的爱尔维修»。）

拉季谢夫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这是可能的。但事实是，拉季谢夫在彼得堡总司令部只服务了三、四年便辞职了。

1776年他再次任职。现在他担任商务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个职务本身，是没有什么英雄特色的。不过，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

这个前莱比锡留学生一经参加商务委员会的业务，便挺身为正义而斗争。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斗争，是因被控失职的«大麻织品检查员»案引起的。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以及拉季谢夫的其他同事，都认为检查员有罪。他一人——当时是委员会的最年轻的委员，——却对这一案件写了相反的意见，而且毫不耽误地将其发表出来。这引起了一场混乱。惊惶失措的委员会副主席长时间地劝说拉季谢夫别说出来，以免引起委员会主席沃龙佐夫伯爵的震怒。但拉季谢夫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于是，事情发展到由他自己向委员会主席陈述。出乎这批惊惶失措的官员们的意外，委员会主席认为拉季谢夫的理由有说服力，因而被控的检查员得到昭雪。从那时起，沃龙佐夫伯爵对他的这位聪明勇敢的属员，倍加注意，后来，在他遭受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曾给他以异常重大的支持①。一般说来，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拉季谢夫任职期间活动的一切，都向我们说明他是一个聪明、积极和完全大公无私的官吏。事情不能不是这样。他从国外带回祖国的理想，完全不是一般只关心自己升官发财的老官吏所需要的理想。当然，就是努力无私的公职人员，也很少能符合这种理想。拉季谢夫曾努力从事写作，在回国以后不久，就着手翻译一部当时很出名的马布利的著作«Observations sur l'hestoire de la Grèce»。他的译本于1773年出版，书名为«希腊史概论，或关于希腊人幸福和灾难原因的考察。马布

① 沃龙佐夫伯爵在拉季谢夫流放西伯利亚时，曾与他通信。流放中的拉季谢夫在写给伯爵的一封信里，便写了前面提到的对爱尔维修的咒骂。

利神甫著》。译本是由诺维科夫在1773年建立的"印书业促进会"出版的[①]。马布利是这样的法国作家之一，他们的著作在莱比锡曾为乌沙科夫的俄国留学生小组争相阅读。这个小组从法国作家著作中吸收了哪些观点，可从乌沙科夫对"君主专制"一词的注释中窥见一斑，这个词是他用来翻译法文"君主独裁制"一词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权利和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分给法律，那是为了利用它来谋求我们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同社会是订立了默契的。如果这个默契遭到破坏，那我们就解除了所负担的责任。君主的不公正使人民——他的法官——得以对他行使同审判罪犯一样，乃至更多的权力。君主是人民社会的第一个公民。"

我们的作家在译书的同时还写诗。但在马布利著作俄文本出版后不久，拉季谢夫便长期中断了他的写作活动。"

H.П. 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认为这种中断的原因是由于拉季谢夫的青年人理想和丑恶现实的冲突。他指出，拉季谢夫在所著《乌沙科夫生平》中，一方面回忆了留学莱比锡的俄国学生在回到祖国时兴高采烈的情景，同时又忧郁地说："我承认，我的亲爱朋友(他这里所指的是库图佐夫。——著者)，你也会承认，回国以后，我们的热情，是大为减弱了"。接着，拉季谢夫对有产者的政权，作了激烈的指责。"啊，你们，劳心的支配者，由于你们眼光短浅，你们放弃了从事公益的机会，熄灭了笼罩着青年心灵的火焰！对青年一次镇压，你便每每使他永远成为残废！"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说得对，他认为这些自述和指责，是撰写我们作家的传记的重要精神文件。但他错误地以为他所指的青年人理想和严酷现实的冲突，暂时制止了拉季谢夫的"唯心主义意图"，似乎这种意图只是从

① B.谢缅尼科夫发现，除这部马布利著作的译本外，"促进会"还将拉季谢夫的另一译本《军官操典》送请科学院出版。但这个译本仍然是由诺维科夫出版，直到1777年才发行的。(见谢缅尼科夫的论文《诺维科夫早期创办的出版社》——《俄国藏书家》，1912年，第5期，第10页。)

1785 年才开始苏醒过来，又以新的力量控制了他①。事实上，在前莱比锡留学生的心灵里，这种意图从来不曾停息，而且即令停息过，其苏醒也无论如何早于 1785 年。这一点可从拉季谢夫的小册子«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中很明显地看出。

这本小册子注明写于 1782 年 8 月 8 日。它所讨论的问题在很长的时期内，都与俄国先进人物的"唯心主义意图"有最密切的联系。在谈到在彼得堡建立彼得纪念碑时，拉季谢夫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称这位君主为大帝？只有为祖国作过贡献的君主，才配享受这种称呼。彼得一世给俄国作过什么贡献呢？拉季谢夫说，这位国王的"优异之处虽然不在于他为人民利益而建立的各种制度，虽然他不是查理二世的胜利者，但他却给一个辽阔无边的庞然大物以第一个意图，而这个庞然大物虽然巨大无比，但过去却是毫无作为的。"他在作出这一答案时，是有意识地同对彼得改革抱着否定态度的卢梭(«日内瓦公民»)表示分歧，而同意伏尔泰的意见，因为伏尔泰认为我们的改革家是一个创造者，是对一个无定形的死板的俄国庞然大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的创造者②。

下面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拉季谢夫在这里与年轻的卡拉姆津不同③，他完全没有忘记彼得活动的阴暗方面。他承认"所以我说，如果彼得确立了个人的自由，那他就可能更光荣，就可能更提高自己，也提高他的祖国"。但拉季谢夫深信，一般说来，不可能希望君主自愿地确立自由。

"如果我们有些这样的例子：国王放弃王位，以便安宁地生活。但这不是由于国王的豁达慷慨，而是由于他在王位上坐腻了，就是到了世界的尽头，也不会，而且不可能有这样的例子：即国王在坐

① 见前关于俄国对西方态度问题的一章。

② 见同章。

③ 见同章。

在王位上时，会自愿放弃他的任何权力。”这一关于国王在精神上不可能自愿放弃权力的意见，表明拉季谢夫在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称之为“唯心主义意图”消沉时期，抱着怎样的政治情绪。可以说，拉季谢夫那时的思想方式，最少在政治方面，要比他的著名《旅行记》出版那年急进一些。事实上，他的《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写于1782年，直到1790年才出版。所以，拉季谢夫在说到国王从来不曾自愿地向自由让步，也永远不会作出这种让步的地方，写了如下的注释："如果这些话是写在1790年，则路易十六世的例子会给作者以别的想法"①。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是说，在1782年，拉季谢夫的“唯心主义意图”很微弱，而是说——而且只是说——拉季谢夫由于猜想路易十六世仿佛是诚心想满足法国人民的政治要求，遂对有产者政权的善意，抱着比以前更信任的态度。我们即将看到，这后一情况对《旅行记》中某些似乎同他对“君主专制”的一般态度不很协调的地方，提供了解释。此外，他同开始受到神秘主义情绪控制的库图佐夫的通信，也都是在这些，按照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的意见，以拉季谢夫的“唯心主义意图”消沉为特点的年代写的。

我们作家的儿子说，这两位老友的通信，可以编成一整部书。非常可惜的是，这些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拉季谢夫不仅没有接受那种控制着库图佐夫的坟场情绪，而是相反，坚决保持了他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因袭来的进步宇宙观，我们根据所知有关他本人和有关莫斯科“蔷薇十字会”会员对他的态度的全部材料应对此深信不疑②。然而，谁坚持进步理想，则其被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

① 《拉季谢夫全集》，1907年版，第4卷，第5页。

② 关于这种态度，见前面第十一章。——在《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里，拉季谢夫表示了对于神秘主义“哲学”的看法。他叙述了在波德别列兹耶车站，有一个到彼得堡学习科学的学生，遇见了他。在这个好学的学生遗失的小笔记本里，有这样的一些话："发展最新的神秘创造罢，以按时出席烦琐哲学争论而自负罢，人类理性关切

称之为唯心主义①的那些意图，就不会停息。

俄国作家，——特别是这里所说的18世纪作家，——其缄默，每每不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意图的消沉。这种缄默每每是由于“不由自主的情况”。如果这种情况的恼人影响能够驱使诺维科夫钻进神秘主义，那它们也就能够使拉季谢夫产生一种信念，认为任何在刊物上反对丑恶现实的企图，都是没有希望的。这一信念完全足够使他保持缄默，即令不是永久，也要保持一定时期。拉季谢夫的暂时缄默，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一信念。

但是人也想到现实。拉季谢夫经常关切西欧著作界的先进思潮，无论如何不能不感到法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所以很自然，他在感到这种风暴正在到来后，也就产生了从事著作活动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为什么他重新拿起了他那枝早已搁置不用的笔杆的原故。

我已一再提过的他那本《乌沙科夫生平》1789年出版了。这

的是成语，而不想想这种成语有无意义。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由学者去解决真理问题，而是提出在针尖上能够容纳多少灵魂问题。”拉季谢夫很了解，18世纪的神秘主义是为了中世纪的概念而反对法国新哲学的。

① 在道德的意义上使用这一形容词，有时为了语言的简括，是必要的。为了简括，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在他所写的传记里使用了它，而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是没有反对唯物主义的庸人成见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种情形之下通用的术语，曾引起巨大的概念混乱。恩格斯在他的卓越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说：“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接着，恩格斯嘲笑了庸人反对唯物主义的成见：“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乐，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物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引自我所译的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国外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1卷，第324—325页。)

本书包含了他的传记的许多珍贵资料。如果根据这部著作来判断，则他当时的主要兴趣是政治兴趣。他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我国贵族道德的本质，认为它们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他说："君主独断专横，除自己的意志和苛求外，不知有法依循；在他看来，其他规章也都低于自己的意愿。这就促使每一个长官认为他所使用的部分权力是无限的，认为他这个局部的统治者同总的统治者没有两样，从而以为把抵触长官权力的规章看为对最高权力的侮辱，是理所当然的"。

拉季谢夫说，这一"不幸的思想"危害着成千热爱祖国的公民，压制着他们的灵魂和理智。但他认为，在当前条件下，这种思想是完全无可避免的。他断然说："怎样也不可能，因为人都是倾向于独断专横的；这一意见，爱尔维修也经常说过"①。

怎么办？难道能够同掌权人物的独断专横习惯妥协吗？或者，难道能够用幻想来安慰自己，以为有德行的人，就令带上镣铐也是自由的吗？不能，都不能。必须斗争。必须学会抵制身居高位的暴君。公民服务国家，而不是听命于长官。关于这一点，拉季谢夫制定了许多规章，他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遵守了这些规章，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作了叙述。我们已经知道，他在担任公职时，怎样在对长官的态度上保持了独立精神。现在，我们看看他怎样把这种独立的精神灌输给他的读者。

在他所著的《旅行记》中，他提到在"克列斯特兹"车站遇见的一名贵族。这个贵族是送他的几个孩子去上任的；在同他们分别

① 《全集》，第1卷，第18—19页。在附注里，拉季谢夫力图对这种"不幸思想"的起源作更详细的说明，并且模仿爱尔维修的榜样，从社会关系中找出了解社会心理的钥匙。他写道："这种要求绝对服从的规章的根源，可能从军法中，从文官和武官的混合中找到。"我国文官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担任军职时开始其对祖国的服务的。他们由于习惯了对下属发号施令，而军事服从又是不容许违抗命令的，所以他们在担任文职时，都带着过去养成的军事思想。他们觉得到处都是队伍，在法庭上也可高喊："举枪致敬！"，他们的决定每每是用鞭笞来签署的。

时，他给他们讲授了实用智慧。这就是那个同“糊涂人的庸俗经验”毫无共同之处的智慧：

父亲说：“努力吧！特别是要首先使你们的行为受到你们自己的尊敬；以期在单独一人反躬自省时，不仅对所作所为没有后悔，而且为自己感到荣幸。”

这是通则。而这个通则的应用情况之一是：

“进入上流社会，你们很快就会知道，社会上有一种在节日的早晨拜会达官显贵的习俗。这是一个小气的习俗，毫无意义，它表示拜访者胆小如鼠，被拜访者傲慢骄横和缺少理性。”

我们看到，拉季谢夫在这里提出的那个贵族，要他的孩子们提防涅克拉索夫后来在他所写的«在正门入口处的沉思»第一部分所抨击的那种奴性。节日拜访达官显贵的目的，是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而这却为有自尊心的官吏所不应该做的。“不要让你的脚跨进那分隔着阿谀逢迎和执行职务的界限，”——贵族继续说，——“除非由于你的职务的需要，不要走进任何显赫大贵族的正门。那时，你虽在卑鄙的人群之中，虽然他们要用奴颜婢膝的目光看望你，你心灵虽然愤慨，但你毕竟与他们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拉季谢夫一方面向他的读者灌输独立感，教导他们怎样对待显赫大贵族，同时对于在60年代先进青年中受到无情抨击的讲究服饰行为，也表示了谴责。

“一贯地讲究服饰，经常表示一种被压抑的理性，”——同一贵族在他的著作中说，——“如果说，尤利·克萨里尔是一个讲究服饰的人，那他的讲究是有其目的的。青年时期追求女性，是他讲究服饰的动机。如果穿着又脏又臭的破衣能够达到他的愿望，他会立即脱下楚楚衣冠而把这种破衣穿上。”

人所尽知，衣冠楚楚可有助于达成高贵的目的。就是19世纪先进青年中最极端的代表，对此也是同意。例如，我国所谓地下工

作者，在华丽的衣冠有助于达成他们的革命目的时，就穿得非常华丽。总而言之，在读到这位克列斯特兹贵族给他孩子们的训诫时，不禁想起杜勃罗留波夫的某些论文，这些论文向青年读者讲授如何生活，特别是如何抵制任性胡闹的规则。拉季谢夫在我国生活导师的队伍中，是一个首屈一指的人物；后来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在这种人物中占着同样的地位。拉季谢夫的实用规则同这两人所制定的规则近似，尤为值得注意，因为他在理论上时常依靠的前提，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哲学前提，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他虽然不肯在最后的结论上追随法国唯物主义者，但毕竟他的人性发展学说是完全从他们那里抄袭得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也都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坚决信徒，而费尔巴哈则很受益于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他对此并不经常明了。属于两个极不相同的历史时期的作家，他们的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出发点，造成了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结论，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克列斯特兹的贵族警告他的孩子们说："不要以为，我会想从你的嘴里听到你感激我对你们的关怀，或赞扬(哪怕是略为赞扬)我为你们所作所为。在自身利益的推动下谋求你的利益，总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你们什么也不亏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小说《怎么办》的主角，对于他们的各种利他行为也表示完全相同的观点——只不过说得好得多。他们每人都说，指导他们的，是纯然利己的动机（用克列斯特兹贵族的话说：自身利益的推动），其根据是每人在打算作些利他的举动时，都希望从这种举动里获得巨大的满足。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我国 19 世纪 60 年代伟大启蒙思想家所大事抨击的利己主义宣传，所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俄国启蒙思想家的唯一不无根据的指

责，是他们用语的不明确。某人愈是富于牺牲精神，便能愈是快乐地为他所亲近的人们服务。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不应因此就说，指导他的行为的是“本身利益的推动。”

问题决定于这人所说的利益是指什么：如果是指他人的幸福，那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利说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因为利己主义者的利益是与他人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如果洛普霍夫和基尔萨诺夫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里，犯了克列斯特兹贵族在拉季谢夫的《旅行记》里早就犯过的同一用语错误，那也完全不意味着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拉季谢夫是利用他们的主角来宣扬利己主义。相反，他们的宣传是最高的利他主义宣传。诽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们从来不肯费点气力去查明，洛普霍夫为了不妨碍他的妻子的幸福而决定退出，他的利己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更不明白，为什么拉赫梅托夫由于决心为祖国服务而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我们都应说他是利己主义者。拉赫梅托夫似乎是70年代俄国革命家的典型。但是，在总和上构成这一革命家理想的特点，在18世纪下半期即已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开始产生。这一点，我们在拉季谢夫本人和他的克列斯特兹贵族的范例上看得最为明显。

根据这位克列斯特兹贵族的说法，共同生活的规则是与遵守人民的道德风尚，遵守法律，以及符合德行的行为有关系的。

“如果在社会里，道德风尚不违反法律，如果法律不给德行的传播设置障碍，则执行共同生活的规则，便是轻而易举的了。”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社会实际上并不存在。在一切地方，道德每每与法律抵触；更坏的是，道德风尚和法律又每每与德行矛盾。因此，很难同时履行人和公民的责任：“两者每每完全对立”。

拉季谢夫理解的人的责任，显然是对待应当是什么，也就是对待理想的责任。而所谓公民的责任，则是指对现实，换言之，对事物的现有秩序的责任。在现实与理想发生矛盾的时候，在现实的

要求与德行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时候，从而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德行便是最高的法律。“不要管道德风尚，”——还是这位克列斯迪兹贵族说，——“不要管民法和宗教法，不要管这些社会上多么神圣的东西。执行它们将使你离开德行”。

这些话表明，拉季谢夫虽然以官吏的身份仍旧严格遵守法律，但他一点也不愿使进步的利益成为法律的牺牲品。官吏心甘情愿地向公民让步。然而为了进步的要求而违反法律的要求，意味着给自己招来迫害。拉季谢夫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想使先进的俄国人在致力于“德行”时，预先学会不畏艰险。“如果法律或国王、或人间任何权力要你撒谎或违反德行，你应对此毫不动摇。要不怕嘲笑，不怕折磨，不怕疾病，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要精神坚定，有如中流砥柱。”这已是毫不模棱两可地宣传用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同社会不正义作斗争了。拉季谢夫明确了解，在俄国，忠于进步将会陷于怎样的绝境。他指出，自杀是人们由于德行而遭受迫害的最后避难所。克列斯特兹的贵族给他孩子指出了卡顿的范例：“如果沉重的不幸使你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你的德行不能在人间获得避难的处所，如果你被逼到绝境，无处可以逃避压迫；那时，你应记住，你是人，应记住你的尊严，戴上极乐的桂冠，用它来解除你的不幸，——你就死罢！”

叶卡捷琳娜看到，«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旅行记»传布法国的传染病。从她的观点说，她是完全对的。毫无疑义，拉季谢夫表现为法国革命家的信徒。这不仅在«旅行记»里是如此。现在业已确凿查明，拉季谢夫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已在刊物里颇为完全和彻底地发表了他的革命观点。

佩平早就（在1868年）发表了一种意见，认为拉季谢夫曾积极参加克雷洛夫的«灵魂通讯»杂志的工作。他认为所有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以讽刺内容的严肃性为特征的书简，都出自拉季谢夫的

手笔。他认为，首先，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信便是其中的一篇。他的这种意见，在不久以前还为某些最严肃认真的学者所同意。毫无疑问，确乎有些有力的论点，足以支持这种意见。但谢戈廖夫提出了更有力的证据以反驳这些论点①。现在，对于拉季谢夫参加《灵魂通讯》杂志工作之说，不得不予否认。但谢戈廖夫在提出图奇科夫的无可辩驳的证明时，确认了我们的作家……。②

① 见他的论文:《拉季谢夫的杂志活动概述》，载1908年12月份《已逝的岁月》。

② 本卷正文到此结束。显然，这是普列汉诺夫的未完之作。——译者。

附　　录

I

第 十 三 章

（关于拉季谢夫）

怎么办？就其思想方式说，拉季谢夫怎样也不能与当权者的独断专横作风妥协。我们已经知道，他虽是愿意、而且善于任职，但他不愿，也不善于听从命令。他给自己提出的规则是："不跨越分隔着阿谀逢迎和执行职务的界限"。但他不以此为满足。

如果当权者的独断专横习惯，是一定社会政治条件的无可避免的结果，则任何不愿与之妥协的人，应该尽其力之所及，促进这些条件的改善。

……一定社会环境下云云，并不是说不应用这种条件进行斗争。

拉季谢夫意识到，同这种一成不变，但却很有害处的习惯作斗争的需要，必然产生，而且将在热爱祖国的俄国人的心中产生。用别林斯基的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拉季谢夫在这里已能在精神上发挥否定的观念。不仅这样。他不仅（在精神上）发挥了这一观念，而且想给他的读者讲授规则，使这一观念得以实现。

如果在一定社会政治条件下，当权者的独断专横习惯是不可避免的，那也不能说，应该与之妥协。拉季谢夫从来不曾作过这种结论。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官吏，他是尊重法律的，但他的长官的情绪使他不能忍受。当然，在他认为必须和可能充任政论家时，他就更不愿同社会的恶同流合污了。拉季谢夫是 18 世纪俄国这样的人士之一，这种人受了法国解放哲学的影响，立意要把这个哲学的结论传播到读者大众中去。用什么手段呢？拉季谢夫除了把他比较坚决掌握的法国解放哲学的结论传播到俄国读者大众中去外，别无其他手段。当他的著作活动经过一度中断而重新恢复的时候，他便成为这种结论热心的传播者了。

在这方面，他是同诺维科夫直接相反的。诺维科夫认为他在道德上必须同法国解放哲学的结论进行斗争。

佩平在 1868 年就证明过，拉季谢夫曾积极参加克雷洛夫的《灵魂通讯》杂志的工作。按照他的意见，所有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以讽刺内容的严肃性为特征的信简（首先是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信），都出自拉季谢夫的手笔。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不同意这一见解，他认为西尔弗·达尔诺维德信的大部分，没有出自拉季谢夫手笔的可靠特征，而且一般说，拉季谢夫未必积极参加了《灵魂通讯》①。相反，韦谢洛夫斯基不怀疑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信是拉季谢夫写的。他认为信中最好的一封，是那封谈到莫里哀的《厌世者》的信。事实上，应该承认，这封信确乎是卓越的。

这封信的作者断言，《厌世者》比布尔达鲁和其他传教士的说教给法国做了更多的好事。他决心承认阿利舍斯特的行为是模范。"让他们尽量责备好了②，但他们对厌世者的一切责备，都对厌世者有利。厌世者所憎恶的不是人，而只是人的恶，只是那些致命的恶！……"③ "如果在国王的宫廷里有哪怕是少数的厌世者，那对各族人民该是多么大的幸运！"④

韦谢洛夫斯基曾将西尔弗·达尔诺维德对《厌世者》的看法同《从莫斯科到彼德堡旅行记》的一个地方进行比较：在这个地方，伊斯廷娜在梦中会见了沙皇，劝他把那些敢于当面向他说真话的人当作最好的朋友，加意爱护。他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表达的方法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⑤。

由于这种相似之处，遂使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信，最少是这里所说的那一封信，更可信地是出于拉季谢夫的手笔。

然而即令这些信是出于别人的手笔，那也不能减少韦谢洛夫斯基的意见的正确性：即拉季谢夫认为应该效法阿利舍斯特。为了证实这一意见的正确，可以从《旅行记》中引录一些有说服力的段落，而主要地，是可以引证拉季谢夫本人的活动。

请注意，西尔弗·达尔诺维德并不要求正直的人去无条件地模仿阿利舍

---

① 见他所写的拉季谢夫传，XXVIII 页附录：《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第 287—288 页。

② 见 B.B. 卡拉什编：《И. А. 克雷洛夫文集》。这里引用的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信。载第 2 卷（见第 355 页）。

③ 同上，第 352 页。

④ 同上，第 354 页。

⑤ 韦谢洛夫斯基：《探讨与鉴定》，莫斯科 1907 年版，第 125—126 页。参阅他的著作：《新俄文学中的西方影响》，第 4 版，第 105—106 页。

斯特，而只是说：他“应该多少与厌世者相似”①。拉季谢夫在《旅行记》里也不主张无条件的模仿。他象西尔弗·达尔诺维德一样，认为值得模仿的，不是阿利舍斯特的那种毫无结果的可笑诚实，以及由于这种诚实而决心告诉爱米里：象她这样的年龄不宜于把自己装扮为美妇人，以及她过多地使用脂粉等等②，而是一个公民的必要的诚实，这种诚实在于对社会的邪恶的敢于嘲笑，对当权者的暴虐行为的敢于揭发。至于这种诚实，那它不仅浸透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每一页，而且浸透了拉季谢夫的全部实际活动。试回忆他在麻织品检查员一案中的表现罢：他的所有同事，包括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在内，都认为必须惩办检查员。只有他一人相信检查员无罪，而且坚持了他的这一信念。他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保持了这种勇敢的爱真理的本色；正因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爱真理的表现，所以它是18世纪俄国文学史上最卓越的现象之一。

普希金说它是一部很平常的书。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象普希金这样聪明的人，这样精细的批评家，犯了这样的错误，真是出乎意料。

拉季谢夫这一名著的最重要缺点，是文字粗糙。这一缺点是由于我们作家的成长条件。他在童年必须掌握法文。后来拉季谢夫又精通德文和英文。而俄文，则象当时几乎常见的一样，是学习赞美诗和东正教日历经；也就是说，所用课本最多也只能讲授教会的斯拉夫语文。在他到莱比锡时，他和他的同学都无法学习俄文，他们开始忘记俄文。在回到俄国担任官职后，拉季谢夫立即感到他的俄文程度很差，并努力弥补他的学识的这一缺陷。但是，就在这时，他也主要是用教会的斯拉夫文书籍来学俄文的。因此，在他的著作里，处处都碰到“斯拉夫古文的词汇”。这给他的文风带来了一种陈腐古老的性质。尤其坏的是，拉季谢夫愈是精神贯注，愈是觉得他所写的问题的重要，便愈是要给他的思想加上一层艰深累赘的教会斯拉夫语文的装饰。当然，那时使用罗蒙诺索夫所主张的“高尚文体”的习惯，尚未完全消灭；他很可能对于当时的读者，不曾造成象现在对于我们这样使人沮丧的印象。但是，与拉季谢夫同代的俄国作家还是使用了这种“文体”的。例子就在眼前：佩平，韦谢洛夫斯基和若干其他作家认为出自拉季谢夫手笔的西尔弗·达尔诺维德的书简，便是较为易懂的俄文写的。顺便指出，这些书简的这一特点，

① 《克雷洛夫文集》，第2卷，第355—357页。

② 《厌世者》(«Le Misantrope»)，第1幕，第1场。

成为反对所谓它们出自拉季谢夫手笔的假设的颇为重大理由。但是，不管这一假设是否正确，无可怀疑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文字，就在那时也是古老陈旧的。

在现时的读者的眼光里，这本书的另一缺点是过于"敏感"。但那时伤感主义的情绪象流行病一般传播着；看来拉季谢夫的敏感，与其说是缺点，毋宁说是优点。

读《旅行记》时，强烈地感到这两个缺点。但是，这本书读得愈是仔细，则其缺点所造成的印象愈是淡薄，而从内容上得到的印象，则相反，愈来愈是加强，所以……。

II

关于拉季谢夫的评论

波布罗夫——维诺格拉多夫——奥列阿里

《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1782年8月8日，1907年版，第1卷。

第71页，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见，表明意识到社会主动精神的缺点。

第75页，关于君主专制政权的值得注意的意见。

第2卷 《论人》

第143页，他仿佛是一个活力论者。注意，关于活力论，第143页和第291页。

第147—8页，——拉季谢夫的认识论

第150页，(0)拉美特利：拉季谢夫不同意他关于人—植物的观点。

注意——拉季谢夫的目的：指明等等……

第153页——拉季谢夫自相矛盾：他关于动物能思考的意见。比较博布罗夫的第2条附注，87：不仅对博布罗夫为"显而易见"的东西，才是"显而易见"的。还有某些别的东西。

第155页——拉季谢夫对比逢的反驳是没有根据的。

第157页——关于手的问题对爱尔维修的反驳，也是一样。

注意第162页——对丑化，如惩罚的愤怒之词。

对拉季谢夫的反驳

第 168 页——动物有内在的感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与第 193 页比较。

第 175 页——关于严厉措施和惩罚。

拉季谢夫的人道精神

注意第 178 ——几乎完全摘录爱尔维修。人类智能发展史。

注意——与第 175 页比较。

第 180 页——还是爱尔维修。

第 191 页——究竟什么促使拉季谢夫相信永生不死。不是理性，心：自我安慰的需要。很重要。

第 193 页——注解：拉季谢夫所指的是"一个所谓人类的灵魂"。

第 196 页——拉季谢夫谈到"一位普里斯特列伊医生"，以及他的经验，等等。博布罗夫教授在所著《哲学在俄国》一书的第 3 辑 122 页上，反驳拉季谢夫，说他是在证明自康德以来谁都不曾争论过的问题(一切都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但拉季谢夫(他的结论在 199 页)在说到不可知是一种虚构的特性时，显然是在重复普里斯特列伊的意见。

"普里斯特列伊引导我们去认识他的判断"——202。重要。

注意第 198 页——"唉！我们必须用手摸着走路，多么快地超乎感觉之上啊！"

第 203 页——"说无作为是自然的特性，显然不通。"

第 203 页——"运动是物的共同性质"。

第 203 页——"运动与物不可分"。

第 203—206 页——拉季谢夫在这里和其后各页，是唯物主义者。特别注意第二卷 214 页上的结论。

注意——自 215 页开始到 225 页结束的唯物主义独白，也是在普里斯特列伊的影响下写的。

对于唯物主义独白，拉季谢夫感叹地答道："残酷无情！"等等；226 页。

拉季谢夫对唯物主义者的反驳，从第 3 卷开始，但什么也未驳倒。这些反驳是建立在简单的 petitio principii (预期理由)上的。例如，第 235 页：这里假定灵魂是一种同躯壳分开的单独实体，而唯物主义者所反驳的正是这一点，所以拉季谢夫不得不对此加以证明。

在第236页——又是 petitio principii (预期理由)。只有在确认灵魂作为单独实体的存在,已获证明时,问题才有意义。

(在«仁慈的苏拉列特»里,他是一个万物有灵论者,第9页)。他自己感到这一点,见237页。

第237—8页——"如果物质是无作为的,是处于死的静寂中的,那它就应该永远是死的。"但在上面,这个"如果"已被坚决驳倒。第239页——可用H和O不等于H_2O的例子来同他的颜料例子对立。

在第243页——见解不无机智,但无说服力。

第245页——又是 petitio principii (预期理由)。

第246页——他没有证据地断言,Sein 须以 Denken 为前提,亦即 Denken 先 Sein 而存在。

248——关于物"高于人和不可见的力"的"必然"假设的评论,很无力量。

第249页——"难道人是创造的结束?"而如果不是,又为什么?与什瓦尔兹比较,第252页。

注意第251页——拉季谢夫认为可能,生命力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中介。

第252页——从力的不灭到认定灵魂不灭。

第269页——第4卷的开始。"亲爱的,这就是为了维护灵魂不死所能说的一切。"

这同他在前几卷所说的略有矛盾。

注意——这是他为了维护灵魂不死而作的结论的归纳。

注意第270页——自己承认是白日作梦;比较第276页。

第275页——论伟人生活中各种条件的意义,很重要。与第178页比较。

注意279页——拉季谢夫的认识论。

第284页——幼稚的结论。超级幼稚。

第285页——拉季谢夫"应该说,灵魂在脱离躯体时,仍然存在"。

第288页——称莱布尼茨为"思想伟人",与第2卷比较。

437(信)

注意,第293页——拉季谢夫的最后结论。

在1791年11月26日的信里,咒骂爱尔维修。

第350页 II——论农奴制。

第371—372页——同上(注意)。

注意第 396 页——许多俄国诗可成为安眠药(例如，他自己的诗——著者)

信，第 2 卷

第 440 页——谈到他衰老了。

第 457 页——他的灵魂悲伤，内心难受。

关于他的论永生的书的解释

第 459 页——书的不合理要求。

注意第 460 页——历史哲学。

第 475 页——拉季谢夫的"全部哲学""消失了"；与 479 页比较。

第 483 页——书。

第 490 页——1792 年，他同情地谈论康多尔塞。这种谈论是不能期待于雷纳尔的。

注意第 490 页——关于书籍和杂志的申请。